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鸿儒遍天涯



自序

作为我个人的文集，应该说这是第三本了。然而前两个集子，编就后适逢“文化大革命”发生，因我被株连为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分店及黑帮分子，数次被抄家，家产和图书全部被洗劫一空，两个集子的书稿也被扼杀于襁褓之中。当时集子已有书名，初集为《学步集》，次集称《独行集》，是应一家出版社约稿结集。尽管那些杂文，以现今眼光看，无论文字，还是思想，都极其稚气，且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并不值得留念；但就我个人的过来的脚印说，也算是舞文弄墨的历史了，这里也当作个交待。

吾生也晚，加之学养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进入学术界的时间不仅很晚，而且从事中国现代学术史的研究也属业余爱好，并无师承可言，完全处于一种自我感觉、自我摸索之中。从严格意义上讲，根本称不上所谓的正规研究，论史料倒掌握了一些，就思考说尚无系统可言，所接触的人物和事件、所议论的问题和症结，似乎是有感而发，但是见解多属浮光掠影、浅尝辄止而已。

即使如此，也是得益于70年代末的解放思想运动，继之主编《晋阳学刊》十年，有了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有了展布学术的媒体条件，才使余有可能跻身于学界，将自己长期思考的中国现代学术史的课题部分地实施。由于50年代以来，政治运动频繁，学术研究无自主可言，学者把主要精力牺牲在了阶级斗争中；当“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本世纪前后出生的学者均已进入耄耋之年，多数于学术研究已力不从心了，然他们却是近一个世纪的亲历者，在其大脑中储存着丰富的文化学术史料。由此想到了学术史的前期工作，即抢救老一代学者的口碑史料，这就是《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丛书的由来和续编同名大辞典的动因。

于约组传略的过程中，余有机会接触到国内许多著名学者，他们既是师长，又是忘年交之朋友，这些前辈的学术造诣、治学精神及人格力量，都给予我受用不尽的影响，为我进入学术史领域有着师范教诲的作用，当然由于自己的愚钝而难以学到这些先生的万一，这是常令自己遗憾和惭愧的事情。还有，在余进入学术史领域后，又见丁东、谢泳、智效民等相继研究20世纪知识分子群体和学术思想史，他们都比我年轻，他们的学术悟性都比我见长，他们的思维视野都比我新颖，他们的思考方法都比我独到，我周围事实上形成了一个群体，常在一起碰撞切磋，给予了我研究写作上的诸多启示，在我的作品中是离不开他们的帮助的。

1997年4月4日于速朽斋

“五四”前后：现代学术生态环境

时代跨越到 20 世纪，现代学术的特征之一就是中西文化学术的交融性程度好，“五四”前后，西学被大量地介绍与引进到中国。

说现象，那个时期实在是乱极了，外来之主义、思潮和学说可谓多矣，但从社会与历史的大变动，从文化学术的发展规律看，它却创造了极为优良的文化学术繁荣的氛围。如果说“五四”前后，可以称之为中国现代文化学术史上一次百家争鸣的历史时期的话，它之积极意义，不仅在于开创了一个开放宽松的时代，而且出现了中西文化学术的碰撞和交融，造就了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家，产生了一系列学贯中西的著作。

在这时期，出现了一批引进西学有贡献卓著者，他们是把中国现代人的眼界打开之先驱者，是把中国文化学术建立于近代科学基础上的划时代人物；即使有些人物在他们的前后期，思想倾向发生了变化，甚至在政治上趋于保守，但也难以抹煞其启蒙思想家的光辉。

今年正是严复著译《天演论》问世一百周年。人们在“西学东渐史”上，首先要论及严复，原因在于“西学”从明末传入中国以来，长期译介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只是到了严复时代，他才率先系统地引进了进化论、唯物主义的实验论、古典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和逻辑学著作，它在中国思想界和文化学术界的振聋发聩作用，就在于其在思想史上的重大飞跃，使得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活动从感性认识上升到了理性认识，从现象迈进到本质的过程中达到了一个崭新阶段。严复翻译的八种名著多出版于 1903—1912 年之间，通过译介西方社会科学著作给 20 世纪的中国带来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可以说：“从严复同代或稍晚一些的人，到鲁迅的一代，到比鲁迅更年青的一代，无不身受其赐。”

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改良主义的小说理论在国内盛行，严复和梁启超、夏曾佑等都强调小说有不可低估的感染力。梁启超创造性地提出与“经史子集”并列的“说部”。而林纾一生翻译了 179 种欧美和日本小说(作家计有莎士比亚、狄更斯、欧文、笛福、斯威佛特、孟德斯鸠、大仲马、小仲马、雨果、巴尔扎克、列夫·托尔斯泰、塞万提斯、易卜生和德富健次郎等)，其开近代翻译小说之先河，功不可没。

马君武于青年时代受到维新变法影响，1901 年留日后接触到西方新思想和学说，陆续译介了斯宾塞《女权篇》、达尔文《物竞篇》(合刻 1902 年)、斯宾塞《社会学原理》(1903 年)、达尔文《天择篇》(1903 年)、约翰弥勒《自由原理》等西方名著，均列入“少年中国丛书”出版。1905 年他最早向我国译介拜伦《哀希腊》，1913 年翻译了歌德的诗歌，1916 年翻译了席勒的剧本《威廉退尔》，被文学史家推为有影响的名译之一。他还先后翻译过自然科学，在 30 年代仍然继续翻译了达尔文重要著作《人类原始及类择》和海克尔的《自然创造史》。他认为进化论的出现，摧毁了唯心的造神论、目的论、物种不变论，给宗教以沉重的打击，可使人们从迷信思想中解放出来。马译虽在严译之后介绍进化论及西方学术，但它系列性地追求和适应社会需要的意义不可低估。

在本世纪初，被译介引进中国的主义、思潮和学说，简直多到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可是最后历史和文化还是作出了自己的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同样是从外国引进的，可是它却在众多的主义、

思潮和学说中被中国接受，使中国现代历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译介史上，有这样一些学者名垂青史：李大钊、李达、瞿秋白、陈望道、蔡和森、陈启修、杨贤江、王亚南、郭大力、沈志远、何思敬、张仲实、吴亮平等。当然在介绍西方其他学说方面的内容，也不应忘记王国维、胡适、鲁迅、杨昌济、汤用彤、李石岑、张东荪、张申府、余家菊、蒋维乔、谢幼伟、陶希圣、孙本文、吴文藻、高觉敷、任鸿隽、张耀翔、梁实秋、朱光潜等学者的贡献。

张申府在回忆他介绍西方学说时讲：“有些现代的新学说新人物都是我第一个介绍到中国来。有些名字也是我第一个翻译的，后来都流行了。特别是罗曼·罗兰、罗丹、罗讷、巴比塞、伊本纳兹，等等都是。以后大大同情中国的罗素尤其是一个。这是我对于国家的一种贡献，我深自引为光荣。”他是最早向国内介绍罗素哲学的人，特别推崇罗素的数学逻辑理论。他在推崇罗素哲学的同时，又接受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虽然看到了二者之差异，却不认为存在着本质的不同，而认为二者可以结合“互补”。他认为这两种哲学有着某种相通之处。他还从两种学说的某种共同背景中阐发了自己的见解。我们从这里看出，一个学者介绍某种文化学术，绝非是一种盲目举动，而是基于其理解基础上的。如果以封闭僵化的心态排斥之，必然难以吸收到世界文化学术中的有益因素。开放引进与吸收外来文化学术，有如吃饭，善食者长，不善食者病，关键决定于自身。

对于那种既无接触西方文化学术的经历和机会，又与国外隔绝而缺乏西方文化学术资料文献，却在那里大言不惭地大谈西方文化学术的缺失和中西文化学术交流，以揣度、成见和主观推断而排斥之，确实带来了许多后遗症。有鉴于此，在开放改革的今天，实在应该继续破除一下思维僵化、意识偏见和自以为是的迂腐积习。

1995年5月

家学：现代学者成名渊源

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大辞典》出版后，受到了学术界之称誉。有鉴于此，有友人提出要我写些编撰随笔，他说：“由这部大辞典我想到一些问题，如为什么三四十年代，中国出了这么多的大学者群(第一流)，而这些学者水平和今天中青年学者比较(尤其是文史哲)，可以说还无人能望其项背。我兄于主编此书，足可以发一些客观之见，探窥其原因及其轨迹。”显而易见，这是一个极难做的题目。

学者群的产生，当然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其中涉及到时代背景、历史条件、学术传统、文化氛围、师承关系、家学渊源以及个人勤奋等多元因素。

本文只谈家学。

中国历代学者都重视家学渊源。家学可理解为家庭世代相传之学。家学世代相传，说明根基深厚。明呈植《<剪灯新话>序》有“宗吉家学渊源，博及群集，屡荐明经，母老不仕”之说；清钱谦益《浙江布政使引右参政青叔元授中大夫父芳加赠制》中也有“盖不独先河后海，礼不忘始；而家学渊源，名教积习，亦有可以考见者焉”之载，可见家学之重要。到了本世纪前期，随着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家学渊源虽不及清以前为重，但在学者世家仍保持着它的地位及其传承力度。

辞典中收编了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严复和陈寅恪等跨世纪的学者，他们之有家学渊源，自不待言。据《康南海自编年谱》载，其世以理学传家，祖父道光举人，治程朱理学。康有为自幼即受儒学思想熏陶，五岁“诵唐人诗”；八岁“读书经”；九岁“从崔清献词”；十一岁“览纲鉴知古文”、“观《大清会典》、《东华录》而知掌故”，“读明史，国志”；十三岁“从陈蕃先生学”八股文；十四岁“应童子试”。从少年就决定了他要走一条童生、秀才到进士而进身的仕官道路。从他后所著之《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更不难看出他的家学根底。康有为长女康同薇，自幼力行其父主张，为近代妇女界开新风的著名代表之一；十五岁即据二十四史编纂《风俗制度考》，后大量翻译日本书籍，协助其父编辑《日本变政考》、《日本书目志》；创办《知新报》，是中国第一位女报人，是中国最早的妇女报刊创办人之一。

梁启超祖父、父亲都是当时颇有势力的乡绅，其本人1889年考中举人，在众多学术领域都有重要开拓和贡献；其弟梁启雄、梁启勋，都是著名学者；其长子梁思成是很有成就、有影响的考古学家、古建筑学家，次子梁思永在考古学、人类学方面均有建树。

在本典中可以看到众多父子学者，诸如严复与严群，柯绍忞与柯昌泗，商衍流与商承祚，马衡与马彦祥，柳亚子与柳无忌，黄文弼与黄烈，朱孔彰与朱师辙，马宗霍与马雍，光晟与光仁洪，金光平与金启琮，吴孟复与吴怀祺等；可以看到大量兄弟、兄妹学者，诸如陈衡恪及陈寅恪，沈兼士及沈尹默，张尔田及张东荪，张申府及张岱年，冯友兰及冯沅君，蒙文通及蒙思明，鲁迅及周作人，潘梓年及潘菽，容庚及容肇祖，吴其昌及吴世昌，吴景超及吴承禧，陈邦怀及陈邦福等。有趣的是，还有许多叔侄学者，像黄侃与黄焯，顾廷龙与顾颉刚，傅斯年与傅乐成、傅乐焕等；还有许多夫妇学者，像陆侃如与冯沅君，钱钟书与杨绛，费孝通与王同惠，张耀翔与程俊英，蒋孔阳与

濮之珍，严景耀与雷洁琼等；还有翁婿学者，像余嘉锡及周祖谟，童书业及黄永年等。这种祖孙、父子、翁婿、叔侄、兄弟、姐妹、夫妇同典的情况，除了所反映的家学渊源之风范外，从另一角度也可体现师承关系等文化传统。这种情况，为什么到了当代却又少见了呢？其中道理及其原因，确需深入探讨，很可能是有益于当代及今后的文化学术发展的事情。1994年12月

师承：现代学术繁荣渊源

中国学术，历来讲究师承。“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师说》)。”师承者，后指授受有源而学有所出，或指学术、技艺上之一脉相承也。到了现代前期，师承之风仍盛行，师承名师门下者，大有人在，而且名师出高徒，对现代学术发展举足轻重，影响深远。

仅以清华国学研究院为例，当时在吴宓主持下聘请了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为导师，他们先后到底培养了多少弟子，不得而知，然从已经掌握的名单看出，在他们授受的学生中，已不难想像到在中国本世纪的学术传承中的作用和影响了。

王国维作为一代大师，基于他之学问的博大精深，故而造就出多元人才，造就出学术造诣很高的弟子。这里开列之名单有，治考古学者：徐中舒、朱芳圃、戴家祥、吴其昌、何士骥、余永梁、吴金鼎；治历史学者：谢国桢、卫聚贤、刘节、蒋天枢、史念海、姚名达、方壮猷、王静如、兰文征、陈守实、王庸；治经学、小学、先秦诸子者：高亨、刘盼遂、杜钢百、杨筠如、侯爵；治文学者：罗根泽、陆侃如、虞君质；治语言学、音韵学者：王力、黄淬伯、赵帮彦、颜虚心；治目录学者：赵万里、刘纪泽；治中国法律史者：杨鸿烈。

在师承问题上，不少学者不仅强调师承，而且注重名师，“转益多师是汝师”即是其师道所在。在现代学者中，蔡尚思、曹聚仁、唐长孺、王利器、靳极苍、胡道静、周绍良、陈子展、傅乐成、杨廷福、斯维至、顾学颉、洪焕椿、张振佩、李希凡等，在治学过程中，所行奉的都是多师说。蔡尚思为实现其“死也要到北京去求名师”的志愿，不顾穷困、不惧长途跋涉、不在乎人地生疏，敢于写出上清华研究院、北京大学研究所诸名师书，表现了强烈的求师若渴精神，终于受到了梁启超、王国维、陈垣、朱希祖、江瀚、梅光羲、陈大齐、李翊灼等先生的教诲和指导，使其受益良多。胡道静有着良好的家学渊源，其父胡怀琛于文史哲皆精，伯父胡朴安长于考据学及古文字学，但在考入上海持志大学国学系后，仍师从多师请教。“师承陈乃乾之版本目录学，还从周予同学习经学史，从吕思勉学习中国通史，从姚明辉学习历史地理学，从姜亮夫学习音韵学、敦煌学，从王庸学习地理学史，从陈守实学习因明学，从顾颉刚学习史学史，从辛树帜学习农业生物学，从蔡尚思学习思想史，从闻省学习语言学、古文字学，从胡先骕学习植物学等，并学习辑佚学和校雠学，然后专攻于古典科学技术方面。”

这种优秀的师承传统，虽然到50年代由于不断的政治批判而被破坏了，但在40年代末尚有短暂的继承。比如李希凡说他在山东大学文史系听课时，两年间一方面受教于他姐夫赵纪彬，一方面设法旁听多师授课，其中有杨向奎的中国古代史、王仲萃的魏晋南北朝史、丁山的古史考辨、陆侃如(古代部分)和冯沅君的中国文学史(中古部分)、萧涤非的魏晋南北朝诗、殷焕先的《说文解字》、赵纪彬的哲学概论等。

在现代学者中，亦有大批自学成才者。所谓自学成才，并非“无师自通”，而是指他们在社会实践中多方钻研、多方求师而走向了专业治学的程度。自学成才者，实际上所走的仍是多师之路。在自学成才的学者中，可见有梁漱溟、钱穆、戈公振、王云五、陆费逵、唐兰、郑逸梅、黄云眉、华岗、童书业、张舜徽、严北溟、周原冰、吴江、贾兰坡、王芸生、唐弢、薛暮桥、张

颌、赵纪彬、叶圣陶、姜椿芳、江地、武新立、宋振庭、孙用、陈辽等等。我曾经采访过自学成才中的若干位学者，他们所以能在学术的某个领域能有所成就，除了自身的聪明好学外，实际上都有着他们的各自的师承道路和师承方式。不过也无需掩饰，自学成才者虽成为某方面的专家学者，但与经过学府熏陶和名师系统指导的学者相比，在文化与学术造诣方面，更会显出某些先天不足。

1995年3月

寻找火种：20 世纪初 由日本转口输入西学及其他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引进西学有大幅度进展，令中国有识之士刮目相待。戊戌变法前后，中国有识之士形成一个共识，要学西方，必须先学日本。

于是，中国知识分子纷纷东渡，涌向日本。孙中山指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输入欧美之新制度，改革国政，迩来国运发展，以成一大强国”，“若中国以其固有之文明，转而用之，突驾日本无可疑也”。为此，举国上下把游留东瀛视为富强之捷径。由 1896 年清廷选派十三名留学生始，几乎呈年年有增之势，到 20 世纪初的前几年，简直到了狂潮巨涌的地步。据有关统计，1901 年是二百七十四人，1903 年即已一千三百人，1905 年增至八千多人，到 1905 年竟骤达一万二千人，……其势头到 1937 年留日学生总数到五万余人。在近现代中国留学史上，超过赴美、英、法、德等任何一国，居世界之首。

20 世纪初期的留日学生后来成为中国政坛风云人物的举不胜举，诸如黄兴、蔡锷、廖仲恺、吴玉章、秋瑾、陈独秀、周恩来、董必武、阎锡山、杨度、王宠惠、沈钧儒、张澜、于右任、蒋介石、孙传芳、许崇智、汪精卫以及五四运动中显名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人。在文化学术领域中著名文人学者尤多，如杨昌济、鲁迅、朱执信、谢无量、马君武、刘师培、张君勱、章士钊、张季鸾、钱玄同、李大钊、陈望道、丁福保、杜国庠、王国维、李达、张东荪、任鸿隽、范寿康、黄序鹈、吕徽、陈启修、朱希祖、马衡、孟森、杨端云、丁佛言、李叔同、郭沫若、丰子恺、夏丏尊、欧阳予倩、蒋方震、贾士毅等。

留学日本热，其直接的功利即是辛亥革命运动的开展，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核心骨干及领袖人才。孙中山曾指出：“革命党之发源，都是在东京方面”，“充任革命党之干部者为日本留学生”，“创造民国者，建国最有功之人”，都是留日学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留日学生的光辉业绩，就是熔铸了中华民国之丰碑。还要看到，在负笈东渡的队伍中，其中之出类拔萃者，后来都先后投身于民主革命的洪流。

留学日本热之深远意义，应该说是译介西方著作、传播西方科学技术和西方思想文化。据熊月之先生统计，从 1896 年至 1911 年，翻译和出版日文书籍的机构至少已有九十五个，其中五十七所设于上海，其余则在杭州、武汉和日本东京。从 1896 年至 1911 年的十五年间，中国译介的日文书籍至少在一千零一十四种；从 1896 年至 1937 年的四十二年间，从日文译成中文的著作就有二千六百零二种。其数量既远超过此前半个世纪中国译介西书之总和，也大大超过同时期中国译介西书的数量。正如郭沫若指出：“通过日本学习西洋的文化，……有巨大的收获，这个收获，既有助于打破中国古代的封建因袭，同时又有促进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作用。换言之，近代中国的文化，是在很多方面受了日本的影响的。”（见《中日的文化交流》）

在由日文校译西学的著作中，除自然科学、医学和教科书外，在社会科学领域各学科，都有许多重要著作转译。在哲学方面，首次较为系统地将西方哲学体系介绍进中国，日本哲学家井上圆了《妖怪学讲义录》，由蔡元培于 1906 年翻译出版，被学界认为是中国介绍西洋哲学之代表。这部著作所以为学界重视，如张东荪指出，它“代表日本人初期接受西洋哲学的态度和反

应”，而蔡译介此著，“亦是代表那个时候中国人对于哲学的态度，这乃是西方哲学初到东方来的应有的现象”。（《文哲月刊》1卷1期）译作最多的学科，首推法学、政治学，从《国家学原理》（1901年）、《万法精理》（1903年）、《欧美政体通览》（1903年）、《法学通论》（1906年），到各种政治制度、各种具体法规法制，都有译作引进。由于当时中国处于大变革的前期，这方面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各界有着高度吸引力；而且这方面的著作，将西方国家观念、法制观念、天赋人权观念、自由平等观念，集中地、系统地、具体地引介进来，其影响之广泛而深远是可想而知的。在社会学、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社会进化论、社会主义、帝国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学说的译介。这时，不仅达尔文、赫胥黎的社会进化论在日本已广为传播，而且孟德斯鸠、卢梭、黑格尔、康德、笛卡尔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也在日本甚为流行，连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通过日本学者幸德秋水、河上肇、宫川寔等人的翻译，也在日本出版发行。尽管前已有严译之达尔文、赫胥黎的社会进化论和孟德斯鸠等民主革命思想著作的翻译，但日文转译这类著作却有着不可替代的普及广泛意义；尽管此时的社会主义著作，较多地有着空想和无政府主义色彩，但对于先驱者而言，不仅有启蒙作用，而且在其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和实践过程中，是其扬弃和超越的必然条件。

从日本转口输入西学，固然有它的特殊历史条件和有它的特殊意义，但是也不可否认它的负面影响。长期以来，中国引进的西学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由第二种文字转译，其原著思想的准确性和纯洁性，是有折扣的。这里有语言的多次转换，译者的学术文化造诣及其思想水平的过滤等问题。

1995年8月

先驱者：五四时期的新村运动

20世纪初年的中国，思想领域空前热闹。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先后，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新村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以及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等也纷纷传入中国。

20世纪初，人们的乌托邦理想，曾集中在“对于新村有着极大的憧憬”（周作人语）上。当时新村运动风靡一时，不但为五四运动中大部分领导分子所关注，且对于在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我们发现，在其倡导者中，除了人们所熟悉的周作人外，就连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罗家伦、王光祈、瞿秋白、周恩来、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都曾热衷过新村运动以及相类似的工读互助团等运动。刘少奇后来在回忆五四运动时说：“在起初各派社会主义的思想中，无政府主义是占着优势的。”以后，随着中国社会和他们自身思想的发展，经过人们不断的探索比较，虽然将一些理论和学说逐步扬弃了，但是在新的历史选择和历史实践中，仍难以摆脱过去的某些影响。

如何理解这种历史现象呢？

在中国，最早接受和介绍无政府主义的是旅欧、留日的知识分子和一些同盟会会员。从1903年至1907年，先后有《无政府主义》（张维编译）、《自由血》（金一编）等书出版，有《民报》《新民丛报》、《天义报》《衡报》和《新世周报》创办与发行，其骨干是刘师培、张维、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等人。到1912年，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理论宣传，可以说达到了系统化的程度，其代表人物是刘师复、郑彼岸、莫纪彭、黄凌霜、区声白、朱谦之、郑佩刚、李卓、晓星、周太朴等，并且形成了不同的派别，计有无政府共产主义、无政府个人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其主要表现是：其一，在全国各地，新村运动、工读互助团等从开始即是从“小组织的提倡”始。诸如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南京、四川、湖南、湖北、山西、江苏等，出现了很多无政府主义小团体。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在五四时期，其著名团体有：毛泽东等的“新民学会”（1918年4月），傅斯年、罗家伦等的“新潮社”（1918年11月），王光祈等的“少年中国学会”（1919年6月），周恩来等的“觉悟社”（1919年9月），以及“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无政府主义讨论会”、“无政府共产主义传播社”，等等。国内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甚多，在知识分子中研究和宣传者呈逐步增多趋势，就不全的统计，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也不下九十多个；其二，创办和出版的阐发无政府主义或侧重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报刊杂志，已多达七十余种，实际上曾介绍和宣扬过无政府主义的报刊杂志，总不下数百种之多。

无政府主义思潮所以能形成广泛的影响，是与无政府主义者从一开始就标榜自己主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密切关系的。中国初期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宣传攻势，一是将主要矛头针对封建专制主义，指向了黑暗腐朽的军阀统治；二是引导人们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被忽略的社会问题，鼓吹工人农民是社会的主人，提倡“劳工神圣”，主张财产公有、人人平等劳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在五四运动前后，许多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有合作的历史，并不像后来那样尖锐对立，故而易于博得青年学子的好感。

还值得注意的是，无政府主义思潮所以能在中国一度流行，并有大范围和深层次的传播，也与中国当时的国情相关，有着适合它的土壤及其气候。

一则中国是一个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由于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极端憎恶，强烈渴望把它们彻底扫除干净；二则作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与社会上濒于破产的小生产者有着紧密的联系，自身也有追求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平均的个人主义趋向，而且二者极易结合起来；三则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和老庄虚无主义的深刻影响。长期习惯于分散经营的小生产者，天然地厌恶和抗拒国家、政治、法律及其权威，而将个体的绝对自由看成为至高无上的价值取向。加之当时就国内而言，辛亥革命失败，国家仍处黑暗战乱之中；就国际环境而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着沮丧、彷徨和悲观、绝望情绪，“资本主义恐惧症”亦影响着中国。面对着当时国内外的种种条件及形势，就连一向政治态度温和与主张改良的梁启超，都大有“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了”的感慨，在《欧游心影录》中竟这样说：“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

当时，新村运动等无政府主义思潮与社会主义思潮，在鼓吹的理论内容及其基本原则方面，具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都带着浓厚的乌托邦色彩。我们翻阅《毛泽东早期文稿》，不难发现他“数年来梦想”的“新社会生活”，就是每日“睡眠八小时，游息四小时，自习四小时，教授四小时，工作四小时”，“工作之事项，全然农村的”。“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这样的“新村”、“新生活”，不仅没有现代工业，而且取消了商品流通。在《恽代英日记》中，可以看到“新村”内部“完全废止金钱，没有私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村内衣服都要一致，能男女都一致更妙。”“新村”运动的倡导者们甚至设想，新村里“没有行政司法等组织，也没有规定的法律训条”，一切依靠其成员的“个人”的理性与道德自觉，实现其“道德完善的个人主义”和“道德完美产生社会秩序”的“大同”理想。于是在分不清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本质区别的初期，很多人甚至许多知识分子，把无政府主义当作社会主义而信奉与追求，是毫不奇怪的。

随着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入，新村运动的若干成员由空想社会主义转向科学社会主义，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于是其理论与实践也发生了扬弃与超越。

1995年4月

寻求真理者：五四时期 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

中国人知道社会主义，约在 19 世纪 70 年代，但作为思潮、学说在中国传播，则是 20 世纪初年了。最早介绍和引进社会主义思潮、学说的人，是梁启超、马君武、朱执信、刘师培、江亢虎等。

19 世纪 70 年代，江南制造局编辑《西国近世汇编》，最早介绍社会主义学说及其动态。在中文报刊上出现的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是茂林(梅林)，其译作是刊于《西国近世汇编》1877 年第 2 卷的《日耳曼民党通议》、《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中国人知道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始于 1899 年 2 月上海广学会《万国公报》连载之颌德《社会的进化》，文中称马克思为“百工领袖”，德国有“讲求善民”学者，“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斯”。

1902 年和 1903 年，梁启超先后发表了《进化论革命者颌德之学说》、《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文中称麦喀士(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之泰斗”、“鼻祖”。

1906 年，朱执信发表《论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一文，前一年先刊出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他是中国最早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界定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他指出：“顾自马尔克(即马克思)以来，学说皆变，渐趋实行，世称科学的社会主义。”

说到对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最早介绍，就要说到中国达识译社翻译的日本幸德秋水所著《社会主义神髓》一书了，日文原本出版于 1903 年 7 月，中文译本仅相隔两个月就面世了，这反映了当时中国学界之求知渴望及其传播西学的神速。此著可视为日本明治维新时代水准最高的社会主义理论著作之一，以《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二书为基本依据，表述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观点，不失为一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读物。除达识译社译本外，在 1906 年和 1907 年还有两种译本。这本著作成为 20 世纪初流行相当广的读物。

刘师培等于 1907 年 6 月在日本创办了半月刊《天义报》，主要宣传无政府主义主张，同时也成为中国最早译载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重要刊物。该刊曾于 1908 年先后多次摘译刊出《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章节段落及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论著，并在他们写的序言和按语中，肯定和评价了马克思、恩格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阶级斗争理论“最有裨于历史”，“对历史发明之功甚巨”，认为可以之“考究当时思想之变迁，欲研究社会主义发达之历史者，均当从此入门”；提出“欲明欧洲资本制之发达，不可不研究斯编”，“讨论史编，亦不得不奉为圭臬”，还提出“经济变迁实一切历史之枢纽”。尽管无政府主义者在评价社会主义学说时不能避免偏见，然而以上见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显示了不可低估的价值。

当然，有一个情况也不应忽视，到了 1907 年至 1908 年，前些年出现的译介社会主义学说的热潮，不仅未有进展，反而开始冷却，被当时泛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所压制。历史进程的这一曲折终究是短暂的，随着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的普遍化和深刻化，驱逼着人们重新去寻求改造社会的真理。

1911 年 8 月，江亢虎在上海发起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到 11 月又在此基础上公开宣布成立社会主义政党——中国社会党。在中国，江亢虎是第一个自称“夙信历史唯物论”的人，“余极信仰社会主义”，并称“共产

主义乃社会主义之中坚”。他于1914年发表《社会主义学说》一文，提出了“社会主义各派进行之方法”有六种：政治运动、军武革命、同盟罢工、暗杀暴动、模范殖民、鼓吹传播社会主义学理。直到1920年11月，江亢虎作《社会主义之今昔》的讲演，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为“物质主观”，认为“社会的经济是基础，宗教和政治、法律、制度等项，皆建筑在这基础上。基础一动摇，上面的建筑物，自然不能安稳。所以社会物质的生产力，发达到一定的程度，旧有的生产关系，受了压迫和束缚，两方面就起了矛盾。不久定要冲突；冲突的结果，旧社会存在不住，生计问题可以圆满解决，有一种自然的趋势。”他进一步强调：“马氏用这种唯物的眼光，观察欧洲各国历史，不但由以往变到现在如此，循着这条路推到将来，必定还是如此。”不难看出，江亢虎自视其第一次运用历史唯物论进行社会分析，无论如何是难能可贵的；致于后来之讲演，时间已过五四运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已出现，其道理已是李大钊等系统论述之后了。

就江亢虎思想而论，可以说集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机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于一身，从其后来坠落为政客和汉奸看，也许可以得到印证。

最初译介社会主义学说者，还有邓实、赵必振、周子高、杜士珍、侯士绶、冯自由、仲遥、胡汉民等人。

1995年6月

门槛里外：现代学者中的“遗民现象”

现代学者的第一代，大多出生于上个世纪。他们在那个世纪，不仅完成了学业，而且参加了科举。好多人经过辛亥革命洗礼和五四运动启蒙，虽然他们的身子进入了20世纪，但脚跟却还站在19世纪的门槛上。尔后在他们之中，依其地位、利益、经历、视野和环境的区别，而在时代的更迭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态势，有的随时代前进，甚至还是弄潮儿和运动先锋；有的被潮流裹胁着，最终跟上了时代；有的忽儿前行忽儿倒退，常有反复；有的则甘当时代反动，被历史抛弃。

我把这种复杂情况，称之为“遗民现象”。

由我主编的辞典，收入了一大批跨世纪的学术人物，有张謇(1853—1926)、马其昶(1855—1930)、刘尔炘(1865—1931)、严复(1854—1921)、郑观应(1842—1922)、龚道耕(1876—1941)、康有为(1858—1927)、姚永朴(1862—1939)、廖平(1852—1932)、章炳麟(1869—1936)、梁启超(1873—1929)、吴虞(1872—1949)、杨昌济(1871—1920)、丁谦(1843—1919)、沈曾植(1850—1922)、欧阳竟无(1871—1940)、罗振玉(1866—1940)、王国维(1877—1927)、蔡元培(1868—1940)、张元济(1867—1959)、陈独秀(1879—1942)、傅增湘(1872—1949)、柯劭忞(1859—1933)、邓之诚(1887—1960)、柳诒徵(1880—1956)、柳亚子(1887—1958)、冀贡泉(1882—1967)、朱起凤(1874—1948)、商衍鎏(1874—1964)、孟森(1869—1937)、金梁(1878—1962)、杨度(1875—1931)、江亢虎(1883—1954)、刘师培(1884—1919)、陈寅恪(1890—1969)、吴宓(1895—1978)，等等。此中入典学者，在最后废除科举的1905年前尚见有：秀才十一人，举人二十六人，贡士五人，进士二十六人，其中多数已进入宦海，并不低的官位。就这些人而言，论其学术造诣、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无愧于一代宗师，但在急骤复杂的时代面前，却每每出现前后时期截然相反的矛盾现象，看上去判若两人，有着不可避免的时代烙印。

有如郑观应、张謇，分别在近代工业发展中有所建树，前者因《盛世危言》被称为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后者因以兴办实业所积资金而投向教育，成为影响全国的著名教育家。然要顺利通过宦海之门，却并非易事。郑观应十七岁参加科举考试，结果名落孙山，落第后，“即奉严命赴沪学贾”。张謇参加科举先后经二十六年，到他四十一岁时始及第状元，并授以翰林院修撰，跻身于仕途；然而他却厌倦官宦利禄，从“四民之首”转向“四民之末”，与商贾为伍，投身于实业。但是，就郑、张相比较看，前者虽也曾主张先办教育、开民智而后行立宪，参与过立宪运动，可是由于其只主张改良，而反对革命；虽曾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却又未摆脱封建意识的羁绊；虽曾要在发展资本主义方面有所作为，却又落得“十举九败”的结局。他因找不到出路而悲观失望，以致堕落，尤其到辛亥革命后，愈趋落伍。而张謇所以能在投身实业后于教育事业大有成就，就在于他“言商仍向儒”，基于兴办实业为筹措资金而发展教育事业的认识；在实践中表现出少有的坚定与毅力，历尽挫折与艰辛而百折不回，历经三十年开辟出一条新路，成为新兴资产阶级代表物。

说到严复、康有为、梁启超一派的戊戌变法人物，他们都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代表，可是他们并未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到了后期和晚年竟在政治上堕落为保皇党，为复辟封建势力而呼号效劳，思想

上也日益倒退和反动。这是他们个人的历史悲剧吗？非也，只能理解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的曲折性和复杂性。作为一个曲折复杂时代的历史人物，对他们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恐怕都失之片面。科学的分析和评价，不仅应以总体论，而且要用阶段论，再结合以方面论，或许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在近现代人物中，刘师培可算是个特殊人物了。所以说他特殊，是终其一生才三十六岁，然其论学论政著作却达七十四种，在政治上则以激烈多变而成为风云人物。他一生短暂，却既是学术巨子，又是政治浪子，错综的思想、激烈的言行、多变的经历和矛盾的举措集中于一身，成为近现代思想学术史上一种类型的代表人物。刘师培十八岁中秀才，十九岁中举人，后来结识章炳麟，思想骤变，改为“光汉”，以激烈“排满革命”著称；1904年参加“国学保存会”，成为“国粹派”之首要人物；1907年信奉无政府主义，创办《天义报》，一时成为介绍《共产党宣言》和克鲁泡特金学说的中坚；1908年与章太炎绝裂，并向清王朝控告章太炎；1909年向端方告密江浙革命党，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差点丢了性命；1915年投向袁世凯，成为“筹安会六君子”，为袁称帝帮凶；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创办《国故》月刊，又鼓吹国粹，与学生作对；1919年11月病逝。由上所述，可见刘在两三年里，就或说“教育救国”，或说“民主共和”，或说“农民革命”，或说“社会主义”，或说“无政府主义”，趋时不谓不迅速，主张不谓不激烈，但转向之突然，倒退之迅猛，也可称善变之冠。历史常爱同人开玩笑，本来想进这个门，却进了另一个门；然刘师培的思想与行为而论，看似带有偶然性，实际却是必然性在起作用。

王国维于1927年6月2日自沉于颐和园之鱼藻轩至今，已经快七十年了，但是他的死因还是一个谜，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死因说起码已有“殉清”说、“逼债”说、“总崩溃”说、“恐惧”说、“多因素”说、“殉文化”说，近又见有梁启超死后王国维“惊惶”说。我认为，无论持何种说法，都不可离开当时之文化大背景，不可离开王国维本体意识或“遗民现象”。

由上看出，所谓“遗民现象”，实际上是那个社会制度、经济政治地位、传统文化影响和时代急骤变化的综合反映及其产物，并不是个人现象。

1995年6月

思想文化也应开放：拿来主义一解

开放，是我国一项重大的基本国策。科技引进是开放，吸收外资也是开放；特区是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的开放也是开放；一国两制的并存是开放，参加二十届奥运会无疑也是开放。1983年7月8日，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又提出了“要利用外国的智力，把外国人请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办教育，搞技术改造”。在为景山学校题词时，他要求“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就是说，我们的开放，不仅是经济上要开放，思想文化也要开放。我们这次改革，不是科学技术的独奏，也不是科学技术和经济体制的二重奏，而是涉及科学、技术、经济、政治、教育、社会、文学、艺术和科学思想、伦理观念以及各种价值观念、思维方法等各方面的交响乐。“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是我们的经济、科学、思想、文化、学术等方面改革和发展的方向。这样的“三个面向”，不是任何人主观的想象，而是基于我们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是基于对我们的祖宗和我们近几十年来闭关锁国所造成的停滞落后的理智的反思。既然这次改革是一部交响乐，那么各个方面都必须在节律上做到动态的协调，任何一个方面的滞后，都会破坏乐章在整体上的和谐性。

在科技和经济开放的同时，所以要强调思想文化的开放，这不仅是因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一种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只有有一定的思想文化为背景才能巩固。任何一种思想文化如果长期凝固、停滞并拒绝改革和更新，不止它本身会落后于时代，甚至可能被淘汰，而且它会严重地影响和妨碍科学技术和经济的改革和发展。今天，只有在科学技术和经济开放的同时开放思想文化，我们才能跟上世界发展的潮流。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在创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同时，要努力在全社会形成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要求的，文明的、健康的、科学的生活方式，摒弃那些落后的、愚昧的、腐朽的东西；要努力在全社会振奋起积极的、向上的、进取的精神，克服那些安于现状、思想懒惰、惧怕变革、墨守陈规的习惯势力。”这就是说，经济体制的改革，不仅会引起人们经济生活的重大变化，而且会引起人们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思维习惯和精神状态的重大变化。如果影响并支配人们行动的旧的思想观念不能进行趋时性的转变，它必然会对改革的潮流产生巨大的反冲力。改革的现实也一再表明，中国的一些传统思想文化在很多方面干扰和阻碍着改革的进程，中国的一些传统思想文化与中国现代化发生了强烈的冲突。这种冲突的实质，是在我国长期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和巩固起来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与我国正在发展着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矛盾。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要进行现代化建设，实现“两个高度文明”，引进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经济管理方法是必须的，那么与此同时是否可以引进和吸收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文化呢？答复应该是肯定的。当今的世界，正在酝酿和进行着一场以生物技术、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和新能源、新材料为支柱的新技术革命，疆域阻隔的经济正在跨出国界和洲界向世界经济的发展，众多的人造卫星已经覆盖全球，世界上每个角落之间正日益深广地进行着多种交流和融通，世界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开放世界。在世界的开放系统中，任何民族以任何形式的夜郎自大的思想和闭关锁国的状态，都将导致民族思想文化的停滞和萎缩，进

而导致整个经济的蹒跚不前，甚至衰败。那种只引进科学技术，不引进和吸收与之相适应的一些思想文化的作法，实际上是在搞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那一套。当时，连孙中山都看出洋务派的作法“是舍本而图末也”。（《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页）历史早已证明了这样必然失败。

思想文化的发展，当然离不开本民族在千百年间所形成的优秀传统，然而不断地吸收其他民族的长处，灌注新鲜血液，增添新的活力，同样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就必须了解世界，不仅要了解外国的现状，也要了解外国的历史，要重视外国当代的科学文化成果，也必须注重外国的思想文化遗产。对外开放使我们有机会接触世界范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了解到更多的新事物和新思想，这对丰富和发展我们的思想文化是极其重要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吸收、融合外来思想文化的民族。我们要在当今世界民族之林中赶上先进，独树一帜，就必须把门打开，不仅应该提倡汉唐时代那种对待外来思想文化的宏襟胸怀和雄大气派，而且也需要借鉴一下日本从外国引进文化、以外国先进思想文化为师，并成功地进行移植和吸收的“合金文化”精神。没有容纳当今世界上各种新知新说的气度和胸襟，而大胆地引进和吸收世界上一切民族的美好传统、智慧和文明，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只能是一句空话。为此，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应该包括思想文化的开放，不能只开放科技和经济，不开放思想文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经济倒退了三十五年，但到1950年就已经恢复到战前的水平。6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获得了高速度发展，被称为资本主义的奇迹。世界许多学者、专家对此进行了探讨，不少学者在探讨日本经济起飞的原因时，多数人认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日本人对于与本国不同的思想文化，不是看作异端，而是抱着积极引进的态度，引进之后，又能根据本国的国情，进行“技术改造”；同时还善于将国外的现代思想文化与本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作有机的结合，形成具有日本特色的思想文化和精神风貌。《读书》（1984年第10期）摘了科学技术出版社即将翻译出版的《设计的奇迹》一书的部分内容。作者是美国《大英百科全书》副主编弗兰克·吉伯尼，他把日本战后60年代以来经济高速发展，称作“日本的奇迹”。日本经济成功的奥秘何在呢？作者认为决定因素就在于许多世纪以来按日本方式改造过的中国儒教道德传统与美国经济民主主义的相互结合，是其历史的、文化的、宗教的根源，日本产业社会就是在强调和谐的人际关系儒家集体主义道德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该书作者指出：儒家学说在中国变成了礼仪的呆板法典和对权势人物的等级服从，然而在日本“儒家的劳动道德还在对一亿一千七百万日本人中的大多数起着激励作用”。为此，吉伯尼借用明治时期的一位实业家涩泽荣一的话说，他的目标是“把现代企业建立在算盘和《论语》的基础上”。这里如果把《论语》比作中国固有思想文化的代表，把算盘作为西方近现代思想文化的代称，那么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思想文化结构中或者是我们的颂扬里，所过多的则是《论语》，所缺少的却是算盘。在这里并不涉及要不要《论语》的问题，而是说不要以此作为闭关自守和排斥算盘的理由。我们须要多作努力的，恰恰是应该正视《论语》的短处，重视算盘的长处，来个扬长避短，以人之长补己之短，使二者巧妙而又有机地结合起来。日本另一位企业家，曾任日本经济协会会长长的稻山嘉宽说的好：“日本人异亦寻常地善于吸收经验，这就是我们的特殊才能。”这样就使得他们兼备东西思想文化之精华。从这个意义上说，难道日本的经济不

是值得我们很好地借鉴吗？

也许有人会说，无产阶级的思想文化与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难道能不讲阶级性吗？二者能否有可比性呢？问题也许就出在这里，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往往要么根本不承认生产方式的民族特征，要么自觉不自觉地宣传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尽善尽美，要么信奉一种错误理论，认为“到了资本主义没落腐朽时期，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就是彻底腐朽、反动的东西”，这样就过分地强调了西方思想文化的阶级性，忽略了我国现在思想文化与西方思想文化的共同性，从而也就抹煞了二者的可比性。其实，不论是物质形态的生产力，还是精神形态的生产力，其性状的衡量尺度是统一的，因而是可比的，而且与生产力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有某些类似的因素和功能，具有相互的参照作用。只注重随着历史的演进必然要否定西方经济、思想文化的社会形式的方面，而无视其具有时代特征的合理内核，那岂不是在重蹈费尔巴哈对待黑格尔指导思想的形而上学的错误吗？为什么我们在70年代末之前，基本上所坚持的只能是经济、思想文化方面的闭关自守政策呢？它是“左”的理论在作祟的结果，错误地认为：西方的就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就是完全反动的。这样一来，就出现了批字当头，先入为主地抵制，千篇一律地批判，简单粗暴地否定，以至于把现代社会中标志着人类文明进步的某些事物，一概地、武断地全都斥之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和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样做的结果，正如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闭关自守。”“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这种闭关锁国的蠢事，我们再不可重复了！

现在，我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要振兴民族，发展经济，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异性能，一定要在正确思想的指导下，积极主动地去研究思想文化，引进有益的成果，甚至迎接它的挑战。

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就有人提出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文化，建立无产阶级文化的主张。列宁针锋相对地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列宁还强调说：“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在这里，列宁阐明了无产阶级思想文化与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辩证关系，还告诉人们，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离开人类文明大道的封闭型的思想文化体系，而是一个凝聚了人类思想文化精髓的开放性的思想文化体系，它极其重视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思想文化遗产，不仅能吸收人类各民族思想文化之长，而且还能改造人类历史上的各种思想文化，但是这种吸收和改造，都是建立在“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基础之上的，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丰富多彩的无产阶级的思想文化。列宁所说的“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就今天而言，它是应该包括现代西方的哲学、文学、经济学及其他一切社会科学在内的。关于此，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也曾经明确地说过：“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在这里，毛泽东同志用了四个一切，第一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都要学，并未限制说资产阶级国家

不在其内。第二是“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方面都在学习之列，其中就包括了社会科学。第三是“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必须学其长处，学其真正好的东西，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从国家民族的政治性质到思想文化的吸收范围及其方法都考虑到了，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的。

说到科学技术的引进，对一些人来说，似乎还可以想通，因为觉得科学技术毕竟没有什么阶级性，要搞活经济，引进一些经济管理方法，经过这几年的宣传之后，好像也可以理解。但要引进思想文化，尤其是引进阶级性很强的社会科学，那可就要考虑考虑了，忧虑也就多起来了，条条框框的限制也就随之产生了。总觉得门窗开得大了，深怕西风带着毒素吹进来污染了社会主义厅堂。但是我倒认为，过多的忧虑实在大可不必。这个问题，只要看看我国人民在近现代如何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就会开朗起来。

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从西方大量流入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潮，进化论、天赋人权论、资产阶级共和国论等等，甚至柏格森、尼采、杜威、罗素等人的种种理论，也一度被当作新思想文化介绍到中国来，还有互助论、工读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等等，学说流派，五花八门，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连孙中山也感叹：“社会主义有五十七种，不知那一种是真的。”但是，“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2页）任何一种理论，不管它如何标榜自己是真理，只要在“国家的需要”面前，历史是会作出圣明的裁决和选择的，这是社会条件制约下人民意志的体现。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在繁杂的思潮中冲破重重障碍，战胜了众多的敌对思想，成为新思想文化运动的主流，进而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产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呢？这不正是历史要求的最佳实现吗？西方资产阶级学派和马克思主义，都是外国的思想文化，但是前者在中国破产了，后者却被中国人民接受以后，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有开放才能比较，有比较才能选择，有选择才能吸收，有吸收才能发展，这恐怕就是规律。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能力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增长。现代科学技术激动人心的发明创造，更使得整个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面貌日新月异，奇迹丛生。在科学领域中，新见解、新理论、新发明、新技术层出不穷，于是有所谓“信息爆炸”、“知识爆炸”之说。尽管社会科学的发展就整体来说大大落后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但是由于各种知识的相互影响与促进，社会科学在研究社会问题、研究人及其周围世界、研究人的相互关系方面，都有不少值得注意的成果和著作。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已成为改变我们整个时代思维方式的科学基础，突变论、耗散结构学说、协同学的蓬勃发展使人注目，发生认识论则在一个方面科学地证实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社会科学在与自然科学的联盟和结合方面也作出了一定的努力和实践，我们看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使得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溶合已成为时代的趋势。

今天，中国已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三十多年了，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我们在引进西方现代思想文化的时候，尽管可能会有一些消极、腐朽甚或反动的东西进来，但是应该相信我们的人民是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有能力经过观察、比较、综合、分析，辨别真假，衡量得失，最终会作出正确的选择和吸收的。

从有关方面获悉，1979年以来，全国出版部门已经出版了一千多种西方的社会科学著作。在这方面，商务印书馆组译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有功劳的。他们在不长的两三年里就集中出版了两百种以上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具有世界水平的外国学术译著，实在可喜可贺。他们还准备用几十年的时间出版这套汇总了人类的思想文化精华的丛书，全部出齐时种数将多达一千种以上，这对于我国人民扩大视野，了解西方思想文化，学习有益的知识，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必将起到积极作用。鲁迅先生曾经主张：“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他之“拿来主义”，第一就是先翻译介绍，把一切为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拿来，先让人们了解外国，之后才能有“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鲁迅全集》第6卷，第19页）的选择、吸收和借鉴及其发展。

葛力主编的《现代外国哲学》（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怎样吸收以及吸收什么的方法论问题上，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在怎样吸收的问题上，主张“要在哲学的水平上批驳错误的意见”，这样才能同论敌站在一个水平上，细加厘别；进而高出论敌的水平，决定取舍。在具体吸收方法上，提出一“要掌握足够的材料”，作出比较和缜密的分析，然后再下结论。二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正确区分一个哲学家和哲学思潮的学术观点与政治观点，避免把哲学体系上的论旨完全化归为阶级利益上的反映。三要在哲学水平上，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和批驳其唯心主义的实质。这种“站在哲学的水平上”，才能消除互相封闭，有真正的对话，有真正的批判，有真正的吸收。编著者把交流、批判和吸收三者作为一个辩证的统一体的见解，是符合思想文化开放的认识规律的。从《现代外国哲学》一书的研究方法上，我们看到编著者极其着重于说理溯本求源，力求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避免简单粗暴的一概骂倒；对确有科学价值的，可资借鉴的有益的内容，给予了恰当评价和肯定，吸收和承继过来；对其中错误的、反动的、腐朽的观念和内容，则分别予以指正和驳斥；对有些内容，现在看来不正确，但是历史上曾经起过进步作用，如实地予以评价；最要紧的是，既评又介，评介结合，采取公允的态度。在如何拿来、如何选择和如何吸收的问题上，上述方法是值得赞许的，对丰富和发展我们的思想文化是有益的。今后，随着思想问题的进一步开放，还会涌现出一些新的方法供大家优选，从而形成一套科学的拿来——筛选——吸收的方法体系。

大开门户，八面来风。任何社会解放运动的基础和保证，实质上都是思想的解放；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一个思想进步的过程。实行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全面开放，就其本质上来说，也是一种思想的解放，随着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深入，开放政策的进一步实施，将会使我们的事业更加充满活力，我们的国家定将在历史前进的世界性风雨中生气勃勃地成长起来，以崭新的雄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985年4月

现代文化的引进

“如果要保存人类，那么只有一条路，这就是走向开放社会的道路。”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全方位开放”是指我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甚大，不仅要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资本，更主要的是要引进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组织和管理方式。因为社会 and 经济发展不是单一的因素或方面造成的，诸因素、诸方面构成了社会和经济整体运动过程，它涉及到思维方式、组织体制、社会科学以及文化形态的现代化。要从思想上确立和在实践中实现全面的开放政策，而不是人为地限制在某些方面或领域。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本来具有的内容，而且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最必要的思想基础。

现代思维方式的引进

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就思维的“空间性”而言，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思维方式。一种是建立在传统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地域性思维方式，或者我们把它称为传统的思维方式，或者称其为封闭性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特征是把世界看作各个组成部分孤立的、毫无联系的“共存”，它把农民“见闻不出乡里，交往止于四邻”的孤立、分散和未开化、眼光短浅的狭隘性、经验性反映出来，对地域以外的世界产生无知和敌对，它是封建的自然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另一种思维方式是建立在现代生产方式基础上的世界性思维方式，或者把它称为现代的思维方式，或者称其为开放性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特征是把世界看作是由各个组成部分相互联系的整体系统，各个组成部分的关系是相互“依存”，而不是“共存”，它把现代社会“国际市场”、“国际分工”、“国际合作”科学的认识论反映出来，它是现代化生产方式、生产规模和生产领域不断扩大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

人类的思维方式的空间性扩张是与人类自身的交往扩张相一致的。马克思讲交往先于生产，“生产方式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原始人的交往局限于部落氏族，奴隶社会交往不出领主的地域，封建社会的交往不出君王的“天下”，这就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交往的地域性，即由部落—领地—“天下”范围的不断扩大，思维的空间也同步扩大。

资本主义冲决封建性的地域交往和国界线有两次。这两次冲击促使世界任何地域性、封建性和封闭性成为不可能。第一次冲击是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以商品和炮艇开拓世界市场，由此开始，地方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的交流交往被世界性的交流交往所取代，野蛮民族，落后国家和落后生产方式以毫无准备、毫无抵抗能力的方式，以灾难的形式接受了这一事实。地域性思维方式第一次在世界性思维下表现出它的简陋性和软弱性，但是它在某些地方、某些未曾冲击到的角落、某些积重难返的国家还有维持生存的地盘，某些国家筑起“铁幕”，防止受到新思维方式的冲击。因为这种思维方式一旦被否定，封建性的君主式统治就不能维持，传统文化就要覆灭。第二次冲击是20世纪中叶，以电子计算机和卫星上天为标志，现代科学以它的物质载体卫星和航天器运行太空，这些工具以强大的持续的电波传播和搜集着世界的信息，它们在空间上超越了国界，超越了民族，超越了大洋和大陆，任何国

家和民族的封闭都成为不可能。最封闭、最顽固的头脑也开始改变观念，开始把世界看成一个整体，开始充当一个“世界公民”。如果我们在70年代讲“开放”、讲“国际循环”，就会被当作“内奸”处死，如果在80年代再讲“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那就会成为笑柄。这就是观念的改变。中国在世界性思维方式中，终于认识到它自身的发展，还远比不上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终于又一次认识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伟大性”开始贬值。

中国实行改革，我们认为必须首先建立世界性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首先要求全面开放，尤其是文化的开放和思想领域的开放。就是用现代智慧来改造愚昧，促进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人的思想—思维是社会发展的内因，皮亚杰说：“人类活动本身在认知方面是最有特征的性质的。人类与许多动物不同，动物只是在物种改变时才能改变，而人却能在使世界改变的同时改变自己，能在建立自己的结构时使自己成为结构，不是由于非时间性的宿命从外界或内部消极地接受这些结构的。智慧的历史不是一份简单的‘成份一览表’，智慧是一束转换，这些转换同文化的转换或象征性功能的转换不能混为一谈，而是远比这些转换开始得早，而且产生这后两种转换。”只有智慧的转换才能带来文化的转换和其他形式的转换。世界性思维就是现代智慧的产物，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文化产物。中国的社会主义建立在传统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实际上是一个小农为主体的社会。“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现象在欧洲发达国家也曾有过。资本主义对小农的冲击，就是商品经济以及由此带来的频繁战争和激烈的竞争。战争和竞争统治着欧洲三百年的历史，激烈的生死存亡的较量，达到前所未有的文化、技术、科学、理论的交流、交换和发展，达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达到观念的改变。中国没有出现过资本主义时期，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育和人性的发展相对低下，这种课必须补。补课的方式就是引进商品文化和竞争意识，引进资本主义用血泪换来的进步文化和思维方式。

现代组织管理的引进

1956年，毛泽东以十分自信的口吻说：“美国只有一亿七千万人口，我国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美国是可能的……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象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于是中国开始搞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办农业。中国人民付出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劳动代价。几乎近半个世纪过去了，离美国的差距愈来愈远，国民产值只等于美国的五分之一。现在我们回头来反思，我们看到那种以人力、物力资源代替现代劳动资本，以传统的生产方式、劳动结构代替现代生产方式和劳动结构的作法，只能是事倍功半，或者是劳而无功。几乎就在毛泽东讲上面这段话的同时，美国在进行第三次产业革命；几乎在同一时间，“美国在能源的生产中的多数情况下，人的相对优势性已大大下降，以致在我们的经济中，人已不再是重要的能源了。在很多相对简单的重复性眼—手—脑的工作中，人也被代替

了。” 美国在 50 年代开始，生产以电脑代替了人力，以自动化代替了机器由人的操作，以现代的计算机来进行管理。生产力发生了飞跃。而中国在三中全会以后，提出的现实的奋斗目标，仍然是解决几千年来“温饱”问题。以上所反映出的，恰恰是两种不同的生产力和组织管理模式及其必然后果。

“社会主义”原来的意义是指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前提、为基础的更高形态的社会结构。一个组织的结构规定着它的功能，“功能”就是“生产力”以劳动组织为例：它是以群体(原始劳动形式，无结构) 亚正式组织(奴隶—封建劳动形式，分为等级而无分工) 正式组织(资本主义劳动结构，以纵深的层次化和横向的分工化为特征)的序列发展的。比如工厂纵深分为决策层—协调层—作业层三个层次，在平行关系上分为原料系统、热加工系统、冷加工系统、锻压系统、装配系统和运输系统等若干系统和子系统，银行也由若干层次、若干子系统联结、整合为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的功能不是个体能力的总和，而是个体能力的乘积或乘积之乘积。社会的政治组织、经济组织都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高级形态的功能是由它的结构规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组织形态是目前为止最高的发展形态，社会主义制度必须以它为前提，为基础。现代生产是由现代人—机两大组织体系完成的，现代管理就是驾驭、控制和协调人—机两大系统的生产过程。现代的政治活动由现代政治结构来完成，经济活动由经济结构来完成，它不是个人意志，而是“系统功能”。所以一个社会并不是改变名称就能神奇般获得“优越性”，而只有它在组织结构上更加科学、更加先进，才能获得优越性。这就是中国目前体制改革的课题。

当前世界范围内，就组织(国家、政党、公司、企业)的“结构—功能”而言，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组织模式和管理模式。一种是亚正式组织模式，或者把它称为传统的组织模式，或者称其为封闭性组织模式。这种组织模式的特点是人—机体系分化、分工、程序化程度低，强调集中性和群体性，在生产中效益、效率很低，在政治上公开性很小，分权观念很差，导致组织成员程序化规范化活动的法律、制度、条例、规则低，主要靠权力无限的统治者进行“人治”。这就是封建官僚体制。另一种是正式组织模式，马克思说这种组织模式只有市民社会才能出现的，即资本主义社会才会出现的。这种组织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建立在高度分化、分工、分权、分治的基础上，即建立有层次、有系统的由相对独立的部分组成和整合的整体。机器系统的系统化、程序化导致高效低耗；政治—经济体制由分化、分工、分权、分治，带来公开性和民主性，带来由严格的法律、制度、条例、规则为保证的规范性行为。这就是民主(或平民)政治—经济体制。发展程度低的国家保留在前一种组织体制中。发展程度高的国家建立了后一种体制，“体制”渗透于政治、经济、生产、经营全部活动中。亦就是说它渗透在全部人际关系中，形成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格模式：前一个是依附性人格模式；后一种是独立性人格模式。所以任何社会组织向高级形态发展，都是一个内部分化、分工、分权、分治过程。目前我国体制改革的党、政、企分化分工，就是一种组织发展的表现。

拒绝现代文明的后果，只能是停滞和倒退。正如美国当代国际关系学者姆罗兹指出的：在 20 世纪，在经济领域，似乎具有无限的增长的前景，各国都以为能够轻而易举地迅速地发展本国的经济。但结果是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大失所望，在生活水平和科技方面同西方的差距日益扩大。他认

为：戈尔巴乔夫进行的重大改革是苏联唯一的出路；除非进行重大改革，否则到 21 世纪苏联将不复为超级大国。我国在 1978 年开始进行的全面的改革，近年来提出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都是对原有的体制进行改造。这说明我国将由传统的组织管理模式走向现代的组织管理模式。如果中国的旧体制不能改变，或者不能彻底现代化，所有的改革都会变成泡影。而这个改革体制的关键，又在于能不能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教导，从资本主义世界引进先进的组织结构和形式。这是我国改革开放涉及的第二个重大问题；就是对发达国家的软科学、软技术的全面引进，而不把引进仅仅停顿在硬科学、硬技术上。

现代社会科学的引进

“科学技术是思维方式的物化”，思想理论建设和思维方式的革新要比科技成果的引进更基础、更迫切。

改革涉及到理论问题。理论是行动的指南。社会改革是社会科学研究和指导的领域，因此理论的科学性必然带来改革的合理性。反之，理论的荒谬性、经验性，必然带来改革的失败性、反复性。

就社会科学的“真理性”而言，当前世界有两种社会科学。“传统社会科学”是指传统社会中、阶级社会中那些为统治者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的理论，理论家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谋生的主要源泉。”传统的社会科学由文、史、哲构成，哲学提供政治幻想和宗教幻想，比如儒家的“大同世界”、佛家的“西方天国”。其主旨是消灭人性禁锢思想，如儒家“天理”就是“禁欲”、佛教的“真谛”就是“色空”。历史学提供封建专制独裁的经验，文学作用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谁是统治者谁就是圣人，谁的语言就是原理原则。其主要目的在于愚弄民众。

“现代社会科学”是指现代社会中那些在经济上、政治上摆脱依附性的平民知识分子，为促进社会发展、人类发展、生产力发展，寻求到的解放社会、解放生产力、解放人性的客观规律的理论和应用科学。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社会科学最早的和最突出的代表。这种科学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称为“人的科学”，它综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的现代成果，成为直接推动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推动生产力发展和人类自身发展的重要理论和重要工具之一。它的核心是社会形态 结构 功能。它的研究方法是系统性和整体性。

我国目前的社会科学属于传统的社会科学。基本结构是传统的文、史、哲加马克思主义某些部分(被苏联曲解和附加了的)。我们长期对西方世界进行文化封锁，企图以单一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唯一的理论基础。但是我们不理解资本主义文化，也就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是这一文化土壤的花朵，是无数资本主义文化花朵之一，这朵花无论如何鲜艳夺目，也不能包罗万象，包医百疾。所以列宁说“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认为，被整个现实社会置于愚昧无知和囿于偏见这种境地的千百万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只有通过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这条道路，才能摆脱愚昧状态，那就是最大的而且是最坏的错误。”列宁主张吸收“全人类一切进步文化”。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社会科学受到一次彻底的摧残，处于无科学的真空状态，马克思主义被封锁起来，只有一本“语录”以“一

句顶一万句”的权威统治着十亿人口的头脑，其后果是人所共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现代社会科学才得以逐步萌生并发展起来。在同一时期，西方世界关于“人的科学”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它不仅直接转化为发达的生产力，而且直接塑造了新的人性和新的思维、新的价值观和新的世界观，我国在这一方面最少落后一百年的距离，正如生产力落后一百年的距离一样。如果说改革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解放人，那么社会科学的开放和引进就成为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现代西方关于“人的科学”是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一脉相承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吸收了达尔文主义关于自然有机体即生物的发展进化学说原理，把社会也当作一个特殊的有机体加以研究，它在各方面都有类似生物有机体的特征。马克思关于“社会整体”、“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系统”、“社会有机体”、“生产力”等科学概念，直接成为现代关于“人的科学”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源头。社会形态的结构规定社会的功能(生产力)，规定社会人的心理状态和主体发展水平，规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联系，规定道德、政治、法律、观念和思维等上层建筑的形态，都与现代关于“人的科学”相一致，所以研究社会形态、社会系统、社会结构、社会关系，成为现代西方世界最为重视的一种学说。这些理论也就是改革—开放的理论，全世界性的改革—开放思潮就受这一理论的推动。我国的社会改革和开放也必须以此为根本依据。

人类就是利用文化来塑造社会有机体(整个自然界)，并且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传统的文化、传统的人性，创造了一个传统的社会有机体，我们的任务就是重新塑造、重新生产和重新构建新的社会有机体、美的社会有机体，这就是要引进先进的社会科学。

现代文化观念的引进

“封闭”是传统文化的代词，“开放”是现代文化的代词，正如“蛋壳”是禽类低级阶段的代词，“羽翼”是禽类高级阶段的代词一样。

就文化的价值而言，目前世界上存在着两种文化，一种是封闭文化(封建文化、农业文化、非创造性文化)，一种是开放文化(资本文化、工业文化、创造性文化)。文化是需要—信念—价值观—思想—智能—技术等种种精神因素的一个函数。一种民族文化如果没有或丧失了创造性和发展性，丧失了自调和转换机能，这个民族就要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无论它在历史上曾经多么灿烂显赫，创造过什么奇迹，都不能挽救它衰老死亡的命运。世界历史上曾经有过数十种古老的文化，现在存留的屈指可数，而走在最前列的是发祥于希腊的西欧文化。黄河文化作为农业文化无可挽回地进入衰落时期，——中国长期一穷二白就是这种文化一穷二白的表现。中国如果不能像日本民族那样接受西欧文化，前途是渺茫的。在世界近代史上，几乎没有一项重大的推动社会生产力和社会进步的发现、发明、发动、发展是从黄河文化中诞生的。这个悲惨的事实谁也无法否认。

(一)推动社会发展的是两种力量，一种是经济，一种是文化，这一实一虚构成运动。自中世纪以来，几乎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变化都是起因于新文化、新知识、新观念、新价值观以及新需要的发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是这样，产业智能革命也是这样。在历史上，思想文化是一种巨大的革命力量。罗素

说：“人怕思想好像世界上没有比它更可怕的东西了。——比毁坏更可怕，思想比死还可怕。思想是颠覆性的和革命性的、破坏的和可怕的，思想对于权益，对于已建立的制度和舒适的习惯是毫不留情的。思想是无政府的和无法律的，对于权力不关心，对于历来久经考验的智慧也不放在心上。思想看到地狱之深处而不怕，它看到人像一种软弱的微小的东西被包围在深不可测的寂静之中。思想是伟大的、迅速的和自由的，是世界之光，是人类的光荣。”

汤因比把思想称为“文化之光”。历史上任何进步和发展都是思想文化首先像闪电雷霆那样照亮天空，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传统文化是消灭思想的文化。中国历代统治者独尊儒术就是因为儒家文化具有消灭思想的功能。儒家认为“天理”就是“去欲”，阉割人的需要；“治道”就是“愚民”，“不可使知之”，民愈愚政权愈稳固。接受儒家文化的统治者都实行文化毁灭政策，禁锢人心，焚书坑儒，消灭思想。这是因为黑暗统治者对光明的恐惧。“恐惧使人倒退——害怕他们所抱的信仰会被证明是有害的，害怕他们会被证明不应该像他们一向所想象的那样受人尊敬”。就是害怕他们虚构的信仰、价值观和他们不合理、不道德的统治被新思想证明是丑恶的和荒谬的，害怕他们的幻想被无情的真理击得粉碎，害怕人民的觉悟把他们推进垃圾箱。所以，他们要封闭文化来自保。开放就是要引进先进的思想或者鼓励人民思想，使那些有着旧思想旧观念的人感到恐惧，感到“比死还可怕”，中国民族就有了希望。有了新文化、新思想就能创造新社会。莫里斯说：“没有思想就没有原子弹。有了原子弹这种思想才有原子弹和可惊的能源。只要愿意，人们就能把地球炸得粉碎，或者建立地球上从来没有的社会制度……这一切都是由于观念。观念是人类文化的原子弹。而观念来自有思想、能说善写的人。”(11)开放文化表现为鼓励各种思想学说的自由竞争，而反对思想学说的大一统，反对一种无选择、无怀疑的思想统治：“选择是有生命的东西的主要特征，没有选择的生活就会使生活停止下来。”(12)选择文化的尺度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些政治名称，而是看哪种文化和思想更能推动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更能创造出更大的生产力。所以列宁说：“有人在这个会议上说，不向资产阶级学习也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我认为，这是中非洲居民的心理。我们不能设想，除了以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13)

(二)文化的另一个意思是人类改造世界的主体能力，即发展生产力的知识和技术。中国的传统文化除了“炼丹”、“成佛”作“圣贤”，对现代的应用科学技术是排斥的，把它看作是祸害人心的“淫巧奇技”。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文化是一种赤贫文化，它的实用性低到近似零的地步。而现代科学技术或者科学的现代化，恰恰与此相反。现代科学的特征是实证科学(马克思也称自己的科学是实证科学)，它不再像《老子》《庄子》追求外在的超越的绝对知识，或者像《论语》《孟子》来自经验的概然知识，而是像《孙子》那样把自己的目标限制在现实的发展生产实用价值上，于是科学不再是种知识的集合，或者知识的发展状态，而是人们用来解决社会问题、发展生产力和发展自我的实际学问。文化—知识—技术成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种无形的资本和资源。

文化投入是生产力发展最基本最必要的条件。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M·索洛在他著名的论文《对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

等文中，深入探讨了经济机制中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特别证明了技术的变化对生产力变动的影响，证明资本存量的增加可以使人均产量相应增加，也就是说生产力的增长有赖于资本的投入，证明在劳动力和资本之外的剩余因素，即非有形和非量化的因素的重要作用，其中特别提到知识的增长和技术变革。M·索洛在这里提到的“资本”，“非有形非量化的因素”即“知识”和“技术”，也就是指文化的投入。文化被称为是“资本和劳动以外的剩余因素”即所谓“残数”。经济增长在世界范围内主要是这个残数的增长。比如美国1929—1969年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传统要素投入(包括教育)只占一半左右，其余的部分主要分布在上述那些变量之中，即知识(包括技术、管理组织方面的知识)的进步造成的残数的增长。因此当代经济学家们认为，传统的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劳动，如果不考虑知识和技术的成份，就无法对它们下定义。因此，经济活动中的文化投入是现代世界发展的根本投资方向和投入方面。

在人类改造世界的活动中，文化作为无形资本投入的量直接决定着时间、速度和生产率。因此文化的先进性可以用时间/速度/效率的函数来表示。即单位时间内创造的产值愈高，说明其技术性愈强；单位时间内发展的速度愈快，说明其知识的力量愈大。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速度，从它所消费的单位时间中可以看出它处于什么样的文化水平。前资本主义社会处于文化时滞的社会，因此生产力和发展速度是低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处于文化飞跃发展的社会，因此生产力的革命和社会发展都是加速的，先进文化创造着强大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速率。

以上从四个方面对比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在思维方面、组织管理方面、社会科学方面和文化观念方面的本质区别。我们认为开放就是引进先进的东西改造落后的东西，全方位开放才能全方位改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是一个全方位开放的阶段，也就是全面现代化的准备阶段。全方位开放必定带来暂时的混乱与矛盾，但是从长远来看它将是长期稳定和高度发展的必要条件。现在的世界环境有利于开放，过去那种缩手缩脚、顾虑重重的思想观念应该是抛弃的时候了，“辫子”应该彻底剪掉了，历史不允许再迟疑、再退缩、再反复，害怕风险就是最大的风险，害怕危机就必然造成最大的危机。推开禁锢的铁门，走出中世纪，这是唯一的出路和抉择。

(本文与阎勤民先生合撰)

1988年10月

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页。

皮亚杰：《结构主义》，第80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6页。

西蒙：《管理决策新科学》，第20页。

《理论信息报》，1988年7月11日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2页。

《列宁选集》，第4卷，第605页。

罗素：《社会改造原理》，第96页，第97页。

(11)(12)莫里斯：《开放自我》，第59页，第35页。

(13) 《列宁全集》，第 33 卷，第 285 页。

编辑型学者学者型编辑 本世纪的一条出人才之路

学者和书刊编辑不应有鸿沟。

我们的时代，要有编辑型的学者和学者型的编辑。

回眸和正视中国文化学术史，像孔子、司马迁、司马光、纪晓岚、戴震等古代先贤是先做学者后做编辑，还有许多藏书家是先搜求而后编辑刻印古籍文献；像梁启超、张元济、丁福保、章太炎、陈独秀、鲁迅、舒新城等近代先辈是在治学方面有成就后又做编辑的。现代学者中有编辑经历者大有人在，如章士钊、吴宓、顾颉刚、傅斯年、胡愈之、茅盾、叶圣陶、郑振铎、阿英、邓拓、王芸生、宗白华、邹韬奋、杜亚泉、宋云彬、曹聚仁、金仲华、王森然等，以至原活跃于编辑岗位上的赵家璧、丁景唐、陈原、李侃、周振甫、钟叔河、庞朴、傅璇琮、敏泽、朱正等学人是先做编辑后成为学者的。因为两种职业的沟通和融合，著作者很难以分清他们该归于那类：学者或是编辑。

我以为，在近现代学者中，如果要分类，无非是：一是在大专院校执教作导师的，他们的路径是以教为主、教研结合。二是任职于专门的科研院所的，这部分人可算是专门的学术研究学者。三是一支，或称一派，那就是在出版部门和报刊社工作的编辑队伍了，现代学者中的重要一派，即产生于这个领域；甚至可以说，现代一些重要学派，与这支队伍相关。四为其他，包括社会的方方面面，这里也有自发奋斗成功者。

提到近现代学者及其学派，常可从主持的报刊相联系，如《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报》，就会联系主编梁启超；涉及《国粹学报》，文化学术界都会想起章太炎、邓实、黄节、许守微等为代表的国粹主义学派；提及《新青年》杂志，显然要同五四新文化主帅陈独秀及其思想启蒙者联系在一起；说及《新潮》杂志，自然不能忘却新潮社社长和这个杂志的主编傅斯年；思及《甲寅》杂志，必然与章士钊及其甲寅学派相关联；念及《学衡》杂志，怎么会忘记吴宓、胡先骕、刘伯明、梅光迪、柳诒徵、汤用彤等的学衡派；议及《禹贡》杂志，当然要提到顾颉刚、谭其骧二位主编及其地理沿革史研究；论及《东方杂志》，不仅要想到杜亚泉及其与陈独秀的东西文化论战，而且会忆起胡愈之、钱经宇；谈及《观察》杂志，就得记起了储安平；诸如《大公报》与张秀鸾、王芸生，《文汇报》与徐铸成，《人民日报》与邓拓，《申报·自由谈》与黎烈文，《小说月报》与沈雁冰、郑振铎，《中学生》与叶圣陶，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上列人名，他们的职业曾是编辑，然而于文化学术内涵他们却是学者，他们的学识修养与其经办的报刊杂志是相得益彰的，他们的学识修养会充分地体现于其经办的文化学术载体，表现出高层次的文化学术品位。

就出版社的主持者和编辑队伍来讲，每个知名的出版社，都与其主持者有强烈的使命感，对真理有执着的追求精神，有通古今之变、融中西之学的文化心态，有开风气之先的胆识与魄力和本人是一代饱学之士有关；都与在主持者麾下聚集着一群有学识、有修养、有专长、有风格、有风范的学者型编辑有关。在这样的群体中，他们是编辑兼学者，在他们身上不时地闪耀着人类智慧的光芒，飘洒着一种特有的人格力量和醇烈的学者味，而绝少商人味、政客味和市侩味。他们以出版阵地弘扬优秀文化学术为己任，以深厚的

文化学术造诣深化编辑业务，以文化学术专长及其研究成果体现和展示其所生产的精神产品的文化学术含量和档次，从而使出版物的质量有其保证基础。

在此，仅以商务印书馆为例。商务印书馆从 1897 年创业至今已近百年，无愧为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历史悠久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教育事业单位”（陈云语）。商务之成功，固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最基本的因素，恐怕在于它之主持者“在学术方面本有很广博的兴趣，很渊深的造诣”有关，说白了就是不仅是出版业务上之行家，而且是有文化学术造诣的专家。还在于其主持者所依靠的编辑人员，无论是专任编辑，还是特聘兼职编辑，可以说不论在当时，还是在以后，许多是国内知名的学者，或是学者型编辑。先后在商务作过编辑的，就有朱经农、蒋维乔、孟森、杜亚泉、范寿康、李石岑、竺可桢、周建人、胡愈之、夏雪佑、周予同、杨端六、唐钺、高觉敷、顾颉刚、沈雁冰、杨贤江、何炳松、马叙伦、叶圣陶、郑振铎、葛传榘、王伯祥、章锡深、钱经宇、韦恝等；作过特约馆外编辑的，也有胡明复、胡刚复、杨杏佛、任鸿隽、周鲠生、陶孟和等；至于与商务有出版和文字因缘的学者而言，何止万数，其中知名人士，可足以千计。更可贵者是多层次、多倾向、多学科和多学派的文化学术界之精英。商务之创办者和主持者之一的张元济，就认为要把一个出版社办得生气勃勃和成果累累，就“不能不求可恃之人才”。由此而反观当今一些出版社及其出版物，那是不难洞察其中之弊病的。

1995 年 10 月

清华大学与学术文化氛围

原计划撰写《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的家学渊源》一文，后又觉得说四大导师，必须交待他们的学术文化氛围，于是又拟定了这个题目，作为前文的过渡；否则，四大导师出现在清华，也就成为不可理解的孤立现象了。

一

清华大学是名扬海内外之著名学府，曾是产生过许多大师硕儒的摇篮，也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吸引着无数莘莘学子奋力跳龙门之理想王国，还是为国家民族振兴而造就过几代栋梁之才的园地。真可谓，忆往昔而以毕业于清华而自豪，看今朝而能跻入清华而荣光。

当我写下这个题目时，忽然联想起许多事情来。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本世纪初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创办的一所“游美预备学校”。初建时名为“清华学堂”，因校址设在清室遗园清华园而得名。辛亥革命后改名“清华学校”，到1925年才改办成为大学，但是在30年代就已跻身于世界著名大学之林了，有“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之誉。清华的历史已近一个世纪，它的创建和出现是中国现代教育、现代学术与思想文化史上的重大奇观和事件。曾有人调查过，人们惊讶地发现：在现当代中国从事人文及社会科学研究，以至从事文学艺术活动的一大批精英与卓越人物，竟大都出自清华或同清华的培养教育相关，更不用说自然科学界的著名硕学人物了。清华大学对20世纪中国现代化和中国思想文化的贡献，不仅是为现当代培养和造就了如此之多的学术、科学和文化的栋梁之才，更加重要的是为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开创了一种新的学风与“学统”，那就是提倡文化多样论与中西文化的汇通与兼容，保持学术之独立与维护思想之自由，开一代之风气。

清华大学原来曾是综合性大学，于50年代初院系调整改为工科大学，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近年又恢复为综合性大学。这种决策，显然是伴随着人文精神的讨论、传统文化和国学研究的升温，如何按大学的精神、大学的价值、大学的目标和大学的模式等方面思考的。由于清华大学的特殊地位和历史，近年来以清华为目标的议论多了起来，曾见有《清华园里可读书？》、《清华园里曾读书》、《清华是一种传统》、《清华学派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和研究吴宓、梅贻琦、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赵元任、潘光旦等人物事迹与思想之文章，几乎成为显学。这种情况，恐怕只能理解为社会对于清华在院系调整后，清华人文传统的中断、人文精神的流失而进行着思归和呼唤；只能理解为人们对中国教育，除了需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外，还需要回顾和反思，需要到传统中去吸取有益的资源——中国的教育现代化不仅需要创新，也需要复原好的传统和好的学风；只能理解为社会与未来对于应试教育的憎恶和抛弃，对素质教育的企盼和实行，对通才教育的追求和达到，而渴望“可读书”的清华园和造就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那样的巨匠大师，这也许是历史的需要和时代的召唤。

二

“大学是什么？”面对这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可能会有各种答案。然

而在清华长期作过校长的梅贻琦却如此回答：“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作为我国首批庚款留学生，梅贻琦1915年回国即到清华任教，1926年作为物理系首席教授被教授会公推为教务长，1931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直到1948年12月离校，连任校长十七年之久，其与清华的关系和对清华的贡献，大概可与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相比。屹立于海峡两岸的有两所清华大学，二者本属同根同源，梅贻琦都可当之无愧为主要创建者，所以他在抗战期间的一篇告校友书中这样说：“琦自1909年(宣统元年)应母校第一次留美考试，被派赴美，自此即与清华发生关系，即受清华之多方培植。三十二年来，从未间断，此谓‘生斯长斯，吾爱吾庐’之喻，琦于清华，正复如之。”梅贻琦在接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说时，提出了“大师论”之说，后来又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师资在办大学中的重要地位，“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吾人知之甚切，故亦图之至急。”“大学之良窳，几乎全系于师资与设备充实与否，而师资为尤要。”“吾人应努力奔赴之第一事，盖为师资之充实。”

清华大学为何能培养和造就出一代一代的第一流人才来，只要了解了一校之长之梅贻琦的教育思想，只要看看他在“大师论”及其特别重视充实师资的实践，只要观察一下清华大学的师资队伍的高素质及其阵容，我们就完全明白其中的道理了。

在《梅贻琦与清华大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一书中，关于清华的师资阵容，曾有翔实之介绍。此处从所列名单，即可见清华大师辈出之原因所在了。

清华大学之师资队伍，在梅贻琦任教务长时期就已初具规模。当时国内许多大师级的著名学者就已荟聚于清华园：国文系有朱自清、杨树达；西文系有王文显、吴宓；物理系有叶企孙、赵忠尧；化学系有高崇熙、赵学海；生物系有刘崇乐、钱崇澍；历史系有刘崇鋮、钱端升；数学系有熊庆来、郑之蕃；哲学系有金岳霖；社会系有陈达；体育系有马约翰、郝更生；国学研究院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等。

在梅贻琦出任留美监督期间(由罗家伦校长主持)又聘请了一批著名学者，1928年到校者有杨振声、冯友兰、俞平伯、施嘉炆、吴有训、萨本栋、邓以蛰、吴韞珍、浦薛风、王化成；1929年到校者有叶公超、刘文典、蒋廷黻、张奚若、萧蓬、张子高、周培源、杨武之、黄之卿、陈桢、李维侗、萨本铁；1930年到校者有翁文灏、张申府、孙国华、李运华、周先庚、余肇池、王裕光；1931年到校者有吴景超、噶邦福(俄籍)、蔡方荫、陶葆楷、张泽熙、王力、赵人儒、燕树棠等。

于1931年底，梅贻琦接任校长，一方面充分尊重原教师并充分发挥其作用，一方面又多方礼聘。一时有学有识之士闻风景从。从1932—1937年，先后应聘来校的国内外名师(包括一些当时即已崭露头角的新秀)有闻一多、雷海宗、萧公权、许维遹、庄前鼎、刘仙洲、倪俊、赵凤喈、顾毓琇(以上为1932年来校)、沈履、张印堂、赵访熊、张大煜、李仪祉、夏翔、冯景兰、沈乃正(以上为1933年来校)、张荫麟、张任、陈之迈、李达、李郁荣、李辑祥、彭光钦、戴芳澜、吴达元、吴晗、潘光旦、沈有鼎、唐兰、任之恭、曾远荣、吴新谋、洪绂、李谟识、董树屏、张捷迁(以上为1934年来校)、段祖澜、霍秉权、范崇武、赵友民、赵以炳、汪一彪、张润田、殷文友、杨业治、李景汉、张席禔、冯桂连(以上为1935年来校)、贺麟、洪绅、吴柳生、王信

忠、邵循正、钟士横、段学复、张岱年、齐思和(以上为 1936 年来校)、陈梦家、孟昭英、陈省身(以上为 1937 年来校)以及外籍学者维纳(美)、哈达玛(法)、华敦德(美)、原田淑人(日)等。

这就是清华园，就是这个有着浓厚的文化氛围和学术环境，就是这个有着高深的文化学术造诣的学者群体和学术传统，就是这个有着水木清华优良学风和校风的园地，有了这个园地，何愁不能培养和造就出名师硕儒式的栋梁之才呢！

三

在此所要介绍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是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的。说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时，又不能不提到创建国学研究院并任筹委会主任的吴宓。

吴宓(1894—1978)，字雨僧，陕西泾阳人。著名诗人、学者和中国比较文学先驱。1916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17年赴美留学，初进勿吉尼亚大学，后转哈佛大学，获学士学位；继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从师于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获硕士学位。1921年回国，执教于南京东南大学，任西洋文学教授。其时正是“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风靡全国。吴宓于1925年2月应清华学校之聘，担任国学研究院筹委会主任，培养国学专门人才，精深研究我国固有文化，正合他弘扬传统优秀文化的夙愿。到职后，即全力以赴。他认为，不仅“只有找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普遍有效和亘古常存的东西，才能重建我们的自尊”。而且要办好国学研究院，就要“聘宏博精深，学有专长之学者”来院执教，经他多方努力，协助校长物色延聘到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位教授和专任讲师李济。吴宓本人虽然就是具有“宏博精深，学有专长”的学者，然而他却十分谦逊，在他拿着校长的聘书去聘请王国维时，进了王宅见到王国维，先恭敬地鞠了三个躬，然后才说明来意。王国维到校后对他说：“我本不愿意到清华任教，但见你执礼甚恭，大受感动，所以才受聘。”校长原请吴宓出任研究院院长，但他坚辞再三，谓之不敢当，而谦允担任了研究院主任。据冯友兰生前谈及此事时说：“雨僧一生，一大贡献是负责筹备建立清华国学研究院，并难得地把王、梁、陈、赵四个人都请到清华任导师，他本可以自任院长的，但只承认是‘执行秘书’。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很难得的！”吴宓1926年3月辞去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改任清华西洋文学系(后改外文系)教授，讲授《西洋文学史》、《中西诗之比较》、《文学与人生》等课程，开我国比较文学研究之先河。近几年，吴宓之事迹及著作不断被整理出版，可了解的渠道很多，此处不再赘述。以上这点介绍，也许可更加深对清华文化学术风范的认识。

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的家学渊源

前文谈及清华大学与学术文化氛围，本篇接着述说四大导师，似乎也就顺理成章了。

这里所以要着重介绍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位，读者约已知道了四位大师在那个文化学术氛围中和文化学术群体中的地位；所以要首先谈论他们四位的家学渊源，一是有感于家学是人生入学涉世第一师的重要，二是有感于家学渊源在现当代所遭到的破坏及其所受到的严重忽视。

一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庵(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他是19世纪下半叶几个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中国先驱者之一，他虽然经历了一个由中向西、又由西向中的思想历程，但思想道路又十分独特。王国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根基提出了大胆的质疑，从而扬弃了儒家的道德传统。这不仅较诸他的同时代人如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诸辈激进，而且即使在十年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也是有非常清醒而彻底的思想见解。

就王国维之治学说，他很早就进行文学研究，所著《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等书，即显其造诣，转治经史金石之学后，有关考古学的贡献，主要在甲骨文、金文、简牍及度量衡方面。王国维号称“史学大师”，然而其学不限于史。举凡文学、哲学、美学、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逻辑学、文字音韵学、版本目录学、古器物学等方面，均有精深的造诣和卓越的建树，不少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归结起来，前期成就主要在文学，包括文艺批评、诗词与戏曲史研究，后期则主要在经史小学，特别是金甲文字、汉晋简牍、汉魏石经、敦煌卷事的整理与考释，在商周史、蒙元史等的研究上，方法出新，创获尤多。所以他的一生学业，既不能按罗振玉选编的《海宁王忠懿公遗书》中四十二种包罗之，也不是《辞海》所列著译六十二种和手校手批之书一百九十二种(据赵万里统计)能涵盖，而应以陈寅恪所论而总观之，王氏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王国维之远祖王稟，可上溯宋代，是宋徽宗赵佶在位之际的将领，稟之父光祖、祖父珪，亦为北宋战将，《宋史》有传。大致推算起来，自王稟殉难(1126年)到王乃誉出世(1847年)，历经七百二十一年间，在其世系中虽不乏“读书人”，却未见有为名士或显官者。王国维父亲王乃誉出世，适逢太平天国革命，“弃儒经商”，“于贸易之暇，攻书画篆刻诗古文辞”，嗣后充任江苏溧阳县府“慕僚”(师爷)，才“得尽窥江南北诸大家之收藏”，“技艺大进”，达到了“其所成就，虽古人无以远过”(《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并著书立说，留下了《游目录》、《娱庐诗集》等著作。当然王国维远祖之渊源，不能说对他全然无关；但要说更直接的还是“父学”的影响，尤其是王乃誉能于“孤贫之中，囊橐之内，克自树立”的“自学成才”的奋斗精神，应该说对王国维这样的“寒儒”，既不以自身天资聪明而自矜，也不为自己“才弱”而自馁，而是在飘忽不定的世变中，“自适于声色货利之域”，作出“深湛之思”，锤炼“创造之力”，应该说是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的。

王国维自幼丧母，形成了“体质羸弱，性复忧郁”的性格。他的家庭，

虽勉强可算“书香之家”，但与前辈或同辈中的出身“世俗”的“文学之士”相比，实是相差很远。就其地位讲，可算“亦商亦儒”转为“亦儒亦吏”的中产之家。在这样的家境中，少年王国维的读书生活是清苦的，关于他家庭及其少年时代的求学情况，自己曾有过概括性的自述：

余家在海宁，故中人产也。一岁所入，略足以给衣食。家有书五、六筐，除《十三经注疏》为儿时所不喜外，其余晚自塾归，每泛览焉。十六岁见友人读《汉书》而悦之。乃以所储之岁朝钱万购前四史于杭州，是为平生读书之始。时方治举子业，又以其间学骈文散文，用力不专，略能形似而已。未几而有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谓学者，家贫不能以贖供游学，居恒怏怏，亦不能专力于是也。（见《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

王国维七岁开始到距家附近的潘绶昌先生处读私塾，所读为十三经，然他对于这类旧学并无兴趣；常常读些私塾规定以外的书籍。十一岁那年，转至当地陈寿田先生处读书。恰在这年，他祖父逝世了，他父亲从溧阳游幕回来，不再外出，日以课子自娱。王国维白天到私塾读书，夜晚则从父亲学习骈文、散文及古今体诗，并自习金石书画。到十五岁时，已与同乡褚嘉猷、叶宜春、陈宗谦交结，时常在一起切磋学问。据陈宗谦在《王忠懿公哀挽录》中回忆，这时的王国维才华已经显露出来，他们被称之为海宁四才子，而又以王国维为第一。他们在一起，“辄上下纵论文史，或校勘疑误，鉴别异同”。对文史校勘的兴趣，到这时已开始形成，到王国维十六岁入杭州崇文书院学习时就更加发展了。他到那里本来是为了接受科举考试训练的，结果却对史学发生了强烈的兴趣，看到友人读《汉书》更感兴趣，于是把幼时积攒的岁朝钱买了“前四史”来读，并认为这才是他真正的“读书之始”。由于他对史学的兴趣压倒了对科举的准备，王国维在1894年第一次应举不中。这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清朝的海军被日军战败。

朝政腐败和国势凌弱之状暴露在民众面前，它引起国人要求变法自强，也使得少年王国维知道世上有以富国强兵为己任的“新学”。他曾经作过游学的打算，以家境困难而作罢。次年，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订立，促使康梁提出变法维新。公开要求废科举，兴学校，给全国很大影响，使得王国维对科举更加反感，再次应举不中，决定“弃贴括而不为，绝举业而不就，由此走向另行选择的学习道路。

王国维的家庭并不富有，先一年又结婚成家，再次应试失败之后，他就同乡沈冠英家当塾师以维持家什。1898年初，经同学许默斋介绍，到汪康年主办的《时务报》当了书记。二十二岁的王国维从故乡海宁来到上海，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事业，……

二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说到梁启超，即与戊戌维新变法连在一起，总与其师康有为连在一起，以启蒙思想家和宣传家而名垂于世。“如果说，严复的《天演论》以进化论的世界观，激励起人们救国自强的热情；那末，梁启超当年的大量论著则把这一观念更为具体地、生动活泼地贯彻和灌注到各个方面。在这一时期中，梁根据自己当时如饥如渴地吸取和了解的西方的思想学说，结合中国的局势情况，通过他特有的流畅明白‘笔端常带感情’的文字语言表达出来，就远比严氏的严谨翻译，更易为人了解、喜爱和接受。……梁启超以其数量极大的

作品成为当时先进青年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梁启超除了在政治和思想上的贡献之外,终生潜心学术研究,对史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法学、社会学、图书文献学、新闻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金融学、科技史、国际关系、中外文化交流等,都有探讨,一生留下一千四百万字的著作。一部《饮冰室合集》,充分体现了在文化学术方面的广博知识和高深的学术造诣及其大师风范。

梁氏的家世可追溯至宋代梁绍,绍成进士后,为官广东。绍传三代,梁南溪始迁新会;再传十二代,梁谷隐之十世孙,即梁启超高祖;梁炳昆便是梁启超曾祖;炳昆的次子梁维清,字延后,则是任公之祖父。

梁延后(1815—1892),起初家境贫寒,后成为“半为农者半为儒”的小乡坤。梁启超同其祖父一起生活过十九年,耳濡目染,印象极深,崇敬祖父的文字甚多。其祖父是一位典型的乡间儒者,一生勤奋而俭朴,自尊而自信,律己严而待人宽,乡誉很好。

梁启超的父亲梁宝英(1849—1916)乃延后三子。梁维清对其子要求极严,激励其子刻苦攻读从不懈怠,甚指望其子博取功名,能光宗耀祖。然梁宝英仕途却不佳,未能进入洋官,博一青衿,只当了一位“田可耕兮书可读”的私塾先生。不过,梁宝英严守其父开创的家风,不仅一生勤奋自励,而且一贯洁身自好,在当地有着极高的威信。

梁启超的母亲赵氏,出身书香门第,能诗能文,贤淑聪慧,勤劳干练,经常教授姑嫂姐妹识字和“司女工”,注重勤督子女功课,以“贤孝”闻名乡里。赵氏生四子二女,长子启超,次子启勋,三子五岁早夭,四子启业,两女未知其名。生四子时难产,赵氏亡故,梁启超仅十五岁。

梁启超幼而慧敏,从家庭及城乡多师受学。六岁初入私塾,读四书、五经、三传,皆均娴熟,有神童之称。遂旁及四史、两鉴、诸子、百家。四部要籍,数年间已多所通晓。科举八股制艺,亦所娴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三十自述》)。少年科第,十二岁为秀才,十六岁中举人。当时,阮元在广州办学海堂,招集两广少年,讲授秦汉百家、六朝文学、隋唐经学、宋明理学,启超在学其间,表现出色,灿然英发;三年中使“旧学”打下了深厚功底。从中举后,于光绪十六年(1890)秋,他和学海堂同学陈千秋同奉南海康有为为师,康“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番一洁,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三十自述》)。康有为讲学于广州万木草堂,梁启超从康始习经世致用之学,包括今文经学、史学、西学,乃至佛学,思想为之一变。其师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梁启超竟能参与校勘、分纂。到光绪十八年(1892),他在学万木草堂又三年,时年二十岁。

前边已提到了梁启超的祖父、父亲和母亲,这里我们引用他两篇文章中的自述,请看家学之重要。一篇是《我之为童子时》:“我为童子时,未有学校也。我初识字,则我母教我。……祖父母及我父母皆钟爱我,并责骂且甚少,何论鞭撻。……我家之教,凡百罪过,皆可饶恕,惟说谎话,斯断不饶恕。我六岁时,不记因何事,忽说谎一句。……晚饭后,我母传我至卧房,严加盘诘。……我有生以来,只见我母亲终日含笑,今忽见其盛怒之状,几不复认识为吾母矣。……当时我被我母翻伏在膝前,力鞭十数。……我母当时教我之言甚多。……但记有数语云:‘汝若再说谎,汝将来便成窃盗,便成乞丐’。……我母旋又教我曰:‘凡人何故说谎?或者有不应为之事,而

我为之，畏人之责其不应为而为也，则谎言吾未尝为；或者有必应为之事，而我不为，畏人之责其应为而不为也，则谎言吾已为之。夫不应为而为，应为而不为，已成罪矣。若己不知其罪过，犹可言也。他日或自能知之，或他人告之，则改焉而不复如此矣。今说谎言者，则明知其罪过而故犯之也。不维故犯，且自欺欺人，而自以为得计也。人若明知罪过而故犯，且欺人而以为得计，则与窃盗之性质何异？天下万恶，皆起于是矣。然欺人终必为人所知，将来人人皆指而目之曰，此好说谎话之人也。则无人信之。既无人信，则不至成为乞丐焉而不止也。’我母此段教训，我至今常记在心，谓为千古名言。”

梁启超在维新运动中，十分重视女子教育，曾先后在《变法通议》、《倡设女学堂启》和《上海新设女学堂章程》等文中，提倡家学与母教。他说，从家学与母教看，为治天下之大本有二，即“正人心，广人才”，而此两者必自蒙养开始。母亲受天性决定，对儿童性情嗜好比父亲更能因势利导，所以孩提启蒙全赖母教。

这就要求为人母者通于学问、达于教法，所谓“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旧学始。”如果将这段议论，与其忆母教禁说谎一事联在一起看，我们就不难看到家学母教在梁启超身上所起的作用及其意义。

三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修水人。近几年来，陈学几成显学，研究陈的文字逐渐多了起来，故此处不再详介，仅想借别人对他的评价来说明之。

傅斯年谈到陈之学问时认为：“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吴宓回忆陈时，这样写道：“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陈寅恪进清华国学研究院，是梁启超举荐的。当时研究院负责人曹云祥问梁，陈是那国博士？进过那家高等学府？梁答陈既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云祥又问陈可曾发表过论著？梁答没有。当曹听后表示，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怎么能当导师？而梁启超则郑重其事地说：“我梁某也没有什么洋博士学位，要说有著作，倒可算是等身了，但加在一起还不如陈先生寥寥几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聘请，我让他留在国外吧。”接着梁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著名学者对陈之推誉。于是曹决定聘请了。

1939年，英国牛津大学特聘陈寅恪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史学家陈衡哲教授说：“欧洲任何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极少数人外，鲜有能听得懂寅恪先生之讲者。不过寅公接受牛津特别讲座之荣誉聘请，至少可以使今日欧美认识汉学有多么个深度，亦大有益于世界学术界也。”

当代学者季羨林指出：“超越陈寅恪不是简单的事情……主要原因是环境不允许再出现那样的人……陈先生是学术巨人，在他范围之内，无法超越，原因就是今后不可能再有那样的条件。总的倾向是可以超越的，但又不可以超越。”

论陈氏家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陈家族中有陈宝箴右铭(1831—1900)、

陈三立散原(1852—1937)和陈衡恪(1876—1923)、陈寅恪祖孙三代四人，都各占一席之地。其祖父是晚清的封疆大吏，任湖南巡抚，在湘主持新政，扬波维新，与京师的维新运动相策应。其父曾任吏部主事，先是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称为海内四公子，以才华横溢、主张西学而声名籍甚，后襄助其尊人在湘推行新政。其长兄乃民初的大画家，我国漫画的创始者。陈寅恪则是中西兼通的文史大家，一代宗师。史称陈门四杰，自晚清迄今煊赫海内外。

陈三立的诗文造诣极高，“与当世贤士大夫交游，讲学论文，慨然思维新变法，以改革天下。陈宝箴逝世后，三立定居金陵，除有家塾外，并在家办学堂，延请教师授课。陈寅恪及其几位弟弟都在这样的环境下，打下了国学的基础。散原老人对于子女的教育，不仅非常重视，而且十分开通，曾延请王伯沆、萧稚泉、柳诒徵等教师，约定一不打学生，二不死背书，在其时与一般之教师规范大相径庭。另外，其家中还具备良好的读书条件：散原老人有着很丰富的藏书，陈寅恪在十几岁以及后来自日本回国期间，终日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佛学、史学等，无不浏览。在这样的家庭条件下就读，兼及家学的承受，从小就在一种自由发展的气氛中，受到国学与西学的熏陶。

陈寅恪在 1902 年刚十三岁时，就随其长兄衡恪游学域外寻师。所以如此，与其祖其翁的变法维新思想有关的，即“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通过日本这个中介来借镜西国，因为日本原来效法华夏，而明治维新又借镜西洋。这正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一种想法。但陈氏兄弟在日期间，正值日俄战争，日占领中国旅顺、大连和牛庄，虽然寅恪才十五、六岁，然其感时伤国，已对日之侵略行径十分愤慨，后返上海复旦公学就学。三年毕业后，负笈远游德国柏林大学，年已二十岁。

四

赵元任(1892—1982)，字宜重，号重远。江苏常州人。赵是清华第二批留美公费生，1918 年仅二十六岁即获得了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这以前，在《中国的语言问题》论文中，就孕育着他以后语言学研究的许多天才设想的萌芽。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赵元任所任课程是《方言学》、《普通语言学》、《音韵练习》、《中国音韵学》、《中国乐谱乐调》、《中国现代方言》、《伦理学》等，他是中国方言调查的创始者，是现行“汉语拼音方案”的奠基者之一，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创立和研究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语言学界誉称他为“中国语言学之父”。

赵元任天份之高，可从他兼通许多学科中体现。在常人眼里科学的分割是森严壁垒的，可在赵讲却是声息相通的。他在康乃尔大学主攻物理、数学，选修过美国史学、天文学、数理逻辑学、系统心理学；在哈佛大学则主攻哲学；而后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却在语言学；他音乐方面的造诣，在本世纪亦达到了中国音乐的上乘水平。

这样的文化学术素养，与其家世家学的关系并非无关紧要的。赵元任的家谱可溯至宋朝，他是宋太祖之后第三十一代，其之世祖赵翼(瓠北，1726—1813)，精于史学，著有《廿二史论》、《陔余丛考》、《瓠北诗集》等传世。其祖父赵执诒，号仲固，是个州一级的官员，先后任职于磁州、祁州、保定、冀州，但每到一处均设私塾，甚至聘请的是常州家乡的先生任教，四

岁开蒙，其祖父一开始就教元任大学、次念朱子小学，接着念论语。其父亲赵衡年，则教过他左传。其母亲冯莱菀，是做过山西抚台的冯光适(字仲梓)的二女儿，出身书香门第，非常重视家学，对少年赵元任影响很大。现引他一段回忆为证：“……晚上多半儿还要念诗。诗全是我母亲教的。母亲是那时候儿很有点儿才的女人。能写诗，能填词，写的一笔好字，还有昆曲也好，又能唱又能吹。虽然他没教过我昆曲，可是我想我后来喜欢弄音乐多半儿是从我母亲传下来的。可是吹笛儿倒是我父亲教我的。不知道怎么样儿母亲不教我吹唱，只教我吟诗，大概因为唱唱儿是玩儿，吟诗是念书，不过诗比别书轻松一点儿，所以让我们晚上念。我倒的确觉着比白天的书好玩儿一点儿，并不拿他太重的功课。我念的是唐诗三百首。我哥哥跟姊姊们还会千家诗跟别的诗集，我就只念了唐诗三百首。可是有别的诗我虽然没念也背得出来了。怎么回事儿呐？因为我们在家里念诗也像白天在书房里似的大伙儿同时念，你念你的，我念我的，有时候儿我停下来就听见他们念的东西。我顶记得他们念的圆圆曲，我连字都没看见就背熟了。还有白居易的《长恨歌》，虽然是唐诗里头的，可是他们比我先念。赶我起头儿念到《长恨歌》的时候儿都已经听得半熟了。……”（《早年回忆》）

由这段回忆中，不仅能看到家学的潜移默化作用，而且可学到家教的方式方法了。是不是还能有些其他启示呢？是不是像当今的应试教育那样，只有将学生的作业压得喘不过气来，才能有人的高素质呢？才能产生与造就出未来的大师级的人才呢？

1996年 10月

同是曾开风气人

胡适(1891—1962)与章士钊(1881—1973)，二人是相差十岁的两代人，但却既是朋友，又是论敌。在本世纪初之文化史上，前者是今文派的领袖，后者为古文派的代表。今天回视他们的个人交谊和学术争论，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事。

胡适与章士钊，在本世纪初，应该说都是开风气的人物。章氏十七岁为“童子师”，二十一岁到南京陆师学堂，结识了安徽籍之汪希颜、汪孟邹及陈独秀等人。1903年到上海加入爱国学社，又交结蔡元培、章太炎、吴敬恒、邹容等人，而投入反清革命行列。章士钊遂主笔《苏报》，使报纸成为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机关报，宣传革命，社会影响甚大，清廷视之眼中钉，下令封闭，并逮捕革命党人，“苏报案”震动半壁河山。正当章士钊革命闹得轰轰烈烈之时，胡适才于1904年离开安徽农村，到了十里洋场的上海，年仅十四岁，童智未开，尚不知革命为何物，更不晓章士钊为何人。不过，胡适非常聪明，在两年后就主编梅溪学堂的《竞业旬报》，开始了以白话文作宣传，大谈社会改革了。当1919年10月，胡适参观吴禄贞墓后，大有感慨地评价“十年来的人物，只有死者宋教仁、蔡锷、吴禄贞能保盛名。生者不久就被人看出真相来了。这是因为时势变得太快，生者偶一不上劲，就要落后赶不上了，不久就成了‘背时’的人了。”(《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72页)其意已涵反对白话文的章士钊在内。尽管此时，胡适与章士钊已因白话古文成论敌，但是胡适并未将章踏倒在地，而是从时势变化太快到赶不上潮流落后背时论之，不管怎么说，这种评价总还是客观的，理性的。

章士钊1905年先留学日本，于1907年由东京转英国阿贝丁大学政治法律系，兼攻逻辑学。辛亥武昌起义后，受孙中山之约，辍学回国。次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被邀为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主笔，后与党人政见分歧，同年9月离开《民立报》，自创《独立周报》，袁世凯委以北京大学校长而未就。1913年3月，发生宋教仁被刺案，章由北京南下，参加讨袁战争。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1914年在东京与陈独秀等创办《甲寅》月刊，“愤袁氏之专政，谋执文字以受。”以“秋桐”笔名发表了许多针对时政弊端的论文，颇为时论所重，《甲寅》杂志之影响，并不弱于梁启超主编的《庸言》杂志。1915年底，云南护国运动爆发，海内外党人纷以讨袁。1916年5月，欧事会与进步党人于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岑春煊主其事，章为秘书长，准备与北方军阀开战。6月袁世凯暴病而亡，黎元洪继位，恢复国会。7月护国军务院撤销，南北媾和。章氏以前议员身份达北京，旋转入学术界，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任图书馆主任。1917年11月章复刊《甲寅》，并约请李大钊、高一适任编辑；7月张勋复辟后又停刊。1918年章氏于北大讲授逻辑学，轰动一时。正当章在北方从事学术研究，提倡调和精神之时，南方桂系排挤孙中山去职，改组广州护法军政府，推举岑春煊为首席总裁。岑上台后，急约章南下相助。1919年初南北政府媾和，章被任为南方议和代表，随唐绍仪赴沪出席会议。章于会议后回到北京，对己之曾宣扬西方代议制，产生怀疑。1921年二月出国到西欧进行政治考察，深受基尔特社会主义之先驱潘梯思想的影响。1922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次年南下上海任《新闻报》主笔，撰文痛斥曹锟贿选总统，抨击代议政治。1924年10月冯玉祥北京政变，直系失势，皖系上台，邀章北上，先任司法总长，后兼管教育，投入北洋军

阔怀抱，思想日趋保守，在文化上倡复古读经，复刊《甲寅》，与新文化运动抗衡。直到1926年北京爆发“三·一八”惨案，段祺瑞、章士钊等在民众讨伐中被赶下政治舞台。以上所以胪列章士钊这段经历，目的在于让读者了解胡适指出之当时“时势变得太快”，“生者偶一不上劲，就要落后赶不上了，不久就成了‘背时’的人了”的时代背景；同时也意在让人们在评价历史人物之功过得失时，千万切忌简单化和极端化，一定要采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态度和方法。

说到胡适与章士钊的白话与文言之争，也就发生在这个时期。就在章氏主笔《民主报》期间，他竭力鼓吹西方民主政治，并倡导两党制。那时，清王朝刚被推翻，民国初建，无论政界上层人士，还是社会各个阶层，对资本主义的宪政知识了解极其有限，而章士钊又留学英国，专攻法律政治。正在美国留学的胡适，读过《民主报》及其政论，十分钦佩。后在信中向章氏说：“忆足下在《民主报》时，亦有此种言论，彼时既有意通问讯，适国内忧攘，卒卒未能如愿，至今以为憾。”（《甲寅》月刊第1卷10号，1915年10月）由此看出，胡适对于章士钊早是心仪已久的了。而章对于胡的印象，也是极佳的，章在一封信里曾以赞赏的心情夸奖说：“曩在他报获读，足下论字学一文，比附中西，得未曾有，倾慕之意，始于是时。”（《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1页）致于两位相互认识，已是《甲寅》杂志期间的事了。

《甲寅》杂志于1914年5月创刊于东京，后来将杂志迁回国内后，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为扩大销售渠道，“亚东”之汪孟邹按期将《甲寅》寄往美国，请在那里留学的胡适代为推销。经汪向胡、章介绍对方，彼此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于是胡将《柏林之围》的译文寄给章，并附函致意。章收到译稿，刊于《甲寅》，还回信：“前辱示书暨小说一种，高怀雅谊，倾感不胜。《柏林之围》已登入第四期，早经邮呈，想蒙鉴阅。”（同前）在同一封信中，章确实地将胡恭维了一阵，并要求胡撰写“论政论学之文，尤望见赐。”胡适随后寄出《非留学篇》，并在附信中说：“顷奉示书，所以奖励末学者弥至，甚愧甚愧！”还谈及他写作打算，计划翻译世界名剧多种，但脱稿时间尚未可料。说《非留学篇》“所持见解，自信颇有商榷之价值，以呈足下，请览观焉。适以为今日无海军、无陆军，犹非一国之耻；独至神州之大，无一大学，乃真祖国莫大之辱，而今日最要之先务也。一国天地可为高等学问授受之所，则固有之文明日既于沦亡，而输入之文明扞格不适用，以其未经本国人士之锻炼也。此意怀之有年，甚愿得明达君子之赞助。忆足下在《民主报》时，亦有此种言论。”（《甲寅》第1卷10号）在文中胡适不主张大量派学生出国留学，而主张把派留学生之费用节省下来办大学，培养人才，并认为这是国家当务之急。由此，可见章士钊早期论政论学文章，对青年胡适是极具影响力的。胡适这篇文章，后因《甲寅》被迫停刊未被刊载，章士钊由日本返国后步入政治，二人交往暂告中断。

胡适与章士钊的交往再始时，已到1917年了。在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先邀章士钊任教讲授逻辑学，后有胡适学成归来亦任教于北大，二位开始面识，又由于陈独秀的撮合，彼此更加友好。由章士钊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可见当时陈、章、胡之关系较为密切。章在信中说：“适之兄：你的信、对联、墨经诠释等都收到了。谢谢对文甚好，我已经照写。但是若有人下一转语，恐怕有点语病，何也！未团圆先离别，出监狱入洞房，转语即是：出洞房入监狱，以离别后团圆。我们祝贺人家的新婚，同时隐射人生中

的一段挫折，怕的蒸出误解，你证婚时演说，说到独秀的话：出监狱入研究室，出研究室入监狱。我就担忧，有人将你的意思，联想到‘出洞房入监狱’一点，这或者是我神经过敏的地方，但是你以为然，请把这对联不用，由我另办一副，请你另做一首对文，交我补写，你看好不好？……”（原件）。章士钊信奉古文，写信写文章皆如此，但此信却用白话，可见其对胡适的尊重态度。

到1918年，章士钊出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与胡适远隔南北。随即“五四”新文化运动将至，胡适倡导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发展更为普及，全国白话文报刊如雨后春笋，达四百余种。即使在这种潮流面前，章士钊仍然坚持保守观念，主张使用文言文，于是发生了白话与文言之论战，双方代表人物就是胡适和章士钊，而且旗帜鲜明，各持己见。说到妥协也是有的，往往表现在双方的通信和赠诗方面，其中还包涵着戏谑与尴尬之类的成分。

1925年2月，章士钊与胡适在北京的撷英饭馆席上不期而遇，此时章是执政府的司法总长，胡是被邀请出席会议，而且在宴会上同席，饭后两人在一起合影。2月5日像片洗出来，章在像片后题白话诗一首，并附信给胡。内云：“适之吾兄左右：相片四张奉上，账已算过，请勿烦心。惟其中二人合拍一张，弟有题词：见阅之后毋捧腹。兄如作一旧体诗相酬，则真赏脸之至也。”（原件）章诗云：

你姓胡，
我姓章；
你讲什么新文学，
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
你不攻来我不驳，
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
将来三五十年后，
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
哈，哈，
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
总算是老章投了降。

2月9日，胡适循章士钊所请，遵嘱奉答“七绝”一首，诗云：

但开风气不为师，
龚生此言吾最喜。
同是曾开风气人，
愿长相视不相鄙。

作为一贯反对白话文的章士钊，此时为何一反常态，表示“投了降”呢？从其诗中不难看出他的矛盾心情，一方面坚持旧论，另一方面又无可奈何，让人看了哭笑不得。事实上，白话文的发展趋势不可阻挡，所以他写了这首白话诗，表示要言归于好，以缓和敌对情绪。

但是时间过了不久，章士钊在北京复刊《甲寅》杂志，却又宣称“文字须求雅驯，白话恕不刊布”，而且又攻击起白话文来，“近年士习日非，文词鄙俚，国家未灭，文字先亡”。于是，胡适又回敬一文《老章又反叛了》，批驳道：“我们要正告章士钊君：白话文学的运动是一个很严重的运动，有历史的根据，有时代的要求，有他本身的文学美，可以使天下睁开眼睛的共见共赏。这个运动不是用意气打得倒的。”指出，章士钊君的谩骂岂能使“胡

适不做白话文”！然而，章仍然不服气，又作《答适之》一文，进行强词夺理的辩驳，不过终归是强弩之末，未能穿鲁缟，败下阵来。不仅结束了章之政治生涯，而且《甲寅》杂志也停办了。章企图依靠北洋政府努力推行复古运动的愿望毁灭了，代之而兴的却是胡适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不断深入发展时代之到来。

1996年 2月 23日

胡适给陈监先的三封书信

近年来，文化学术名人的书信集的出版渐渐多了起来，这实在是一件值得欢迎、值得欣慰的事情。

文化学术名人的著述活动，不仅限于专门著作论文和其他文体的写作，而且包括了日记书信以及交游往来。作为文化学术交流方式之一的书信，往往是文化学术著述的重要方式，这在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从史料角度讲，书信具有其他文献所不及的特点，在某些方面有着其他材料不可替代的作用，就官方文书中是难以见到的，不论对于历史研究，还是对于历史人物及其思想与学术的评价，都有着较高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这恐怕正是文化学术界重视书信的理由所在。

—

胡适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学术史上之一代宗师，他之文化学术思想影响，不仅是深远的，而且是多领域的。他的存在是一种客观的历史现象和文化现象，并不是以某种主观好恶就能决定他之存在与否，历史与现实都证明了胡适及其思想影响的客观存在。

我的书斋存藏有胡适的三封书信，就来自 50 年代批判胡适思想运动之后和“文化大革命”浩劫之后的民间，收藏者是与胡适有过交往的文人陈监先先生，这三通书信就是他与胡适在 40 年代后期为收购一批章实斋资料的通信。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胡适于 1922 年出版了《章实斋先生年谱》，1931 年又经姚名达补订后再版。40 年代已在山西省教育厅供职，而且对中国文史及其古籍文献深有研究的陈监先，在太原古旧书肆上发现了有关章实斋的新资料，即章实斋《上慕堂光禄书》、《上晓徵学士书》二札。陈监先根据新发现的资料，对《章实斋先生年谱》提出了质疑，并给胡适写信附上章实斋手札二通（后刊载于 1946 年天津《大公报》文史周刊第 4 期，题目为《章实斋年谱的新资料》），进行商榷。胡适时任北京大学校长，其时不在京，邓广铭代行其事，给陈监先复函二封；胡适返校后，与陈监先又亲自有信三札。

解放后，陈监先长期从事 17 世纪启蒙思想家傅山研究，著有《霜红龕集校补》等。80 年代，我主编《晋阳学刊》杂志，为推动傅山研究，从创刊号起即辟“傅山研究”专栏，并聚集了一批研究傅山及 17 世纪启蒙思潮的学者专家，然却未见着陈监先；后经多方访寻，直到 1984 年 8 月召开傅山学术讨论会前夕，才在远离太原的原平县农村，找到了他。时已年届 80 岁以上，且患有偏瘫症，不过与之一见如故，论及傅山与相关问题时，思维清晰，话锋犹健，所涉事件和人物，都能体现出他思考的深度。陈监先还是山西当代藏书家，晚年将他藏书的大部分捐献给山西省图书馆。我去过他家几次，从交谈过程中发现，从他交给我转藏的有关章实斋年谱的新资料可见，他手中实际上还珍藏着一部分极有价值的现代文献。与胡适三通书信相关的，除前边提到者外，还有陈监先本人写给胡适的二札底稿。有意思的是，以上书信仅剩邓恭三（广铭）的一个印有“国立北京大学缄”的信封，背面贴有“中华民国邮政”，面值每枚壹佰元共 6 枚的邮票，也被撕得面目全非；陈监先二札信稿，不仅在胡适名字上涂墨，而且打有 × ×，与胡适信开头部分，有涂抹

之后又贴了一层纸遮盖。按书信常规看，涂抹掉的文字，很大可能是恭维了胡适几句，然而关于章实斋的资料部分却都保留了下来。所以会作出涂抹，显然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有关，与他自身的生存安全有关；但是即使如此，胡适的三封书信还是有幸保存了下来，这件事情的本身，就不难看出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及其文化蕴涵。

二

陈监先在回忆他发现章实斋年谱的新资料的经过时，这样说：“1945年秋间，日本投降以后，我从晋西回到太原，偶游书肆，见有由旧家散出名人书帖多种，内有字帖三巨册，俱书札原墨，汇裱而成，一册题《甲戌同年手迹》，一册题《同里诸公手迹》，一册题的什么，已经看不清楚了。我取得书主的同意，全部借归，从头到尾，细阅一遍，都是满清乾嘉时代的名人，致汾阳曹慕堂先生父子的手迹。足见原是曹氏故物，掩藏一百余年而概未出世，外间无人知道，故吴兴刘氏嘉业堂所刻章氏遗书五十卷，号称完备，亦未收入。实斋手札，我照全文抄下，一札是给曹慕堂的，一札是给钱晓徵的，都是说实斋由京归浙后，撰述《文史通义》的事。尤其给钱晓徵一札，洒洒千余言，专论古今著述渊源，文章流别，及《文史通义》著作的旨趣，我取胡适之先生的《章实斋年谱》对照了一下，便发生了一点意见，觉得这两篇文章，可作《章实斋年谱》的新资料。”

鉴于以上的认识与判断，陈监先写出文章，并附录章实斋手札二篇，与胡适进行商榷。他指出：“《章实斋年谱》乾隆三十七年条下，列‘候国子司业朱春浦先生书’云：

是以出都以来，颇事著述，斟酌艺林，作为《文史通义》，书虽未成，大指已见辛

楣先生候牍。所录内篇三首，并以附呈。

胡先生断定：“所谓辛楣先生候牍，即上辛楣宫詹书”。现在我觉得所谓‘辛楣先生候牍’，当是指新发现的这篇《上晓徵学士书》，未必是《上辛楣宫詹书》。”

为此，陈监先提出了自己的五方面的理由：

第一，《上晓徵学士书》有“谨录内篇三首呈览”之语，与候朱春浦书所称合，而《上辛楣宫詹书》，则没有说“录内篇三首”的话。

第二，候朱春浦书中有“大指已见”云云，《上辛楣宫詹书》却多是说“当日不合时宜”的情形；只有这篇《上晓徵学士书》，才确是说著述《文史通义》的“大指”。

第三，《上辛楣宫詹书》有“所上敝帚，乞勿为外人道”一语，按其语气，必另指个东西，我以为当即是指《上晓徵学士书》而言。

第四，据年谱，实斋作候国子司业朱春浦先生书在“秋冬间”，这篇《上晓徵学士书》尾署“八月二十日”，可知候朱春浦书之作，亦在“秋间”，到不了“冬间”。至于《上辛楣宫詹书》是否作于“秋间”还不的确。

第五，候朱春浦书有“是以出都以来……”云云，《上晓徵学士书》有“自出都门……”云云，都是实斋由北京返浙后，首次通信的语气，《上晓徵学士书》：“……因忆京华旧游，念久不获闻长者绪论，以为耿耿，敬想入秋来，起居定佳，伏维万福。”这更是候牍里的话，看《上辛楣宫詹书》，全文共三百八十三字，没有一个字有“候”的意思，如何能称为“候牍”呢？

因此，年谱所云“即上辛楣宫詹书”，似应改为“即上晓徵学士书”。谱中若两书并列则《上辛楣宫詹书》可放在《上晓徵学士书》的后面。

年谱在乾隆三十八年条下，《与严冬友侍读书》云：“为《文史通义》一书，草创未多，颇用自赏，曾录内篇三首，似慕堂光禄，乞就观之。”

就此，陈监先指出：“新发现的这篇《上慕堂光禄书》，正是‘录内篇三首似慕堂光禄就观’时的原书。”

《上慕堂光禄书》云：“所著《文史通义》，其已定者，得内篇五，外篇二十有二。文多不可致，谨录三首，求是正。讫，转致辛楣先生、朱春浦师。两处书俱未缄，亦乞阅后封致。”又书后附语云：“外文三篇，系呈朱春浦师及辛楣先生，以缮录手不暇给也。”

陈监先由此得结论曰：“可知《上书晓徵学士书》，系托曹慕堂‘阅后封致’。如今原书既与曹慕堂书同在一处，足见当时曹慕堂将书积压，未曾‘封致’。因此，我判断《上晓徵学士书》，钱晓徵当时未必见到。曹、朱、钱三书中都有‘录呈内篇三首’的话，实则是实斋因为‘缮录手不暇给’只录了一个三首，请曹看了，再转给朱、钱二人递观罢了。现在帖册中没有候朱春浦书，当是已封致朱春浦了。那封信，即年谱所列候国子司业朱春浦先生书。”

因《上慕堂光禄书》、《上晓徵学士书》，文字较长，此处只得割爱了，幸好陈监先已交待清楚了。现在，我们想说的是，当时胡适已经是名扬中外的著名学者，而陈监先却名不见经传，可后者竟敢于与前者进行争鸣，指出前者的失误，弥补前者的缺失；即使后者掌握了确凿的事实，但要与前者商榷，也需要有无畏的学术勇气。当我在几十年后，郑重其事地向陈先生询及当时的心境时，想不到他只平淡地说：“学术探讨上的事，就本当如此，谁能穷尽了真理？”说到胡适，按照他当时的地位和影响，也可以对陈监先的商榷不予理会，然而从他给陈的三封信中可见，胡适并未表现出学阀气味，相反却使人们看到，是那樣的具有学术雅量，是那樣的谦和平等待人，体现出一代宗师的大家风范。这与当今一些有地位的学者相比较，实在已经很少见到这种学风了。但愿我之批评，不会使某些人不高兴，就算谢天谢地了。

三

现将胡适给陈监先的三封书信抄列于下：

其一：

监先先生：

我从南方回来，才得见先生九月十日的长信和章实斋的遗文两篇，并且看见邓恭三兄和先生往来的通信。我要特别谢谢先生的厚意。实斋上钱晓徵书，大概是被曹慕堂留下了，始终没有寄达。此信是从安徽太平府试院发出的，也许那时钱辛楣已南归，故此信留在北方。尊论我完全同意。曹学闵是甲戌进士（乾隆十九年），故有“甲戌同年手迹”一册。戴东原集中有与曹学闵书，其原札也许在先生所见三册之中。

我曾嘱邓恭三兄请先生把这三册手迹买下，如先生不愿自己收藏，我颇想备价收买。

先生来信对我有过分奖励的话，实在不敢当，特别道谢。

《水经注》案，已审了三年，案情已大白，但判决本全文还没有写成，惭愧之至。匆匆奉答，敬祝

大安

胡适敬上

卅五，十一，五日

其二：

监先先生：

我在南京住了五十天，昨天回来，今天才见到先生十一月廿二日的信。章实斋手迹册页，今天也见到了。

当日我本提议请先生代我收买这些册页，不意竟蒙先生把实斋两札手迹赠送给我，这就近于夺先生之所好了。惭愧之至，敬此申谢。

乾嘉学人手迹三册，我所以想收买，正因为其中也许有关系传记的材料，如冯廷丞即系和实斋东原都有往来的人，实斋与东原在宁波相见，章氏甚讥评戴氏的议论，不知冯氏曾提及此会否？

此三册尚可收买，千万请先生许我备价寄还。但以此小事烦累先生，深感不安。

匆匆奉覆，敬祝

新年康乐

胡适敬上

卅五，十二，卅一夜

其三：

监先先生：

元月九日的惠书收到了。为了章实斋和乾嘉学人手迹的事，屡次承蒙先生费神，一面和书贾再三交涉，一面又开示了一份极详细的目录，实在感激不尽。

就先生所开示的目录看，其中关系比较重要的，似乎只有任大椿、钱坫、朱锡庚、冯廷丞和引之(王引之?)诸人，这几个人的信札中如果有涉及学问上的问题，或和他们的生平极有关系的资料，不知书贾是否还肯容许先生借来托人抄录一份。但如果像来书所说，其中也只是些寻常事情，便不必了。全份索价四十五万，实非我的力量所能购买，请不必再和书主商谈了。

先生有便来平，甚望能有晤谈的机会。专此敬请

撰安

胡适敬上

卅六，一，十六

1996年10月

梁启超与现代传记文学

梁启超由 1873 年出生，到 1929 年逝世，仅度过 56 个春秋，作为一个学术人物，他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若干领域，诸如史学、文学、政治学、哲学、经济学、法学、新闻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图书文献学和西学翻译等各种学科中作出卓越的成就，留下了 1400 万余字的辉煌巨著，成为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具有“百科全书式”的著名学术大师。本文仅涉及其对于现代传记文学上的一些看法。

中国之传记文学源远流长，遗产极其丰富。远在春秋末和战国时代，中国之传记就已产生，典型者为《左传》、《战国策》。发展至司马迁之《史记》，传记文学已达成熟阶段，并且已经蔚为壮观。在二千多年的历史中，始于《史记》的正史，以及杂史、地方志和散见于历代各家文集中之传记，真可谓浩如烟海。从司马迁以后的二十五史及清史稿，传记几乎成为历史的主要部分，由此不难看出传记在传统史学中的重要地位。汉代以后的历代，都有众多的甚至成批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撰写传记作品，有的甚至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曄等人，既是著名的史学家，又是杰出的传记作家。历朝历代的一些著名的诗人、散文家，诸如陶渊明、韩愈、柳宗元、苏轼、陆游、宋濂、袁宏道、姚鼐、全祖望、龚自珍等，以及近现代的梁启超、胡适、郭沫若、林语堂、吴晗、王森然、朱东润、刘相湘等，都写过一些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进入 80 年代后，传记文学简直成为显学，传记文学达到了空前繁荣时期，优秀传记作品层出不穷。

在漫长的发展史上，古代传记文学逐渐形成了它的优秀传统，在内容上忠于史实，是非分明；在艺术上注意表现人物性格，积累了若干描绘人物的表现手法。当然，也无需讳言，在写法上也存在着共同的局限，如形制短小，不利于全面写出人物的生平及其活动的环境，事实过于简略。人物性格缺少发展与变化，对人物心理尤其少于细腻的描述。这样一来，古代传记文学也就难以担负起对现代现实生活的描写使命了。

随着时代从古代到现代的交替，传记文学也有一个从古代到现代的过渡阶段，而梁启超、胡适的传记文学创作及其理论就成为了这一过渡的桥梁。他们发现了中国传统传记文学的缺陷与式微的情形，同时发现西方传记文学的发展及其在学术上的影响；他们二位除自己以身作则从事新式传记的撰写外，更大声疾呼提倡一门新的学问，即传记文学。他们在传记文学作品写作的思想特征、人物性格、情感力量、结构形式和语言表达等五个方面，都体现了其从古代向现代发展中的桥梁作用。这种桥梁作用主要体现在他们二位，尤其是梁启超的传记文学作品的写作实践中。

梁启超的传记文学作品的写作，若从他 1897 年左右写作戊戌政变中遇难的六位烈士算起，到 1905 年前后写作西方六位资产阶级革命家结止，八年间完成传记二十几篇。不过从写作风格上看，以《记江西康女士》、《记东侠》、《三先生传》、《殉难烈士传》等篇为代表，其基本上沿袭了古代史传的格调；以《匈加利爱国者噶苏士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新英国巨人克林威尔传》等篇为代表，则在古代传记文学基础上又吸取了西方传记文学的因素，从内容到形式都可显示出梁启超在传记文学写作上的发展，或称其在传记文学由古代向现代的过渡。

梁启超的传记写作理论则实际上晚于他的写作实践的提出，主要见之于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时间已到了 1927 年。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即“人的专史”与“理想专传”。何谓“人的专史”呢？梁提出：“人的专史，是专以人物作本位所编的专史，大概可分为五种形式：(一)列传，(二)年谱，(三)专传，(四)合传，(五)人表。”何谓“理想的专传”呢？梁指出：“理想的专传，是以一个伟大人物对于时代有特殊关系者为中心，将周围关系事实归纳其中，横的竖的，网罗无遗。比如替一个大文学家作专传，可以把当时及前后的文学潮流分别说明。此种专传，其对象虽止一人，而目的不在一人。择出一时代的代表人物或一种学问一种艺术的代表人物，为行文方便起见，用作中心。此种专传从前很少，新近有这种专传出现，大致是受外国传记的影响，可惜有精彩的作品还不多。”为体现他“理想的专传”意旨，梁写过《李鸿章》一书，以实践其通过对传主及相关人物、事件的描述与评价，而达其辐射、涵盖和反映一个时代的目的。并“全仿西人传记之体，载述李鸿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论断，使后之读者，知其为人”。他关于“专传的做法”，曾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专辟专章加以论述，同时还拟出了《孔子传》、《玄奘传》的大体做法。从中可见梁之传记写作理论及其操作实践，确实在古代传记向现代传记的转换过程中，起到它应有的过渡和发展的积极意义，显示了梁在现代传记文学创建中的无可替代的先导作用。

要论梁之后在现代传记文学方面的开拓者及成果显著者，自然不能不提到王森然、朱东润二位先生。说到朱东润，读者还较熟知；提及王森然，恐怕人们就生疏了。其实，王在政治思想上应列入本世纪最早觉醒者之一批先辈人物之列，在文化学术上应属于众多领域中都有建树之杰出学者。其所以在社会中名声不彰，盖因于政治因素和历史纠葛。这种情况，在中国现当代史中，应该说不是个别现象。王在现代传记文学中的贡献，是他早在 20 年代中期至 30 年代末即写出了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中国近代百家评传》；朱东润则不仅在 40 年代始重传记文学研究，而且以古代传记传统与现代西方传记经验相结合，先后创作了《张居正大传》等十部传记作品。若以梁之理论套的话，王之成就在列传，朱之成就则在专传。

1994 年 8 月

王森然与《近代百家评传》

王森然(1895—1984)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影响的人物，由于各种原因，使他的业绩到70年代末才得到公正的评价。他提倡历史人物的“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相结合原则”，却在他自身的评价上产生了分离现象，被蒙冤了几十年。每当排除偏见因素，历史的评价就会趋向客观合理，显现出历史的无私公允来。

若要给王先生在文化学术上定位的话，他是教育家，在教坛上执教七十年，培养出的弟子有几代人；他是史学家，著有《世界妇女运动大系》、《印度革命与甘地》、《新史学之目的与范围》等百万余字的讲稿；他是文学家，不仅主持和编辑过《塞声》、《骆驼》、《摸索》等数十种文学刊物，而且发表了《时代与文学》、《创作与压抑》、《艺术与社会》等大量理论文章，并出版《文学新论》一书；他是诗人，其古体诗及新诗，皆有着自身的气质和风格；他是艺术家，其丹青享誉中外，在艺术理论造诣上，亦颇见工力与涵养。此外，他完成了宋代至现代剧本的目录大全，几乎囊括十七个民族之所有戏剧；他是传记学家及传记作家，早在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末，即研究和撰写了《中国近代百家评传》一书，先后刊载于国内报刊，在中国现代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受到国内外学界的重视和推崇。

从王先生已经出版和发表的部分评传看，都饱含作者探索的勇气和创造的匠心，展现着作者在传记写作上的求真与致活之基本工力，都反映着作者在人物评价上的许多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以历史学家和文学艺术家相结合的王森然先生，在研究近代著名人物和创作他们的评传时，不仅较好地达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而且较为成功地解决了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结合，同时注意了学术性与通俗性的兼顾，这样也就构成了其传记作品的特色，显示出了他在现代传记文学上的贡献。

传记文学的基本要求，一是忠于历史；二是讲文学性。历史真实是史学工夫，艺术真实是文学技巧，二者相兼而统一，即可认为是一部优秀的传记。王森然指出：“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辞采以为才也，论诵以为学也，志断以为识也。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因此，治史之人，重在有‘史德’。有‘史德’之人，襟怀坦白；有‘史德’，才能以董狐之笔，秉笔直书。”王先生治学严谨，忠于史实，不畏权势，不怕杀头，光明磊落，刚正不阿，对于入传者，在其笔下，不论是受到歌颂的先驱和志士，还是受到批判的落伍于时代潮流的遗老和文人，都能给以翔实地叙述、客观地介绍和公允地评价。尤其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在这种环境中生活的人，不管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都可能有微疵或小善。在作者笔下，没有把简单化、脸谱化的结论套在一些人物头上。否则，使人看不到他们的思想和举止的变化发展过程，因而出现溢美溢恶的弊病。

1927年白色恐怖笼罩中国，李大钊于4月28日惨遭军阀张作霖的杀害。王森然不避危险，在天津《大公报》刊出了《李大钊先生评传》。从这件事就可看出先生之忠于历史的勇气。在传中称颂李大钊“学问之渊博，道德之高尚，理志之宏远，热忱之浑厚，胆气之雄伟，意志之坚强，均横绝一世”。堪为“革命青年之导师”；抨击执政军阀和社会，并高声疾呼：“世有惨杀先生者，但不能以先生之言断其终身，处此黑暗、堕落、恶浊、卑污之世界，非先生谁为指路之明灯哉！”对烈士牺牲而未觉醒的人们却麻木如故，作者

发出感慨曰：“国人不知尊之敬之，而权贵之怒睨其言，朋党之积怨其后，先生宁以死殉党，以死偿学，不肯屈法以求荣，其忠于主义，勇于任事，以视后己尸窃高位，伺敌人之喜怒，以媵媚取荣者为何如也。以中国之最大政治家，兼学术思想之巨子，立遭惨杀而无反映，遂知我中国积弊，莫之能革……悲夫！”这般议论，除传导了传主之革命精神外，还可进而激起后继者革除积弊和改造中国的勇气。

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结合，按一般道理讲，似乎并不复杂；而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实际运动常处于极其错综复杂之中，从而形成了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之间的尖锐对立和冲突，往往出现从道德评价看来是恶的东西，而从历史评价上讲却可能是进步的情况。这就要求人们在评价任何现象和任何人物时，应始终把维护新事物发展的历史评价放在首位，并注意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有机结合，以避免将二者颠倒和一概而论的简单化或绝对化的错误。

关于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王先生指出：“传记无须为贤者、尊者、亲者及自己讳。是什么说什么。凡是推助过历史前进而为人民做过好事，在学术方面哪怕一点滴超越前贤者，都不能抹煞。……金要足赤，人要无瑕的狭隘眼光和过分苛求，做不成大学问。”这种不掩恶，不溢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诚诚，但求真于历史，有益于时代的学风，是何等之可贵。

王先生治史，不求远古，而就近人，不思超脱，但求益时。他首先以历史学家及历史高度审视历史和人物，这就使他能透过历史的尘雾，分辨出时代的辙迹，觅寻到历史和人物的真相，给以学术的立位。虽然他写出的总数仅二百万字，据知搜集的史料却多达二千余万字。有了丰富之史料，才能有丰富之形象，才能以遒劲之笔力和高远之眼光论人叙事；才能通过典型意义的事件展示传主的性格特征和精神风貌，通过传主的思想、行为逻辑及其命运中之历史逻辑作出合理而又科学的解释。由于评传较好地解决了学术性与通俗性的兼顾，而能流行和影响于社会。

1994年8月

巴金与卫惠林

一代文宗巴金再过一个月就是九十二岁的长者了，难能可贵的是他仍在笔耕不辍，去年刊在《文汇读书周报》(1994.8.13)上的《怀念卫惠林》一文，从笔迹看还是他亲笔写就，可以称之为现代作家中写作生涯最长的人之一了。

他追思之人，对于当代读者而言，很可能是陌生的。因我研究现代学术史，又由于从80年代末筹组《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丛书的关系，也许还有山西同乡之缘吧，曾与当时旅居美国的人类学家卫惠林有过书信来往，很感谢他两次向我提供了他之详细经历及著作情况。当我看到巴老的回忆文章时，因文中并未介绍卫惠林的籍贯和经历，我一时判断不出是否有另一个同姓名的人，去信核实，也未见回复。

从巴老的怀念中，看到他对卫惠林了解熟悉、情感深切，也看到卫惠林对作者的帮助和影响之大。巴金和卫惠林1925年在上海认识，后来同去巴黎，且住在一起。

我本来对巴老怀念的卫惠林，就想解开一些不解的东西。想不到《黄河》杂志社的谢泳也注意到了这件事，除查阅了有关资料外，并来舍下询及卫惠林情况，后来他还以读书札记的形式写出一篇《巴金的山西朋友》，刊于《太原日报》上。于是更促使我翻检资料架上的卫惠林档案，查阅徐开垒的《巴金传》、陈思和的《巴金传》、陈丹晨的《巴金评传》和汪应果的《巴金传》，终于对巴老怀念的卫惠林，有了肯定性的意见。

卫惠林为山西省阳城县人氏，与巴金同庚，但卫生于1904年阴历二月十八日，巴金生于1904年11月25日。在徐开垒的《巴金传》中说卫之“年纪比他(巴金)大几岁”是不正确的。说到两人都曾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奉者”，符合事实。徐与陈的两家传记中，都说巴金小说《雨》中的男主人吴仁民就是卫惠林。巴金在写作《雨》这篇小说时，还曾同卫惠林通过信，征求过卫惠林的意见。看来卫惠林还对小说的第三章谈过自己的看法，所以巴金在回信中说：“你不过读了《雨》中的前三章。我以后将怎样写下去，你还不曾知道。你说这小说的阴郁气过重，但这阴郁气也不曾隐蔽了那贯穿我的全作品的光明的希望。我早已不去想那黑影了。事实上，我已经把它征服了。”徐先生的传记说：“巴金在答复了卫惠林的信以后，就根据他原来的设想，把《雨》写了下去。他原来计划就是要写一个粗暴的浮躁的性格。他现在果然把这个性格写活了，因为他非常熟悉这个性格，他不但熟悉他的外表，还了解他的内心。这个性格便是他的热情的友人卫惠林的性格，即《雨》中的吴仁民，虽然有一部分并不真是卫惠林的亲身经历，但巴金觉得按照他的性格，他完全可以成为吴仁民。卫惠林是巴金最好的朋友之一，他非常忠实地在《雨》里写了卫惠林的为人，因此他后来经常翻阅自己这本小说，他觉得这里有他过去好友的影子，虽然后来生活改变了卫惠林的性格，也许由于热情有了寄托，岁月使他变得沉静，成为一个稳重的大学教授，卫惠林不再是《雨》中的那个卫惠林，但《雨》里的吴仁民仍然留着巴金昔日好友的影子。”(《巴金传》)

由巴金晚年怀念卫惠林的心情看，以及今后研究巴金的需要看，让人们多了解一些卫惠林的情况是有益的。现我据卫惠林先生提供的履历和著作情况，抄介于后。卫惠林，学名安仁，字惠林，以字行。山西阳城县城内化源

里人。1917年毕业于晋城获泽中学，1922年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第二高等学院毕业，1924年早稻田文学部社会哲学科修业，1929年法国巴黎大学文科毕业，1928—1929年巴黎人类学院研究生，1929—1930年法兰西书院研究生。1930年回国后，历任于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助研(1930—1933)和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央大学边政学系教授、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纂、省通志稿同胄志主修、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1955—1972)、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访问学者(1973—1975)等。他之研究领域是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1926年即翻译出版《婚姻进化史》，1931年翻译出版《民约论》；专著有《社会学》(1964年)、《台湾风土志》(1962年)、《台湾省通志稿同胄志》(1962年)、《社会人类学》(1982年)等；调查报告有《四川丰都宗教习俗》(1944年)、《世界民族志》(1936年)、《兰屿雅美族的社会组织》(1962年)、《台湾东部的母系社会》(1967年)等。他在世界人类学学界也有着一定的影响。1982年后在泉州定居，后来病逝了。

1995年6月

百千鸿儒遍天涯： 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

—

在世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和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之际，我想到了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

作为我所崇仰的一种学术风范和道德凝聚，作为在那场灭绝人性、毁灭人类文明的战争中能成功地坚持教育事业八个多年头的西南联大及其教学、科研实践，我由衷地想到了它所造就的一种精神。

疾风知劲草。当年在中国抗战之大后方，它竟能弦歌不辍，尽心竭力地培养出大批人才，仍能提高学术，推进科学，形成和发挥出一个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追求和时代风格，我认为，这堪称知识分子群体的一个学术和精神上的黄金时期。

联大迁昆明是最悲壮的一件事。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我认为西南联大作为特殊时代的产物，它蕴含着普遍的价值及其意义，恐怕在科学史、学术史、思想史、人才史、教育史，甚或知识分子群体意识和伦理道德的塑造，都值得认真地研究和借鉴。

遗憾的是，半个世纪以来，它被忽视了。近年始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如美国学者易社强先生做出了开拓性的探索；国内学者谢泳的研究角度，将视野集中于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历史命运、历史价值和历史遗产，他主张“对西南联大的研究首先应当着眼于它是西方文化影响在中国生了根的一个知识分子群体，它除了作为纯粹的教育机构在培养各种专业人才上所取得的成就外，更重要的在于在这个知识分子群体中形成的独立思考、关心国家社会、精诚合作、兼容并蓄等现代精神，以及民主自由的民主风格。”他认为这个知识分子群体及其所形成的优秀传统，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优秀范例。

二

评价西南联大，应从它的历史、传统、特色和贡献等方面去理解。

历史：西南联大是与抗日战争相始终的大学。平津相继沦陷后，原清华、北大、南开三所著名大学的师生，辗转流亡，汇集于湖南，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7 年 11 月 1 日，分别在长沙和南岳上课。

战火迅速蔓延到中原，三校继而迁滇，更名西南联合大学。1938 年 2 月，师生们在黄子坚、曾昭抡、闻一多、李继侗、袁复礼等先生带领下，徒步跋涉 1671 公里，为时 73 天，于 4 月 21 日到达昆明。在完成了中外教育史上罕见的迁徙后，于 5 月 4 日开始上课，至 1946 年 5 月 4 日三校复员，恰是八年。然而，西南联大常委会于 1941 年 3 月 7 日曾决议：“以本大学前身长沙临时大学于民国 26 年(1937 年)在长沙开始上课之 11 月 1 日为本大学校庆。”那它的校史就将近九个年头了。

抗战期间，类如西南联大的大学尚有西北联合大学等近 20 所，但能与抗日战争相始终，而且在学术和精神上有斐然成就者，只可说唯有西南联大。

传统：组成西南联大的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各自有其优良的传统。清华西化最深，自由活泼；北大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南开坚韧不拔，坚定不移。故三校有“山(南开)、海(北大)、云(清华)”之喻。三校之合，各取其长而避其短，相得益彰而互补，又形成了精诚团结、互谅互让的新的校风。

说到联大的成功，自然首推三位校长之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们就是，张伯苓(1876—1951)，蒋梦麟(1886—1964)，梅贻琦(1889—1962)。这三位校长主西南联大校政，分工是：张在陪都重庆代表学校向当局交涉，蒋管对外事宜，梅理校内事务，三校既合又分，创造了一种和谐而协调的气氛。联大熔三校的传统于一炉，集三校学贯中西的著名大师于一堂，成为当时的“民主堡垒”。

特色：梅贻琦有句名言：“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的确，西南联大教授阵容之鼎盛，即使在古今中外知名大学中，也堪称绝无仅有。在名教授中，有自然科学的叶企孙(189—1977)、吴有训(1897—1977)、姜立夫(1890—1978)、饶毓泰(1891—1968)、曾昭抡(1899—1967)、任之恭(1906—?)、赵忠尧(?—)、周培源(1902—1993)、吴大猷(1907—)、王竹溪(1911—1983)、张文裕(1910—1992)、杨石先(1897—1985)、华罗庚(1910—1985)、陈省身(1911—)等科学大师；社会科学学者有：哲学教授冯友兰(1895—1990)、汤用彤(1893—1964)、金岳霖(1895—1984)、沈有鼎(1908—1989)、王宪钧(1910—)、郑昕(1905—1974)、贺麟(1902—1992)、冯文潜(1896—1963)、王维诚(?)等；语言、文学与外国文学教授：闻一多(1899—1946)、朱自清(1898—1948)、吴宓(1895—1978)、叶公超(1904—1981)、李广田(1906—1968)、浦江清(1904—1957)、柳无忌(1907—)、罗庸(1900—1950)、王力(1900—1986)、罗常培(1899—1958)、游国恩(1899—1978)、魏建功(1901—1980)、钱钟书(1910—)等；政治学、法学教授：张奚若(1889—1973)、钱端升(1900—1990)、王赣愚(1906—)、戴修瓚(1887—1957)、芮沐(1908—)、浦薛凤(1900—?)等；社会学、经济学教授：潘光旦(1899—1967)、陈达(1892—1975)、陈序经(1903—1967)、李景汉(1895—1986)、陈岱孙(1900—)、方显廷(1902—1985)、费孝通(1910—)等；历史学教授：谢国桢(1901—1982)、雷海宗(1902—1962)、张荫麟(1905—1942)、吴晗(1909—1969)、邵循正(1909—1973)、傅斯年(1896—1950)、郑天挺(1899—1981)等；教育学、心理学教授：田培林(1893—1975)、黄子坚(1898—)、孙国华(1902—1958)、胡毅(1904—)、曹日昌(1911—1969)等。如此一流学者，足见盛大阵容。

这批教授之特色还在于：(1)多数具有留学西方的教育背景和对西方文化精神的体验和了解。(2)有对国学的深厚根基及其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入理解。(3)有较多的对中西文化融会的思考与研究。(4)有相对稳定的专业，在政治上一般能接受民主和自由思想。由于他们既能熔铸古今，又能会通中西，故能具有宽容和民主精神，他们虽有派系而却不大有派系之争。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上，联大通行的是自由民主的学风和校风。不同的学派，不同的治学方法，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追求，都可以存在，学术观点各异，并行不悖，互相争鸣，各种政治力量都无法改变它。

贡献：西南联大在战争中巍然屹立八年多，坚持到抗战胜利，这里且不说学校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仅联大本身的诞生及其坚持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壮丽的爱国主义诗篇，就给中国教育史、中国现代史创造出丰富的、极有启迪性的文化遗产。

我们看到，活跃于二战后国际科学领域中的学术权威，诸如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唐敖庆、朱光亚、王端駮、王浩、牛满江、何炳棣、邹谠、李树青……等，很多人出身于西南联大；如果把视野转向国内，人们发现驰骋于 50 年代后社会科学界的著名人物，还有冯至、洪谦、殷海光、刘国光、陶大镛、滕维藻、王瑶、朱德熙、任继愈、张世英、汪子嵩、王佐良、王利器、程应缪、何兆武、吴晓铃、余冠英、黄楠森等，多数是当年联大的学生辈。曾有人作过统计，中国科学院从 1955 年设学部后，第一批当选的 300 名学部委员中，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有 190 人，其中西南联大的师生就有 118 人。如果我们统计一下国内各门科学的学部委员、博士生导师，各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厂矿企业的著名研究员、教授、高级工程师、专家学者以及党政部门的领导干部，按照西南联大八年多来在校学生的人数算一算百分比，恐怕得出联大出人才的结论，也就绝非虚妄和夸大了。

1995 年 8 月

天地有正气：学者在抗日战争中

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必然激起全中华民族的强烈反对和誓死抵抗。在全民抗战的日子里，有一支特别的队伍，那就是中国的学者，在他们的身上所体现出的是民族的智慧和谋略，所展现的是民族的正义和力量，所表现的是民族的骨气和脊梁。

在烽火连天之时，沦陷区大学院校不断内迁，在大后方所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西北联合大学等 20 多所大学，聚集着一大批世界教育史上第一流的学者，教育事业与人才塑造仍在进行着。

在延安等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又产生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文学院、延安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华北联合大学、中国女子大学、中国医科大学、自然科学学院、军事学院、民族学院等适合战争需要的高等学府。“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曾在这些院校执教和研究的学者如：王学文、薛暮桥、何思敬、何干之、范文澜、何其芳、成仿吾、杨献珍、周扬、艾思奇、于光远、柳湜、江隆基、吕骥、孙叔平、王朝闻、吕振羽等。他们培养出的学生，可以说遍及抗战的各个角落和各条战线，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和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造就了领导各方面的人才。

抗战期间，学者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发挥其长，运用各种精神武器，投入了抗击侵略者的战斗。

很多学者在新闻出版战线上，从事或创办抗日救亡报刊，以笔墨为武器，唤醒和增强民族抗战意识与自觉，宣传国内共同抗日、一致对外，呼吁国际反帝反侵略统一战线。先后战斗在这条战线上的学者有：郭沫若、陈望道、华岗、戈宝权、陈彪如、钱俊瑞、黄松龄、邓拓、左舜生、嵇文甫、姚雪垠、曹聚仁、翦伯赞、张季鸾、王芸生、乔冠华、刘思慕、杨讼、杨潮(羊枣)、俞颂华、范长江、胡愈之、冀贡泉、谢六逸、叶以群、孔罗荪、齐燕铭、冯亦代、卓炯、冯牧、陈笑雨、茅盾、郑振铎、夏衍、邵荃麟、黄药眠、潘梓年等。他们所出报刊，分布在上海、北平、武汉、重庆、桂林、广州、延安、苏北以至香港、南洋各地，通过各种声音舆论打击侵略者。

抗战初期，前中央研究院的社会所、史语所、人体所和营造学社先迁昆明，1940 年又迁往四川叙府(宜宾)，在那里聚集了傅斯年、陶孟和、梁思永、梁思成、李济、董作宾、丁文江、彭雨新、汪敬虞、章有义、姚曾荫、罗尔纲、李文治、严中平、巫宝三、梁方仲、吴半农、费孝通、谷春帆、马黎元、南钟万等一批著名学者。在陶孟和领导下，在当时即提出了“抗战损失研究和估计”，为以后抗战胜利和会谈判赔偿问题提供材料准备，这是一项极有预见性的重要研究项目。当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傅斯年针对日本宣扬“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阴谋，为驳斥侵略者谬论，增进国人对东北历史的了解，当即决定编写一部东北地方史，用历史事实说明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他不仅亲自命名为《东北史纲》，而且联络方壮猷、徐中舒、萧一山、蒋廷黻等，在很短时间内就写成了第一卷，以大量不容置辩的历史事实证明东北自古属中国领土。郑天挺抗战期间曾任西南联大总务长，他亦针对日本侵占东三省后制造“满洲独立论”，先后写出了《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的变迁》等论著，驳斥侵略者的谬论。柳诒徵在任第四中山大学国学图书馆馆长期间，针对“九·一八”日本入侵我国东北，他主持印行多种明代御倭书籍，以激励爱国之心和增强

御辱之术。姚从吾在抗战开始后，随北大迁长沙，再迁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曾发起组织中日抗战史料征集委员会，征集到抗战史料达 164 箱，抗战胜利后移交北京图书馆，表现了一位学者的远见卓识。

还有很多学者工作于国际组织中，为中国取得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胜利而争取国际支持，为促成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统一战线的建立而付出了心血，他们中有周鯁生、王宠惠、蒋孟麟、胡适、吴文藻、钱端升等。

抗战期间，经济学家孙寒冰在 1940 年任云南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时，罹难于日机轰炸；历史学家姚名达 1942 年组织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选任团长，率团奔赴抗日前线，同年 7 月在赣东新淦石口村与日寇肉搏时壮烈殉国，时年 38 岁；政治学家费巩没有牺牲于日寇的炮火下，却惨死于搞分裂的投降派的暗杀中，时间是 1945 年 3 月 5 日，地点则在陪都重庆；还有沈钧儒、邹韬奋、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史良以及冯雪峰、赵承信等，因为主张和进行抗日而被“攘外必先安内”的当局逮捕关押，受尽了也算本国“同胞”的摧残。

为此，文章最后，我要特意记上一笔，在中华民族处于危险的时候，在学者中也曾出现过一些背叛祖国、助纣为虐的败类，他们就是臭名昭著的罗振玉、周佛海、江亢虎、周作人之流，他们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995 年 8 月

且说抗战中的校歌

近年来，在翻检抗日战争史料时，发现了不少著名的学校(其中有高等学府，也有中小学校)，不论大后方还是解放区的，不仅有本校的校训，而且还有校歌。又发现，好多校歌的歌词竞相出自名家手笔，歌词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精神感召性和艺术美感性，它所蕴涵的教育意义和凝聚力量确实不可低估。

在国统区：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平津相继沦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经过漫漫征途，先在湖南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随着敌寇的逼近，师生们又唱着《义勇军进行曲》，翻山越岭踏上了艰辛的旅程。这平、津三校继续向西南迁徙，历时七十天之久，经三千六百里的路程，横跨湖南、贵州、云南，最后在昆明建立西南联合大学，开始了长达八个多年头的人才与人文精神的塑造，成为抗日战争时期惟一的有始有终联合到底的学府。所以能如此，请看西南联大校歌：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据冯友兰的《三松堂自序》中载：“罗庸是有一首校歌的稿子，并且带有谱子，这首稿子曾一度为校歌委员会所接受。所以有人说联大校歌是罗庸作的，也是事出有因。此外还有冯(友兰)词、马(约翰)词及张(清常)词，但是校歌委员会最后决定用冯词。联大常务委员会根据校歌委员会的建议，决定用冯词作为校歌。”“校歌的谱子原来有三种，有沈(有鼎)谱、马(约翰)谱和张(清常)谱，校歌委员会先建议用沈谱，常委会据以公布。常委会先公布的是冯词沈谱，后来又改用冯词张谱。这就是后来在校内校外沿唱的西南联大校歌。”由此也不难看出，联大校歌产生的严肃性和隆重性。

抗战期间，朱自清先生不仅任教于西南联大，而且还在昆明的私立五华中学兼任国文教员。约在1944年10月，他为该校制作了校歌，歌词为：

渺哉五华经正，流风遗韵悠长。问谁承先启后，青年人当仁不让。还我大好河山，四千年古国重光，贵在吾人肩上。千里英才，荟萃一堂；春风化雨，弦诵未央。坚韧和霭，南方之强，五华万寿无疆。

朱自清把“还我大好河山”的重任寄托在青年身上，也毅然地担在自己的肩上。

在解放区：

抗日战争时期，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为了寻求革命真理和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来到解放区，他们迫切要求学习革命的理论和本领。为适应形势需要，在延安地区及华北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先后成立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华北联合大学自然科学学院、医科大学、延安大学、民族学院等新型学府。抗日军政大学的校歌最为著名。由凯丰作词、吕骥谱曲。抗大的歌声，不仅从陕北高原飞上太行之巅，而且由战争年代的

过去，传唱到和平建设的今天，它之勇往直前的精神和战胜困难的气概，远超出一个校园，远越过一个时代：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

华北联合大学成立于 1939 年 7 月 7 日，随后挺进于敌后，在硝烟弥漫的敌后战场上，在残酷卓绝的斗争环境中，学员们学习和战斗着。他们的校歌词是：

跨过祖国的万水千山，突破敌人一层层的封锁线！民族的儿女们，联合起来！到敌后方开展国防教育。为了坚持华北的抗战，同志们，我们团结，我们前进，我们刻苦，我们坚定！国土要收复，人民要自由，新社会的创造，要我们担任！努力学习革命的理论，培养我们革命的品质，我们誓死决不妥协投降，战斗啊，胜利就在明日！

这首华北联大校歌的词、曲作者，尚不清楚为何人。

1941 年 9 月，在陕北公学民族部的基础上，于延安成立了民族学院。聚集了汉、满、蒙、回、藏、彝、苗、东乡等八个民族，其校歌的歌词是：

我们是各民族的优秀子孙，我们是中国真正的主人。汉、满、蒙、回、藏、苗、彝，亲密地团结在一起。今天是各民族学习的伙伴，明天是革命中战斗的先锋。同志们，让我们携起手来，高举民族革命旗，迈步走向平等、幸福、各民族团结的新中国。

1996 年 6 月

纪念抗日战争的碑铭

为了纪念抗日战争的胜利，人们竖碑立铭。本文则着重记述两块著名的纪念碑：

其一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其二是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留别李庄栗峰碑铭》。

一

1946年上半年在西南联合大学，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于复员之前，“联大中的人为了纪念联大而建立”了一座纪念碑。最早提出动议者是梅贻琦，在一次清华的校务会议上，梅先生说：“我们在昆明呆了七八年，临走的时候要留下一个纪念品吧。”于是冯友兰提议，留下一个有古典形式的纪念品。然后大家推冯先生筹备此事。碑由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碑立于西南联大旧址，今之昆明师范学院所在地。值得注意的是碑铭中认为“可纪念者”的四个方面，已将联大所创造之可传后世的精神与传统表述清楚了。现摘录其要，供读者了解，也许不无益处。

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此其可纪念者一也。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其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

当我们读毕联大纪念碑之碑文，到底该如何看待西南联大之历史、传统、精神和贡献，以及它的意义和从中继承些什么，似乎想再说什么，都显得多余了。

二

抗战开始，前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流离迁徙川滇桂黔陕之后方各处，其中之历史语言研究所则至四川南溪李庄，在极其简陋、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在其所聚有之人力和研究资料的情况下，得以继续工作，而且成绩斐然。

史语所所长是傅斯年，所聚著名学者之众，远在其他所之上，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机之时，能同心协力，共渡危困。当1946年迁返原地前，在李庄

栗峰树碑纪念。现抄录如下：

李庄栗峰张氏者，南溪望族，其八世祖焕玉先生，以前清乾隆间自乡之宋嘴移居于此，起家耕读，致资称巨富，哲嗣能继堂构辉光。本所因国难播越，由首都而长沙，而桂林，而昆明，展转入川，适兹乐土，尔五年矣。海宇沉沦，生民荼毒，同人等有幸而有托，不废研求，虽曰国家厚恩，然而使客至如归，从容乐居，以从事于游心广意，斯人里主人暨诸军政当道、地方明达，其为藉助有不可忘者。今值国土重光，东迈在迩，言念别离，永怀缱绻，用是询谋金同，醮金伐石；盖弇山有记，岷首留题，懿迹嘉言，昔闻好事，兹虽流寓胜缘，亦学府一时故实，不为镌传以宣昭雅宜，则后贤其何述？铭曰：

江山毓灵，人文舒粹，旧家高门，芳风光地。沧海惊涛，九洲煎灼，怀我好音，爰来爰托。朝堂振滞，镫火钩沉，安居求志，五年至今。皇皇中兴，泱泱雄武，郁郁名京，峨峨学府。我东曰归，我情依迟，英辞未拟，惜此离思！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一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人：傅斯年、李方桂、李济、凌纯声、董作宾、梁思永、岑仲勉、丁声树、郭宝钧、梁思成、陈槃、劳干、芮逸夫、石璋如、全汉升、张政烺、董同和、高志寻、夏鼐、傅乐焕、王崇武、杨时逢、李光涛、周法高、逯钦立、王叔岷、杨志玖、李孝定、何兹全、马学良、严耕望、黄彰健、石钟、张秉权、赵文涛、潘恽、王文林、胡占魁、李连春、萧纶徽、那廉君、李光宇、汪和宗、王志维、王宝先、魏善臣、徐德言、王守京、刘渊临、李临轩、于锦绣、罗筱渠、李绪先同建。陈槃撰文，董作宾题额，劳干书。从立碑之名单，不仅可看出当时史语所之学者阵容及其学术实力，而且可看到许多学者至今尚在学术机构和高等学府传道授业。

三

最后，我们还要谈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叙永分校纪念碑》的事。

四川叙永分校是西南联大的重要组成部分，成立于1940年，一年以后迁回昆明。1990年5月20日，原联大叙永分校校友举行了分校五十年成立庆祝活动，并与中共叙永县委、县政府联合立碑纪念。其碑曰：

自鸦片战争启端，船坚炮利之帝国主义，莫不思以中国为鱼肉，大则侵蚀边疆，小则强行租界，终至贪蛇吞象，妄图亡我中华。九一八事变后，日寇频频入侵，不十年间，我国精华之铁路通达之区，全遭蹂躏，沦陷敌手，工厂学校纷纷内迁，中华民族已临危急存亡之边缘。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南开大学，遂联合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在侵略进逼之下，始迁长沙，再迁昆明，三迁一年级新生于蜀南山城叙永，七百学子来自全国，或不甘沦陷万里流亡，或海外归来忍辱负重，共赴国难汇集于高等学府中，古庙油灯下，叩知识之门，求振兴中华光复国土之路。时序如流，朱颜不驻。当年娃儿，今已古稀。皓首重聚永宁河畔，抚今追昔喜半个世纪国家进步，放眼未来感民族重任未可息肩，饮水思源谢叙永父老哺育情深，桃李成荫念启蒙老师辛勤教诲。历史见证，爰记留馨。

1996年12月

学派：现代学术发展走向

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之学术是否繁荣，是否能有长足发展，是否能有重大收获，它之根本渊源是什么？它之根本标志是什么？我会毫不含糊地回答：是林立的学派！

在本世纪初，尤其是“五四”运动前后，社会历史发展到一个转折时期，各种思想、学术流派出现了“百家竞起，异说争鸣”的热烈景象。当时，哲学有李大钊的唯物史观与胡适的唯心史观之争；有陈独秀、陈大齐的无鬼论与易乙玄等的有鬼论之争。文学有《新青年》主张的白话文与桐城派、文选派反对白话文之争。教育有蔡元培和周春岳、余以智等关于大学学制改制之争。历史学有顾颉刚、钱玄同与刘然黎、柳诒徵等关于古史辩之争。心理学有陈大齐主张的行为派和南京高等师范的实验派之争。就所争论的问题讲是极为广泛的，那时各种学派、社团不仅注意与对立的流派争辩论战，而且重视本派内部各种意见的协调讨论，学术界出现了一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民主自由的好风气，同时也明显地推动了文化、学术的繁荣发展。

当时百家争鸣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外国思潮的大量输入，各家各派都以积极的探索精神引入形形色色的外国思潮和学说，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且不说马克思主义者与实验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在政治层面的三次论战，就是在各学科领域也都有类似的情况。在早的天演论，在后的相对论，以及哲学方面的功利主义、实证主义、实验主义、生机主义、尼采的超人主义、马克思的辩证法唯物论、英美新实在论、维也纳学派，等等，可谓应有尽有了。在先驱者中，严复译介赫胥黎、斯宾塞尔、亚当·斯密、穆勒·约翰等人的七八种名著；王国维于1905年介绍叔本华及其哲学；胡适介绍詹姆士、杜威的实用主义和科学方法；张东荪先后译出柏格森的《创化论》、《物质与记忆》和《柏拉图五大对话》；章士钊在《东方杂志》上著文介绍赫拉克利特、巴门尼特、黑格尔、列宁等；张申府最早注意到了罗素及其《我们的外界知识》的著作；……尽管初期的译介和研究，还显得幼稚和浮浅，然而它却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以致促成了一些学派在我国的诞生。当然，不能说这是产生学派的唯一原因。

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虽有大量西方著作译介进来，但自成一说的系统性的著作的出现，却是三四十年代的事，随之成熟的学派便纷纷崛起。就哲学而言，张东荪的“架构论宇宙观”、“多元认识论”，张君勱的“德智主义”，冯友兰的“新理学系统”，贺麟的“新心学系统”，熊十力的“新唯识论”，金岳霖的“知识论”，真可说是群星灿烂了。就历史学而论，除顾颉刚的“古史辩”学派外，相继又有傅斯年的史料学派、吴宓的《学衡》学派、陈寅恪的新乾嘉学派（此说有疑义，有的学者认为，陈虽然创有新概念、新方法、新境界，但并未开宗立派）、朱镜我的“新思潮派”、郭沫若的唯物史观派、陶希圣的“新生命派”，等等，也可谓是众家异说纷葩了。在教育中尚有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与“五育”并重、全面和谐发展说，李大钊的精神构造说，杨贤江的教育本质说，陶行知的教育救国论和生活教育论，舒新城的实用教育论，张伯苓的“痛矫时弊，育才救国”说，陈鹤琴的教育中国化、科学化说，雷沛鸿的教育改造运动与社会改造运动相辅而行说，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学派，等等，也是诸说并存各展其长。其他诸如社会学、心理学、文艺学、语言学等学科，同样是多学派竞生的局面。

记得 1985 年初，社会学家邓伟志就提出过“中国的学派为什么这么少”的问题，他指出学者们所受教育不同，从事科学研究的环境不同、角度不同，各人抓住研究对象的侧面不同，采用的研究手段、方法不同，学者们个人的素养、品格不同，都会带来不同学说、学派的产生。由于科学在运动、发展中，自然会出现参差不齐的学说、学派，在各学科的相互作用中，也自然会有不同学说、学派的产生；从小学科向大学科发展，大学科需要集体攻坚，也是学说、学派层出不穷的原因。进入 80 年代后，在中、青年学者中重视学说、学派的人，已趋增多，这与政治上的宽松、文化学术氛围的营造不无关系。但是，我们仍应为振兴学说、学派而努力，一要有敢于立新说、树新派的气魄和雅量，不把新说、新学当异端，而是将学说、学派及其学者当作精华来爱护和扶持。二需从国家上下不仅要提倡真正尊重人才，尤其应该真正尊重学说、学派及其学者，而且要在社会树立尊学说、重学派的社会风气。三能在科学研究机构、大专院校和文化学术报刊，把“拔学说之尖，兴学派之利”的事多作些、作好些。四在文化学术界更要破“文人相轻”的门户之见，如此，学派的振兴有望矣。

1995 年 11 月

试论学术流派的意义及其价值 ——兼论顾颉刚创建的古史辨学派

—

无论自然科学领域，还是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与出现不同的学派，不仅是学术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而且是学术繁荣发达的内在进步动因及其标志之一。

人们探索自然界和研究人类社会时，由于研究条件不同，掌握材料不同，探索的角度和深度不同，思考方法和研究方法的差别，自然在同一个学科或同一个问题会出现各式各样的见解和思想体系。于是乎就产生了学术中的争鸣或交锋，进而形成学派，学派的形成又促使争鸣或交锋之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起来。无争鸣或无交锋的学派是没有生命力的，无学派的争鸣或交锋很可能是徒具形式的。可见，学术流派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的学术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产物。只有当出现了众多的著名学者及其大量的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而引起人们竞相追求和仿效的时候，才可能形成学术流派。

可见，学派是在争鸣或交锋中逐渐形成的。学派大凡有其“灵魂”：有自己杰出的代表人物；有独创的建树及其思想体系；有独特的研究方法及其学术风格。一个学派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及其学术影响得到社会和学术界的认可。一个学派对社会的影响程度，它决定于这个学派的理论或思想所能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

任何学派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它是时代的产物，自然有着历史的局限性，总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时代的社会生产条件和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还需要在以后的实践中不断发展，逐步趋于完善。也可以这样理解，我们所说的学派，其所创造或立帜标新，并不排斥继承，而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前进。任何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只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其原因在于任何新规律的发现，新定理的证明，对人类历史某些问题的重新认识或“疑古”，都只能是研究者依据科学的发展实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新的科学观念和方法，对各学科领域进行创造性探索研究的结果。

科学上的不同学派之是非，应当通过科学实践去检验，通过学术争鸣或交锋去解决，也就是通过自由讨论去解决。既然科学是一种真理，学派是学术探索中的流派，它就不怕争鸣，不怕交锋，不怕诘难，不怕批评，而是愈辩愈明，愈争愈真。毛泽东曾经指出：“艺术上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学派定于一尊，正常的学术争鸣或交锋不能展开，学科的生命力也就被窒息了，学派也就无由产生发展了。历史向我们提供这方面的教训不乏其例。

历史上的学派，往往具有排他性。学派之争，常带有“帮派”的气味。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即是。说起来，这还算是原则的。就是无原则的，也屡见多也。如“名盛则附之众。附者众，则不必皆贤而胥引之，乐其与己同也。名高则毁之者亦众。毁者不必不贤而怒而斥之，恶其与己异也。”

以此种党同伐异的帮派作风于学术，只能是葬送了学术。

学派建设，应视为是一个国家学术思想发展的一面镜子，一种尺度。我

们不仅在国内要形成众多的学术流派，而且在国际上还要形成一个独具特色的中国学派(每一学术领域和每个学科均应如此)。只有这样，才能以特有的风姿步入世界学术之林，才能更好地促进国内的学术水平的提高发展。

二

在中国近现代古史学界，人们把它分为信古、疑古和释古三个派，或者称作正统、怀疑和唯物史观三个体系，这可视为近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

顾颉刚先生在中国近现代史学界所以占有重要地位，是因他主编巨著《古史辨》，指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创建古史辨学派或称新疑古派所然。

其一，顾颉刚先生于1920年即开始了考辨古史。1923年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从1926年到1941年先后编出《古史辨》一至七册出版，其汇编350篇文章，约325万字，是20年代、30年代考辨古代史料的总结集。后来又将其考订古代地理部分编为第八册出版。《古史辨》并不是一部书，也并非顾先生一人所独著，而是有点像不定期的刊物，和集体的创作。这也许正是其长处，每册中将针锋相对之双方观点的论著汇于一编，一册在手，即可一目了然相互争论之见解，在雅量上就可算开一代风气了。

其二，“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主要意思有三：(1)“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2)“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治国”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3)我们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顾先生按他对于古史记载的基本观点，认为必须打破关于古史的传统说法，于是又提出：

(1)打破民族出于一统的观念；(2)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3)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4)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以上就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的大体内容。

其三，顾先生认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史学体系，主要完成于从战国到西汉的儒家之手；儒家经典《尚书》是确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一古史系统的首要典籍。他指出，要有效地摧毁这套史学体系，就必须摧毁《尚书》的经学地位，这样才能驱散它本来面目上蒙着的迷雾。

为此，顾先生在对《尚书》的整理和研究上，可谓用去了他一生中的一部分精力和时间。1926年于中山大学开了《尚书》课程，曾经编了《〈尚书〉讲义》及《〈尚书〉学参考材料》八大册；后来北上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又开《尚书》课程，编《〈尚书〉研究讲义》五种，又编《尚书文字合编》、《尚书通检》、《尚书学讨论集》等三种。到了解放后，顾先生研究计划中，继续将《尚书》研究作为他的重点之一，进行更为系统、更为精密的整理。于1962年发表了《尚书大诰公释摘要》；在晚年又连续发表《尚书甘誓校释译论》、《盘庚三篇校释译论》、《尚书汤誓校释译论》、《西伯戡黎校释

译论》，这都可称作是在《尚书》研究史上超越前人和启示来者之著作，从根本上动摇了儒家利用《尚书》编成的古史体系。

其四，对于顾颉刚先生所创建的古史辨学派或称新疑古派的意义及其价值的认识与评价，尽管可以列出若干种，但作为一个历史学派及其学术地位是被历史与社会公认了的。“‘五四’运动以后，疑古思想是反封建思潮的一个重要方面，顾颉刚先生则是这一时期疑古思想的代表。他继承了我国历代疑古辨伪的优良传统，吸收了社会学、考古学和历史进化论的科学知识，创立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他把我国先秦至两汉的古书上有关的古史记载，作了系统的详尽考辨，揭露出它们原来大多是出于神话传说。他的大量的切实的考辨古史、古地、古人和古书的工作，既为科学地研究我国古代历史扫清了道路，又提供了经过考订的确实可信的文献资料。”

顾先生提出的古史传说出于神话演变说，所以能成为摧毁伪古史“迷宫”的锐利武器，这不是偶然的，它表明了这个学说的科学力量。关于古史传说出于神话演变这个问题，在今天似乎成为普通常识了，可是在当时的多数人心目中，尧舜禹是古代的圣贤帝王，尧舜禹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尧舜禹正代表着封建权威世代相传的道统，是无人敢怀疑的，是不可动摇的。因此，顾先生的观点及其学说面世后，真有些石破天惊了，不禁世所愕然了。但是，经过了一场众人瞩目的辩论之后，终于使伪古史系统瓦解了，大多数人将三皇五帝看作是史前史的范围了，甚至当年出来辩护的学者中也有些人清醒过来了，历史的面目被恢复了，社会确认了古史辨学派或称新疑古派的学术意义及其价值。

在五四时期，“在文学上以白话派而向文言派进行斗争，在哲学思想上以反旧道德派而向旧道德派进行斗争，是进步的一种表现；而还不知道在史学上以疑古派而向信古派进行斗争，以资产阶级的一些方法而向地主阶级的一些方法进行斗争，也同样是进步的一种表现。二者都是属于反孔反封建的思想体系的，都是这个阵线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之一。《古史辨》的疑古派，是以信古派为最大的甚至是唯一对象，而同它进行斗争的，这就是顾先生的主要功绩。”

顾先生这个古史传说出于神话演变说，不仅得到新史学派的代表郭沫若先生的共鸣，而且同当时从事神话研究的文学家茅盾先生不约而同。这只能证明，科学研究是可以得出异途而同归的结论的。

郭沫若指出：“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个卓识。从前因为嗜好的不同，并多少夹有感情的作用，凡在《努力周刊》上的发表的文章，差不多都不曾读过。他所提出的夏禹问题，在前曾轰动一时，我当时耳食之余，不免还要加以讥笑，到现在，自己研究一番过来，觉得他的识见委实有先见之明，在现在新史料并未充足之前，他的论辩并未能成为定论，不过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的。”同时又肯定了禹的天神性，认为“禹当得是夏民族传说中的神人”。

茅盾指出：“我们相传的关于太古的史事，至少大半就是中国的神化。神话的历史化，在各民族中是常见的。”又指出：“中国神话在最早时即已历史化，而且‘化’的很完全，古代史的帝皇，至少禹以前，都是神话中人物——神及半神的英雄。”“和羿一样，禹也是古代神话中为民除害的半神英雄。”“至少禹以前的，实在都是神话。如果欲系统地再建神话，必须先使古代史还原。”顾先生是为了考辨伪古史系统，使古史传说还原为神

话；而茅盾先生是为了探索神话，系统地再建神话，主张把古史传统还原为神话。由此可以进一步证明《古史辨》不仅对考辨古文献的时代性有其贡献，而且在考辨古史传说的神话性也是有其贡献的。

其五，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是对中国历史上疑古学派的继承和发展，既集中国疑古派之大成，又超越中国疑古派之前贤，成为我国辨伪史上的一个重大发展，为考辨古史传说和古文献资料提出了新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标志着我国的疑古辨伪之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新疑古学派首先来源于中国史学之怀疑派的疑古思想，顾先生自述道：“我的学术工作，开始就是从郑樵和姚、崔两人来的。崔东壁的书启发我‘传、记’不可信，姚际恒的书则启发我不但‘传、记’不可信，连经也不可尽信。郑樵的书则启发我作学问要融会贯通，并引起我对《诗经》的怀疑。所以我的胆子越来越大了，敢于打倒‘经’和‘传、记’中的一切偶像。”又说：“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姚、崔三人的思想，从近的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二人的启发和帮助。”这可谓是其主要的学术渊源。其次，是清乾嘉考据学的继续和发展。顾先生尤其推崇王国维，“数十年来，大家都知道我和胡适的来往甚密，受胡适的影响很大，而不知我内心对王国维的钦敬和治学上所受影响之深”。就是说，他受到王国维用实物材料研究古史的影响是深刻的。再次，是道咸以来经世致用思想的继续和发展。顾先生极重视研究边疆地理，他起草《禹贡学会边疆研究计划》，创办禹贡学会，出版《禹贡》半月刊，着重考辨古代地理和边疆地理，都体现了这一思想。最后，是顾先生善于从各个方面联想和应用到学术研究上来，他之对于古史的根本论点，就是在看戏过程中受到的启发，从民间传说里得到的联想，进而丰富了他的思路，开阔了他的视野，更好地促成了古史辨学派或新疑古学派学术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其六，顾颉刚先生从1920年北京大学毕业留校担任助教，开始了他之学术生涯始，到1980年12月逝世为止，拥有着六十年的学术生命。期间，至少在：(一)古史和古籍的考辨；(二)古代地理和边疆地理的提倡和研究；(三)民俗学及民间文学的提倡和研究；(四)古籍的译注和点校等四个学术领域内起了领导的作用，并结出了丰富的果实。

作为古史辨学派或称新疑古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是“五四运动以后到抗战以前的二十年中”，“中国史学进步最迅速的时期”里学术风云人物之一。抗战之前，可谓是他研究生涯的黄金时代，精力之旺盛，想象之繁富，创获之丰硕，年满三十三岁即成为一个学派的首领。从卢沟桥事变后，直到其谢世止，在五十五年的时间里，虽然也有其学术进展，但就这个学派在这个领域中贡献而言，是否可以说，和其往昔的学术成就是不能相配的。当然，这个中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也非几句话能说得清楚，可另专题研究。

随着历史的发展，顾先生指出唯物史观有异于《古史辨》的时代背景：“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是随着社会革命运动而兴起的，当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前后，社会主义勃兴于中国，为探索革命的正确前途，一般革命家都努力于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尤其是集中精力于社会经济史分期的讨论，这样就产生了所谓《中国社会史的论战》。”顾先生在1947年出版的《中国当代史》，除肯定唯物史观的进步性外，还认为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是“最早的”“一部极有价值的伟著”，“富有精深独到的见解”，“影响极大”。

这本身说明了顾先生是随着时代前进的，他并不以古史辨学派的观点而拒绝唯物史观。

“学林探索贵涉远，无人迹处有奇观”。就古史辨学派而言，虽然其学说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但毕竟是在“五四”时代新出现的一个学派，而且自有其意义和学术价值，并在史学领域占有其重要的学术地位。当顾颉刚先生诞生百年时，历史学界在他之出生地苏州举行学术讨论会，表明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古史辨学派的新的认识和评价。

1993年5月

注：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

《明史·李三才》，中华书局，第6067页。

《答刘胡两先生书》，载《古史辨》第1册。

王煦华：《顾颉刚先生的学术贡献述评》，《顾颉刚选集》。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

蔡尚思：《顾颉刚创造的新疑古派》，《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1期。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夏禹问题》，《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304~305页。

茅盾：《神话杂论·中国神话研究》，1924年。

茅盾：《中国神话研究初探》（原名《中国神话研究ABC》），1982年。

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中国哲学》第辑，三联书店，1980年。

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中国指导》第辑，三联书店，1980年。现代中国学派与西方学术渊源略论在本世纪初，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二三十年代，可称之为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黄金时期，其标志之一，就是随着第二次西学的引进，在中国学坛上出现和形成了若干学术流派，成为现代学术史上一时之盛况。

诸如以章太炎、黄侃为代表的章黄学派，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学派，以蔡元培“兼容并包”为标志的北京大学学派，以王国维、陈寅恪为代表的清华研究院学派，以章士钊为代表的甲寅学派，以胡适为代表的实验主义学派，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唯物史观学派，以吴宓为代表的学衡学派，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东方杂志学派，以民铎、学艺为代表的康德学派，以李石岑为代表的尼采学派，以张申府为代表的罗素学派，以瞿世英为代表的杜里舒学派，以张颐为代表的黑格尔学派，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等等，枚不胜数，而且各个流派均在现代学术史上有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并各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从学派的角度研究各个流派的师承及其学术渊源，也许是一件有学术意义的事情。

外国学派多数是经中国学者引进的，多因中国学子留学外域所承师门有关。当本世纪初，尤其是二三十年代，留学的学者先后回国，同时带回了他们业师的著作和学说，或传授于讲坛，或翻译后出版，或被邀请讲演，或著书立说，其时外国的学说及学派在中国确有昌兴之势。不过不少学说虽有传播和引进，但真正形成学派的并不多，尤其是那些政治性的学说和学派，在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系统引进，与之一番较量，很快就黯然失色，其名声随之不彰了。

所以如此，当时的知识分子在其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学术自由”观点，以对抗封建道统的蒙昧主义，批判实行“学术专制”的“道统”。他们宣称：“且学术所以进步者，由于竞争也。学者各出其所见所闻，以互相辨诘，互相折衷，然后真理见。……吾得一语而断之曰：中国自上古以来，有学派，无道统，学派贵分，道统贵合；学派尚竞争，道统尚统一；学派主日新，道统主保守；学派则求胜前人，道统则尊尚古人；宗教家有道统，学术家无道统也。”其次，“学派”对抗“道统”，实际上是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主张在中国进行“竞争”和倡导学术“自由”，这既可视作对抗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武器，又可作为正确吸取人类先进文化的手段。

章太炎、黄侃师生，早年东赴日本，“略看中西各国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时有概述”。与西学打交道，前后约二十年，其在修订《诂书》中，运用西学来评价诸子时，广泛地传播了西学。

李大钊的唯物史观学派、胡适的实验主义学派和在中国形成的康德学派、尼采学派、罗素学派、杜里舒学派、黑格尔学派，或者有其师承，或者钟情于某一学者的学说，都有着直接间接的西学渊源是毫无疑问的了；就以王国维而论，他通过日本的译本，读了费尔班克斯的《社会学》、杰文斯的《逻辑学》、海甫定的《心理学》、保尔逊的《哲学概论》和文德尔班的《哲学史》，由此而接触到康德哲学。从王国维自述他研究哲学的过程。是从康德始，经叔本华，再回到康德；当然他所接触到西方哲学家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但其所潜心研究的，却是康德、叔本华和尼采等几位德国哲学家，其中又主要是叔本华。他成为把康德、叔本华和尼采哲学传播到中国来的最早的学者之一，而且他在学术上所获得的成功，显然与之接受德国哲学有着重要关系。李泽厚曾指出：“他所以取得这些成果，完全在于他接受了当时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从哲学理论到艺术作品的熏陶，特别是经过严格的自然科学方法论的训练。他研究过西方哲学和社会学，翻译过形式逻辑书籍，所有这些才使他能突破传统封建史学的方法，对中国古史能具有一种新的眼光和新看法，使他的学术成果不但不同于乾嘉考据之类，而且也比同时的革命派人物如章太炎要深刻和新颖。”

外国学派曾在中国形成气候的，还应提到白璧德学派(中国称作“学衡”学派)，其代表人物是吴宓、梅光迪、胡先骕、汤用彤、柳诒徵等人。他们多数留学于美国哈佛大学，师从新人文主义宗师白璧德，并服膺其学说，以《学衡》杂志为园地弘扬其师思想，形成“五四”运动时期与激进主义、自由主义相制衡，当时被视为保守主义之一派。这三个学派都带有中国文化启蒙的色彩，共同构成了20世纪初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然长期以来，由于历史成见和判断不准确，把他们与国粹派同列一阵，忽视其“论究艺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宗旨；忽略其引介西学时“超越东西界限而含有普遍永久价值”的追求。直到80年代，学术界才重新审视学衡派的积极的文化意义及其历史价值。

傅斯年无论作为史料学派的领袖，还是作为倡导集团性研究的首领；无论是在组织推动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还是他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体系，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是有其重要地位的。平心而论，可以说傅斯年是中国现代史学大师之一。他的学术功绩应该从开风气、立规模、定方位、辟路径方面去审视和评价，也许更妥当些。作为史料学派，自有其学派价值判断和学派存

在之理由，然在 50 年代后盛行否定一切的大批判时，这个学派备遭诟病；但是从未见有人探本穷源，研究其何以有其主张和宗旨，而是以“独尊一家”的立场排斥他派。其负面代价已该到了反思的时候了。

傅斯年 1920 年入伦敦大学研究院，师从史培曼，主攻实验心理学，兼及物理学、数学和化学等自然科学。1923 年转入德国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主修哲学，兼及相对论、量子力学、比较语言学、比较考古学，甚至涉及地质学，沉醉于数学和统计学。期间，傅斯年与陈寅恪有两年时间同校。当时德国史学界正风行着以兰克(1795—1886)为代表的历史语言考据学派。这一学派以“客观主义”和“科学方法”为号召，主张历史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客观地反映历史的真实，主要任务是对史料进行严密的、实事求是的考据。这与集中国传统的历史考据学大成的乾嘉学派的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有相同之处，虽从现存的傅斯年、陈寅恪的史料和著作中未发现兰克学派及其对他们学术思想的影响，但其在史学实践中却有着很强的实证主义特征，从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来看，是源于马赫著作，以重史料考据而言，可视为汉学传统和“兰克学派”双重影响的结果。其著名宣言即“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史学便是史料学”。

1996 年 6 月

外国学派在中国之兴衰

外国学派多数是经中国学者引进的，多因中国学子留学外国所受师门有关。在本世纪初，尤其于“五四”前后和三四十年代，留学的学者先后回归，同时带回了他们业师的著作和学说，或传授于讲坛，或翻译后出版，或邀请来演讲，或著书立说，其时外国的学说及学派确有昌兴之势。不过不少学说虽有传播和引进，但真正形成学派的并不多，尤其是那些政治性的学说和学派，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引进中国后，经过一番较量也就黯然失色了，其名声也就不彰了。到了50年代，因奉“一边倒”和百家争鸣为两家说，当然西方其他学说和学派也就无立足之地了。西方学说和学派的再次兴盛，已经是80年代的事了，虽然学说引进了不少，但就形成学派而论，尚未显著。

现将鄙典(《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大辞典》)中涉及此者介绍几例。

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开始接触实验主义，并十分崇拜业师杜威这位实验主义哲学家。于“五四”时期，他即著文《实验主义》，系统地介绍实验主义哲学及其原理。于1919年5月杜威来华讲学，长达两年又八个月，胡适不仅亲自在场翻译，而且将他译述的《杜威五大讲演》在1922年出版，成为其时传播实验主义最有影响的著作。杜威哲学所以能在中国40年代末以前有推崇者和实行者，其原因一则由于杜威哲学比较平实，比较符合中国人的实用心态，二则杜威在中国有一批留美的嫡传弟子，诸如胡适、陶行之、蒋梦麟、刘伯明、郭秉文、郑宗海等在学校范围的鼓吹，确曾在教育领域和学术界有过比较广泛的影响。可是在50年代全面地批判后，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涉及杜威及胡适成了禁区，其学竟无人敢问津。

罗素哲学在中国的崇拜者，可以说有第一代的赵元任、傅铜、张东荪、张申府；第二代的金岳霖、冯友兰；第三代的俞大维、张荫麟、胡世华、万卓恒、沈有鼎、汪奠基、王宪钧。不过在这些学者中，除了傅铜曾在英国伯明翰大学有七年攻读西方哲学的经历和金岳霖于20年代留学于剑桥大学，可算罗素弟子外，其他都难说有直接从师关系，他们中之多数都是经过对罗素哲学之研究，而推崇其逻辑实证哲学的理论和方法。在介绍和研究罗素哲学方面，论向中国推介罗素的时间，张申府为最早；论对罗素哲学思想的系统阐发，当属金岳霖。前者早在1914年即对罗素数学逻辑理论发生了兴趣，于1919年撰有三篇罗素传略，并首次介绍罗素十多部哲学著作之梗概，后又著专文介绍罗素的人口理论；后者曾先后出版了四部学术专著，即《逻辑》(1935年)、《论道》(1940年)、《知识论》(1983年)、《罗素哲学》(1988年)。在其著作中，或系统地介绍罗素逻辑，或以实证哲学原理和逻辑分析方法分析中国哲学中基本范畴，或以“有效原则”建立自己的知识论体系，尽管《罗素哲学》有着极左年代的局限，但仍体现了著者对罗素哲学观点和方法的缕析与深思。到了本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学术界及青年学子中，又出现了罗素学说的兴趣及研究的趋势。

外国学派曾在中国形成气候的，还有就是白璧德学派，在我国被称为学衡派。他们之代表人物是吴宓(1894—1978)、梅光迪(1890—1945)、胡先骕(1894—1968)、汤用彤(1893—1964)、柳诒徵(1880—1956)，其中多数留学于哈佛大学，师从新人文主义宗师白璧德，并服膺其学说，以《学衡》杂志为阵地弘扬其师思想，形成为“五四”时期与自由主义、激进主义相制衡的被当时贬称为保守主义的一派。其时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派尊崇

马克思；以胡适等为代表的自由派则拥戴杜威、罗素；以《学衡》杂志为代表的保守派则崇拜白璧德。就三派所思考和要解决的问题看，都是如何对待中国传统，如何引介西方文化，如何建设中国新文化，都在寻求救亡图存、振兴民族的出路，都带有中国文化启蒙的色彩，所以应该说是三派共同构成了 20 世纪初中国文化启蒙运动。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对学衡派的看法存在着历史成见，加之研究不够和判断不准，与国粹派同列一阵，忽视其“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宗旨，忽略其在引介西学时“超越东西界限而含有普遍永久价值”的追求。直到 80 年代，学术界才开始重新审视学衡派的积极的文化意义及其历史价值。

就各个学术领域而言，几乎每个学科均有外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哲学领域，张君勱于 1919 年访问过柏格森，后从师于法国哲学家倭伊铿；郑昕 1927 年留学于德国柏林大学，1929 年转耶拿大学，在新康德主义大师鲍赫指导下专攻康德哲学，其返国后一生讲授康德哲学，代表著是《康德学述》。洪谦于 1934 年在维也纳学派创始人石里克指导下，完成了题为《现代物理学中的因果律问题》的博士论文，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在维也纳时期参加了维也纳学派。著有《维也纳派哲学》（1945 年）、《石里克和现代经验主义》（1949 年）、《维特根斯坦和石里克》（1981 年）等。贺麟 1926 至 1931 年，先后在奥柏林、芝加哥和哈佛三个大学，修过康德哲学、斯宾诺莎哲学和黑格尔哲学，并有幸听过与罗素合著《数学原理》的怀特海教授的几门课，但其为了课研黑格尔哲学，竟放弃博士学位不要，毅然转学至柏林大学选修哈特曼教授的“历史哲学课”，并兼听迈尔教授的哲学史课，还在法兰克福拜访过斯宾诺莎哲学专家格布哈特。这时，他已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哲学思想，即从西方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的理性派哲学及辩证的方法；通过与中国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的相互贯穿，形成其特色的新黑格尔主义哲学观。他所翻译之黑格尔《小逻辑》、《精神现象学》、《哲学史讲演录》（四卷本），斯宾诺莎《知行改进论》、《伦理学》以及鲁一士《黑格尔学述》、开尔文《黑格尔》，都是较早流行的著作。熊伟在 30 年代从学于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他可能是中国唯一的海德格尔弟子，译介到我国的海德格尔著作有《存在与时间》、《论人道主义》、《形而上学是什么》、《形而上学导言》等。

在历史学领域，傅斯年 1920 年入伦敦大学研究院，师从史培曼，主攻实验心理学，兼及生理学、数学等。1923 年转入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学习哲学，兼及相对论、比较语言学、比较考古学，而七年的留学使之受到系统的自然科学训练和 19 世纪实证主义史学传统的洗礼，决定了他治史的基本特征和路向，形成其融会中西、贯通新旧以求创新的史学理论及方法。姚从吾 1922 年入柏林大学，受教于傅郎克、海尼士两教授，专治蒙古史及史学方法论，兼及中西交流史。杨人楩 1934 年入牛津大学，受教于汤普森，后来长期从事于世界史研究。在经济学领域、政治学领域、法律学领域、社会学领域、教育学领域、心理学领域、语言学领域等，情况同以上类似，在他们的师承与治学过程中，都可看到其中外国学派及其学说的影响，于是有中西文化学术之交流和融合。

1995 年 4 月

学术渊源章与黄

——记章太炎、黄侃学派

于 20 世纪初，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随着西学的引进和时代的骤变，在中国学坛上形成过许多学派，成为现代学术史上一时之盛况。诸如以章太炎黄侃师弟为代表的章黄学派，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激进主义学派，以章士钊为代表的甲寅学派，以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为代表的清华研究院学派，以蔡元培“兼容并包”为标志的北京大学学派，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以吴宓为代表的学衡学派，等等，均在现代学术史上有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并各占其一定的历史地位。

对于现代学术史上之学派的形成及其发展，作为一种学术的正常现象是值得研究和提倡的。然在当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却被“舆论一律”、“独尊一家”所淹没，至于学派之提倡和学派之研究，向未被引起学界之重视；至于学派之形成以致学术意义上的百家争鸣局面之出现，也就自然难以办到了。余以为，这不能不视为是文化学术事业上的一种失策。邓伟志先生曾在 80 年代作文分析，在中国当代学派为何如此之少，他有感于学术发展中的这种失误而发出呼吁，我认为其意义是极其重要的，所以受到学界的关注，自然也就不难理解了。

作者虽有意于现代学派的研究久矣，然而才疏而学浅，始终未敢与未能深入涉足。即使今欲试着进入，也颇觉自不量力，真正的动机是抛砖而引玉，企望学界同好者或学术史研究者关注此学，反思现当代学派形成及其发展上的成败得失，以促进学派与学术之繁荣。开篇先及章黄学派，逐次涉足其他学派。

章黄学派是由章太炎、黄侃师弟两代构成的学派。嫡派相传，不仅弟子众多，而且一再传承，至今仍见其余绪，可谓渊源流长。侯外庐指出：“太炎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是自成宗派的巨人。”“运用古今中外的学术，揉合而成一家言的哲学体系，在近世他是第一个博学深思的人。”“五四以来，新人与旧人的若干尖端的代表者，同时出现在章氏门下。”

章氏拜俞樾为师，“读书精勤，晨夕无闲。”俞樾乃晚清浙江朴学三大师之一。章太炎按俞师之治学要求，成为西子湖畔诂经精舍首屈一指的得意门生。据 1897 年刊刻的《诂经精舍课艺文八集》载，共选入五十六人一百五十九篇诗文，章氏则占二十一篇而居首。其还钻研周秦两汉诸子，写出了其首部著作《膏兰室札记》，继之又有《春秋左传读》等一批具有学术之作问世，迅速即以青年汉学家而崭露头角。

后其倡言变革而屡遭当局通缉和关押。也就是 1906 年 6 月刑满出狱后流亡到日本，除接任《民报》总编辑外，并从 1908 年主持国学讲习会和国学振起社，开始讲学授徒，以其思想与学术造就了一大批第一流的人才。据其弟子任鸿隽回忆，当时“听讲的人以浙人川人为多，浙人中有沈士远、兼士兄弟、马裕藻、马叔平、朱希祖、钱玄同、龚未生等；川人中有曾通一、童显汉、陈嗣煌、邓胥功、钟正楸、贺孝齐、李雨田及我与我的兄弟任鸿年等。还有晋人景耀月、景定成；陕人康宝忠。”当周树人(鲁迅)、许寿裳、周作人、钱家治等听说讲学开始，可是恰与其课程时间冲突，于是决定在星期日为周等八人开了一个特别班，足见其时对章氏思想与学识的景仰追慕。其中有许多后来成为新旧文化的领导者，如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许寿裳、

黄季刚、刘师培、张继、陈独秀、胡适、刘复、吴承仕、汪东等人。在其弟子中，按其出类拔萃者，又有四大金刚之说，据吴承仕自己称：“这四大金刚，系指黄侃、汪东、钱夏(玄同)，及我本人而言，且太炎封黄侃为天王。”也有五天王之说，除前四人外，另加朱希祖。在传说中，还有入室弟子“北李南黄”之说，北李系指晋人李亮工。从章太炎的自述中，也曾经对他之弟子有过评价：“弟子成就者，蕲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逊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韵文辞。逊先博览，能知条理。其他修士甚众，不备书也。”就其弟子而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其中多数是学有专长，卓然自树，或长于“小学”，或长于经史，或长于诸子，或长于诗文，有所创建，有所前进，其高者成为学派，奕世流光，号为大师。论其贡献，类在声韵、训诂，文字、校订、考据、通解与诗文写作之间。以一个侧面讲，其弟子们亦博大，亦精深，在文化学术上之促进作用，堪称后生典范。其弟子所以能如此成建树，自然与他们导师的思想蕴涵的博大精深为基础。

于1935年秋，章太炎六十四岁时，又在苏州正式举办了“以研究固有文化、造就国学人才为宗旨”的章氏国学讲习会。发起者是朱希祖、钱玄同、黄侃、汪东、吴承仕、马裕藻、潘承弼等高弟，协赞者是段祺瑞、宋哲元、马相伯、吴佩孚、李根源、冯玉祥、陈陶遗、黄炎培、蒋维乔等知名人士。学制二年，分为四期，各期修学课目有：第一期：小学略说、经学略说、历史学略说、诸子略说、文学略说；第二期：说文、音学五书、诗经、书经、通鉴纪事本末、荀子、韩非子、经传释词；第三期：说文、尔雅、三礼、通鉴纪事本末、老子、庄子、金石例；第四期：说文、易经、春秋、通鉴纪事本末、墨子、吕氏春秋、文心雕龙。由此课目，即不难见章氏之治学经历，也不难看出前人顾炎武时代兴起的清代考证学派经俞樾而集中到了章氏身上。

章氏国学讲习会主持者是章太炎，会务由其夫人汤国梨和弟子孙世扬总其事。先生主讲，并由章氏学派之传人任讲师，诸如朱希祖、汪东、孙世扬、诸祖耿、王骞、王乘六、潘承弼、王牛、汪柏年、马宗芑、王绍兰、马宗霍、沈延国、金毓黻、潘重规、黄焯等。并增设特别演讲，邀请章先生老友王小徐、蒋竹庄及家君沈颀民等担任。每星期二，先生躬亲讲席，宣扬胜义。对于经学、史学、子学、文学作系统之讲述，最后教授《尚书》，句句精审。在国学讲习会就学者，最高龄的为七十三岁，最幼者十八岁，有曾为大学讲师、中学国文教师的，以大学专科学生占大多数，籍贯多到十九个省，住宿生即达百余人。其时，仍沿袭接受赞礼结成师生关系，章氏一门也是这样结成的。早于1932年，国学讲习会成立之前金天翮、陈石遗、李根源、张一等章先生的朋友曾在苏州筹备国学会，当时在沪之章氏亦受聘讲学，并为次年的正式开设写了《国学会刊宣言》。或许国学会意欲更改旧的形式而采取新的方法，在1934年秋章先生最终同意迁居苏州后，却于冬天“以讲学的旨趣不同”而离开了国学会，另外组织了章氏国学讲习会。

章太炎是经古文学派的近代大师。他曾有“学术万端，不如说经之乐”说，提出经师必备的六个基本条件，说明此派之学风：“近世经师，皆取是为法：审名实，一也；重左证，二也；戒妄牵，三也；守凡例，四也；断情感，五也；汰华辞，六也。六者不具而能成经师者，天下无有。学者往往崇尊其师，而江戴之徒，义有未安，弹射纠发，虽师亦无所避。”关于章氏之学术体系，侯外庐在指出其经学，小学，文章，及政论与革命等方面的主张，

都不能不导源于他之哲学及其方法论，然后才能透视出他学术思想及其体系的博大精深，才能审视出章黄学派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真正意义及其作用。

“具体言之，在一般哲学上，章氏所谈到的，计有哲学定义问题，宇宙根源问题，名实(思维与存在)问题，时空问题，有无问题，质量问题，高级形态与低级形态问题，本质与现象问题，是非(真理与谬误)问题，感觉与思维问题，因果问题，差别与同一问题，有神与无神问题等。在中国哲学史上，章氏则上至老庄孔墨荀韩诸子，中经汉魏六朝唐宋明清各家，下抵公羊学派的康有为与谭嗣同，以及严几道等，均有评判。关于西洋哲学，在古代则谈及希腊的埃里(利)亚学派，斯多噶学派，以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等；在近代则举凡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叔本华，尼采，培根，休谟，巴(贝)克莱，莱布尼兹，穆勒，达尔文，黑(赫)胥黎，斯宾塞尔，笛加(卡)尔，以及斯宾诺沙等人的著作，几于无不称引。关于印度哲学，则吠檀多，波(婆)罗门，胜论，数论各宗，华法，华严，涅槃(槃)，瑜伽诸经，均随文引入；对世亲，无着之书，尤为赞佩。这种运用古今中外的学术，揉合而成一家言的哲学体系，在近世他是第一个博学深思的人。所有这些资料，才是我们评价章氏哲学思想的依据。”(《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15页)以上可视为章氏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上的地位。其实，除此之外，在中国近代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教育史、史学史、经学史、宗教史、训诂史、语言文字史，以至中医史等研究领域，都难以绕过章太炎，都不能不给他在这些领域留下一席显著的地位。

罗常培早在本世纪40年代即在《周秦古音研究》一书中称道：“周秦古音之研究导源于宋，昌明于清，至章炳麟、黄侃乃总集前人之大成。”并说：“清代之考证周秦古音者，自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钱大昕以迄孔广森、王念孙、江有诰、邹汉勋等，对于韵部之分合，声母之异同，音转之条例，已十得八九。至章炳麟、黄侃、钱玄同、曾运乾诸氏更集各家之大成，续有补匡，持旧术、因旧材以研究古音者，至此殆已臻极。”

黄侃早年在日本从章太炎先生受业，以后二十多年执弟子礼甚谨。章氏说黄侃“性虽倨异，其为学一依师法，不敢失尺寸”。其“于并世老宿多讥弹，惟于太炎先生，则始终服膺无间，有议及章先生者，先生必盛气争之，犹古道也”。其实，黄侃在治学中，是既尊崇师法，又不完全笃守师法，能够独立思考，并善于在导师之见解基础上能有创新。在从其拜比己仅长两岁之刘师培为老师来看，他又能坚持“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原则。黄侃发现己之经学不及刘，于是改朋友为师徒，执贽称弟子，直至晚年，言必称先师。可贵之处就在于黄侃在治学上从不墨守成规。在汉语音韵的研究上师生两人的途径与方法并不完全相同。章氏博极群书，不暇作圈点工夫，黄侃做学问则务求精细，凡校园之书朱墨烂然；章氏作文，以先秦两汉为宗，而黄侃对近代却亦重视，所作古今体诗词咸臻其妙；章氏对于周秦古韵有深邃的研究，而黄侃却不惟古韵，兼及后世韵书如宋元以下等韵之学；章氏对于清末出土之龟甲文字极力摒弃排斥，而黄侃晚年却致力于甲骨卜辞之学，视之于研究而极可珍贵。由上可见，黄侃所以能在音韵研究上卓然成一家，就在于他能在若干方面，并不一味遵从师法，而能博综兼采。这正是黄侃胜过太炎先生的地方。黄侃自己就曾申言：“治学第一当恪守师承，第二当博综广揽。扬子云说：多闻则守之以约，多见则守之以卓，寡闻则无约也，寡见

则无卓也。”由此，不难看出黄侃取得重大成就之根本原因所在。

黄侃先后在北京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执教二十余年，他以学术之功底，治学之目的，科学之方法，促成其学说蔚为大观，俨然一代宗师。其黄门得意弟子约略有：孙世扬(鹰若)、曾缄(慎言)、刘颐(博平)、罗常培(莘田)、金毓黻(谨庵)、张文澍(馥哉)、骆鸿凯(绍宾)、范文澜(仲云)、杨伯峻、殷孟伦(石臞)、林尹(景伊)、陆宗达(颖民)、程千帆(伯昊)、龙榆生(以字行)、黄焯(耀先)、严学窘(以字行)、傅斯年(孟真)、潘重规、黄永镇等，都曾在国内各著名大学及学术机构授业与研究，如今除少数几位尚健在外，多数均已进入道山宗祠。眼见当今学坛上活跃之学人名家中，或许是太炎先生的再传弟子，或许是黄侃先生的隔代学生，然渊源所自，不能不缅怀章、黄二位宗师，不能不追溯到章、黄学派。

1927年后，黄侃执教于南京，其斋名曰“量守庐”，自号“量守居士”，典出陶渊明诗：“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以此表白鄙薄世俗名利，而潜心学术的节操；念于知音，实为民族传统文化传统之命运能继承而忧虑也。事实上，黄侃终生都为文化与学术的传承而不懈地追求着和竭力地耕耘着。1935年10月，年仅四十九岁的黄侃病逝，他生前著作不多，给后世留下了许多遗憾。章太炎曾有“轻易著书是妄，重于著书是吝”之说；而黄侃本人也尝言五十岁后当著书，表明了他不敢轻言著书，可惜年及五十而歿。其师章氏在为其弟子撰写墓志铭时，也有“著述无传”之憾。在黄侃逝世后，其弟子们则有的佳许其师不轻易著书的严谨治学，也有更多的人对其师五十岁后当著述之论提出了异议，甚而有的对这种“述而不著”的治学给予批评与否定。为此，作者曾写信求教于程千帆先生，感谢他目力不佳的情况下给我作了长篇答复。

程先生除指出我轻信传说之不妥，他对其师黄侃的著述情况则有他自己的理解。现摘要二段：“黄先生五十岁就死了，但并非生前‘述而不作’(此语暂按照一般解释)，台湾影印黄先生遗书即有十四大册(均手批，古代学者著书的通行方式，如今人用卡片)，上海古籍出版社及武汉大学出版社所出版的遗著也有近十种，以字数论，肯定在百万以上。这恐不能算是‘述而不作’吧。章太炎在《黄季刚墓志铭》中写道：‘然不肯轻著书余数趣之曰：人轻著书妄也，子重著书佞也。妄不智，吝不仁。答曰：年五十当著纸笔矣。今正五十，而遽以中酒死……岂天不欲存其学耶？’您一定很明白，‘述而不著’和‘不轻著书’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程先生在信中又指出：“即使东南大学一些老辈曾有‘述而不著’的说法，于先生‘晚年尤为矜慎’，也应当放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在疑古派盛行的大禹可以是一条虫，批林批孔盛行时‘有教无类’可以将有训为囿，否则不免成为保守派或反动学术权威。在这样的特定情况下，宣称述而不作，晚年特别‘矜慎’，我们今天也是应当理解的。离开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就背叛了历史唯物主义。至于以讹传讹，掉换概念等等则属于文献审查的范畴以及逻辑推理的方式等，似均当考虑。”

任何一种有社会价值的思想学说都会得到自己的传人，都会被以不同的方式继承和发扬，这可视为在一般的情况下论之。当然，一个学派及其思想体系有无生命力，是否会被继承和发扬，其决定的条件在于自身有无自我批判能力。作为章黄学派而言，也与其他任何学派一样，同样不能不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这才正是学派发展的正常规律。

1996 年 1 月 6 日

东西文化论战及其他 ——记东方文化学派

在本世纪初的“五四”运动前后，曾经发生过东西文化论战。这次论战，是由《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和《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之间的争论引起的。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以简单的态度，将前者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学派讥笑和贬斥为保守派；直到 80 年代末或 90 年代初，以上评价才有所改变，持公允评价者则以王元化先生为代表。其指出：

“和《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持近似意见的人，大多数认为作为中国传统骨干的道德伦理(有时即以纲常名教去概括)是有继承性的。我们不要因此简单地去讥笑他们的保守态度。这些人是杜亚泉、陈嘉异、梁漱溟、钱智修，以及未参加论战而观点和他们十分接近的王国维、陈寅恪等，都是吸取了西学中的民主主义的或自由主义思想的学者，他们在中西学术上造诣很深，决不是维新运动时期迂腐冬烘、愚昧无知的顽固派。倘用激进的态度把两者混为一谈，则未免感情用事，是很不公允的。”(《清园论学集》第 649 页)

《东方杂志》创办于 1904 年，由商务印书馆主办，办刊历史长达三十年，可分为三个时期：创刊至第七卷，乃草创时期；从第八卷起，内容和形式大为改进，是为第二时期；第十七卷起改为半月刊，可称第三时期。杜亚泉主编《东方杂志》，即在第二时期，时间是 1911 年至 1920 年，先后近十年。杜亚泉(1873~1933)，原名炜孙，字秋帆，号亚泉，别署陈仲逸、佺父、佺叟、高劳等。其号因前曾办《亚泉杂志》而用也，他自己说过：“生在世界上，没有用途，就像化学惰性元素的氩，没有面和体就像几何上的线。”“亚泉”二字由氩、线二字省去偏旁而来，有自谦之意，不过氩气后来成为用途不小的元素，恐怕他是没有想到的。他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约有二十八年之久，所编撰之百余种教科书，范围不出博物数理化；然其在《东方杂志》上刊发之二百余篇论文，却多涉文化方面，兼及科学、哲学、社会及伦理。被后人尊崇为徐寿以后“中国科学界的先驱”，受到了公允而中肯的评价：“其对于人生观和社会观，始终以理智支配欲望为最高理想，以使西方科学与东方传统文化结合为最后目的。先生实不失为中国启蒙时期的一个典型学者。”(《东方杂志》引卷 1 号)

在东西文化论战中，《东方杂志》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为文化思想领域中一方重镇，在中国现代文化学术史上居极其显要的历史地位。这次论战，就其社会影响而言，它的意义远在科学与玄学、民族形式等问题的论战之上。历史已发展到 20 世纪末，站在世纪的峰颠回首审视世纪初的一些事件、人物和问题，从中领悟必要的经验教训，或许对将临的 21 世纪是有益的。

揭橥这场文化论战序幕的两派，便以《东方杂志》与《新青年》为各自的阵地。《新青年》创刊于 1915 年，此时《东方杂志》已开办了十一个年头，并在读者中有了相当大的信誉。但是《新青年》一诞生，却标志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并以新的姿态宣告了与《东方杂志》论战的开始。双方由思想上对垒到转向公开的交锋，时间是 1918 年，由此引发出这场空前的东西文化大论战。

陈独秀及聚集于《新青年》麾下之新文化一派人物，以宣传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为己任，对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展开了无情的批判。对这种以“外来之西洋文化”为新，以“中国固有之文化”为旧的主张，杜亚泉首先发表文章，表示极大的不满和强烈的批判，继有《东方杂志》后任主编

钱智修(笔名坚瓠)也相继参战,以主张新旧文化调和著称的章士钊,以东方文化信徒自誉的陈嘉异,也进入论战阵地。他们宣扬东方文化优越论,倡导中国文化统整论,主张中西文化之折衷和新旧思想调和论,成为后来现代新儒家思想发展演变之先声。

东方文化优越论,在陈嘉异一篇《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中提出,认为中国文化精蕴高深,实较西方文化优越,其萃萃最著者有四:1.从文化的发生或起源上论,中国文化为独立的,自创的,优越于西方传承的、因袭的文化;2.从其协调性和主导精神上说,中国文化具有调和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优越性,且能以精神生活统御物质生活,溶二者为一体;3.从其适应力和变动性上讲,中国文化具有调节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优越性,尤其能“以民族精神为根柢”,随时代之变易而运用发展之;4.从其与世界文化的关系和发展前景上言,中国文化具有“由国家主义而达世界主义之优越性”,惟其“以世界主义为归宿,故东方文化则可为将来之世界文化”。

中国文化统整论,乃由杜亚泉提出。他有“宇宙进化之顺序”三阶段说:无机界之进化、有机界之进化、人类社会(或趋有机界)之进化。他在分化与统整的关系上主张,其一,以重统整、抑分化为其文明进化观之特征。其二,中国“固有文明之特长,即在于统整”;由此统整,才形成了“吾国文化之结晶体”,即儒家“名教纲常诸大端”。其三,而新文化运动将西洋近世之“种种杂多之主义主张”输入中国,破坏了我数千年文化之统整,不利于我固有国是之巩固和增强。其四,中国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之“救济之道”,皆有赖于统整。

中西文化调和论,乃由杜亚泉、章士钊倡导。其主要观点是:(一)在处理不同思想、文化、主义和主张等,“勿轻易排斥异己之思想”,“勿极端主张自己的思想”,而应“察其原因,考其理由”,善择相宜者用之。(二)强调“世无绝对之物”,惟有调和才是“宇宙万有”和“社会进行至精之义”,事物有差别才要调和,无差别则无调和。(三)认为东西文化及其文明“各有特长,而亦各有弊害”,所以二者应取长补短,互为调剂。(四)在处理新旧思想关系上,不赞成“破旧立新”,而主张“新者立旧者自破”,因为从思想文化的总体演进上看,“新也旧也,不过一程度问题”,“程度虽差,然皆沿同一方向以进,但有过不及之差,非若正与负之异。”(五)强调欲谋开进,必善于保守,不善于保守旧基,便是“忘本”和“自杀”,由原来之调和趋新而转向保守复旧的立场。

在扼要地介绍了东方文化学派的相关见解后,不难看出这个学派思想体系及其文化学术观点的可取之处和其局限性。虽然历史已经给东西文化论战作出了评价,但是先辈们当年争论的问题,直到80年代仍在继续着,作为一笔文化学术遗产,我们没有理由不客观地评价与汲取这场论战之双方的追求真理的精神及其合理成果。

1996年3月6日

傅斯年及其傅氏家族考略

—

傅斯年，字孟真，山东省聊城人。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二月十三日生于邑之北门内祖宅内。1950年12月20日因脑溢血病逝于台湾，终年五十五岁。其六岁入私塾，十岁入东昌府立小学堂，十一岁读毕十三经，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至天津，次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1913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本科国文门。其时，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等文，提倡白话文学；傅斯年曾著《文学革新申议》等文响应。1918年夏，傅与同学罗家伦、毛准(子水)等组织新潮社，编印《新潮》月刊，宣扬新文学，倡导新思潮。1919年于北京大学毕业后，考取山东省官费留学，赴英国先至爱丁堡，嗣入伦敦大学，研究实验心理及生理，兼治数学。1923年由英转德入柏林大学哲学院研究。1926年应国立中山大学之邀返国，次年春就任教授，兼国文、历史两系主任，嗣兼文学院院长。1928年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聘其筹组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11月专任研究员兼所长，期间，还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教授、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等。后来曾任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北京大学代理校长，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去台湾后任台湾大学校长及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

傅斯年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代才子，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应占有一定地位。不论在创办和主编(事实上)《新潮》杂志期间，还是在参加和组织“五四”学生运动方面；不论是筹设和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期间，还是于北京大学、台湾大学任校长方面；不论是在支持安阳殷墟遗址发掘问题上，还是在史学研究的成就及其理论与方法的贡献上，都功不可没。尤其是他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三年，可说是尽其毕生心力的建树，所征聘和造就的研究人才，先后在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学科之学人近百，出版专著七十余种，发表论文五百余篇，入藏图书四十余万册，设置语音实验、考古发掘、人体测量、民族调查之仪器百余种，皆其领导及擘划之功。作为历史学家，他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史料学派”的倡导者或首领，在史学及其史学理论和方法上有其创获，在著作上出版的专著有《东北史纲》第一卷、《性命古训辨证》三卷，稿本有《古代中国与民族》、《古代文学史》等，论文有百余篇。卒后，后人辑印为《傅孟真先生集》六册。作为一代学人，其治学道路和学术思想可供研究者和借鉴者亦多。

史籍称傅氏家族为鲁西名门显族，世居聊城，共历十四世，约四百八十年左右。从其七世祖始，随着官位的升迁，傅氏遂成为东昌望族。但是到了傅斯年时，实际上傅氏家族已经衰落了。为此，研究傅氏家族之兴衰及其原因，对于人们认识封建社会的家族发展是有一定意义的。

二

关于傅氏之先世远祖，据傅公心海神道碑铭曰：“傅氏发源自江西，高騫鳧。临兹邦，兹邦尸祝攀循良，乃留喆胤慰群氓。”《东郡傅氏族谱》记载，傅氏远族是江西吉安府永丰人，明成化(1465—1487年)年间，傅回

任山东东昌府冠县令。任职满后，携四子南返，留下三子，一子留冠县，一子去博平，一子傅祥奉母命占籍聊城。聊城在明代属东昌府，冠县则为东昌府属县，故聊城傅氏后人通常认傅回为傅氏家族始祖。据传始祖李志太通堪兴术，择定聊城城南三华里处为傅氏祖茔，即此，后世代居住在聊。

傅祥事迹无考，可能是毕生以务农为业。他之夫人孙氏，生有四子。次子名纶，字理之，号后泉，为聊城诸生，其生性倜傥不羁，但是督课子孙甚严。他之夫人母氏，生有三子，次子名谕，字汝克，号晓臆。傅纶后改习商业，鬻卖纸布，以信义著称，由此生意兴隆，资用充裕，他卒年五十八岁。傅谕配夫人赵氏，生有三子，次子名天荣，号肖臆；继其父经商，擅写小楷，晚年因风痹疾不再从商，将财货全数转给其弟，亡年六十七岁。傅天荣娶夫人王氏，生有五子。次子名思敬，字心海，因家境贫寒，后弃学经商，亦工楷书，是位知足守分的商人。他之夫人李氏，是聊城李正学之女，素具贤德，婴疾而卒，年仅四十八岁。傅思敬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逝世；生有二子，长以恒，早卒，次以渐，字于磐，号星岩。以上自回祖至心海凡历六世，约一百六、七十年，傅氏除耕读外，多数经营商业，并未显世。

三

傅以渐(1609—1665)，是博斯年之七世祖，为清朝第一个开科状元，由弘文院修纂累至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一直受清世祖顺治器重，成为清初不可忽视的人物之一。

傅以渐“少颖悟，三岁诵书，十岁属文。家贫纸笔不供，每成文于壁上，书成拭去，更为之。夜或燃香以读”。 “及成童，读诗易，习举子业，辄能砭砭入解，期次远大，质稟醇厚，其不屑于俗侪辈相齟齬，见者乡人士重为大过人之器，以独富所学，积学累功，深于坟典，受业于莘邑少司空孙兴公。先生之门，屡试皆冠多士，食饩芹官，高文笃行久，县公辅矩度而为闾族所矜式者，至今乡人誉不置口。曾十六岁从大廷尉绳武顾公至京师，见旅壁有题迪砺老老语者，公见之，争自奋勉，顾公异之，乃曰：‘士无不以训行为务而特来，见于弱冠年，以楷先型，为孜孜其思无不齐者若是，且都会繁华地，少年士，甚至逐绪牵情足矣，乃何以度越凡近也，真弗可及。’”

傅以渐所处的时代，正值社会动乱的明末清初，聊城东南书院众生辍学，唯独有他矢志不移、攻读不懈而终成大器。

顺治三年(1646年)，开科大考，傅以渐赴京会试，以进士及第之第一，首夺大魁，授弘文院修纂，尔后即累迁擢升不次。1647年，会试同考官；1648年，充任《明史》纂修官；1651年，迁升国史院侍讲；1652年，任《太宗文皇帝实录》纂修官，同年六月，迁左庶子；1653年，擢升秘书院侍讲学士、国史院学士，同年七月，任教习庶吉士；1654年八月，授秘书院大学士；1655年初，他向顺治陈述有关国计民生的三件大事，均符合顺治的意图。顺治又令其作《资政要览后序》。是年二月，被加封为太子太保(即康熙皇帝的老师)。不久，改任国学院大学士，兼文武殿试读卷官，并主持编辑《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圣训》和《通鉴全书》，还承旨纂《内则衍义》、复核《赋役全集》。1656年八月，傅以渐在监察御史面前申请辞职，旋即接到顺治旨意：“尔为辅佐皇帝治国家的重臣，淳诚朴实，勤劳谨慎，怎么能引退呢？应该施展尔宏图谋略，辅佐皇上教化人民，治理好国家。”

1657年二月，傅以渐和曹本荣奉旨编纂《易经通注》。顺治云：“朕看《易经》一书，精深奥妙，应用广泛，包罗天地万物之括理。自三国时魏国王弼有《周易注》，唐代孔颖达著有《周易正义》，宋程颐著《伊川易传》，到朱熹之《原本周易本义》问世，后来学者一直用来作为研究《易经》之标本。明朝永乐年间，命儒生学士综合元代前研究《易经》之各家之说，汇为《周易大全》，于《易经》多所阐发。但此书同异互存，并未删繁就简，取其精华。从《周易大全》成书至今，近三百年来，儒家学者对《易经》不乏真知灼见，今亦应取各家之长，辑成一编，以飨后人。你等要尽心研究，融会贯通，要简约而概括，详尽而不重复，使伏羲氏之《易经》奥旨，为日星永放光芒。”顺治如此重视《易经通注》之编纂，傅以渐在当年十二月即完成是著。是年冬，“皇太后违和，群臣惶懼，内阁奏疏颇多壅积，公于数日内悉为票拟皆称”，深得顺治厚爱。

1658年，傅以渐和学士李蔚主管大考，任会试总裁。有人上奏皇帝，禁止考官携带书籍进入考场，而众考官则仍要求携书应试。傅以渐上奏顺治，废除禁例，准许携书入场应试。在主考过程中，傅以渐积劳成疾，发病呕血，乞赐另遣一员，同李蔚任事。九月，改内院为内阁，授傅以渐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十月，因病乞假回籍。1659年十一月，傅以渐因病逾一载乞求免职，顺治复命：“旨卿清慎素著，佐理有年，宜加意调摄，痊日即来供职。”

1660年三月，再次申请“罢得”，顺治特派使臣到聊城抚慰并察看病情，并称赞其“清廉谨慎，为有功之臣，应注重治病”。(11)到1661年初，清世宗驾崩，傅以渐奔丧至京。期间，又以病向康熙请辞，始得解任。康熙二年(1663年)，傅以渐在家乡养病时，曾主持编纂《聊城县志》。于康熙四年(1665年)逝世，终年仅五十七岁。

在傅以渐死后，清廷诰赠其父傅思敬、祖父傅天荣、曾祖傅谕三代均为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加一级，其配偶被封为一品夫人。大学士李蔚为其三代亲撰神道碑文，吏部主事许其进为傅以渐伯父傅恩义(字完贞，曾资助傅以渐读书)撰《明孝子完贞傅公家传》，史官宋弼撰《少保大学士傅公传》，武定府教授耿贤举也撰文写传，清廷《国史列传》有傅以渐专篇，掌京畿道监察御史、翰林院编修朱续晫为《东郡傅氏族谱》作序，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海源阁主人、中议大夫、江南河道总督杨以增为重修《东郡傅氏族谱》撰序。傅以渐不仅于生前已达到“荣禄兼极”的地步，而且在死后名显山左，成为鲁西名门望族。

四

傅以渐夫人虞氏，乃江苏苏州人，据说是位绝色美人，有“艳倾宇内”之誉。仅生一子，名端揆，八岁而殇；由族子宅揆继嗣，名永，字纶西，号西斋，为乾隆十七年(1752年)举人，先后任浙江泰顺、永嘉等县县令及湖州、温州二府通判，后至台州同知，因事忤巡抚王亶望，抑郁成疾，不久歿于杭州(12)。

傅宅揆初娶何氏，早死。继娶杨氏，但无所出。再娶黄氏，生有三子，长名廷辉，字映宸；次名廷椿，三名廷松。杨氏在傅宅揆逝世后七年自杀殉节。黄夫人则寿至九十有四。傅廷辉曾随侍其父于浙江任所，其父病歿时他已十八岁，扶柩北还，返家后囊空如洗，废学而失求取功名之机遇。因生母

黄太夫人在堂，亟图禄养，乃捐纳一个从九品的小官，分发河南任职。在豫历任怀庆、归德二府经历和延津县典史，先后有二十余年。后因黄太夫人年高而归故里，在返乡后二十多年间，热心于地方公益事业，都以他为首倡，在当地民众中威望甚高。卒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享年七十七岁。他即是傅斯年之高祖(13)。傅廷椿事迹无考。傅廷松精通武功而豪侠仗义，专打不平，合城畏之。

傅廷辉夫人朱氏，是聊城庠生朱衍诗之女，生有二子，长名绳勋，字接武，号秋屏；次子继勋，字玉溪，号湘屏，均读书成名，宦途如意。傅绳勋是嘉庆十九年(1814年)进士，官高任职为翰林院庶吉士、工部郎中、军机章京、知府、兵备道、盐运使、按察使、布政史及浙江、江西、江苏巡抚等职。在江苏巡抚任上，与两江总督陆建瀛不合，加之他生活侈放，不仅多置姬妾，而且染有鸦片烟瘾，于是被陆上疏劾之，告其：“烟枪两杆，侍妾八人”，为此于咸丰元年(1851年)辞职返里。在其被解任后不久，太平天国军队攻陷南京，陆建瀛自杀，他竟因而有幸逃得性命；清廷又任命他为团练大臣，待鲁西宋景诗起义被平复后，他称病不赴清廷任职。晚年以乡贤自誉，迭任泺源、启文二书院讲席，终年八十二岁，著作仅存《重修东昌试院记》一文(14)。

傅继勋为傅斯年曾祖，道光五年(1825年)拔贡，先后任安徽省庐江、歙县、贵池、太湖、全椒等县知县，太平、安庆二府知府，官至安徽布政使。清末重臣李鸿章、丁保祜均出于门下。他以格言四句处世和劝勉县学诸生，即“贵莫过于为圣贤，富莫过于蓄道德，贫莫过于不闻道，贱莫过于不知耻”。道光末，他曾以循良陞见。

傅绳勋有八子，长子名浚，字东泉，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进士，曾任吏部文选司郎中，而立之年后即卒。次子名沅，字仲南，咸丰元年(1851年)举人，曾任山右大宁及福建将乐县知县，是道光宰相贾祜之婿，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连襟。四子名淮，字小屏，廪贡出身，曾任直隶候补县丞。七子名濂，字惠泉，曾任军职。其余诸子不详。

傅继勋元配李夫人，聊城人，卒于歙县任所。续弦张氏，为安徽某镇总兵张云台之女，生有七子，长名潜，字达泉，同治元年(1862年)举人，曾任内阁中书，浙江严州知府，长于诗善于画，尤以书名。因在外出查案时作画耽误公事，而被以“书生迂腐”劾免。次名漣，字味泉，文事次外，擅长武功，他是道光时浙闽总督刘韵珂之婿，曾参左宗棠幕，征西时向左建议而未受接纳，出语讥刺而被革职；其后任浙江候补布政使理向，与浙江人结怨，被仇家所害。三子名淦，字笠泉，即傅斯年祖父。四子名泐，字歧泉，候选同知，曾任江苏武进典史。五子早夭。六子名洸，字雪泉，酷嗜皮簧，师承程长庚，亦长于书法，曾任安徽候补府经历。七子名溥，七岁而殇。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傅氏家族在清道光、咸丰、同治时代发展到鼎盛时期，傅绳勋、傅继勋兄弟均为封疆大吏，而诸子又多具才华，或以书画而名世，或以武功而见称，所谓是“满门俊逸”之家了。但是，傅氏先辈却大都孤高廉介，不事逢迎，或恃才傲物，或玩世不恭，或不识事务，或书生迂腐，居官而不积蓄钱财，虽在清初就是望族名家，但卸任后大都与穷神为伍。据熟悉傅斯年为人的人介绍，说傅斯年就颇具傅氏祖风。

傅斯年祖父傅淦，文武兼备，多才多艺，不仅博通经史，而且工诗书画，既精通医理，又擅长武功，为人澹泊，不乐仕进，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考上拔贡后，则绝意仕途。尽管他有作官之途径，但把功名利禄视为一文不值，而以交游侠义、诗文书画为乐，塞北江南都有其踪迹。在孙子傅斯年出世后，便以教孙子读书为旨趣，把其希望寄托于傅斯年身上。所以世所认为，傅斯年受其祖父影响最深，可谓是傅斯年学问人格基础的奠立者。

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曾有意提携他这位世弟，专门写信让傅淦到天津，准备给其安排职务。当傅淦抵津时，正巧李鸿章忙于处理公务，暂安顿在安徽会馆住下，待以日往访，而傅淦一怒返乡，从此绝意仕途。他还认为，历代弊政皆由宦官启之，因此痛恨宦官。一次傅淦到山西介休，遇两名宦官充军西北，路经其地，忽染重病，求他诊治，竟遭拒绝；在宦官长跪哀求下不得已而为其治，当病愈后，宦官赠他银两，他不仅将银子从门中掷出，而且口中咒骂宦官为“无鸟者”。在光绪时，傅淦曾居住北京，结识镖师大刀王五。他化装为乡下武师，投入镖局。王练武时，他在旁批评，故而王邀其比武，并以竹竿为兵器胜王二次，再试摔角又胜王数次。交谈之间，王知傅是名公子，乃拜为师。王初用双钩，号称“双钩王五”，傅淦则认为双钩非兵器正宗，劝他改使大刀，此后王才以大刀著名。但此事他绝口不提，他之武技也从不传授本族子弟。

傅淦平时仗义疏财，好施周济，不善理家，家道开始衰落。傅氏兄弟原住聊城北门内相府街祖宅，街以傅以渐府邸所在而得名。相府原有楼十二座，在分家时傅淦均推让兄弟，他只独分马廄一座，加之不事生产，又好济穷，于是日益穷困起来。

傅淦夫人陈氏，名梅，潍县人，其父曾任江西巡抚。生有三子，长名旭安，字伯，号晓麓，是傅斯年之父。次子嵩安；三子春安，字兰。傅淦于1922年逝世，终年七十八岁；陈夫人卒于1924年，年高八十岁。傅淦生前曾易筋经，但于逝前将文稿焚毁，故无著作传世，仅存《挽兄东泉先生》、《老书生道情歌》诗作二首，还是据傅斯年之弟傅斯岩记忆所录，并非原貌。不过从诗中可透视出傅氏家族之衰落境况及傅淦对世道的见解与处世原则，故录于后(15)。

其一挽兄东泉先生

离乡已数年，所念惟兄弟，竟爽冀长存，中道无捐弃。忆昔少壮时，要约杂嘲戏，他日孰先亡，相挽以文字。深惧田庐荒，更悲门户替，况夫鬓皆苍，衰老必将至。终岁游西江，奔走为家累；归来两弟亡，持筋良非易。我亦为饥躯，匆匆分襟际，每慨寄人劳，时为筹归计。聊践息壤言，当作生刍祭；东望故乡云，涕泗复涟洏。

其二老书生道情歌

忧愁苦多欢乐少，年未六十人已老；往日繁华梦里过，转眼凄凉空烦麻。胡为轻掷好时光，终朝碌碌为人忙，宦途本是幻中境，妻子尽是骷髅场。求田问舍遗子孙，那知不久属他人；帝王江山难久保，何况士农工商民。我今思得一妙法，眼前欢乐莫放下，今朝有酒便酩酊，管甚明朝断炊话。营营孳孳无休歇，反被他人作笑把；闲情镇日清昼长，那有真来都是假。

傅斯年在讲到其祖父对于他兄弟们的影响时，这样说：“祖父生前所教我兄弟的，尽是忠孝节义，从未灌输丝毫不洁不正的思想。我兄弟得有今日，

都是祖父所赐。”(16)

傅斯年父亲傅旭安，光绪二十年(1894年)顺天举人，曾任山东东平县龙山书院山长，靠束修维持生活。在职六年，年仅三十九岁，因病歿于任所，是时傅斯年只九岁，其弟仅七个月，家庭断绝经济来源，生计愈加困难。

傅旭安夫人李氏，名叔音，生有二子，傅斯年居长，字孟真，傅斯岩居次，字孟博。傅斯年之学问基础，除其祖父奠立外，其母之督教之功不可没。他母亲出生于地主家庭，虽识字不多，但知书达礼，贤孝识大体，教子甚严；其母卒于1941年，享年七十五岁。

傅斯年于孤苦中度过了童年时代，在十四岁时，由其父之学生侯延燠(字雪舫，后考中进士)带至天津读书，次年进入天津府立中学堂，毕业后再入北京大学攻读。傅斯年在回顾他幼年时曾说：“我出身于士族的贫家，因为极穷，所以知道生活艰苦，然我所受的教育是中产以上的，是由于亲戚的帮忙。”(17)在其父亲死后，傅之家计则靠故旧赠予数千缗并代存在息维系之。

六

聊城，明清为东昌府治。元代后，古运河穿境而过，成为南北运输之大动脉。交通之便利带来了商业的发达、经济的繁荣。明清两代，聊城商贾云集，人口稠密，北距有小天津之称的临清，南有繁华城镇之张秋、阿城，是漕运和商业交汇之重镇。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文化的昌盛。明清两代的聊城，不仅名人辈出，而且刻书业、制笔业十分发达。尤其是誉满海内的四大私人藏书楼之一的“海源阁”，更是聊城文化的象征。在清代，聊城曾成为清帝王巡幸之地，从1689年至1709年，康熙帝亲临东昌府四次；从1748年至1790年，乾隆先后九次到过聊城，并写有咏光岳楼(聊城城中鼓楼)诗十三首。由此，可想当时聊城之繁荣昌隆的盛况。

再由此综观傅氏家族盛衰荣竭之历史，有些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傅氏家族从明成化年间(1487年)到清道光年间(1843年)的三百五十多年，共历十四代，六世前经商并不显世，但是到了七世步入宦途而达到盛时，再经八、九、十、十一世四代之科举仕宦的延续，发展到鼎盛时期，到了十二世开始衰落，下继到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时，这个家族已经破败不堪了。从傅氏家族由明成化到清道光期间的族谱看，族人中有一百一十三人取得了功名，其中进士四人，举人七人，太学生三十六人，庠学生六十六人。二十一人取得了官位，其中刑部员外郎一人，布政使二人，知府二人，知县十二人，以七世祖傅以渐官位最高，受到顺治、康熙两帝的宠幸，名位上升到了“荣禄兼极”的地步。但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清代到了末世，随着清王朝的败象显露及其继续发展，作为这个社会组织细胞的傅氏家族也逐渐衰落了下來。加之，从地理上讲，到傅斯年降生时，津浦、京汉两条南北铁路，替代了昌隆一时的水路漕运，聊城的经济和文化较前也变得萧条起来，傅氏家族的荣耀也成为了过去。

1991年9月

注：

《心远堂文集》卷十。

此谱1991年春送中央档案馆展览。

见《傅公心海神道碑》。

见《星岩傅公墓志铭》。

参见《清史稿》第32册，第9496页。

转引自《大众日报》文史版。

《少保大学士傅公传》，《傅氏族谱》。

(11)《少保大学士傅公传》，《傅氏族谱》。

(12)《聊城县志》(续修)卷八。

(13)《聊城县志》(续修)“耆献文征”。

(14)《聊城县志》卷八、卷十。

(15)台湾《传记文学》第28卷第1期。

(16)傅淦事迹，见傅斯岩手写傅氏家传。

(17)《傅斯年全集》第6册，第100页。

“考史而不著史”

——记傅斯年及史料学派

在 20 世纪初，应该说是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史学的转型过程中，有位重要的关键人物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傅斯年(孟真)先生。他是史料学派或称科学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其在本世纪上半世之主要成就及其贡献，当在历史学领域。

傅斯年(1896—1950)，就学于北京大学，崇信章太炎学说，师承刘师培、黄侃、陈汉章。五四学生运动领袖，创办与主编《新潮》杂志，在鼓吹科学思想，抨击专制积弊，响应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的新文化运动中可谓一代骄子。后留学英国，又转学德国，选学了许多自然科学的课程，先打算“致力于心理学，以此终身”，后又接受 19 世纪德国朗克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学派(亦称历史语言考据学派)的学术观点，将史料看得高于一切，要把历史学成为史料学。在 1926 年归国后，次年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暨国文、历史两系主任，并筹建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1928 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其后主持所务二十余年，都按照他“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的主张行事；他提出“考史而不著史”和判定史学进步与否的标准是：(1)能否运用直接史料，(2)能否扩充利用新材料，(3)能否扩充研究的方法；他有一个标明其学术旨趣的口号，“我们不是读书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其上见解，均在他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体现，他坚信通过发掘整理史料，是可探得史实，求得客观知识的。

傅斯年在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实践中，他按自己对史学的理解与认识，进行了极其执着的追求与实践，以其惊人的胆识与魄力和超人的组织能力，在网罗学术人才、组织重大学术课题、开展“集团研究”、形成史料学派和推动中国现代学术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有着不可替代和不容低估的意义。就傅斯年本身的学术研究及其学术著作讲，虽然有其贡献与地位，但是与其能站在史料学派之前列，成为史料学派之组织者与领导者相比，他之学术贡献及其学术影响，应该说却是前者难及后者，他之卓越的史学思想、史学建树和史学组织活动的影响远超过其史学著作，这在学界是被多数公认的。

先看其史语所聚集之学派群体：在那里工作过的著名学者是陈寅恪、赵元任、陈垣、李济、顾颉刚、徐中舒、岑仲勉、刘半农、董作宾、罗常培、李方桂等；经其发现和培养，后来成为名家之学者有胡厚宣、陈乐素、张政烺、陈述、严耕望、劳干、全汉升、夏鼐、梁思永、郭宝钧、凌纯声、石璋如、丁声树、王崇武、高去寻、李晋华、吴相湘、姚家积、李光涛、周法高、屈万里等。次见史语所学派群体所进行的泽被后世之大事业：其一是殷墟考古发掘；其二是清朝内阁大库档案之整理；其三是古文字古器物之研究；其四是民族学、语言学之调查。无论任何一项，都具有空前启后的价值。再说史语所学派群体所完成之史料搜集与汇编：所内编撰印行专刊三十种，单刊二十五种，集刊二十二种，《史料丛书》七种，《中国考古报告集》二卷，《人类学集刊》二卷。在“扩张研究材料”的宗旨下，地下埋藏之甲骨、金石、陶瓷、竹木的文字刻辞及实物，地上遗存之古公廨、古庙宇及其他古建筑、雕塑绘画，少数民族之语言、文字、民物、制度及风俗、信仰，各地

之方言、方音，群经古籍、档案、方志、谱牒、小说、戏曲及宗教典籍等，均在搜藏之范围，积累了大量的丰富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资料，弥足珍贵。

在“一分材料出一分货，没有材料不出货”的原则下，这个学派的许多学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里，都作出了各自的学术建树。诸如陈寅恪之隋唐史研究；陈垣之宗教史研究；董作宾之甲骨文研究；李济之考古学研究；劳干之秦汉史和敦煌学研究；岑仲勉之唐史研究；全汉升之中古经济史研究；严耕望之中古政治制度研究；屈万里之经学研究；赵元任、李方桂之语言学研究等，不仅体现了其时之学术界最高水平，而且深远地影响着现当代之学术风气与学术路向，大大地扩展了新的研究领域，大大地推进了学术的发展和繁荣。

1996年2月4日

昌明国粹融化新知 ——记吴宓及学衡学派

代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当然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激进主义派是主力军。但是就当时思潮与学派而言，尚须提到另一潮流《学衡》杂志及其学衡学派，被学界称之为文化和思想上的保守主义。

学衡派是以《学衡》杂志为阵地聚集起来的一批学贯中西的学者群体。

《学衡》杂志创刊于1922年1月，终刊于1933年7月，前后共出版七十九期，坚持长达十一年(期间曾有过停刊)，发行国内外，其学术文化影响在五四以来众多期刊中是为罕见。就其编辑力量而言，柳诒徵、刘伯明、梅光迪、汤用彤、吴宓、胡先骕等，可视为《学衡》杂志的创办人，柳、吴二位致力尤多。吴宓始终任总编辑；1925年吴北上清华后，增设景昌极为副总编辑，1927年起改由缪凤林接任；1930年吴游学欧洲时，胡稷咸曾代理编辑过三期。就其作者队伍而论，有一个较为稳定的作者群体。在七十九期中发表过三篇以上的作者有一百零八人，其主要作者是：柳诒徵(五十五篇)、吴宓(四十二篇)、缪凤林(二十四篇)、景昌极(二十三篇)、王国维(二十篇)、胡先骕(十八篇)、张荫麟(十四篇)、刘永济(十二篇)、林损(十二篇)、汤用彤(八篇)、郭斌龢(八篇)、刘伯明(七篇)、孙德谦(三篇)、徐震堃(六篇)、梅光迪(五篇)、吴芳吉(四篇)、胡稷咸(四篇)、王恩洋(四篇)、李思纯(三篇)、陈柱(三篇)、刘朴(三篇)、叶玉森(三篇)、杨成能(三篇)等。

从以上主要作者的学历、经历等情况分析，则不难发现这个学派成员中一些相似性的东西。这就是说，作为一个学派中成员，虽不排除各有互异的部分，但在主要方面一定存在着共同的因素。以《学衡》学派讲，其一，以留学美国，又以出身清华而留学哈佛的为其中坚力量。如梅光迪、吴宓、胡先骕、刘伯明、汤用彤、张荫麟、郭斌龢等；其二，以东南大学在教之学者为主干。如柳诒徵、缪凤林、景昌极、徐震堃等；其三，以吴宓之清华学堂同学与清华大学同事为基本。同学中有吴芳吉、刘朴、刘永济，同事有王国维(留日)、陈寅恪(留欧美)、李思纯(留法)、胡稷咸。这种教育背景与文化素养，决定了《学衡》学派之作者群体，是具有学贯中西、学有专长的队伍。以这样的作者为中坚为骨干为基本，自然也就决定了《学衡》学派的中西文化价值取向，必然也就影响到《学衡》杂志的整体系统及其文化精神。

在《学衡》学派中，应特别认识一下吴宓(1894—1978)、梅光迪(1890—1945)、胡先骕(1893—1968)、汤用彤(1893—1964)、柳诒徵(1880—1956)等几位灵魂人物，他们既是《学衡》杂志的设计者与创办者，又是《学衡》学派的凝聚核心和重要学者。吴宓，1917年清华学堂毕业后赴美留学，师从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1865—1933)，1921年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后回国，应梅光迪之邀任教于东南大学，主持《学衡》杂志十一年，他是保持《学衡》办刊宗旨与独立风格之最主要的因素。梅光迪既早于吴宓留学哈佛，并取得硕士学位，经梅之引介使吴从师白璧德，又早于吴回国出任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是他邀请吴返国主办《学衡》杂志。早在《学衡》杂志创办前，梅与胡适在美国就曾有过文言与白话的文学形式问题之争。梅在《学衡》杂志的办刊宗旨方面，曾发表过许多言论，可见其在《学衡》学派中的重要地位。胡先骕，其为植物学家，1913年、1923年曾两次赴美留学，获加州大学、哈佛大学植物学博士学位。五四运动前夕发表《中国文学改良论》，在创办

《学衡》杂志期间则有《评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评尝试集》等文，以抨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著名。汤用彤，1918年赴美，1922年获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任东南大学哲学系教授。在《学衡》杂志刊出《评近人之文化研究》，批评了当时在文化研究中的三种时弊：诋薄国家者、输化欧化者和主张保守旧文化者。柳诒徵，历史学家，受业于江阴南菁书院、南京钟山书院，曾留学日本，著有《中国文化史》等，《学衡》杂志创刊号卷首“弁言”就是柳氏手笔，在该杂志发表文章首屈一指。上述五位，除柳氏外，均为白璧德弟子，深受新人文主义影响。

由以上之学术群体，就不难理解《学衡》杂志的办刊宗旨了。其标明宗旨为：“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无激无随。”其宗旨之核心，可理解为“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两个主题，实际就是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如何引介西学的问题，用吴宓的话说就是“发挥固有文化，沟通东西事理，镕铸风俗，改进道德，引导社会”。（《吴宓日记》）还可用吴芳吉（吴宓挚友）话说，那就是“复古固为无用，欧化亦属徒劳。不有创新，终难继起，然而创新之道，乃在复古、欧化之外”。（《再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由上简言之，就是既不能全盘西化，也不能志在复古，而应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之前提下，进行创新，才有希望“继起”。从《学衡》杂志创办十一年来所刊之文章的整体内容看，其一研究中国古代文化与古代文学；其二引介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学；其三进行中西文化之比较研究。是体现了《学衡》杂志及其学派的宗旨和目的的。

历史已经过七十多年的发展与沿变，站在本世纪的巅峰反思《学衡》杂志及其学派所标榜的原则和所进行的追求，我们不能不钦佩其远见卓识，不能不重视其文化价值及其成就。

1996年1月29日

以疑古为旗帜 ——记古史辨学派

在中国近现代史学界，顾颉刚占有重要地位。所以如此，是因他主编巨著《古史辨》，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创建古史辨学派或称新疑古学派使然。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是中国历史上疑古学派的继承和发展，既集中了疑古派之大成，又超越疑古之前贤，成为我国辨伪史上的一个重大发展，为考辨古史传说和古文献资料提出了新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标志着疑古辨伪之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其学术意义自不待言也。

顾颉刚(1893—1980)从1920年即始考辨古史，1923年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于1926至1941年先后编辑出版《古史辨》一至七册，汇编文章350篇，约在325万字，是20年代、30年代考辨古代史料的总结集。后来又將考订古代地理部分编为第八册出版。《古史辨》并非一部书，也并非顾颉刚一人所独著，而是像不定期之辑刊，将不同观点之论著与书信汇于一编。这也正是其特色，每册中将针锋相对之双方论著结集一起，读者即可一目了然相互争论之见解，在学术之雅量和争鸣之兼容性方面就可算开一代风气了。这与80年代前那种独尊一家，将不同观点当作反面教材另立一册的作法相比，后者不是显得气度过低了吗？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概而言之，主要意思是：其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后有盘古等。其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知”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治国”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其三，我们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即我们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其所说见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

其后顾先生又在《答刘胡两先生书》中，进一步阐明了这个学说的出发点及其推翻非信史方面的四个标准：（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顾先生认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之史学体系，主要完成于从战国到西汉的儒家之手；儒家经典《尚书》是确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一古史系统的首要典籍。他指出，要有效地摧毁这套史学体系，就必须摧毁《尚书》的经学地位，这样才能驱散它本来面目上蒙着的迷雾。

这个学说一提出，疑古者立即赞赏，认为是“伟大的发现”，“一大贡献”，尤其是钱玄同“欢喜赞叹”，评之为“精当绝伦”，索性连姓也不用了，直称“疑古玄同”；信古者则群起而攻之，激烈地进行反对；作为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对于古史辨学说及其学派，至少是不理解或不重视的。直到1930年，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说：“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个卓识。从前因为嗜好的不同，并多少夹有感情作用，凡在《努力报》上所发表的文章，差不多都不曾读过。他所提出的夏禹问题，在前曾哄传一时，我当时耳食之余，还曾加以讥笑。到

现在自己研究了一番过来，觉得他的识见是有先见之明。在现在新的史料尚未充足之前，他的论辨自然并未能成为定论，不过在旧史料中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公允地说，这种评价是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学术界的一种正确的态度的。

从《古史辨》一至八册看，作为古史辨学派而论，书内完全赞同或基本接受疑古辨伪观点的，可划为这一学派。书内也编入反对派的文章，自然不应视为古史辨学派。即使古史辨学派内部的论点，也不尽完全一致，并多有争论。就这个学派讲，是在探讨一个学术中心问题时，自然形成的，并没有一定的组织形式，没有学会章程，没有指定首领，没有定期会议的规定。学派成员散居海内外，没有固定的联系；师生同学之间的书信联系与学术切磋，则另当别论。以顾颉刚为古史辨学派之创始人及古史辨学派之大纛，却是被学界所公认的。就其弟子而言，在抗战前的十一年中，顾在中山大学、燕京大学、北平研究院、禹贡学会、通俗读物社等部门造就了一批专家学者，如陈槃、何定生、白寿彝、冯家升、谭其骧、朱士嘉、徐文珊、张维华、侯仁之、杨向奎、史念海、吴世昌、吴丰培、童书业等，不少人至今尚活跃于学术界。

说到古史辨学派之学术渊源，顾颉刚曾自述道：“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樵)、姚(际恒)、崔(东壁)三人的思想，从近的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二人的启发和帮助。”其主要来源为此，其次则是清乾嘉考据学的继续和发展。顾先生尤其推崇王国维，“数十年来，大家都知道我和胡适的来往甚密，受胡适的影响很大，而不知我内心对王国维的钦敬和治学上所受影响之深”。最后，还应看到道咸以来经世致用思想对顾先生的影响，他所极重视研究边疆地理，即源于此。足见这个学派之渊远而流长了。

于 1993 年在顾颉刚先生诞辰百年时，在苏州曾举办了纪念性学术讨论会，胡绳发表了《顾颉刚古史辨学说的历史价值》的讲话，他说他并不是全面评价“古史辨”，只是想提出一个问题：“在学术界里马克思主义对非马克思主义采取什么态度。有一种态度，是只有马克思主义正确，对非马克思主义只能批判、反对、驳斥。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文革’曾把这种态度发展到极点。顾先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工作有价值，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应该重视的。”余以为，此可作为审视非马克思主义学派之有意义的言论。

“ 不苟异亦不苟同 ”

——记侯外庐及其思想史学派

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翦(伯赞)、吕(振羽)并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在五老中,生卒年是这样的:郭 1892—1978、范 1893—1969,侯 1903—1987,翦 1898—1969,吕 1900—1980;从中看出:不仅侯外庐年龄最小,而且作古之时间为最后。在外庐先生逝世后,历史学界于 1988 年 11 月举行过纪念侯外庐学术讨论会。在会上有不少学者提出加强史学界五老的研究的倡议,还有人建议要关注侯外庐学派的发展,并呼吁建立侯外庐研究会。由此可见侯外庐学术成就及其学术思想的影响。

1986 年 4 月 21 日外老赠我《韧的追求》一书,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未及拜读,只是一般翻阅。近来认真读之,才领悟到它的学术价值,在于著者对自己在学术研究中逐渐形成的一个学派所作的客观而系统的叙述。所谓学派,可理解为学术观点的基本相近,一同讲学、研究、编著,再加上师生传授从事学术活动的人们和流派。作为一个学派,侯外庐学派是具备了基本特征和基本风格的:

首先,有着独特的完整的学术体系。在长达半个多世纪中,著述了一系列著作,在社会史方面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及大量论著,思想史方面有《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中国思想通史》(多卷本)、《宋明理学史》及众多论著。在学术观点上,这个学派有着自己的独立见解,主要是:按照中国社会发展史的阶段,叙述各个社会的思想发展;根据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分析中国古代的“早熟”文明;从封建土地国有制,认识中国封建思想定于一尊的经济基础;从地主阶级不同的矛盾利害,寻求说明不同阶级对立思想的矛盾斗争原因;发掘中国思想史上唯物主义和反正宗儒学的“异端”思想的优良传统;强调以法典作为论证奴隶制与封建制分界的标志。外老在列举以上观点后说:“以上几点,是我们经过几十年长期研究得到的。如果说,上述观点和方法足以构成作为一个学派的体系,那么,我们就应该把这个体系比较完整地叙述出来。”

其次,有着一批有学术造诣的学术传人。侯外庐是这个学派的创立者,杜国庠是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核心人物有赵纪彬、邱汉生、陈家康、白寿彝、杨荣国、杨向奎等,“诸青”学人有杨超、张岂之、林英、何兆武、李学勤等,以及这个学派的继承者们。任继愈先生指出:“这个学派的形成,不是自封的,是得到了同行公认的。侯外庐先生与他的同伴们合编的《中国思想通史》,这是解放后系统地讲思想史的唯一的一部书。这部书影响是很大的。侯先生在集体编书过程中带出一批人才。当年的‘诸青’,是一些青年,现在都成为骨干、顶梁柱,是学科的带头人了。编书有言传身教的作用,故能有效地带出一批人来。这点,侯外庐先生是成功的。”当然作为一个学派,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划然一律。即使在思想史研究上基本一致的,在社会史研究上也未必一致,其重要特色就在于“众家之长得以荟萃”。

再者,形成了一个学术风格及学术精神。在纪念侯外庐学术讨论会上,来自中外的二百多位学者认为,这个学派已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学风,那就是:(1)开拓精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在社会史著作中讲思想史,在思想史著作中讲社会史;通过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的研究,拓展史学研究领域。(2)批判精神:外老常说,“搞学问和干革命一样,要经常

保持批判的精神”，纵贯这个学派的所有著作及其所坚持的学术观点，其科学的批判精神一直沿袭和保持着，而且其批判态度与方法与一些人的所谓批判是无缘的。(3)求实精神：外老的求实精神，不仅确实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之新，求中国社会之实，而且承续了乾嘉学派的治学传统。(4)时代精神：外老在研究中所体现的时代精神，不是单纯为政治服务，而是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为了民族的生存，国家的兴旺而迸发出来的一种社会使命感。(5)“韧”的精神：外老的回忆录题名为《韧的追求》，与他之一生的经历及其学术探索是名符其实的。为翻译《资本论》，十年百折不挠；为探索学术真理，敢于坚持己见，即使遇险而不变初衷。外老忆及“40年代，赵纪彬同志在重庆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时，有许多褒誉之辞我受之有愧，唯有一句，他说我‘对于一切成就，不苟异亦不苟同’，我敢自认符合实际”。(6)集体主义精神：这个学派有着优良的群体意识，外庐先生则善于发挥集体的智慧，使侯外庐学派的群体意识更加突出而有其特色。

侯外庐先生是山西省平遥县人。也许是出于同乡的缘故，他对于晋省的学术事业发展倍加关心，在我与他的接触中感觉尤其明显。外老经过“文革”的摧残，身患了偏瘫症，行动不便，说话不清，本当一心一意养病，但却仍然耕耘不辍，到晚年还主编了一百三十余万字的《宋明理学史》一著的出版。我认识外庐先生，一是《晋阳学刊》进行傅山研究，征求他的意见；二是出版《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丛书，征约他的自传。他一听说是山西老家来的，可以看出，他的心情是非常高兴的。说到他的自传，在我的请求下，他欣然允诺。自传经他口述，由助手李经元整理。在自传整理好后，外老还亲自审阅，亲笔写上：外庐阅。病中口述！在自传的开头，这样写道：“《晋阳学刊》高增德同志嘱我为《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作一自传，虽则我没有值得可写，既蒙盛情相约，辞之不恭，故略述自己多年从事科学研究的经历，聊以备考。”据知，以后又有多处向他约传，他都未诺，只建议转载或摘录《晋阳学刊》材料即可也。其实，我当初约外老写传时，他总是说，没有什么值得可写。可是，在我说明了写学术自传，着重总结从事科学研究的经历及其学术思想时，他才在“既蒙盛情相约，辞之不恭”的情况下答应的。但是，他既然诺许了，就毫不迟延了，很快就完成了，并寄来了。

外庐先生是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但他平易近人，毫无盛气凌人之势。1984年是傅山逝世三百周年，我们计划召开傅山学术讨论会。由我负责会议的筹备工作，曾同尹协理两次进京邀请学者和落实有关事项。虽知外老患重病，但是基于他对傅山研究的学术造诣及其独到见解，我们还是试探着去打扰他了。这次是通过历史所思想史研究室的黄宣民先生转达我们的要求的：一是计划编辑出版《傅山研究文集》，即把解放后研究傅山思想的论文，选其中优秀者合于一集，请外老为是书题签；二是外老虽不便出席傅山学术讨论会，但可否为会议写一封信或写一点文字？当把我们的想法告知外老后，他竟一点折扣未打地全部满足了。于3月24日为论文集写了《傅山研究文集》和《傅山研究》两种题签；于8月14日撰述了2000字的文章《发扬傅山的优良学术传统——纪念傅山逝世三百周年》，为会议大增光辉，使我们倍受教益。

由于我与学者的较多交往，所以在他们中的长者作古人后，常常是我最早收到讣告，以便归入学林档案。在我接到外老与世长辞的不幸消息后，曾使我郁结愁怀、悲绪难控，陷入痛楚追忆之中，曾写述《我所崇敬的学者—

—追忆侯外庐先生》的悼念文章，刊载于 1987 年的《太原日报》上。今天虽又为文，仍然情思未尽也。

1992 年 5 月

关于学术争鸣的几个问题

—

理论、学术问题上不同意见的讨论乃至争论，是发展理论、繁荣学术、探究真理的必经途径。人们在理论探讨和学术研究过程中，由于研究条件的不同，掌握资料的不同，探索角度的不同，阅历经验的不同以及研究方法的不同，必然会形成不同的认识和不同的结论，这就产生了矛盾，就必然要引起理论上、学术上的是非之争。欧洲古代哲学家很早以前就已经懂得，通过辩论揭露矛盾并克服这些矛盾，是发现真理的最好方法。他们把这种方法叫作 *dialectic*，意思就是进行谈话和论战。中国古代思想家也早已知道这个道理，《逸周书》中有“疑意以两，平两以参”之说；《墨子》中有“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之论；王充主张“两刃相割，利钝乃知；两论相订，是非乃见”。班固认为“其言虽殊，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他们所揭示的都是通过争论可以互相启迪、共同提高的道理，指出了学术争论是解决理论分歧的正确途径。

争论之所以必要，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理论上、科学上的任何创造和突破，除了需要矢志不渝的攀登，深入不倦的探索，良师益友的援助之外，还需要“敌对”意见的帮助。当某个学术观点受到非议和责难时，有些人往往会觉得不愉快，岂不知这种非议和责难正是成功的一种前提。蒲鲁东曾经写了《贫困的哲学》，为批判这本充满错误观点的书，马克思发表了《哲学的贫困》。恩格斯在为《哲学的贫困》写的序言中，认为《贫困的哲学》一书给予了马克思把自己的观点同蒲鲁东的见解对立起来加以发挥的机会。显然没有《贫困的哲学》的出现，也就不会有《哲学的贫困》的产生。恩格斯在总结费尔巴哈为什么没有“前进”的原因时，也阐述了同样的思想。他指出“在社会领域内，正是费尔巴哈本人没有‘前进’，没有超过自己在1840年或1844年的观点，这仍旧主要是由于他的孤寂生活，这种生活迫使这位比其他任何哲学家都更爱好社交的哲学家从他的孤寂的头脑中，而不是从和他才智相当的人们的友好或敌对的接触中得出自己的思想”。这说明，人们的认识所以能逐步完善，接近真理，正是通过与各种不同意见的接触中实现的，而与“敌对”意见的争论，正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

争论之所以必要，还在于理论、学术研究是一种探索性、创造性的艰巨劳动。凡是要在理论上、学术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都需要人们思想解放，善于独立思考，对名人的理论和传统的观念有大胆怀疑、敢于批判的精神。马克思主义主张人们服从真理，而绝不提倡盲目地服从权威。在认识世界的问题上，在科学问题上，在理论、学术研究上，只能以是否符合客观真理为标准，而不能用别的什么东西为标准，例如以权力大小、地位高低、影响多大或是否是名人和传统见解为标准。中世纪的法国哲学家阿伯拉尔在反对当时的基督信仰主义和教会霸权主义时，就提倡大胆的怀疑精神。他的一本名著叫《是与否》，在书中提出了一百五十八个问题，对上帝、神都提出了责难。他主张“在学问上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坚持的和经常的怀疑”。他说读基督教的著作“都要有充分的自由进行批判，

而没有不加怀疑地接受的义务，否则一切研究的道路都要被阻塞”。他断言：“怀疑把我们引向研究，研究使我们认识真理”；“由于怀疑，我们就验证，由于验证，我们就获得真理。”他这个“怀疑——验证——真理”的公式，为后来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和唯理论提供了思想原则。阿伯拉尔在基督教神学占统治地位、教义不容怀疑和动摇的当时，敢于这样大胆地提倡怀疑精神，实为难能可贵！当然，我们提倡在理论上、学术上的怀疑精神，并非不加分析地怀疑一切，而是主张有分析的科学的怀疑。这种精神的确立，正是立足于“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的，如果停止了，对现成的结论满足了，对名人的和传统的东西不需要研讨了，坐在已有的水平上就够了，那还有什么前进和发展可言呢！？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它是研究发展、变化的科学，不是形而上学的封闭体系，不承认什么终极真理。为此，我们必须否定那些过了时的、不符合当前实际情况的结论，用新的、更加正确的结论去补充和代替它们。没有否定，也就不可能有发展。

争论之所以必要，还因为学问之道，浩如烟海，无论怎样杰出的人物，怎样知识渊博的学者，也都不可能穷尽真理。恩格斯指出：“真理和谬误、善和恶、同一和差别、必然和偶然之间的对立……只有相对的意义；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以前才能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所以会如此，这是和人们“所获得的一切知识必然具有的局限性”和“他们在获得知识时所处的环境对这些知识的制约性”相关联的。科学的结论，在争论中才会被发现和肯定；科学的发展，通过无数人的发明创造，集众人之思而不断充实完善。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总要有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具体到对一个理论观点、一个学术见解、一本科学著作来说，往往也要经过反复的研究和深入的探讨，其中包括与别人进行讨论和争论，才能达到比较正确的认识。对于比较复杂的事物，更需要长时间地反复多次地商榷、争鸣、探讨和辨析，才能从复杂的事实中清理出科学的结论来。那种认为认识可以一次完成，因而没有分歧也无需争鸣的看法，是违反认识的辩证法的。总结人类认识的历史，我们看到，人们多少次好不容易获得的一个正确认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又暴露出它的片面性。于是人们又需继续进行探求，以便修正和补充都已经片面和不正确的认识。作为一个从事理论研究、学术研究的科学工作者，不应相信什么永恒真理和我正确，而应该不懈地研究和探讨，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善于向各种人学习，包括向不见经传的人学习，以便修正错误，使自己的认识进一步接近真理。

毛泽东同志在讲到争论的必要性时指出：“各种不同意见辩证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词》中也指出：“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虚心倾听各方面的批评，接受有益的意见，常常是艺术家不断进步、不断提高的动力。”这些论述无疑是符合理论探讨、学术研究的发展规律的，是繁荣学术、发展理论的正确方针。

二

理论、学术的发展需要不同意见的争论，这个道理在原则上人们是知道

的，但是一涉及到实际情况问题就来了。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流毒尚未肃清，社会主义民主的风尚亦未很好养成，封建特权观念的烙印在某些方面还相当之深，一些同志对于正常的理论探讨、学术争论和科学批判，仍感到不大习惯，喜欢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对待理论问题和学术问题。那种在发生分歧和争论时，不是平等待人，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而是自以为身居要津，高人一等，因而盛气凌人的事情，还时有所闻；甚至那种凭借权力和地位压制不同意见的现象，也还并未完全绝迹。总之，在理论探讨、学术争论和科学批判问题上，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需要纠正和改进的问题。

既然是理论探讨、学术争论和科学批判，其方式就应当包括批评和反批评，或者叫做批判和反批判，当然讨论式的商榷也是一种方式。但是我们有些人却不习惯于批判和反批判的方式，一谈到批判就意味着打倒，一听到批判就“谈虎色变”。究其根源，这仍然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恶果。这里牵涉到一个关于“批判”这一概念的理解问题。科学领域中的批判，就其本来意义讲，就是探讨、追求、辨析、研究，就是扬弃。没有批判的研究，不能叫做研究；没有批判的探讨，无法追求到真理；没有批判的辨析，难以辨明是非真伪；没有批判的继承，根本谈不上创造；没有批判的扬弃，根本不能叫做扬弃。辩证运动的规律在思想领域中表现为不同观点的相互论战，互相批判，互相否定。没有批判原则在科学研究中的贯彻和运用，就根本不会有学术的繁荣和理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这方面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们对于论敌的批判，目的都在于辨明真理，而并不是为着把对方从人身上整垮、整死。人们熟知的恩格斯与杜林的论战，在杜林败下阵来，被柏林大学撤了讲师职务的时候，恩格斯并不因他是自己的论敌而企图置之死地，相反地却批评柏林大学不应当采取此种措施。正因为他们把批判当作辨明真理、发展理论的必要途径，所以他们也就把批判当作必不可少的手段和武器。打开马克思、恩格斯乃至达尔文、康德等伟大人物的著作就可以看到，他们在科学问题是那样经常地进行批判，那样习惯于进行理论上的论争。仅一部《资本论》，其中批判了多少部著作？在多少个学术问题上同论敌展开过批判式的探讨？现在仍需要为批判正名，去除“四人帮”加进去的恶意杂质，恢复批判一词的科学意义，明确科学批判的正确目的，使我们习惯于学术上的争论，以共同促进科学文化的繁荣发展。在理论、学术界应当提倡在真理面前一律平等的精神，既允许自己批评别人，也允许别人批评自己，把批判与反批判当作理论、学术题内应有之事。

现在有一种有碍理论、学术发展的风气，就是不大愿意进行学术争论，不敢进行学术观点的交锋。究其具体原因，一则因师承关系或同窗关系，明知自己的导师和好友在一些观点上不正确、不科学，也不愿意与之争论长短，担心伤了和气，破坏友谊，疏远感情；二则因某某是名家，是权威，虽然知道他们有些见解是错误的或片面的，也不敢公开同他们明辨是非，甚怕妨碍名家声誉，得罪权威；三则在理论、学术争论时，既不敢旗帜鲜明，更不敢指名道姓，就像在那里演京剧《三岔口》，鸣则鸣矣，但不知道与谁争论，或羞羞答答，或拐弯抹角，很难把问题说清说透。以上这种情况说明了在理论探讨和学术研究中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的批评和反批评的争论空气，这种不正常的局面不打开，要想在理论上、学术上有新的突破和大的进展可谓难矣哉！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但也并非在所有问题上看法都完全一致。他们之间有时不仅有争论，而且一争论就是好几天，从未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马克思逝世前的十年中，恩格斯几乎每天都来找马克思，探讨许多问题。他们常常一起外出散步，两人一前一后走来走去，半晌一言不发，有时候又各自陈述自己的想法，直到半小时后，大家都停下来，相互承认双方所想的问题毫无共同之处，于是，俩人就放声大笑起来。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中，记载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一本书的评价问题产生争论的情况。马克思于1866年8月7日给恩格斯写信认为：“有一本很好的书，一旦我做好必要的摘记就寄给你……这就是1865年巴黎出版的比·特雷莫的著作《人类和其他生物的起源和变异》。尽管我发现了一些缺点，但这本书比起达尔文来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进步。”

10月2日，恩格斯给马克思回信说，这本书“我还没有读完，但是可以断定，光是下面这一点就说明他这一套学说是空洞的：他不懂地质学，也不会作最起码的历史文献批判。”“这本书没有任何价值，是与一切事实相矛盾的纯粹的虚构；作者所举的每个证据，都需要再用新的证据来加以证实。”

10月3日，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这样说：“你的这种评语，在居维叶的反对物种变异说的《论地球表面的灾变》一书中可以几乎一字不差地找到。……但是这并不妨碍居维叶是错误的，而正确的表述新思想的人，尽管居维叶是大地质学家，自然科学家中少有的历史文献批评家。”

10月5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则说，“关于特雷莫。上次给你写信的时候，我才读了全书的三分之一，而且是最糟的三分之一(开头)。第二个三分之一是对各学派的批评，好得多；最后的三分之一是结论，又很糟。作者的功绩是：他比前人在更大程度上强调了‘土壤’对人种以及种的形成的影响，他比他的前辈发挥了更正确的意见(虽然在我看来仍很片面)。”对于马克思指出的居维叶的错误，恩格斯回答道：“不过那时这个问题与地质学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不能把恩格斯对特雷莫的评语同居维叶的错误等同起来。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明确指出：“居维叶关于地球经历多次革命的理论在词句上是革命的，而在实质上是反动的。”

10月9日，马克思给路·库格曼的信中说：“我还要向您推荐特雷莫的《论生物的起源等等》。这本书虽然写得很粗糙，充满了地质学上的错误，历史文献方面的批评也很差，但是总的说来，它还是比达尔文前进了一步。”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这本书的争论看出，即使是在无产阶级内部甚至在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也不是在所有问题上意见都是一致的。还看出两位导师从完全相反的评价开始，通过辩论，而且是相当尖锐但却友好的辩论，对于特雷莫这本书的毛病，取得了比较接近恩格斯的看法，在另外有些问题上，又各有自己的保留。他们无论在争论的态度上，还是在争论的方式上，都是我们自愧不如的。这就是尊重客观事实，实事求是。他们在争论中，并不是从自以为是的成见出发，而是具体地分析该书的论点和论据，并和自己所掌握的事实结合起来研究，互相吸收对方的正确意见，改正自己的不正确的意见，既有马克思对恩格斯尖锐的批评，又有恩格斯坦率的自我批评和对马克思的反批评。这种严肃的科学态度，在真理面前平等的、同志式的有理有据和有礼有节的辩论方式，以诚相待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风格，都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争论和友谊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并存的。友谊应该发展，由于争论，

进而会得到巩固。友谊因为争论在学业上互相吸收，取长补短而得到补充和长进，通过争论又考验了友谊而更加焕发光彩。争论是走向真理的道路，只要争论的双方，目的都在于探讨理论、研究学术和追求真理，只要争论的双方完全把自己放在平等的同志式的位置上，只要争论的双方“各自扬弃其片面性，则它们的统一才不致偏了一面”，即使双方争论得脸红脖子粗，也不致于伤害感情，更不会破坏关系；即使直呼其名的批评和反批评，指名道姓地争论，针锋相对地交锋，也只能会消除误会，增进友谊和团结。

尖锐的理论探讨和学术争论，不仅是一种方式方法，更重要的是一种风格。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孙冶方，生前一再提倡在理论批评和学术争论中公开地指名道姓，他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战斗风格。他自己和经济学家于光远在学术争论中就是这样直呼其名地互相批评对方论点的。这已经是理论学术界的一段佳话了。孙冶方逝世后，在孙冶方纪念会上，大家除了钦佩他的理论勇气外，同时也盛赞他在对待学术争论问题上的崇高风范。孙冶方不仅一贯主张百家争鸣，而且主张“求异存同”，鼓励把不同意见拿出来争辩。经济学家薛暮桥讲到他和孙冶方的争论时说：我过去同他在某些问题上经常有不同意见，我发表文章以前，常常给冶方同志看，他提出不同意见，而且申明要保留批判权；虽然我们在某些问题上经常争论，但并不伤害我们之间的深厚长远的友谊。孙冶方就是对于哗众取宠任意批评他的同志，也从不记仇，他相信真理是经得起任何检验的。另一位经济学家马洪在讲到学风时，特别称道孙冶方的马克思主义态度。好些同志在经济学术观点上同冶方是有分歧的，但他从来都主张摆在桌面上来进行讨论。如果可以公开争论的话，他主张在报刊上指名进行商榷，进行批评。人家和他商榷，或批评了他，他并不认为就是他的仇敌。但他从来不在理论原则问题上让步，如果他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是决不妥协的。他对于同他意见不同或批评过他的同志，在同志关系上、私人关系上，都是非常亲切的，并与之长期在一个单位融洽地共事。

理论、学术上的争论，需要具有宏通豁达的襟怀，谦虚谨慎的态度，超颖清高的境界。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有高尚风格的学术争论。具体来说，这种风格应当表现于：坚持己见，务求持之有故；批评别人，务求充分说理；听取别人的批评，务求虚心诚恳；争论的双方都应当不把学术争论引到学术以外的范围去。真理不论谁发现，都是大家共同的财富；而错误的东西只要被认识，也就等于为他人提供了借鉴。所以，在科学上，发现错误和发现真理一样是有价值的。大家抱着探求真理的态度，通过充分的争论，达到互相了解，互相启迪，共同提高的目的，就既能促进学术理论的发展，又能增进相互之间的团结和友谊。

说到与名家、权威的争论问题，也有几点似值得注意。既然是名家、权威，一定是在某个理论、学术问题上具有较高造诣和较大贡献的学者。但是今日之名家、权威，必定是从昨日之非名家、非权威发展而来的。在他们发展的道路上，肯定受到过昨日之名家、权威的培养和提携，而且也曾经同昨日之名家、权威争论过，并从争论中获得了益处，得到了提高，成为今日之名家、权威。所谓名家、权威，应当不仅在理论、学术的造诣上有威望，而且在治学作风和治学方法上，包括在对待理论、学术争论方面也应当有气度，具有勇于追求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人们对于名家和权威，是应当尊重和听取他们的意见的，但是决不当迷信和盲从。对于名家和权威所说的话，

也要敢于独立思考，加以分析；有时甚至应大胆怀疑，反复探索，提出不同的意见。只有这样，真理才能愈辩愈明，人类的文明和智慧才能越来越发展。如果有哪位名家和权威，不欢迎批评，害怕别人与他争论，或者一听到他的学生和无名之辈同他进行商榷辩论，就颇为不满，产生反感，就感情冲动，火冒三丈，或者做出一种居高临下、不屑一顾的冷漠态度，恐怕都会有失名家和权威的气度，更有失先辈对后辈所肩负的职责和义务。

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范文澜，不仅在历史学领域是我们开国一代的大师，而且在贯彻百家争鸣方针，帮助人们正确地对待权威方面，也堪称模范。《中国通史简编》是较早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叙述中国历史的著作，《中国近代史》(上)是一部研究这段历史的开创性著作。可以说，范文澜在历史学领域是当之无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权威。但是，范老从不以权威自居，更不以权威压人，总是严格地按百家争鸣的原则办事。他主张，不论对经典著作，还是对权威的意见，都应当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合理的接受，不合理的放弃。他的《中国通史简编》在 50 年代出了几种版本，有着一定的影响，同时也有一些批评意见。面对批评，范老抱欢迎态度，并且从两个主要方面诚恳地检讨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一是书中有些地方的叙述有非历史主义观点，二是书中在叙述方法上缺乏分析、头绪紊乱。进而对秦始皇、刘彻、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等封建统治的评价，重新作了修正补充，同时对书中因“借古说今”而损害了历史观点的错误，也作了自我批评。他在讲到历史研究的叙述方法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法应用在历史研究上，如此复杂而繁重，丝毫没有其他轻而易举的便宜方法可以代替。旧本《中国通史简编》却采用了一个便宜方法来代替它，那就是现象罗列法，把互相有机联系着的统一的整体，排列成许多各个孤立的现象。……名为历史，实际只是一本史料汇编。”在自我批评的同时，还重述了该书必须坚持的五个方面。从以上可以看到，范老对所有那些批评，始终抱着严肃认真的态度，勇于自我批评，勇于接受别人的批评，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纠正错误、坚持真理、不疲倦地推进学术前进的科学态度。

记得在 60 年代初，著名历史学家吴晗曾写了一篇题为《争鸣的风度》的短文，说争鸣应该：“第一大家都平等，有权讲道理；第二道理要科学，能够说服人；第三共同的语言，一致的口径；第四道理要讲透，态度要正确。”我想这种对风度的要求，不论是对“无名之辈”，还是对名家和权威学者，都应当是同样适用的。

三

列宁说：“社会主义的刊物应当进行论战。”作为学术性刊物的生命力，并不在于它在所有学术性问题上的议论一律，看法一致，而在于它既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政治方向，又有丰富多采的内容和实事求是、各抒己见的学术见解。作为学术刊物的编辑人员，应当懂得自己刊物在发展理论和繁荣学术方面所肩负的重大责任，应当通过各种努力去促进理论探讨、学术争论的活跃，多发表一些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性文章；学术刊物的编辑当然应该有自己的学术观点和看法，但是在编发争论文章时却需要有兼容并包的精神，不论哪派的观点都可有一席之地，不论所发文章的见解与自己意见如何相左，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要让它在自己所耕耘的园地里开放，千万不可以自己的好恶而相排斥；学术刊物的编辑同样需要有胆识，既不可轻视

“无名之辈”的小人物，更不必跟在名家权威后边去捧场；刊物上该发表什么和该发表什么，应该有科学的原则，而不需要看名家权威的态度而取舍。对于提出新的观点、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发掘新的材料的文章，对于重要学术理论问题的争鸣性的文章，应该提供阵地优先刊载。这样，学术刊物就会大大有助于理论的发展、学术的繁荣和科学的昌盛。

1985年3月

注：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1卷，第567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7页，第40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6页。 《邓小平文选》第182、184页。

黑格尔：《小逻辑》第425页。

转引自《北京晚报》1983年5月7日。

社会科学研究及其成败功过

社会科学需要更加繁荣，这既是人们的共同愿望，也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迫切要求。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既有社会科学事业的领导体制问题，也有对社会科学在四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问题；既有社会科学事业自身弊端的克服问题，也有一个按照社会科学本身的规律来对待社会科学的问题。比如怎样对待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成功和失败，应该在社会科学研究问题上持一种什么样的功过观，就是一个值得我们领导机关和社会舆论重视的问题，它直接影响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

—

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既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也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既会有成功，也会有失败，这本来是正常的事、常有的事。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却有一种习惯：似乎成功了是理所当然之事，而失败了则认为是不可饶恕之举，于是对于得出正确结论或是成功者给以殊荣进而受到高度重视，对于得出错误结论或是失败者不予理采，甚至受到批判也是罪有应得。在这样的习惯环境中，人们自然把前者尊为有功之臣，而把后者视为有过之人。岂不知这种成败功过观，是存在着极大的片面性的。

先以自然科学为例：在天文学中有“地球中心说”和“太阳中心说”，二者的错误与正确、失败与成功应该说是清楚的，然而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在哥白尼时代，天文学中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这种学说用数学的方法，用单纯的匀速圆周运动的配合，来表示观测到的行星的运动，提出了一个地球为不动中心的太阳系构造学说。这个学说认为，宇宙是有限的，全部宇宙被封闭在第八层(恒星天空)的甲壳内，地球位于特殊的中心位置。除地球以外的其他天体(太阳、月亮、行星)都具有严格的正圆形状，表面绝对光洁，循着最完善的几何形状——圆周轨道，天然地、永恒地循环运动。这是古代人对天体运动的一种解释，它与当时的观察资料相符合，与人们的经验相一致，所以为人们所接受，一直流传了一千多年。到了中世纪后期，宗教利用了“地心说”，强说地球居于宇宙中心，证明了上帝的智慧，上帝派人到地上来主宰万物，就让人类的住所(地球)处于宇宙的中心。这个学说所以被宗教利用，主要是它符合了上帝创世说的需要，为基督教教义提供了根据。

随着天文观测的进步和数学的发展，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着力钻研了天文学、数学、希腊语和柏拉图的著作，在著名天文学家诺瓦腊的影响以及希腊古典著作的启发下，逐渐形成了太阳中心说的思想。1506年他回到国内，一面完善其学说，一面进行天文观测，用观测和计算对学说加以核对和修正。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写成了六卷本的《天体运行论》，总结和阐述了太阳中心说。就这样纠正了托勒密的错误，摧毁了“创世说”，打击了宗教势力，对自然科学的发展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说“地心说”就毫无价值而“日心说”就完美无缺呢？不能这么说。要知道，人类对天体的认识形成一个学说(假说)，是从托勒密开始的。这个假说也是对前人经验的总结。“地心说”作为那个时代生产水平和科技水平的产物和托勒密作为那个时代科学史上的有贡献者，理

应受到历史的肯定，从天文学这门科学的建立来说，他是开了先河的。“日心说”的建立也不是同托勒密毫无关系，“日心说”的某些观测数据就是从“地心说”中来的，尤其是圆形轨道的结论，就是从托勒密那里接受过来的。说到“日心说”，也有着不可避免的弱点：由于哥白尼完全从数学的观点看问题，他所提供的只是一个几何上简单而完美的宇宙模型，并未回答由于地球运动在力学上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他也并没有超出天体沿圆形轨道作匀速运动的传统观念，后来经过了意大利科学家布鲁诺、伽利略和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的补充与发展，才使得“太阳中心说”更趋完整和科学化。

由此看到，怎样对待科学研究中的正确与错误、成功与失败实在是个复杂问题。更不应该把错误者、失败者作为批判的对象，所需要的倒是应该分析错误和失败的原因，总结科学研究中的经验教训。更何况错误是正确的先导，失败乃成功之母，从“日心说”在“地心说”的基础上产生，不是充分地证明了这个道理吗？

再以社会科学为例：在经济学研究中，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早在 1953 年就发现了我国人口增长过快，每年要增长 22‰以上，甚至可能达到 30‰，每年净增人口一千三百万之多，于是他提出了控制人口的主张。1955 年他据浙江、上海等地的调查，写了一份题为《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发言稿，由于有人认为他在宣传马尔萨斯的一套，他把稿子抽了回来，未能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提出。到 1957 年 3 月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马寅初再一次就“控制人口”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同年 4 月，他又在北京大学就人口问题发表了演讲，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整理成《新人口论》，作为一项提案，提交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并在 7 月 5 日《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马寅初认为，解决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必须从人口和科学研究两个方面着手。他引用大量调查数字说明中国人口增加的速度的确是过快了，如此发展下去，五十年后中国将是二十六亿人，因此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同时，必须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的增长。他警告：“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益形棘手，愈难解决。”政府对人口问题若不设法控制，“难免农民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和不为失望的不满”。

实践和历史都证明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正确的，应该列入成功的行列，于国家人民是很重要的贡献，本应受到褒奖。但是，在那个年月他却受到了批判和谴责，把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把正确的颠倒为错误的，把真理当作谬论，把成功反作为失败，结果是批了一个马寅初，增加了几亿人的沉重负担。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的 1979 年 9 月才作出了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决定，肯定了他在控制人口问题上的贡献，为其《新人口论》恢复了名誉。

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类似的问题何止错批一个马寅初？对《武训传》、对俞平伯、对胡风、对孙冶方、对杨献珍等的批判，不也是如此吗？这里并不是说，被批者的观点中无懈可击，但是当时却是按毒草和反动、按错误和谬论来批判的，要以成败功过论当时他们是有罪的、是被打倒的失败者。但是，事实证明了当时的判断和否定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了他们的研究是有创见、有价值的，于社会科学的发展是有贡献的。这就是说，评价科学研究及其成果的成败功过，是个复杂问题，来不得简单武断。更何况，在科学研究上所涉及到的多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学术性和科学性很强，并不是谁作一个结论就能解决的；还有些理论问题，非有多年的研究和各种

知识的素养认识不了它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如果以急功近利的观点看问题，就会看不到它的长远的战略的价值，而作出错误的否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对待孙冶方的经济理论不就是这样做的吗？孙冶方本来是我国经济学界对唯意志论和自然经济论的最早批判者，是对旧的国民经济管理体制实行全面改革的最早倡导者，是创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体系的积极探索者。但是，他的具有独到见解的经济观点和改革主张，却被看作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受到批判，孙冶方也被戴上“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修正主义”的帽子而受到围攻、批斗。当我们认识和理解了他的理论和主张时，已经二十多年过去了，是何等大的代价呀？科学探索观察事物是很深很远的，怎么能以识浅短见的原则去衡量它的成败功过呢？

二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我们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功过成败观呢？我以为：既然是科学研究，就应该允许有失误，这已是众所周知的道理。但是，不知何时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观念，似乎自然科学研究出现失误，是不足为奇的，即失败六百零五次也是允许的，可是说到社会科学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却是错不得的。这种状况，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从而也使社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走向了万马齐喑和濒于枯竭的局面。君不见被批判者头上戴着一大堆帽子，脑后拖着一大把辫子，浑身上下束着那么多紧箍咒，不仅无权从事研究，甚至剥夺了说话的权利；由此而来，那些头上没有帽子、脑后没有辫子和身上没有背黑锅者，鉴于别人的经验教训，忧心忡忡地过日子，哪有什么勇气进行科学研究呢？哪敢说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呢？在这样的情况下，追求真理的风气怎么可能形成呢？科学的结论怎样取得？社会科学及马克思主义又如何能繁荣和发展呢？当然以上情况，说的是过去年代，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种局面有了极大的改观，但是能否说长期形成的僵化观念和消极影响很快就能消除呢？恐怕不能这么说。这种情况，告诉人们，要发展和繁荣社会科学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社会科学及其研究中的成败问题，必须要有一个适合它发展的社会环境，必须客观地允许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失误和对错误的修正。要知道，科学研究和理论探讨中的正确与错误、成功与失败，对科学和理论的发展都是有价值的，轻视科学研究中的失误的作用是错误的。

从人类精神生产的特点和真理发展的规律来看，客观世界是极其复杂的，每个人的认识都是具体的认识，在认识过程中常常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对真理一次就认识，不可能一次研究就把握事物的规律，不可能一次探讨就得出科学的结论。这就是说，科学的任务是追求真理，科学研究需要进行创造性的探索，创造性的东西毕竟是前无古人的，或者是要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见解。任何科学工作者，不论他多么才华出众，多么杰出，都不可能保证不犯错误和没有失败。

还有一种情况，在科学研究中正确的东西，一开始往往被当作错误的；而本来是错误的东西，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却长期被当成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己之好恶轻率地下结论，从而中断其辩论和争鸣，停止其研究，那就会把正确的当成错误的，把错误的当成正确的，以至于长久地迷信下去。所以对于科学研究武断地作结论，而且对于自认为错误的大加讨伐，

实在不是一个聪明的办法。这也就是说，在科学研究中，可怕的并非犯错误，真正可怕的是怕犯错误和不允许有失误。很明显，怕犯错误的必定是不敢追求真理者，或者是明哲保身、萎靡不振、毫无创新精神者。一个社会如果不允许人家犯错误和改正错误，势必会造成一种噤若寒蝉的恐惧心理。这样的社会要使人们真正“无所畏惧地追求真理”，形成一个有生气有活力的局面；要出现一批有作为的科学家和有价值的科学成果是不可能的。

在科学研究和理论探讨中，尤其在新的历史时代，要有新的理论探索和研究，与之相应的应当提倡一种新的成败功过观。一定要提倡自由探索，自由讨论，自由辩论，自由批评和自由反批评；一定要提倡说真话，说实话，使人们无所畏惧地追求真理、坚持真理。只要是有新意、有创建、有建树的研究及其成果，即便是不够完善、不够成熟，甚或有错误，都应该积极地鼓励和支持；只要是敢于探索，敢于思考，追求真理的研究及其成果，即便是不适合领导意图和口味，或者是还不为我们所理解和接受，都应该冷静严肃地研究和对待；只要是探索新问题，探索社会实际及其客观规律的研究和成果，即便是得出了错误的结论，甚至是完全失败了，都应该认真地分析其原因，总结出经验教训，促使其再作研究，以致取得成功。以上的几种情况，不能认为就是有过，应该说比那种千篇一律的人云亦云、缺乏创见的亦步亦趋，要有价值、有贡献。只有如此，才能改变那种“宁‘左’勿右”、“不求有功(创见)，只求无过”的成败功过观念，才能使社会科学工作者理直气壮地研究和探索，拿出于改革、于两个文明建设有用的科研成果来，也才能开创社会科学发展和繁荣的崭新局面。

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探讨，它同自然科学的研究一样，都是在前人的认识水平和学术成就的基础上进行探索的创造性劳动。所异之处只不过是二者所研究的对象、方法和精确程度不同罢了，前者面对的是社会，后者则是自然，但是不论前者还是后者，却同样是从了解现象到掌握规律的探索过程。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不仅要检验前人的成果，吸取不同学派不同学说的合理成分，批判继承历史遗产，发展前人已经取得的科研成就；而且要考察历史的、现实的、自然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中国的、外国的一切直接间接的联系。这种社会结构的多层次性和复杂性，社会生活的丰富性，社会认识的不确定性和随机性，决定了要获得一个正确的观点和取得一项有价值的成果，它需要占有丰富翔实的资料，经过认真的研究和周密的思考，往往要有多少次的失误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恩格斯说到马克思着手研究政治经济学时，这样指出，当时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已经写出了千百部著作，已经把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完整的形态，作为一个不能非难的教义摆在后来者的面前，“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绝不是对经济学的个别章节作零碎的批判，绝不是对经济学的某些争论问题作孤立的研究。相反，它一开始就以系统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既然经济学家无非是这些规律的解释者和辩护人，那末，这种阐述同时也就是对全部经济学文献的批判”。这种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系统的完整的科学探索，“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正是社会科学研究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这种艰巨性和复杂性，决定

了社会科学研究和理论探讨的失误的不可避免，决定了要得出一个科学结论和成果的不容易。

一项研究，一种理论，一个观点，能完美无缺、无懈可击，当然很好。但是在事实上不可能。我们不是常说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和斯大林、毛泽东晚期著作中，就有一些片面乃至错误的东西吗？是不是要苛求他们等到自己的观点百分之百成熟以后再发表呢？假如是这样，恐怕也就不会产生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学说、毛泽东思想了。邓小平同志在《“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谈话中讲道：“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对于马克思早期的和斯大林、毛泽东后期的错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都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对于其他从事马克思主义及社会科学研究者所出现的错误就不允许呢？难道说后者都成了圣贤之辈？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探讨上，还有一个值得提出的问题，就是不能认为老祖宗没有讲述的，后人就不能讲；或者后人根据发展变化了的情况，对老祖宗讲述的话有所修正、有所发展，就是什么“离经叛道”。相反，对于那些在深思熟虑、认真研究的基础上所提出的新观点、新见解、新理论，更应予以重视。对于那些争议较多的问题也不要急于肯定与否定，应该让实践来检验和回答。

三

从上所述，不难看出，社会科学研究本身是有它的特点和规律的，如何对待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成败功过问题，实际上是如何按照社会科学本身的规律对待社会科学的问题。

如何对待社会科学研究，不仅有认识规律上的问题，而且有实际过程中的问题。

从认识规律的方面讲，需要处理好这样三个关系：

一是未知和已知的关系。社会科学研究和理论宣传教育，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领域。社会科学研究和理论宣传教育，同属于意识形态或者说思想战线的一部分，同样都要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尊重客观实际，注意调查研究，为两个文明建设的现实服务，这是相同的。但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任务是探索未知，即发现那些尚未被人们认识的社会现象及其本质和发展规律；而理论宣传教育则要求准确地解释党和政府的现行方针政策，直接对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它所宣传的是既定的已知的事物。后者是政治理论宣传教育，而前者却是学术研究。作为党的政治理论宣传教育，它要求统一口径，要求从理论上去论证、解释党和政府的决定和各项方针政策，要求宣传教育的效果；而社会科学研究则要求对基本问题进行探讨，必须研究现状，研究历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在各自研究的领域独立思考，提出独立见解，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建树。尤其是涉及到一些新的探索，需要经过多次的反复和长期的研究，即使如此所得出的也可能不是预想的结论，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是否被采纳实行和宜

于公开发表，还要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作为科学研究，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不但是允许的，而且应该大力提倡。对这种研究及其成果的衡量和评价，只能依据科学的实践。

二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科学研究是一种理论研究，但是理论研究并不等于科学研究，这里有一个提高与普及、抽象与应用的问题。作为科学研究，当然应当着眼于提高，它不能满足于现有的认识水平。科学研究要求深入到事物的本质中去，而不能停留在表面现象的说明和实际应用的论证上。就这个意义上讲，它与错综复杂的表面现象是有一定的距离的，但这并非脱离实际。要知道“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这里是不是就不讲社会科学的应用研究功能了呢？不是的。所谓应用社会功能问题，实际上就是社会科学本身的社会价值问题。在这里，正确处理好社会科学及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是十分重要的。社会科学的一切科研成果能得到社会承认的根本价值是它的学术价值。而一项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的表现形式则是它的社会价值，或者叫社会功能、社会需要。如果一部科学著作不具备一定的学术价值，怎么能正确地为社会发展服务呢？又怎么可以设想，既是一部有学术价值的科学著作，而又是在社会发展毫无社会价值呢？不难理解，正是科学著作的学术价值在社会发展中产生了社会功能和社会影响时，它才获得了社会价值；而当它表现了一定的社会价值时，这部科学著作的学术价值也就得到了社会的公认和合理的发挥。在社会价值中，作为社会科学及其成果它对实践的作用，在于从理论上去指导实践，它不是实际运动的直观的东西和具体的经验的堆积，而是对社会运动的内在必然性即规律的揭示和认识。这就是说，我们对于社会运动的研究和服务，不是从一般表面现象去叙述，而应当是通过对社会运动全部事实和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取得对社会运动的理论认识。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要求社会科学及其成果尽快发挥应用作用，于是我们对社会运动的叙述在不少情况下只停留在感性认识的阶段上，有时还采取具体经验的形式，或者成为具体方针政策的汇集。岂不知这样要求的结果，社会科学及其成果除了变成婢女之外，没有别的作用。社会科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它对社会运动的作用，只能是对各种具体经济、方针、政策和做法进行理论抽象和提炼，使其摆脱感性具体性，升华为理论形态的东西，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和理论指导。它的应用作用只能是作用于人的观念，必须通过教育和舆论等手段，变成受教育、受舆论人们的观念或认识才能起作用 and 见效益。只有通过这样的转化过程，才能谈得上实现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任务，才能谈得上充分发挥社会科学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三是长远与现实的关系。社会科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范畴的科学，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或者说叫为两个文明建设的服务，这不是哪个人的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社会发展的要求，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需要。这样说来，并不是社会科学要不要为现实服务的问题，而是要消除左的影响，把社会科学为现实服务和实用主义的那一套区别开来。社会科学作为一种精神生产，在考虑它为现实服务和满足社会需要时，不但要有一种广阔的、长远的眼光，而且要注重社会科学中各个学科的结构和层次及其特殊规律，千万不可简单化和庸俗化。过去在精神生产方面存在着两种弊病：一个是眼光太浅近，要求太着急，希望为现实服务要“立杆见影”，而且在要求上不加

区别，千篇一律；第二是在社会科学为现实服务的问题上，只许成功不能失败，一旦错了，不管青红皂白挨批。这样一方面要求见效快，另一方面又错不得，于是人们只好选择一些于现实远的课题，去回避现实，以免自讨苦吃。由此看来，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并不是人们不想为现实服务，而是对过去那种左的作法的一种反抗，是特殊的历史造成的消极影响。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虽然作了一系列的拨乱反正的工作（包括社会科学研究为现实服务的问题），但是在好些问题上要真正地正过来，还必须进行许多行之有效的努力。

社会科学的应用功能是极其广泛的，在社会科学中有着几十个学科，而每个学科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尽管各个学科为现实服务是共同的，然而服务的途径、方式和效果却因不同学科而有区别。从社会科学本身讲，它的应用价值不仅具有多功能性，而且具有多层次性，甚至有着多变迁性。既有直接作用，也有间接作用，还有迂回作用；不仅有低层次作用，而且有高层次作用；有的是明显作用，有的则是潜在作用；有的表现为启迪作用，有的则显示出转化作用；除了近期作用外，还有长远作用，等等。面对着这样的服务，如果缺少战略的总体的长远的眼光，没有一种多功能多学科多层次多渠道的应用价值观，是很难达到目的的。

从实际过程中讲，又必须处理好三条原则：

第一，坚持在争论中确立真理的方针。“双百”方针不仅是促进艺术进步、科学发展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繁荣的动力，而且是解决科学研究中分歧和学术是非争论的最有效武器。贯彻“双百”方针，实行学术自由，提倡科学研究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探讨问题，为发现真理、掌握真理、发展真理而自由勇敢地探索；允许和鼓励各种不同学术观点、不同学说、不同学派的民主讨论和自由争鸣。只有这样，才能启发思想，激发聪明才智，引发真知灼见，集思广益，在探索和争鸣中出人才，出成果，出理论，出经验。只有学说层出不穷，学派众多林立，学术观点不断争论，社会科学事业才能生机勃勃、繁荣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谬误是形成和发展真理的必要条件，片面性、表面性是形成和发展全面的、精深的学术思想的必要条件。

斯大林曾说过：“科学所以叫作科学，正是因为它不承认偶像，不怕推翻过了时的旧事物，很好地倾听实践和经验的呼声。否则，我们就根本不会有科学。”但是科学工作者不可避免地要与传统势力和偶像式的权威作战。要否定人们头脑中已经扎根的过了时的定论和习惯看法，或者要推翻权威的但属于错误的论断更为困难。发现真理很难，使真理为人们所理解、承认和接受更难。在这里，就有一个学术平等问题，一个观点、一种学说，凡是权威、专家提出的，好像别人就不能提出异议；无名小辈有所创见，如果没有权威、专家的引见，则很难发表和出版，要得到社会承认更难；一个学术问题的争鸣，最终还要由权威来定论。这种情况急待改变。

第二，坚持社会科学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方向。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列宁在谈到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时说：在研究中“有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他所研究的现象的规律，而特别重要的是这些现象的变化和发展的规律，这些现象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个社会关系制度到另一种社会关系制度的规律。所以马克思关心的是一件事：用准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一定社会关系制度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完全地指出

那些作为他的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马克思主义从总的方面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它并未终结和阻塞人们对历史具体规律的认识和发现，它所要求的恰恰是后继者对许多具体规律的研究和发现，进而帮助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科学地认识和改造世界；当他们能正确地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很好地认识和把握现状，就能主动地适应历史发展趋势，自觉地预见和开拓未来。

今天，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它向社会科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说，过去我们的着眼点主要是研究变革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规律性；那么今天所要揭示的则是社会主义在其自身基础上的完善和发展的规律，阐明建设和改革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是不同以往革命过程的另一种复杂的历史过程。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改革理论认识这一过程，不仅要进行科学技术革命，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强大的现代化的物质基础，而且要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新型的经济关系、政治法律制度和机构、社会管理系统和生活方式、思想文化体系、伦理道德规范、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同时还要造就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的新人，这样就给社会科学提出了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既是现实的又是长远的任务。不难看出，社会科学要对这样的社会发展过程作出多学科、多结构、多层次的研究，作到从未知达到已知，从了解现象到掌握规律的探索过程，要大胆探索就难免有失误；研究现实问题和新的问题则更为敏感，失误自然更会多一些。当然要尽量减少失误，提高成功率。但是总不能一有失误就讨伐。

第三，坚持学术理论是非要用实践来检验的标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学术上理论上的是非，只能靠事实、靠材料、靠说理、靠实践检验来解决。为科学探求、为学术探讨和为理论研究限定活动的范围，只可研究这个，不能探求那个，甚至规定只可得出预先规定的某个结论，而不能得出与这个既定结论不同的结论，都是不对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最反对用条条框框限制科学探索活动和“乞求上司庇护的”作法的。马克思曾尖锐地指出：“既然探讨老是注意法律赋予挑剔权的第三种因素，难道它不会失去真理吗？难道真理探讨者的首要任务不就是直奔真理，而不要东张西望吗？假如我首先必须记住用某种指定的形式来谈事物，难道这样我就不会忘记事物的本质吗？”恩格斯曾这样强调：“德国人的理论兴趣，现在只是在工人阶级中还没有衰退，继续存在着。在这里，它是根除不了的。在这里，没有对地位、利益的任何顾虑，没有乞求上司庇护的念头。反之，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通过自由探索、自由讨论，由实践检验来解决学术理论是非，它恰恰是“符合工人利益和愿望”的，也是符合科学事业发展规律的。胡启立同志代表党中央在中国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再一次重申：“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观念。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文学创造中出现的失误和问题，只要不违犯法律，都只能经过文艺评论即批评、讨论和争论来解决，必须保证被批评的作家在政治上不受歧视，不因此受到处分或其他组织处理。”以上原则，当然也是适应学术理论领域的，保证研究者不因发表不同学术观点而受到政治迫害和人身、名誉的侵犯；保证编辑不因发表不同学术观点的文章而受到株连、处分；在学术的立法上要规定，任何对学术问题的非学术解决都是违法的；学术理论探讨，只要不违法，就要受到保护和鼓励。

1986年6月

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9页、118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35页。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页。

《列宁主义问题》，第636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254页。

《列宁选集》第1卷，第114页。

一个未完成的采访 ——记梁漱溟先生

我从1979年下半年筹办《晋阳学刊》。当时考虑，有关中国学术史，除了梁启超和钱穆在二三十年代各有专著外，后面之学术史尚是空白；近现代中国著名学者，在经过了众多政治运动，尤其像“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和摧残之后，有的在历史舞台上隐殁了，有的在学术领域中沉寂了，即使是健在者，多数也在古稀或耄耋之年，身体状况多数不佳。觉得应该尽快通过适当的形式，抢救这批学者的学术史料。

在想法成熟后，即行向全国的著名社会科学家发出了征约传记的信函。信函发出不久，冯友兰、周谷城、季羨林、张岱年、蔡尚思、邓广铭、杨向奎等先生相继来信，表示“至为赞成”、“我们赞助你们的事业！”先后寄来了他们的传记。但是，也有的学者保持沉默，梁漱溟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可是从后来的许多迹象看，他一直在关注着我们工作的进展情况。

到了1980年上半年，山西人民出版社李翔德同志知道了我的举动。当即决定出版《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丛书，到1985年出版到第4辑；《晋阳学刊》于1980年创刊后的第2期始，特辟“《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选载”专栏，每期刊登一至二位学术传记，历经十二年之久。

对于以上动态，梁漱溟先生是知道的。《晋阳学刊》1985年第二期刊载《章士钊传略》，他及时地看到了，并且通过历史学家阎宗临先生之子阎守诚同志于5月15日转告我，说梁先生愿意请白吉庵先生为他作传，并盛赞《章士钊传略》内容翔实，评价科学，文字朴素，有学术特色。

因我约梁先生传记已有多年，讲心里话，早就企盼着尽早得到他的传记。于是5月16日在给李希泌先生去信时，顺请他转告白吉庵先生有关梁先生的意图。李先生与白先生是云南同乡，他们不仅常有往来，而且电话联系不断。白吉庵先生据约，很快就同梁漱溟先生联系上了，安排好采访日程，按约定计划进行，先后采访三年多四十余次，直到1988年6月23日梁先生仙逝，采访尚未最后结束。

从后来白吉庵先生写的一篇《怀念梁漱溟先生》（《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7月16日）文章中知道，梁漱溟先生是十分重视这次采访活动的，“回忆三年多的时光，拜访梁老四十余次。每次当我到达时，梁老已经坐在客厅，服装整齐，手里拿着书或报，集中精力在看。显然，这是在等人来的样子”。

在采访的三年多时间里，我与白吉庵先生常有书信往还。我记起，曾有以自传形式写传的想法，“但他不主张取自述方式，他说我已九十二岁了，许多（事）已回忆不起，还是想到哪里，随便谈，你去整理，可参考他的书，云云”。一次想请梁先生为《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题签，当采访者转达了我的意向后，他愉快地答应了，于1986年2月10日挥毫书出，但却漏掉“现代”二字；在2月11日又补写了“现代”，把“现”还重写一遍。后来到同年6月9日，采访者到梁老家，梁先生还曾提到书签能用否？

在我的催促下，白吉庵先生曾几次想着手先为《晋阳学刊》撰写一篇二万字左右的传略，然后再考虑二十万字的传记。直到1986年10月3日作者来信，尚无马上动手写作的念头：“关于梁老的传，我一直在搜集材料的。报刊上曾披露了一些，我都看了，自信还有好些没有涉及。请不要着急，有理不怕迟到。我准备明年写出。”到了1987年11月14日来信告知了他的想

法是：“最近开始阅读与梁老先生谈话笔记，心想：明年写出一本二十万字的传记，……若是写个五万字，不多不少解决不了问题。因为材料比较多，不用可惜！”在同月的27日又来信说：“还是以原计划为好，先写一个两万字的给您，明年初即可刊用。”后来“不料又遇着他事，一放就不好收拾。”“如今梁老已经去世，未在他生前写出传记来，已成为我一生莫大的遗憾！常常受着心理上惭愧的责难！”从白吉庵先生采访期间来的二十多封信来看，他最初是抱着“抢救”的姿态去采访梁漱溟先生的，正是基于这种“抢救”的想法，越采访越觉得梁老先生的经历丰富，越采访越感到梁老先生的思想深邃，越采访越认识到需要“抢救”的东西越多，于是几经企图着手撰写梁漱溟先生之传记，都未能如愿，最后竟成为一项未完成的采访！

所庆幸的是，毕竟把珍贵的口碑资料“抢救”了下来，可是我们仍然希望早日见到梁漱溟先生传记的面世！

1991年12月17日

文如其人

——记季羨林先生

在我之书斋中，今年又增加了季羨林先生的条幅：“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录陈寅恪先生诗。增德先生。季羨林一九九二年二月。”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1980年，我邀组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时，季在同年6月即写好了自传寄来，并在信中说：“我在学术上，虽然从事科研的时间很长，但是谈不到什么高深造诣，滥竽充数，殊觉汗颜。”1981年2月我进京有机会拜访诸学者，除了邀组传略外，还请教有关学术问题。在访问邓广铭先生时，邓先生尤其推崇季先生的自传，认为一是平易近人，文如其人，二是治学之论，说是常谈，却为高论。可谓平易中见深刻，常谈中有精邃。他曾在课堂上，向其弟子们介绍了季先生的自传及其治学经验。

季羨林先生自传里说：“谈到什么治学经验，我确实是卑之无甚高论。如果非说不行的话，我也只能讲几句老生常谈。但是这几句老生常谈却是我几十年从事这个工作的深切感受。”然后他从六个方面谈了自己的治学经验：一，要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这是我们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离开它是不行的。这同说人必须吃饭一样，是老生常谈，但却是真理。二，要注意史德，要讲实话，不要讲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话。有的人为了证实自己的“学说”，不惜歪曲事实，强词夺理。这是研究工作的大敌。三，不要老想走捷径，要像蜜蜂那样，不辞辛苦，一点一滴地积累资料，大量积累资料。不要只发空论，讲一些“假、大、空”的话。四，要珍惜生命，珍惜时间，浪费时间就等于自杀。五，知识面要广一些，要多知道外国的情况。近几十年以来，我们的科学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果还有不足之处，我认为，最突出的是知识面窄，对外国情况不甚了了。如果想扩大知识面，必然需要很多有关外国的书籍。这就需要多学习一些外国语。今天在中国，在其他国家也一样，不懂外文，就很难认真地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六，态度和方法都要十分谨严。社会科学虽不同于自然科学，没有法子用仪器来进行实验，但因此就更需要谨严的态度和方法。当今国内有不少人的著作经不起检验。你只需把他的引文同原文校对，就会发现有些是引错了。这种马马虎虎的作风在科学研究工作中是绝不能容许的。

季羨林先生是山东临清市人，出生于1911年8月。此时他刚过80周岁寿诞，但是身体硬朗、精神矍铄、思维清晰，讲话和发言都不用稿子，其思考问题仍然保持着谨严的逻辑推理及其连贯性，就连像《关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长达近6000字的讲演都“没有稿子”，“一点稿子也没有，一个字都没有”。然而他却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思想基础；文化是不是能够永存；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以及现代战争等方面进行了长时间的论述。我长期以来，有一个观点，勤思有益于长寿；在这次会上，在与季羨林、张政烺、王利器、何兹全、杨志玖等先生的接触中，使我更坚定了以上看法。

在傅斯年学术讨论会开幕的第一天，季羨林先生最后一位发言。季先生一生见过傅斯年二次，在谈及傅斯年时，将傅与陈寅恪进行比较，引申批评了以论带史的研究方法，对于那种教条主义的研究，他是很不赞成的。说到陈寅恪是否懂得唯物主义时，季先生认为，唯物主义也可理解为实事求是，

从陈寅恪的著作中看，虽然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但其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不也就是唯物主义吗？难道这不比那些以论带史者的随心所欲更唯物主义吗？

季羨林先生是研究印度佛教及其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的，近五十年来对于佛教梵语的研究，始终有一个指导思想没有放弃，这就是，除了找出语言发展的规律性的东西以外，希图把佛教梵语的研究同印度佛教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坚信许多印度佛教史上的问题，可以通过佛教梵语的研究而得到解决。为此他先后著有佛教梵语的多篇论著。1984年他说过这样一番话：“回顾我对佛教梵语的研究已经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了。这一条研究的道路并不平坦，几经波折，屡历风雨。但是总算是坚持下来了。所获得的成绩，我却只有脸红，然而并不气馁。虽年逾古稀，但我仍然要说一句：希望在于未来。在今后若干年的时间内，在完成其他课题的同时，我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和精力，继续对佛教梵语进行探讨。希望能解决一些新问题，取得一些新成绩。从他近十年来出版的著作看，是实现了他的宏愿的。”

1992年10月

哲人其萎

——记冯友兰先生

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可称为哲学大师的人，自然应包括冯友兰先生。用贺麟先生的话说，芝生先生建立“新理学”体系，“使他成为抗战期中，中国影响最广、名声最大的哲学家。”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三位建立了完整的哲学体系的哲学大师，熊十力、金岳霖和冯友兰。熊先生的哲学以中学为主，西学较少；金先生的哲学以西学为主，中学较少；而冯先生的哲学则中学和西学并无偏重，比较完整地融合了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中的理性主义，使中国哲学传统中的理性精神得以发扬，这是独具特色的。从中国现代哲学的这一发展脉络看，冯友兰哲学确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一座高峰。

冯先生一生，著作甚丰，且形成了他自己的哲学体系，其学术贡献为国内学术界及世界哲学界所敬重。他之代表性著作，可以三个时期划分，第一是30年代初，出版了开新纪元《中国哲学史》两卷本；第二是抗日战争时期以《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和《新知言》等系列性著作，提出了“新理学”的哲学体系；第三是他从80岁始，到95岁完成的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长达154万字的巨著。冯友兰先生曾用一副对联概括他的著作：“二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所谓“二史”是指两卷本和七卷本，“六书”则谓“新理学”的六种系列性著作，合称“贞元之际六书”。《易经》乾卦卦辞说：“乾、元、亨、利、贞。”元亨利贞代表春夏秋冬四季，贞下起元，意味着严冬即将过去，春天就要到来。“六书”都是抗战期间著的，当时处于民族存亡绝续之际，经过艰苦的斗争，振兴中华、民族复兴的时刻就会到来，所以称为“贞元六书”。

1990年12月4日是冯友兰先生95岁华诞，但是他却于11月26日溘然长逝了。在其仙逝前的8月，曾有人请教他《新编》可否代替两卷本时，答曰：“不能代替。”当继问《新编》同两卷本有何异同时，答曰：“《新编》是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写的。旧本是在解放前那时的环境下写的，《新编》是在现在的环境下写的。旧本有旧本的价值，《新编》有《新编》的价值，不能代替。”“二史释今古”表明《新编》不能代替旧作，两者各有千秋。从两卷本到七卷本可以看出冯先生哲学思想的发展变化。“六书纪贞元”，则代表冯先生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的哲学。

1988年，冯友兰先生又曾把他的哲学思想及其追求，用一副对联加以总结：“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前者表明他的历史责任感，把他之哲学研究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要在新旧相续的时代做出哲学家应有的贡献。后者体现他对哲学的理解，他要反思人类精神生活，通过对宇宙、社会和人生的全面理解，在促进社会实现“新命”的过程中，积极而又平静自如地生活。这二者的统一，就使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四句话有了新的时代意义。中国哲学有一优良传统，那就是哲学家总是力求其哲学与人格的一致。冯先生也是如此。他之哲学追求与人生理想是统一的，其中不仅有理念，而且有真情实感和对生活的态度。敝以为，这也许就是冯友兰先生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

现在该说一下我与冯先生的交往了。

在解放后的思想战线，冯友兰先生是大批判的重点之一。我记得，1950年哲学界发动了对“新理学”的批判；1955年学术界批判胡适、梁漱溟时，又捎带批判冯先生；1959年再度批判“新理学”；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冯先生先后发表《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和《再论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他认为：“近几年来在中国哲学史的教学研究中，对中国古代哲学似乎是否定的太多了一些。否定的多了，可继承的遗产就少了。”提出：应区分过去哲学命题的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其具体意义不必继承，抽象意义则是可以继承的。这种说法后来被称为“抽象继承法”。不久陈伯达率先发难，硬说冯先生的主张是“企图经过某种形式保留中国历史上的唯心论体系，企图把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一套道德都当作永恒不变的道德”。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其间又发生批林批孔运动，冯先生在被迫的情况下又作出了批判否定孔子的文章。……从50年代到70年代，冯友兰先生在政治上、哲学和学术思想上，经历了曲折痛苦的时期。冯先生虽然探索哲学长达70余年，但“这个旅程充满了希望和失望，成功和失败，被人理解和被人误解，有时受到赞扬和往往受到谴责”。（见《三松堂全集》第1卷）这使得许多了解他过去的人为之深感不解，当其回答别人询及他哲学思想变化的经过时，他以诗答曰：“去日南边望北云，归时东国拜西邻。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

我与冯友兰先生的第一次认识，那是“十年浩劫”结束后的1979年10月，在中国哲学史讨论会上。出席会议的还有张岱年、王孝鱼、张恒寿、邱汉生、金景芳、石峻、任继愈等著名学者。其时，我正在筹创《晋阳学刊》，有着许多学术问题需要解惑，于我来说确有生逢其时之感，所以在会上不放过一切时机寻访各位先生。当年冯友兰先生已84岁高龄，由其次女宗璞陪同，言及办刊物的内容时，冯先生用河南唐河乡音说：“学术刊物就要办出学术性来，否则就不是学术刊物了。”与冯先生第二次接触是约他写学术自传，1980年4月20日发出信，刚到6月22日他就寄来了经他亲自修改41处的自传，连信封都是他亲手写的，并附照片一帧。以实际行动支持了我之编纂《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丛书计划的实现，令我感佩不已。

时间到了1984年，在筹组傅山学术讨论会时又去北京，深望冯先生给予鼎力相助。当其助手李中华先生转告了我之想法时，想不到冯先生慨然允诺为大会撰文，并在8月8日寄来了近二千字的文章。于文章开始，冯先生说：“我因年老体衰，行动不便，不能来太原参加大会，甚为遗憾。……我对傅山毫无研究。不过对于中国近代史和中国近代哲学史逐渐积累了一些看法。把这些尚未成熟的看法，先讲一点，也许可以作为傅山研究的参考。”然后，冯先生从十七、十八世纪出现的批判封建道德的方面，肯定了傅山思想的意义。他还在文中透露：“我的祖先的原籍是山西泽州府高平县。……河南唐河县我们这一支姓冯的人的始祖是作为一个个体小商贩到唐河县来的，后来发家致富就在唐河安家落户了。我是这位始祖的五世孙。”

冯友兰先生虽然已成古人了，但是他的提携之恩则使我铭心难忘。

1992年3月

美学家编辑生涯 ——记宗白华先生

在中国现代学者中，有相当多的人有从事编辑的经历，诸如梁启超、章太炎、张元济、鲁迅、茅盾、郑振铎、阿英、舒新城、丁福保、曹聚仁、邓拓、周振甫、胡道静……，可以说不胜枚举。他们中有的起初作编辑，而后专事学术研究；有的是先在学术领域耕耘，中途进入编辑队伍；有的是终生未离开编辑岗位，但是始终坚持编研结合而相得益彰。他们在编辑岗位上，注意学术动态与信息，发现和培养学术研究的新人，倡导和促进新鲜学术思潮及学术风气；然后结合自己的专业研究方向，有感触有思考地探索问题，阐发某些被人忽略或研究不深的专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做编辑工作的学者，因与作为作者的学人经常交流见解及信息，其所探讨的问题常常具有选题新颖独特和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又由于其有长期的煮字生涯，故在文字风格上也有自己的特色。

宗白华先生，系海内外美学权威。本篇着重涉及他的编辑经历。宗白华曾两度主编《学灯》，首次是1919年11月，原主编郭虞裳外出，二十二岁的宗白华任《学灯》主编；二次主编《学灯》是在抗日战争中，长达八年之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两次主编《学灯》，恰是宗白华大展才华，在学术上大放异彩的时期。

五四时期的宗白华，主持《学灯》，自然地把哲学、美学和新文艺(尤其是新诗和戏剧)的新鲜血液注入了《学灯》；《学灯》成为五四时期最具盛名的四大副刊之一，于新文化运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主编《学灯》的同时，宗白华学海泛舟，在半年多时间即登出文章将近二十篇，其中有连载的长篇《欧洲哲学的派别》。他宣称：“一班旧思想的人反对新潮实是一种倒戈的反击，可以不必顾问。但要我们说得做得，将理想化为现实，他们就无话可说了。”他主张：“我们现在研究新学术的初步手续，就是各种学术根本观念的研究和历史的观察。”他认为：“认明科学是哲学底基础，先多多的研究科学，然后再去研究高深的哲学，不要离开科学空谈哲理。”

1938年6月，他在重庆再次主编《学灯》，在《发刊词》性质的《学灯》擎起时代的火炬》中提出：“我们应该恢复汉唐的伟大，使我们的文化照耀世界”，“我们的文化是精神的，同时是非常现实的；是刚毅的，同时是慈祥的；是有力的，同时是美的。汉代的书法，唐代的雕刻，表现了这一个。”他说：在十九年前五四运动的时候，《学灯》应了那个时代的三种精神而兴起：1、抗日救国的精神；2、提倡科学的精神；3、提倡民主的精神。而思想的解放，精神的独立和社会问题、青年问题的注视，也是那个时代的特色。他表明今天的《学灯》仍愿为这未曾过去的时代精神而努力。《学灯》刊登了当时学者郭沫若、徐悲鸿、陈独秀、唐君毅、方东美、傅抱石、冯友兰、汪辟疆、贺麟、熊十力、朱希祖、周辅成等几十人著作。宗白华本人除不断有论美学、论书画的论著发表外，几乎每期都有他撰写的“淡雅而有深意”的“编辑后语”，常有画龙点睛之论。

我向宗白华曾发过约传函和促传信，但未见过他复函，可能是他年老不便提笔所致，为此我先后两次拜访。我每次去，宗白华都是靠在一把摇摇椅中谈话的，他记忆清晰，当我自报姓名后，就说：“我收到了你约写自传的

信函，还常收到《晋阳学刊》，你们约请我们这批年事高的学者写传，并且注重治学经历、学术渊源和学术思想，想法及举措都是很有意义的；从已经在刊物上刊载的若干篇传略看，本身不仅是一笔学术财富，更重要的是于后继治学者有借鉴价值。尽管老学者的治学思想、治学方法，可能不一定都正确，但要相信后继者从中会得到有益的营养和宝贵的教训。尤其是自传，更具有第一手资料价值，但是要我自己写已经相当困难了，好些事情难以理出头绪，同时也提不起笔了。你们有个提法甚好，叫做‘抢救’。是需要抢救的，否则我们已风烛残年了，一走就把好多东西带走了，要知道思想是不能复制的。”我聆听他讲述完，我告诉他自传也可采取传主口述，请他人记录整理的办法；他点头称好，并表示他的传略可采取此法。

后来宗白华的学生邹土方先生应我之约，完成了《宗白华传略》。正当在《晋阳学刊》1986年第3期选载他的传略时，宗先生突然逝世了。

1992年10月

乾嘉学派的殿军 ——记孙楷第先生

欲写有关孙楷第先生的这一篇文章，我曾几次翻阅他在我舍的学术档案，但却一直未能结稿。这次又从档案架上取下了他的卷宗，重新展检他给我的多封信函，终使我浸沉在十年前拜访孙楷第的回忆中。

《晋阳学刊》(1981年第1期)曾刊出一幅《刘璋青绿山水轴》，文字说明：“刘璋，字于堂，号樵云山人，山西太原人。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举人。雍正元年(1723年)任直隶(今河北)深泽县知县，在任四年，被解职。同治间刊行的《深泽县志》列名于名宦传。著有《捉鬼传》(一名《钟馗斩鬼传》)是一部具有现实主义的讽刺小说。”

想不到，孙楷第对这段文字极有兴趣，不久即来信说：“关于刘璋及其画，解决了我五十年研究小说史的一大疑难，此前，我竟不知道刘璋为太原人氏，贵刊一则短短的文字显示了它的学术价值。”还说他收到了传约，但他不主张自传。说：“自传文学，似易实难。过简且不脛人意。若趁此机会作自我宣传，自吹自打，有伤雅道。俗眼也许欣赏，但必为有识者可笑。”在信上还说到他之图书古籍在十年浩劫中被人劫去的情况。信是用大稿纸写的，而且字有红枣大，正反面都写。他认为作自传是自我张扬，我回信时进一步说明了总结学术研究的经验教训，有利于学术传统的继承发展，有利于后学的培养成长，而老一辈学者能从学术和治学的视角去考虑自传，实是功德无量的事。到1982年12月31日来信时，他的态度有了转变，“前嘱作文，虽发愤试作《我的学术研究》一文，因我精神不好，作了一半，即中止不能作下去，并且看了一看，发觉已写出未竟之稿，作得不好，非常气馁。”

我专门拜访孙楷第的时间是1983年3月16日。事先就得悉他身体不好，经常卧床以气功度日，每日仅进食二三两，性格日渐古怪，因文革中被劫书的事未解决，每当说到此事就要发脾气。气后又大伤其健康，有鉴于此，先生的夫人温芳云则常挡驾客人。关于这种场面，我以前在拜访朱光潜、俞平伯、许涤新等先生时，就曾发生过，于是这次我也早有思想准备。我进屋时，孙楷第尚卧榻于床，我与师母先在外屋交谈，当他听到有客人时，先探出头看看外面来人是何许人，一问是山西高某，于是全身闪出，以他浓重的沧州口音大声寒暄，然后又像欢迎久别的故人似的热烈握手，使我感觉到他已经感情激动了。

今天，先生显得特别高兴，一谈就是两个多时辰。在我听他谈话时，不时地环顾室中陈设，见到四五个书架上空无一书，于是话题转到了文革中图书古籍被劫的事情上来。他说：“弟还有伤心事，即是我的书在十年浩劫时为人劫去”，说到此时，先生嗓门高了，我心中也暗暗叫苦，甚怕他情绪过分激动，设法平稳气氛。然他仍说：“我是公民，是研究人员，在学问上小有成就，强占我书不还，不唯侵犯了我的合法人民权利，亦且破坏学术研究。我虽老，现在还不糊涂，过去收集所获的材料，百分之九十以上还记得，思考力正常。我的《元曲家考略》，已发表者八十五人，还有十几个待整理。我的《小说旁证》七卷约三十万字，稿全而须校对整理。‘日月逝矣，时不我与’！我最近必须理会此事。语云：‘巧妇不能作无米之炊’。又云：‘好汉无身，寸步难行’。没有书，我什么事也作不了！”我用了很多劝解，才把先生话题拉向传略方面，他告我《我的学术研究》一文写了万字，稿子在

梁容若先生手中。周汝昌传已有万字，由于事情不断，学术思想部分待补。遗憾的是，以上两份稿子由于种种原因我都未能见到。这次辞别后，于 1984 年和 1985 年他又给我写过三封信，大意谓他的传略由杨晦先生之子杨镰撰写，并希望尽快刊出。当我函告他传将刊于《晋阳学刊》1986 年第 1 期后，先生还索看了校样，并指出：“杨镰文提我作的吴昌龄与《西游记》一段，有‘足以破数十年中外学者之惑’一语，‘数十年’三字删去，至托！至托！”但接到信时，刊物已终校付印，未及改正，留下憾事。

还有一件遗憾的事，就是先生还曾托我访问姚忠肃公神道碑拓本，由于一些原因，未得结果告知他。先生在信中说：“弟四十余年前，作包公案故事论文其第一章，为双勘钉故事，双勘钉案元杂剧(已佚)以属之包拯，实乃元朝姚天福事。天福勘双钉见《辍耕》及《新元史》。元虞集有姚忠肃公神道碑，碑载勘双钉事为《新元史》拓本，弟 1922 年亲闻之于柯凤荪先生。此碑文《道园学古录》，国朝文类均不载。其碑文仅见《稷山县志》。天福稷山人，在元世祖时为名臣，有直声。旧元史有传，但不载勘双钉事。凤老说他见过此碑拓本。弟敢次质之《晋阳学刊》编辑部诸君，愿代访问一下，此碑在山西是否流传有拓本。能得此一事见告，不胜感荷。”由此也可见先生的记忆力之强及其学术上严谨态度。

1992 年 12 月

《长恨歌》争鸣

——记周煦良、俞平伯先生

周煦良先生，是我心仪已久的著名学者。他翻译的英国高尔斯华绥《福尔赛世家》、美国巴马与威理《地球末日记》、苏联考塞夫臬考夫《活命的水》和法国凡尔纳《天边灯塔》等小说，曾使我倾倒过……

周氏家族在安徽省东至县(原至德县)是远近闻名的望族，诗书传家。就在周煦良父辈中，有佛学家周叔迦和书画收藏家周叔弢等；同代有历史学家周一良和敦煌学家周绍良等。如今，周煦良已作古。在我忆及他时，想着重谈谈关于对《长恨歌》的学术争鸣问题。

1981年3月24日，周煦良来信说：他于去年11月中旬病重入医院，至今还未出院。他患的是肺气肿哮喘，且病情较重，一直离不开氧气袋。“可是在病情不稳定的情况下，也未停止过读书和研究。”他与我写的七八封长信，以及给俞平伯写的信，所著述论文《〈长恨歌〉的恨在哪里》，都是带着氧气面罩写出来的。接着在5月22日信上，他提出了要与俞平伯先生继续进行《长恨歌》的争鸣，他说，“这篇文章和山西人民出版社的另一刊物《名作欣赏》去年第2期中的《一篇长恨写风情》唱了对台戏。但它也和千余年来的人唱了对台戏，且开始的不是我，而是俞平伯先生。如果你们能把我的文章寄给俞先生看，并请他也写点东西，那便可以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提反对意见的人肯定不少，那就会掀起一个争鸣的局面。由于白居易是太原人，这个争鸣的局面在《晋阳学刊》上展开，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反正赞成和反对，都毫不减低白居易这篇伟大作品的地位。”

我遵嘱将信和文章都转寄给俞先生，想不到俞老很快就回信了。根据周、俞二位先生的意图，将双方通信和《〈长恨歌〉的恨在哪里》同时刊载于《晋阳学刊》(1981年第6期)。周文重新提出俞平伯的“隐事”说，认为俞说至今“仍旧是对白居易这篇伟大作品的正确解释”。并就俞说加以引伸，以为“诗的中心思想是写杨妃不忠实于感情”，诗的后半部杨对唐明皇已忘得一干二净，诗末二句“乃诗人结语，不接杨妃”。推测诗旨深隐的原因，是白用游仙体写传闻，诗出受到朝野激赏，白不必煞风景而挑明事实。俞信基本同意周文看法，但认为末二句“实遥应篇首”。指出此诗特点是“讽刺而用微词曲笔”。“本意固在惩尤物窒乱阶，却又不能扬家丑显国恶，故褒贬互用，美中有刺”。对20年代旧说，则认为“似有创获，以佐证不足，难成定论”。我在发表周、俞二位先生信时，我曾加了这样的按语：“信中既有学术问题上的探讨，又有互相尊重对方的切磋，观点不同，友谊常在，不因学术上的争论，而成为个人关系上的隔阂，这种风气在学术研究上是值得积极倡导的。”

周文和二人的通信发表后，有十多种报刊转载和报导，不久即引起讨论和争鸣。孙汝舟推崇俞平伯“第一个把它(指《长恨歌》)读懂”。但觉得俞文(指《从王渔洋讲到杨贵妃的墓》)对杨妃马嵬逃脱和流落民间当了女道士的推测，都和当日情事不合。孙文考证是：马嵬变起，兵士诛杀诸杨。玄宗迫于情势，同意赐死杨妃。但参与其事的高力士和陈玄礼皆玄宗亲信，时间和驿馆构造都可让他们别觅一人代杨而死。杨妃可能在夜间换装隐逃，后混于难民群，越终南，浮汉水，沿江东逃，在东方海滨城市当了娼妓，也可能是“名妓而兼‘假母’，主持着一个很大的妓院”。玄宗派中使寻访到杨妃

后，杨不愿返回长安，将定情物让中使带回，口头说是寻旧好，实际上表示决绝。原因可能是玄宗年老失势，杨看穿了皇家真象，不愿再历风险。

李宗为《论杨贵妃的传说以及〈长恨歌〉之恨》，对周、俞二位先生观点提出商榷，主要看法是：1. 杨死于马嵬，唐人众口一词，记载凿凿，并非暧昧不明之事。2. 玄宗遣方士寻访杨妃神灵故事，出于民间传说，唐人多有称咏，并非仅见于白陈歌传。3. 白居易《李夫人》和郑嵎《津阳门诗注》均提到杨妃死葬马嵬事，郑嵎还详注了玄宗令高力士物移葬杨妃情况，空坟说不能成立。4. 唐代道观亦有清规，许多公主皆入道观，不能在女道与妓女、庵观与妓院间划等号。代宗沈后流落民间后仍可回宫，杨妃为寿王妃五年、又为女道士，然后入宫为妃。杨为女冠或娼妓无颜复见君王说亦难成立。

对于《长恨歌》出现的学术争鸣局面，这是周煦良先生预料中的事。他于1982年4月27日随信又寄来了一篇《何妨对〈长恨歌〉重新评价》。认为：“在我看，白陈王谈及此事的游仙观就是个妓院；当年杨妃从马嵬逃出来，可能就在这里当了女道士（整屋今为周至县，在泾河南岸，而马嵬则在泾河北岸，看地图便知），所以元和年间的白陈王三人在观里宴乐，席间会及此事，我文章不提者，因为俞先生又会说‘孤证站不住’也。”

1983年秋，我途经上海，到医院看望了周煦良先生。尽管他还带着氧气罩，但是床周围摊的都是书，枕头底下压的还是书，当有所灵感时再随手记下。我到了病房，周很兴奋，竟然取下了氧气罩，与客人放声高论。先是谈山西傅山，他说：“傅山不但是一个有高风亮节的文人，而且是明末清初的一个伟大的书法家，他的字真称得上导之则泉流，顿之则山立（书谱作“山安”）。这次在你们学刊上看到他的肖像插图，和《荀子评注》举例，欣喜异常。他的像我只在有正书局石印的傅青主墨迹初版本上看到（再版便无肖像，而且石印有损坏）。那幅像很简单，你们登载的这一张，在中国人像画中也称得上名作，实可为山西博物馆贺。傅青主《霜红龛集》收得很不全；有正石印本中的那坐诗只收了几首，商务影印的《傅徵君墨迹》里面的《丹枫阁记》与《寿××六十序》两篇精彩文章也未收进，其实他的诗文凡是集中所未载者，都可以作为资料，陆续在你们学刊上发表。”

周先生谈锋正兴时，医务人员及侍服他的人曾不时来劝阻，但却无济于事。接又谈哲学家许思源先生，“我与许君仅是中学同学，其学术成就仅凭耳闻，倒是郁南夫人是30年代时认识，而且比较熟悉。他们夫妇在五七年双双被戴上右派帽子，现在虽已改正，但许君已在十年动乱中饮恨去世，因此未能施展所长……，但其本人成就亦颇惊人，哲学方面有用英文写就的专著，在出国前已为人称道，后又在加拿大某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波动力学一文……我虽对近代物理学略懂皮毛，就对数学公式则一窍不通。即此可见在哲学方面之造诣。至于文学方面似系家学渊源”。在我回到山西后，他荐来许思源《论李太白》一文，又信函介绍我与唐郁南女士认识。

1992年7月

话说吴宓

——记贺麟先生

吴宓，可算得上是一代文化名人，二三十年代曾与朱自清、闻一多等执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在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时，他刻意延聘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等名流到院任教，培养了大批卓有成就的专门人才；他曾长期主编《学衡》杂志，有着颇多贡献，“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

说起来是非常惭愧的，对这位学贯中西文博今古的学者和诗人，我过去却是一无所知的。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于吴宓的家乡陕西泾阳县有缘见面，都不识其为何许人也。当时我被打成黑帮，吴宓先生则被“反动学术权威”被折磨得沉疴难支，自知不久人世，挣扎着回到故乡，住在县城西关面粉厂他胞妹家。吴宓当时已是八十多岁的老翁，且有意回避生人，加之我对他的无知，就这样失去了可以领教的机会，留下了不可弥补的遗憾。

后来，由鲁迅杂文《估“学衡”》的注释中，得知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曾有过一位匆匆过客“吴宓”，在脑海中只留下了一个“复古主义者”的很不清晰的形象。真正了解吴宓先生，还应感激贺麟先生。

1982年3月在京，贺麟先生面允为吴宓作传。

时间已到了1988年12月，到京的次日，我一头就扎进了东罗圈胡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宿舍，访贺麟先生。

我与贺老是多年的忘年之交，于是开宗明义提出如何评价吴宓学术地位的问题。贺老听了我的发问，又移步至书房取出《吴宓诗集》，边翻边说到：“雨僧先生在近几十年被人们遗忘了，但实际上他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不可忘记的人。有人批评他搞复古主义，也就是在《学衡》杂志上提倡国粹时，其实当时情况很复杂，不是戴上顶帽子就能解决问题的。我手头的这本《吴宓诗集》，是1932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说的是诗集，实际不限于诗，其中还列了他发表的28篇文章及部分译著，诸如《论新文化运动》、《诗学画论》、《论今日文学创作之正法》、《论诗之创作》、《诗韵问题之我见》、《评顾随无病词味辛词》、《空轩诗话》和《雨僧文稿》等，在当时文学界都是有影响之作。他在文学翻译理论上也是有其建树的，诸如《译韦拉里说诗中韵律之功用》、《译穆尔论现今美国之新文学》、《译白璧德论今后之诗趋势》等。……说到雨僧先生在比较文学方面。可谓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人。用比较方法研究《红楼梦》，还写出了《〈红楼梦〉新谈》（刊于《民心周报》第1卷第17期），时间当在1920年3月27日，算得上是早期研究《红楼梦》的著名人物。用的是西方资产阶级学者衡量小说优劣的尺子，还夹杂了不少封建伦理观念。但是，他把《红楼梦》放在世界文学之林中，与‘西国小说’相比，称赞《红楼梦》‘其入人之深，构思之精，行文之妙，即求西国小说中，亦罕见其匹’，肯定它‘宗旨正大’、‘范围宽广’、‘结构谨严’、‘事实繁多’、‘人物生动’。‘为中国小说一杰作’。在二十世纪初，能这样全面高度评价《红楼梦》，足以使人耳目一新。”

在我的印象和观念中，总觉得贺麟先生是研究哲学的，而且专长于黑格尔哲学，论及学问时也一定是生涩艰深的。但是通过这次访谈，竟发现了麟老的另一面，当他谈起吴宓先生对《红楼梦》的研究时，气氛显得那样轻松愉快，连语言都变得平易亲切了。话题还在吴宓先生《红楼梦》研究上，他

又慢慢地然而绵绵不断地说下去：“雨僧先生对《红楼梦》之偏爱，之有深湛的研究，在当时师友中都是知道的。他的记性，真是惊人，只要你开个头，他便能给你背上一大段，而且一字不错，他是较早主张为《红楼梦》正名的人，认为称《石头记》不妥，称之为《情僧录》或者《风月宝鉴》，或者《红楼梦》都不正确。他说原书第一回，借空空道人之口，把石头记纂录成书的经过说得一清二楚，在‘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之前，便肯定的说，‘即此便是石头记的缘起。’最后还要强调一句，‘铁案如山，这是不容误解的。’”

后来话题又说到是吴宓先生的学生，可谓桃李遍天下，许多人是现当代有建树的学者，诸如王力、吕叔湘、李健吾、张骏祥、曹禺、俞平伯、王佐良、许国璋等。

谈及吴宓先生的晚景，在‘文化大革命’中批斗时摔坏了右腿，到1976年时双目失明，后于1978年1月17日含冤下世，终年八十四岁。

不过历史没有忘记这位学者，1978年6月5日为他举行了追悼会，1979年7月18日西南师范学院为其平反恢复名誉，……。

对此，贺麟先生表示了欣慰。

1992年1月

笔墨情缘

——记苏局仙先生

报载，“上海第一老人”苏局仙于去年12月30日溘然长逝。据医生诊断，老人是“年老体弱，无疾而终”。在“两个月前的重阳节时，苏局仙刚刚在老人节中以110岁的上海最高年龄被推为‘上海第一老人’。今天——1992年元旦，将是这位经历两个世纪的历史老人的111岁寿辰。”“苏局仙三十多岁时曾患肺结核，去年8月间复发，住院月余，至9月30日方出院。11月28日，老人写下生平最后一首诗：‘普天同享千秋寿，天下有谁不自豪。盛世生居万事足，无须再羨汉萧曹。’”消息还说：“老人生有三男一女。眼下，一直与唯一活着的二儿子、79岁的苏健侯一起生活，平时常以诗书言志会友。老人现有孙辈四男一女，他们中有人民解放军军官，有大学教授；还有曾孙六男四女，大都就学于高等院校。”

看毕这条消息，我想到了与苏局仙老先生的一段交往。苏局老是清末秀才，他的书法和诗早已闻名，与国内许多书画大家多有唱和，结有翰墨姻缘。1982年，是《晋阳学刊》创刊两周年，当时有意摸一下社会各界对敝刊的反映和评价，在征求意见的对象中包括了苏局仙、启功等书画家。信函发出后，多数人有回音，苏局仙、启功先生还先后寄来了诗书作品。在回信中，苏局老说他是《晋阳学刊》的忠实读者，对刊中许多论文的观点有着甚浓的兴趣，对刊物所体现的学术气氛表示赞赏。他以铁划银勾的书法，挥洒自如地书出两首诗：“山右夙称繁盛地，人文物产媲江东。到今更觉民情奋，着力争求学术雄。俊杰一心图报国，思量何处觅丰功。借从学舆论科技，各就所长尽厥衷。”“学刊创始再经年，已得风行远近传。中外古今并讨论，农工商学共钻研。百家正许争鸣日，万众倾忱四化天。隆重特为庆纪念，未来进展漫无边。”题头是“壬戌夏为祝晋阳学刊社两周年纪念”，落款为“南汇百一岁苏局仙”。

据知，苏局仙先生学诗时已经很晚了，与当代诗家唱和，已是花甲之年后的事，可是屈指算来，至今也是半个世纪了。到85岁时，他的诗稿已经积之盈尺；可惜十年动乱中，诗稿却毁于一旦。嗣后，经朋友和学生的搜集，将老人1967年至1973年的诗作编为《蓼莪居诗存》，将1974年到1982年诗作编为《水居室诗抄》。于老人105岁时，上海市文史馆将其十九年积稿编选成《东湖山庄诗稿》，刊行问世。到1991年上半年，深圳红荔书画馆从他近年的新作中选出绝句109首，并邀请海内外著名书法家挥毫书成《东湖山庄百九诗集》，精印出版，是为盛事。

论及苏局仙老先生的笔情墨缘，他与诗人书家赵朴初，画家谢稚柳、陈佩秋夫妇，陆俨少、林曦明、凌虚、吴青霞、沈彬如等都有唱和赠答。苏老赠赵朴初诗曰：“为民服务即慈悲，佛法原来不堕空；治乱兴亡也有责，仰期提倡大雄风。”赵朴初回赠苏老诗答：“茶寿才过一，雄心跨上仙；再编诗万首，待庆大椿年。”这里，诗人用了一则东洋典故，“日人称百八岁为茶寿”，“茶”字拆开便成廿加八十八，恰是百零八数。在苏老回赠的诗作中，不仅可见他与海内名家的情谊，而且展示出老人“诗言志”的风采。在《谢稚柳先生同夫人陈佩秋画家合作双柏图见赠志感》中，明白如话地答曰：“写来双柏祝长寿，合作商量立意新；妙笔通神拜善颂，宝之永远作家珍。”在《谢陆俨少惠赠山水一幅》中，则简明扼要地称赞了陆俨少“画中有诗”

的艺术特色，诗曰：“名下无虚老画师，画中却是意含诗，唐缣今日谁轻写，赵璧隋珠我敢私。”在《贺吴青霞八十寿》和《酬凌虚手绘金鱼图赠我》中，前者褒奖女画家“不服老”的精神及其艺术造诣，后者则并称吴青霞，凌虚为“江左画鱼两大家”。前者：“天降神仙原不老，八旬尤其是妙龄身；手挥绝世超群笔，日写人间无尽寿。”后者：“江左画鱼两大家，山斋早已识青霞；今朝又得凌公笔，宝气冲霄射斗斜。”在老人诗作中最有趣的要算《酬林曦明老赠手绘寿桃》一首了：“双桃分给全家食，老幼可能寿命长；笔下尚余千万在，寿人寿己寿无量。”诗中不仅充满了人情味，而且窥视出老人所以能长寿的博大胸襟及其秘诀。《苏州沈彬如赠绘松鹰图》：“奇气盘旋胸腹中，笔锋到处写英雄；高瞻万里云天外，不向人间啄小虫。”看来，诗画均采用借物喻意的手法，“鹰”与“英”同音，鹰为百鸟之王，自然不同于一般的角色。画家赠鹰，意在“善颂善祷”，诗人报之以诗，诗情在言外，令人回味而不尽也。……

苏局仙老人仙逝了，但他留有“寿人寿己寿无量”的佳句和祝福，君不见“过去人生七十古来稀，如今年过八十不稀奇，九十以上多来兮，百岁老翁是常有的”。苏老生前在总结他长寿秘诀时，最要紧者有两条：一是胸襟要豁达而博大，二是头脑要勤思而不堕。当然各人有各人的长寿之道，但是我以为能得此二诀，人人能有“寿登期颐”之希望。可以想见，现在向百岁进军的人是有人在的了。

1992年4月

历史已证明他是强者 ——记沈志远先生

吾生并未有机遇与沈志远相识，然却有幸同他公子沈骥如在 80 年代初交往。当时，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硕士学位，后又随宦乡读博士学位。以我之经历，知道沈志远在哲学、经济学方面均有着很高的学术造诣，著译甚丰，他之著译曾影响了一两代人。然他却在那种“引蛇出洞”的年代被错误地打成右派分子，成为了他所信赖的机器的专政对象。

即使在人身失去了自由，言论受到了剥夺的情况下，他的忧国忧民之情仍然不减。其时，思想上、政策上的极左危害着民族和国家，大跃进所造成的经济上的大破坏，人民公社所带来的违背历史规律的错误潮流，都使他心急如焚。尽管他指出这些时弊，轻则会受到批判斗争，重则可能有杀身之祸，但是并不愿看着民族和国家受损害而去做一个风派文人。

沈志远经过生死利害得失的权衡后，坚定地选择了要在理论上进行一番严肃的研究，针对三面红旗推行中的问题，写出系列的文章，作出理性的反思和批评。1957 年到 1965 年，是沈志远生命的最后七年，其在逆境中写出了《按劳分配的几个问题》、《论社会主义的相对稳定性》两文后，还打算写《意识与存在》、《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可能性》、《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文，主旨都是要反对那种以中国的国情特殊为由，而否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做法。

沈志远之所论，显然是与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按劳分配逐步取消论唱对台戏。这可大大激怒了上海那个大权在握的“好学生”，他喊道：“右派分子没有资格教训我们应该如何搞分配！”一场更大的灾祸又将降临到沈志远头上了，然而即使如此，他仍然没有退缩的表现！1962 年 7 月 23 日由沈志远执笔并在上海市政协会议上进行的题为《为更好地展开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而努力》的八人发言这样指出：

理论宣传工作上表现的某种程度的片面性，表现了以下一系列的问题：如我们往往强调了不断革命论，却忽视了发展阶段论；强调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却忽视了客观可能性和尊重客观规律的必要性；强调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却忽略了它的相对稳定性；强调了政治思想教育，却不大重视物质利益原则；我们往往非历史主义地夸大了按劳分配原则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却忽略了按劳分配首先、并且主要是体现无产阶级法权，是作为“按劳分配”、“不劳而获”资产阶级法权的对立物而存在的道理；我们谈生产关系的改革比较多，而谈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则比较少；强调上层建筑比较多，注意经济基础的决定意义则比较少；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宣传上，我们政治强调得多了一些，经济谈得少了一些；解释政策相对多了一些，探讨规律相对少了一些；宣传高速度多了一些，研究按比例少了一些；强调政治任务多了一些，研究经济效果少了一些……

这些批评和建议，已被历史和现实证实了它的远见卓识，但在那种极左的压力下，敢于直言不讳地提出这些见解，是需要何等的勇气！正如徐铸成在回忆文章中所说的：“他参加政治活动多年，但没有一点政治‘活动家’的韵味，始终保持书生本色，不趋时，不媚世，不见风使舵，不巧于逢迎，这也许是他致命的‘弱点’罢！”“但历史将证明他是一个强者……”。

1984 年 7 月

补白大王

——记郑逸梅先生

我的案头放着郑逸梅先生历年来赠阅的七种书籍：《梅庵谈荟》、《艺林散叶》、《文苑花絮》、《艺坛百影》、《清娱漫笔》、《书报话旧》和《郑逸梅文稿》，都是他进入耄耋之年后的著作，而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八十岁后出版的著作远不止此数。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郑逸老今年寿诞当在98岁，然而每年都要有一至二种著作面世。他生肖属羊，一生中已度过第二个辛未年了。在上海文史馆去年举行的“为羊祝寿”的欢聚会上，郑逸老说了一段十分有趣的话：“我属羊，所以一生一世不吃羊肉。在座的都比我年轻，我是老羊，你们是中羊、小羊。但都是羊，希望大家能学我的样，也不要吃羊。我们不能‘自相残杀’。”不要以为郑逸梅先生“羊”气十足，但是他所信奉的却是“龙马精神”。至今，他还每日独坐寒窗，日写二千字以上的文章，故在海内外报刊上能常见到新作不断发表。

人们称郑逸老为“补白大王”，是说他的文字极短，只是聊作报纸的“补白”而已。尽管这个雅号并无贬意，何况郑老欣然认可，但是我仍想为之辩白几句。从他赠我的书看，觉得改称“掌故大王”似更名符其实。他在自传中也曾这样说：“我素喜欢写人物掌故，《正言报》、《和平日报》、《今报》、《新夜报》都辟一专栏，每报每天刊登一篇。同时三水陆丹林也喜欢写人物掌故，陈仲陶诗人有云：‘掌故罗胸得几人？并时郑陆两嶙峋’。实则丹林掌故资料较为翔赡，我是望尘莫及的。上海《永安月刊》初为一般性杂志，自我参加了辑务，力主以人物掌故为尚。我每期有稿，复邀陆丹林、李伯琦、陈蒙安、巢章甫、胡朴安等，大量供给掌故笔记及南社诗话，该刊的风格为之丕变，出至一百多期为止。我这许多掌故作品，先后汇刊了《小阳秋》、《人物品藻录》、《近代野乘》、《味灯漫笔》、《皇二子袁寒云》、《花雨缤纷录》、《拈花微笑录》等书。”从老人的叙述中，我们不但懂得了他喜掌故之始由，而且看到了他一生以掌故写作为慰，如今出版的四十余种著作，除《人物与集藏》一书是五千以上的大文章外，多数属于短篇的人物掌故的汇集，仅《艺林散叶》一册就收入近现代人物掌故4342条之多。以上可算是为郑逸老之雅号的正名，不过是否一定要改为此雅称，我倒无强人之意。

郑逸梅先生，生于光绪二十一年乙未九月初二日（1895年10月19日），原姓鞠，父震福公，经营米业。母亲郑瑞娥，主持家务。在其三岁时，邻居失慎，家室遭殃，贫无立锥，便依靠外祖父为生。外祖父原籍安徽歙县人，洪杨之役，避难苏州，若干年后成为小康，从此寄籍苏州，为苏州人。外祖父之子早死，其被嗣给舅父，称外公为祖父，遂也改姓为郑。郑老从中学时代即为报纸写文章，他之处女作是一篇译文，题目为《克买湖游记》，刊于上海《民权报》上。稿件被列为甲等，编辑在信上说：“如此文章，多多益善。”后来《民权报》因反对袁世凯而被停发，改名为《民权素》，以杂志形式出版，主编特为郑逸老辟《慧心集》专栏。《民权素》出至十七集止，后派生为《小说丛报》，又派生出《小说新报》，均约郑逸老撰文。因常写短小文章，适宜补白，朋友称他为“郑补白”，有擅刻者刻了一方“风流郑补白”印赠之，以后大家索性雅称“补白大王”。直至目前，有人写郑逸老的采访稿，标题就是《补白大王郑逸梅》。此可谓是“补白大王”雅号之来

历，真算历史久远了。

我熟悉郑逸老是 1981 年的事，在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时，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编撰的《南社丛谈》，洋洋五十四万余言，项目凡十四，附录项目凡九，传记一百七十多篇，是第一本翔实完整的南社史。阅读全书，我被编撰者丰富而博通的历史学识给折服了，为我研究中国现代学术史提供了明晰的线索和珍贵的史料。抱着求师的欲望，我向郑逸老去信求教和约传，从此我们之间多年来有书信往还，经常受到他的教诲和指导，连续收到他的赠书。1982 年 10 月我去广州中山大学出席封建主义经济结构学术讨论会后，在返晋途中路过上海，拜访周煦良先生后，又到长寿路 160 弄 1 号敬见郑逸老。时年郑老 88 岁，看上去却像六旬多，当他取暖水瓶给我冲茶时，上下阁楼楼梯几乎是小跑，往茶杯中的倒水动作，简直如年轻人一样的迅疾。我们的话题就是从他的《南社丛谈》开始的，从南社的成立及其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意义，到南社的性质及其成员的组成，南社与新南社的区别和联系，进而具体谈及柳亚子、陈巢南、高天梅、刘申叔、俞剑华、黄宾虹、胡朴安、胡怀琛、蒋万里、姚石子、叶楚伦等二十四人的具体情况。凡是我提到的问题，郑逸老都如数家珍地给予满意的答复，他之思维敏捷令人诧异，因为在我面前的是一位八十八岁的长者。关于他本人的自传，不久即可交稿；说到为南社的一些学者作传，除提供了一些线索外，至于是否能写，待考虑后在信上示知。

郑逸老的毛笔字，甚有自家风骨，但他极少用毛笔写字，写作和回信基本上用钢笔。多年他赠我的书籍，从不签字，而是盖一个“逸梅持赠”的印章。他藏有很多印章，多为有趣的闲章，都是名家篆刻。其中有邓散木的“旧闻记者”，高式熊的“补白大王”和“灯下白头人”，陈茗屋的“秋芷室”，矫毅的“扫叶老残”等。在十年浩劫中，郑逸老被造反派批斗为“臭知识分子”，故有“秋芷室”之谓，就是“臭知识”之意。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从校长的宝座上被拉下来，令其在校园中“扫垃圾”，于是记实为“扫叶老残”也。郑逸老认为以上事都是值得铭记的，故又治印“以老不忘”，“不过，我总是往前看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有温故，才能知新。所以我常拿来看看，激发自己对生活、对前景更增加一点信心”。

这番寓意深刻的话，已经说到了延年延寿的道理。于是把话题也就自然引到了长寿方面，郑逸老告诉我，要总结出系统的长寿秘诀，暂时还难以说出个头绪来，不过他很主张要心胸开阔，对浮名虚利一切要看得很淡，生活上要自奉甚俭，他不饮酒，不吸烟，除了喜好摩挲古物、翻检书画之外，没有什么嗜好。他很喜欢与朋友谈古论今，可惜“老成凋谢”，年纪相近的“走”的“走”了，留在世上的也多不常走动了。谈到此处时，还不免多少使他感到有些寂寞，不过从翻书写作中自寻其乐已经是郑老之常法了。

1992 年 3 月

傅山是应当研究的 ——记范若愚先生

《晋阳学刊》创刊就注意刊登研究傅山的文章和文献，从 1982 年又辟了：“傅山研究”的专栏，但是要组织学者深入研究，却处处感到存在着“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干扰。

在那个年代，许多研究傅山的先生，都受到过傅山问题的株连。当我拜访郝树侯、何高明、陈监先等先生时，他们真是感慨甚多，余悸犹在。

1984 年傅山诞辰三百周年，就在我们筹备傅山学术讨论会时，又传闻着“傅山参加了康熙年间博学鸿辞科考试，晚节不忠”的说法，使得筹备工作罩上了一层阴影。

经过证实，倒是确有其事。中央党校范若愚同志是山西浑源人，前不久返晋小住，在一些场合非正式地说过以上的话。他虽然是作为个人意见讲的，但是下边的一些人却把它当作金科玉律来对待，似乎傅山又不宜研究了。尽管我们一再说明，一个历史人物作为学术研究是不应受到影响的；可是由于唯上思想的作祟，筹委会还是有人主张向中共中央宣传部请示一下为安。

事情已到了 1984 年 3 月，我以傅山学术讨论会秘书长的身份，到北京听取一些专家学者的意见。到京后，曾直接间接地拜访了侯外庐、冯友兰、张岱年、贺麟、杨向奎、任继愈、石峻、辛冠洁、汤一介等先生，他们中的多数表示 8 月准备到会，少数几位即使因年事高或工作脱不开不能赴会，也计划写文章或交出书面发言，但是傅山作为明末清初我国重要的爱国主义思想家、启蒙哲学家，又鉴于历来对傅山著作及其历史地位评价不够公允的情况，召开一次学术讨论会是极有价值的。后来，我又到了《光明日报》理论部，恰好那天苏双碧、李桂海、萧黎几位都在，当他们得悉我们有向中共中央宣传部打报告的想法时，他们认为根本用不着小题大作，并且指出现在又不是“批儒评法”那阵子，难道还要以儒法的标准来衡量傅山吗？

在京拜访名单中是列有范若愚同志的。原来下榻于崇文门中国社会科学院招待所，为方便起见，后来干脆搬迁至中央党校招待所住下，目的是想向范若愚同志多请教几次。3 月 14 日到了中央党校，先拜访了曾作艾思奇助手的卢国英同志，当晚即由卢陪同造访范若愚同志。

进得门来，卢国英将我作了介绍，范老一听说是家乡来人，自然是十分高兴的。然后向范老说明了到京的任务及在京邀请学者去晋赴会的情况。说到召开傅山学术会议，他虽患有颜面痉挛症，但还是滔滔不绝地讲着他对傅山及其研究的看法。

他一开始便说：“傅山是明末清初的大才子，他的思想可了不得，与他同时代的人都不及他。山西虽然禁锢在群山中，但是出了个傅山，在那个时代，思想竟那样的解放，见解竟那样的深邃，胆识竟那样的超凡，勇气竟那样的过人，确实难得。有人称他是 17 世纪的启蒙思想家，我看不过分。……不过他《霜红龕集》中的许多东西太难懂，就连老范（指范文说）在 1958 年都讲过傅山著作文字艰深的话，他的讲话记录稿存在《红旗》杂志社。我当时心想，傅山的著作连老范都说艰深，我小范就更是不敢问津了。不过从那次后，我倒更重视为山西省收购傅山的书画了，每次去琉璃厂都操心傅山的字画，……”

范老说的正在兴致时，我从中插了一杠子：“可是我们在傅山研究上遇

到了困难，现在山西有人传说，范若愚讲过傅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用您的话影响傅山研究的深化”听了我的插话，范老略为思忖后继续说：“我是说过这话，那是在晋祠说的，是随便说起傅山的书画时说的。记得他曾在晚年参加过博学鸿辞科的考试，有向满清低头称臣的意思。不过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有点大汉族主义的味道。”我又插话：“就傅山参加博学鸿辞科的事也是被迫的，是别人抬他去的，而且到了京城又装病装疯，并且未正式入考。说起来也是反抗的。”范老肯定地说：“是这样的。即使是自愿地参加了考试，也不影响傅山的总体评价，更不应该影响对他的研究。傅山不仅是个思想家，而且是个书画家，在山西老百姓都知道，他还是个医道很深的医生，他对于女科、男科及疑难杂症都是很精当的，在民间流传的著作和书画是很多的。傅山是应当研究的。”想不到谈得如此投契，然后我们邀请他8月份一定回山西参加傅山学术讨论会，他高兴地允诺。他还告知，他正在从事阎锡山研究，如有可能力争还想在会上讲讲傅山。

转眼间，会期就要到了。我与秘书组成员尹协理同志再度赴京落实会议事项，到访结果是：冯友兰、侯外庐、任继愈三先生不能亲临会，但愿写出文章；张岱年、贺麟、杨向奎、石峻、辛冠洁等先生不仅将赴会，还计划在会议上发言。可是当准备拜访范若愚同志时，得悉他不幸跌折了大腿，于是返晋的计划不得不取消了，是为憾事。

经过紧张筹备，傅山学术会议如期于8月13日正式开幕了。除以上说到的京畿学者外，还来了虞愚先生，上海来了蔡尚思先生，武汉来了萧蓬夫先生，石家庄来了张恒寿先生，郑州来了卫俊秀先生，……会议开得顺利，开得完满，唯所缺憾者就是范若愚同志未能到会。

1992年1月

惊涛拍岸见砥柱

——记杨献珍先生

今年8月25日，著名哲学家杨献珍逝世了。他虽然几经政治风浪，但是却能高寿到九十七岁。人们常说，顺境得长寿，可是也有另一种情况，诸如马寅初、梁漱溟、冯友兰等先生，都是在他们的人生旅途中遭过非同寻常的逆境，但也都是寿达九旬以上的老人。此中秘诀，按常人说，就是凡事应取豁达态度，既来之，则安之，不激动，不动怒，保持自己心理上平衡。这话说易行难，不过自有其理。

杨献珍案于1980年11月平反，他在平反大会上说：“不管政治处境怎样险恶，我始终相信一条：我们党是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传统的，不仅我个人的问题，而且全党、全国的问题，都有一天会正确地得到解决。唯物主义会为自己的胜利开辟道路，我们的党必然会回到唯物主义路线上来。我非常高兴的是能亲眼看到这个信念得证实。”人有了这种信念或是其他的信念，就会心态平衡、意志坚强，也就遇事开朗而豁达。关键还在于个人的内因。

80年代初，杨献珍来太原参加全国地方志会议，与我健谈了三个多小时。我们的话题始终围绕着建国后哲学上的三次大论战（即关于“综合基础论”、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关于“合二而一”）。在拜访前的1982年3月，他曾赠阅《我的哲学“罪案”》一书。我不理解地问为什么用“罪案”两字？他反问：“我犯了什么罪？不过是在理论上提出和坚持了自己的观点而已。可是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里，从我在监狱被关押八年之久看，似乎是犯了大罪的，曾被开列十大罪状。我犯的是我没有犯过的罪。然书名用《我的哲学“罪案”》，即并非故作危言耸听，盖纪实也。序的开宗明义就是这么说的。”他以浓重的湖北郧县腔向我释疑破题，使我思路顿开。

1953年和1955年，杨献珍的两篇论稿首先提出了“综合经济基础论”，与“单一经济基础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对我说：“生产关系的总和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所借以树立起来而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那个现实基础；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社会关系，构成社会，并且构成一个处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第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制度是真实的基础；社会经济形态是一定生产关系的总和；分析社会经济形态，即分析社会组成人员间的生产关系。由上可见，经济基础就是整个社会的诸种生产关系的总和。在此基础上，我又分析了我国过渡时期，由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的社会经济形态，或称五种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这就是我国过渡时期的基础。但是我认为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是综合性的，它并不是单一经济基础的。我所以要摸清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这个底，目的是要人们正视现实，防止人们不顾现实而盲目地、主观地去行事。”

在说到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时，他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在哲学史上只能为黑格尔说的，思维即存在，存在即思维，思维和存在是同一个东西。这个命题，与毛主席所讲的‘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是两个绝然不同的问题。据毛讲的矛盾的同一性的原理，‘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说的是：从存在到思维，从思维到存在，或者从物质到精神，从精神到物质，有着一一条由此达彼的桥梁，这就是哲学上所说的同一性。可见，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在哲学史上所说的是思维和存在为同一个东西，而思维

和存在有同一性，却所说的则是思维和存在有联系的问题。”杨献珍认为这场争论是原则性争论，但未得出原则性的结论，还在被监禁的情况下，在1967年和1973年曾两次用文字申诉自己的观点。而第二次申诉是针对《人民日报》上《哲学战线上的一场严重斗争》而写的，其题目是《1973年在监狱写给中央专案组的抗议书》，可见其理论上的勇气。

尔后，话题自然地谈及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争论。杨献珍说：“‘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都是对立统一规律的一种表达，但表述的重点可以有所不同。不过我根据当时的现实情况，所强调的是矛盾双方的联系，目的在于反对片面性、绝对化的形而上学思想。”他在回顾了中外哲学史特别是辩证法发展史，回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发展史后，指出“其实，合二而一和一分为二都可理解为是对立统一规律的通俗的表达方法。对于这种表达，我是坚认如此的。为此，我在狱中写过四次申诉，在陕西潼关流放地又写三封申诉信（其中有一封是《论恩格斯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关系》），但未发出，后来都收在《我的哲学“罪案”》一书中，请你看书好了。”

关于他为学术而几经风波的事，杨献珍则看成是学术发展中正常的必然的，他说：“本来唯物主义思想就是在长期的残酷斗争中生长起来的。在欧洲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里，就有多少先进的思想家为传播唯物主义受到种种残酷的迫害？其实，千余年来唯物主义者遭受残酷的摧残迫害，直到现在也没有结束，就是今后也将存在。也许随着社会发展和科学昌明，这种迫害摧残的事会少起来。至于我个人，也在这正常的必然的之中就是了。”

时间很晚了，我带着收获的满足和打扰的歉意，离开了他的房间。以后收到了他的年谱（王关山撰写），刊于1984年第3期《晋阳学刊》。

1992年11月

学者型作家作家型学者 ——记冯至先生

冯至先生是被鲁迅赞誉为中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人。对抒情诗人的冯至，我确实是心仪已久了。但作为学者的冯至，即使在我筹组《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丛书后，对于像冯这样介于作家与学者之间的人物，在取舍上往往遇到不少难题，所以迟迟未能收编入传。直到1989年上半年，青年学者蒋勤国写完了冯至评传，专门赴京请教冯先生返晋后，听了他对冯先生的详介，尤其是冯先生关于中国古典文学和德语国家文学的研究，才决定将他以学者撰写其传。

作为诗人，冯至浑蕴着学者的情怀；作为学者，他饱涵着诗人气质。论诗，其抒情其韵味无穷而浑长，可谓开了一代风气；说文，其有理其有据而敢抒胸意，真诚而谦逊，人如其文，文如其人，文风和人品都体现秀雅之美。

冯先生书中的这类秀雅文字，可谓每篇中都有，我们所看到的是以诗的语言表达深邃的哲理，将诗人与学者融结为一体，将诗与理凝铸于一炉。《病友赠书》中一说是冯先生1992年11月6日最后一篇文章，文风至终未变，一以贯之。

冯至在德语文学翻译、研究和教学上的成就及其贡献，在国内外都有重要影响，尤其在德语国家享有声誉。然每当他审视和评价自我时，总是显得有些苛刻。最近，我又一次从学术档案中抽检他给小蒋和我的几封信阅读，犹如冯先生正坐于我面前，其真诚而谦逊的品格之风扑面而来。

在反省极“左”思潮下的诗作时，他自责“工力此生多浪费，何曾一语创新声”；说到以学者为其作传时，他自谦道“我不是学者，没有写过一定水平的学术著作”；在谈及他与存在主义思想的关系时，他指出：“你来信谈到我与存在主义思想的关系，很有道理。不过，我当时(三四十年代)只是读过些存在主义哲学的书，有所理会这自然反映在我写的诗、文里。但是我对于存在主义哲学没有作过系统的研究，更不曾以存在主义自居。”提及社会上对他的评价时，他表示：“说实在的，我对于过分溢美的文字，读后往往不但不感到愉快，反而很难过。因为人要有自知之明。”在给小蒋信中，一再强调评价应当实事求是，“我总觉得评价过高，整个行文，应把调子降低，才符合实际。写这类的书，不要有过多的激情”。在有关比较方法时，他要求“与现代的诗人，学者比较，总是贬低别人，抬高你的‘传主’，这样不好。我有自知之明，我有许多地方不如其他现代的诗人、学者，我在他们中间不过是名列‘中等’而已”。对于自己的有些著作，他提出“如《德国文学简史》是‘大跃进’的产物，是我生平最引以为憾的一件事，又如《张明山与反围盘》毫无可取之处，又如关于文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也很平凡，毫无新意。这类的东西，只应否定，无甚可取，不要对它们说好话”。

1989年6月20日，他复我一封长信，是据我5月29日就小蒋所撰传略中提出的三个问题作的回答。涉及林如稷、陈炜漠、杨晦、陈逵、夏康农、翟立林、田德望的学术成就，他给予了详实的介绍，然对于他在古典文学、德语文学研究方面的学术思想和概述中国现代在德语文学研究方面的创获及代表人物等第二、三个问题，他则表示“请原谅我不能回答了”，讲到原因时，他这样说：“我最不愿意对研究者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样会影响研究者的客观态度。”“至于第三个问题，范围太大了，我不能对此妄加评论。”

由上所引，冯至先生之风范已展现于读者面前了。

1995年4月

楹联圣手

——记张伯驹先生

我虽无缘与张伯驹先生会面，却有幸同他通过几封信，在书信往还中了解张先生的一些事情。尽管张先生已在1982年3月26日仙逝了，可是至今提起往事，仍然如同昨天，还有着不尽的由头和话题……。

在我的观念中，认为藏书家、文物书画收藏家是算学者或文化人的，他们所以能收藏那么多有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图书古籍及文物书画，有经济能力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有文化素养、有专业造诣和有识别鉴赏眼光，却是首要具备的条件，更何况像张伯老这样的收藏家，同时就是文物书画的研究专家呢。我是基于以上的考虑，于1980年12月向张先生发出了约传记函。我记得张先生的家址是红学家周汝昌先生提供的，在1981年3月又请周先生代写过张伯老传记，当年6月下旬收到了张先生的小传。

从传中悉，伯驹先生字丛碧，河南项城人氏。以鉴赏收藏家、诗词家闻名于世，且又擅书法，并为名票友。其父为前清进士，官至直隶总督。他早年与张学良、袁寒云（袁世凯之子），溥侗（溥仪堂兄）并称四公子。九岁能诗，三十岁开始全力写诗，先后与傅增湘、郭则澐、关赓麟等结为蛰园诗社、庚寅词社，并大力收藏文物书画。凡遇珍品，必倾囊购之为快。他曾收购我国传世最古的画品——隋代展子虔《游春图》，竟不惜变卖家产得二百二十两黄金，又借友人二十两，共二百四十两黄金购至手中。我国传世最古的书法作品——西晋陆机《平复帖》，又变卖夫人首饰，以四万元大洋收购之。当时日本人欲以三十万元大洋索让，被伯驹先生断然拒绝：“我买它岂止为钱！黄金易得，国宝无二，万一流落海外，我岂不成了千古罪人！”

抗日战争爆发，伯驹先生甚怕所藏珍品被侵略者掠去，故将画品书帖缝藏于衣被中携往西安。后来，汪伪政权某师长将张先生“绑票”，索逼四十万大洋方可赎人，否则就要撕票。如此危急之时，张先生亦不愿变卖所藏文物书画，最后是夫人潘素求亲告友，方集资将他赎回。由此见张先生视珍藏比生命还宝贵，可是到了新中国成立后，他却于1956年悉数捐献给国家。在其所捐书画中，有西晋陆机《平复帖》卷，唐杜牧《赠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书《道服赞》、蔡襄《自书诗帖》、黄庭坚《诸上座帖》、呈璐《杂书诗》、赵孟頫《章草千字文》、元俞和楷书等书法珍品，中央文化部特授予褒扬状。随后又将隋展子虔《游春图》和唐李白《上阳台帖》献出。张伯驹先生谈到此时曾愉悦地说：“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一大事！”

解放后，张先生主要从事书画、古琴、棋艺、京剧等方面研究，不料竟在反右派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后经陈毅关怀，至吉林任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在十年动乱中，因张伯老写了两首抨击林彪、江青迫害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金缕曲》，被诬为“现行反革命”而隔离审查，长期失去工作。1972年陈毅逝世，伯驹先生悲知遇之恩，特撰挽联于灵堂。

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河山，永离赤县；挥戈挽日，接尊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於天下，九泉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曾信步浏览灵堂上的挽联，甚为赞誉张之挽联，并询及张茜，此人与陈毅的关系。张茜略作说明后，谈及伯驹先生现尚无工作和户口在京。毛泽东当即嘱周恩来安排。不久，张伯老被聘为中央文史馆

馆员。

张伯老多才多艺，其书法得王右军真传，号为“鸟羽体”，著有《中国书法》一书。其京剧造诣极高，宗余派，与梅兰芳、余叔岩曾发起成立“国剧学会”。“玩票”、《空城计》，他竟饰孔明，名角为余叔岩饰王平，杨小楼饰马谡，王凤卿饰赵云，程维先饰马岱，一时轰动了京城。据知，伯驹先生能京剧文武老生四十一出，曾在上海、西安、兰州、天津、长春等地演出过四十余次。

伯驹先生又为诗词，又是楹联圣手，他的遗著不仅有《红氍纪梦诗注》、《洪宪纪事诗注》、《诗钟分咏》、《丛碧词》、《春游词》、《秋碧词》、《雾中词》、《无名词》、《续断词》等，而且有《中国对联话》、《京剧音韵》等。他知道我对楹联有兴趣，曾于1982年12月10日亲自抄录寄来楹联百余幅供我学习。从伯驹先生楹联中所见，他所拟楹联内容极其丰富广泛，既有寿联、婚联、挽联、堂联，也有书画联、照答联、戏台联、游戏联；论及其楹联的修辞形式更见多姿多彩，比喻法、双关法、歇后法、叠字法、嵌字法、抵字法、同部首法、回文法、无情法、集句法等方法运用娴熟；我以前未见过有关生殖崇拜内容的楹联，在伯驹先生的楹联中则见有崇尚男女生殖的内容，但是读来却并不俗气，反倒看出张先生的匠心独到和文字功力。很可惜，因张伯驹先生逝世后，其令婿楼宇栋催索甚急，竟未及复印一份就退回去了。

就在1982年春节过后，85岁的张伯老住进了医院，他曾一度六、七天不能饮食，精神处于昏沉状态，人们都为老人担心着。可是就在2月15日这一天，也是他85岁的寿诞日，他突然想吃饭了，并在床上接受了将要出国的张大千先生的孙子张晓鹰为其拍照。下午，王禹时去探视时，张伯老先生要王录下他吟成的一首七律和一首《鹧鸪天》词。兹录如下：

· 病居医院 ·

张大千兄令孙晓鹰赴美，来视并拍照，因寄怀大千兄。

别后瞬经四十年，沧波急注换桑田；
画图常看江山好，风物空过岁月圆。
一病翻知思万事，余情未可了前缘。
还期早息阅墙梦，莫负人生大自然。

· 鹧鸪天 ·

病居医院至诞辰感赋

以将干支斗指寅，回头应自省吾身：
莫辜出处人民义，可负生教父母恩？
儒释道，任天真；聪明正直即为绅。
长希一往升平世，物我同春共万旬。

据纪录者讲，伯驹诵到“还期早息阅墙梦，莫负人生大自然”和“莫辜出处人民义，可负生教父母恩”时，都泣不成声；到生命的最后，还歌颂祖国“换桑田”、“江山好”，还期望海峡两岸“早息阅墙梦”，还想着人民对他的好处，想着社会风气。他留恋祖国，虽然要去了，还要同这“升平世”“物我同春共万旬”。这诗词可视为他一生的总结和对祖国、人民的期望的作品。

1992年2月

著作万篇难成一传 ——记罗尔纲先生

罗尔纲先生诞生于 1901 年，与本世纪为同龄人。

罗尔纲先生研究太平天国，始于考证张嘉祥的事迹，若论时间已在六十八年以上了。其研究太平天国史著作等身，而治学严谨，更为一代师表，有如他考证之《李秀成自述原注稿》是经四十九年笺注而成之作；近年推出的《太平天国史》八十八卷凡一百五十万字，苦心耕耘半个世纪。

我对罗尔纲先生仰慕已久，在约组《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时，他是第一批征求传略的对象，但是时间已过了十余年，罗先生的传记至今尚未得到。此间，与罗先生常有书信往还，除 1989 年以后的两封信是其女儿罗文起代复外，其他信函都是他亲笔书写的。

罗尔纲先生第一封信写给我的时间是 1982 年 1 月 31 日，那时《传略》丛书已出版一、二辑，在《晋阳学刊》选载学者传记也有 20 篇，于是有此信。信中说：“至命撰自传一事，因有师承问题，难于下笔，未能遵命，伏维见谅为幸。”随信寄来《论湘军》论文一篇，并说明是《湘军兵志》第一章《总论》，发表时先改此题。到 1988 年 6 月和 9 月先后收到罗先生两信，其一告他传由广西某大学的老师撰写，其二又告传稿学术思想不足，“距离尊处要求太远，难以应用”。从“师承问题”到选择传记作者，时间已过了七八年，但先生的想法毕竟有了很大的变化，我是十分高兴的，于是才有 1988 年底的拜访，意图是想尽快促成传记的完稿。

当我登上罗先生的居之楼梯时，只见门上贴着：“本人有病，概不会客，有请到新楼罗文起联系。”见此状，我则退下楼来，可是凑巧遇罗文起上楼，呼其名说来意，她让我上楼进屋坐叙。进门后，她与我谈：父亲一则广西话，二则不善言谈，三则血压高。一兴奋可能影响睡眠，弄不好还可能有意外，故而家人对来客挡驾较多。父亲一般不见客，不出席会议，不参加集体活动，甚至也不下楼；平常与子女研讨学问，也须互相用纸条子的方式交流；不过思维很清晰，对问题反映很敏捷，写作速度很利索，整天一个人伏案工作，他的著作都是这样完成的。对他的自传，自己不写，今年虽请广西一位同志写，但写出后觉得难以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此事尚无着落。我动员她帮助其父完成，或口述，或记录，她觉得很难办到，怕不答应。中间，她看到其母起床了，遂将我到访的事通告其父。大约十多分钟后，罗先生拿着一份前说到的传略稿复印件和他为自传所拟提纲来到客厅，寒暄时说了几句普通话，当谈到正事时，就需要罗文起翻译了。

罗尔纲先生说：“《传略》之组织和出版功德无量，意义很大，是现代学术史上的大事，我已购得四册，希望在山西能购得五至十辑。我所以一直未诺写传，主要碍于师承，与胡适先生有关系，直到最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种书，中国近代史所荣孟源还在文中说什么‘胡适之流’，充满着左腔味道。在传中，吹捧不行，贬低也不行，自我张扬也不行。今年所以要写，是《人物》杂志上发了一篇，你来信要写治学和学术思想，于是我请原篇作者来写，可是写好一看，却发现作者对我学术思想理解是隔靴搔痒，认识很不深入；我在原稿上改删很多，但改到一半时，改不下去了，只好将原稿退还本人。了解我的人，是最早调到广东社会科学院的一位，其次就是广西的这这位，我给了他资料，专门拨了经费，成立了教研室，还在我从事学术研究

60周年纪念会上报告我的事迹。现在看来，广东的没有联系了，广西的难以胜任，我只好请罗文起整理了。我已拟了一个提纲，是仿照《浮生六记》的格式拟的：童年记、困学记、改造记、探索记、考证记、抗病记。大约可写25万字，还向所里报了项目，但是生前不计划出版；这个六记的提纲，是第一次让外人知道。至于给你们的自传，我提供资料和构思，由文起整理，最后由我修改定稿。”在辞别罗尔老时，他赠我著作二种：《困学集》、《太平天国史丛考甲集》，并亲笔题签。

到1989年1月16日，罗尔老在收到《传略》丛书五至十辑后，来函称“先生主编这部大型丛书，功在不朽。承收小传，至感光荣。”并告曰：“拙著《书呆子六记》已脱稿。其中学术思想、考证方法两部分甚难阐述，子女等了解更非易易。现已命罗文起先读一遍，由第二小儿罗加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帮助。他们须读懂后才能执笔，而如何写法又是大问题。因此，今年3月必不能交卷。何时能奉上，须看他们工作而定。总之，辱承先生多年垂注，并亲临寒舍见教，纲一定将小女等草稿一改再改，使大体象个样子，才能奉上，断不敷衍塞责也。”信中还告邮来书款，连邮费三元钱都考虑到了。

同年8月8日收到了罗文起来信，告以坐浴跌伤，至今未愈，“因而他撰的《困学五记》写到第三记即未能续写。由于家父自传未写成，故我未能据以写简传，一俟他病痊愈写成《困学五记》后，即写简传奉上不误。”

时间又到了1991年12月27日，罗文起又来信提及郭毅生所写《罗尔纲先生的治学风范》。“我父亲看了，以为写得不错，叫我复制一份寄给您，请您审阅是否可用。如可用，有何修改之处，请直函郭毅生教授。”随即，我复函罗先生同意由郭先生撰传，并附传约信二式，请罗文起同志转送郭先生为盼。

可是一直未见有联系的文字，于是又在去年8月给罗先生去信。此中我猜想罗先生很可能又有了新的见解和新的要求了。从十余年约传的接触过程中可以见到这种严肃态度，在刘大年、黎澍等先生处也曾听到过奖誉他有几十年删改补充一著的高标准、严要求精神，这正是大学者的风度。

1993年1月

革新教育与革新社会 ——记雷沛鸿先生

1992年12月17日《社会科学报》上刊登了莫增荣的大作：《陶行知：唯一从总体上探索中国教育的智者》。文称：“陶行知不同于其他教育家的地方恰恰在于他的宏观性。他是中国教育史上唯一堪称从总体上探索中国教育生路的教育家，他对中国教育的贡献具有宏观意义。”又说：“综观陶行知一生的教育理论建树和办学实践，他不同于中国教育史上的任何其他教育家。以陶行知的同时代人为例，蔡元培的贡献主要见之于高等教育方面；黄炎培的贡献主要见之于职业教育方面；陈鹤琴的贡献主要见之于幼儿教育方面，等等；而陶行知则不同，他的目光所及，是探索中华民族整个教育的出路问题，或者说是命运问题，他的贡献具有总体意义和全局意义”。作者强调指出：“正是应当从这个总体基点上，去评价陶行知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重要价值，确立他在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特殊地位。”

我为《社会科学报》“学人春秋”专栏的撰文计划中，原本就列有教育家雷沛鸿先生的篇目。现在有感于莫文的立论，于是想先论雷先生。此外，我并不反对从总体上、从宏观上评价陶行知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所要指出的是莫文的主观、武断和偏颇，把他所论的对象推向了“唯一从总体上探索中国教育的智者”。不但是中国教育史上“唯一”从总体上探索中国教育的智者，而且是“唯一”的“不同于中国教育史上的任何其他教育家”的“智者”。这种突出一个，不顾其他的思想方法，我以为不足取。例如我认为，雷沛鸿就是“又一位”从整体上探索中国教育的智者。

雷沛鸿与陶行知属同时代人，但是由于解放前后客观环境的制约，雷沛鸿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思想之弘扬则难以实现，尽管他的教育思想体系如何具有宏观性而总体化，可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却难倡导和几乎被否定和淹没。后来他的教育思想及其理论被肯定，被在一定范围内实施，时间已晚至80年代初，即使如此也常常受到一些思潮的干扰。在这一点上，作了不懈努力的，我们自然会想到雷先生之遗孀马清和女士和广西区人大教科文卫委主委韦善美先生以及他们的一批同仁。由于他(她)们的识见远大和坚定不移，才使得这位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已著名的教育家拭去历史的蒙尘而彰明当世。

雷沛鸿1913年公费留学，在国外半工半读，先后近十年，专习政治学兼攻教育学，更留心各国之基础教育，深感教育为建国大业之根本要图，并立下要在中国教育事业上“为此一代，后一代，后数代国民身心发展而尽力”之宏愿。他1921年回国，执教于国内各著名大学多年，并五度出掌广西教育行政，数次赴欧美及南洋诸国考察教育。仅教育论著有数百篇，约二百万字，在教育理论方面自成体系；就教育业绩而论，先后致力于普及国民基础教育，创制国民中学，创办西江学院，在教育实践方面亦有系统、有计划的实施。

雷先生认为“文化是教育的来源，教育政策的理想的内容，乃是根据民族文化的遗留”。人类为着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必须把人类社会积累的经验亦即文化传授他的后代，这是教育之所以产生和不断得到发展的原因。“文化演进是教育变动的主导，文化变动教育就随之而变”。文化的时代性和空间性决定了教育的时代性与空间性。一定的历史时期或一定民族的教育方针、教育政策、教育内容因一定历史阶段或一定民族的文化不同而变化。

雷先生尖锐地批评民国以来的学制改革，一方面盲目模仿外国，一方面

凭空想像，脱离中国的现实社会和自身的生活动力。为此，改来改去，都不能适合中国的国情。他反复强调，必须要在中国文化的根基上，积极吸取当今世界的先进民族之经验，建立“土化的”“中国化”的教育，这就是大众化、中国化的民族教育体系。他主张“教育的寄附体是社会，教育改造与社会改造不能分离。革新教育是改造社会的助力；革新社会是改造教育的基础”。这种把教育改造与社会改造相辅相成的改造论，无疑是从宏观上、整体上思考和构想的。

雷先生把教育改造的目标从属于他的社会理想和教育理想。他声明要“以全副精神注重于教育的大众化”，他把大众化和中国化作为教育改造的方针，企图完成“每一个人自初生以至老死均能与教育为缘的教育制度”，这个构想难道不具有宏观性和整体性吗？

雷先生在教育改造的实施方面，同样有着许多宏观的、整体的伟大尝试。在普及国民基础教育中，主张儿童教育与成人教育并重，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合流；迫于当时困难深重，强调既要救亡，又要救穷，提倡以爱国教育为灵魂，以生产教育为骨干；基于当时之国力不富，分别对不同年龄的儿童、青年、成人提出受教年限的不同要求，并有一所三用、一人三长的组织措施。雷先生于1935年提出创制国民中学的设想，用意在于桥接国民基础教育，提高国民文化，并改变中学教育即升学教育的单一格局；他认为，大学教育的功能应当是研究学术，培养人才，传播智慧。他还设立了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和广西教育研究所，并亲任院长和所长。雷先生深知教育改造的艰巨，为使教育设想变成现实，必须通过教育立法，所以从1933至1936年，他又主持草拟教育法规性文件八十二件，然后通过政府法令的形式颁布实施。

关于“五四”时期至解放前夕的教育家，有的学者曾将之分列为五大类，并进行了比较研究，其道理自比莫文之“唯一”性要科学，故附于后参考。(1)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徐特立、吴玉章、杨贤江、成仿吾、车向忱。此为共产党员教育家。(2)蔡元培、马相伯、陈嘉庚、张伯苓、梅贻琦、李建勋。此为主持或创办高等学校的重要代表人物。(3)鲁迅、林励儒、叶圣陶、许崇清。此为进步的教育家。(4)黄炎培、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俞庆棠、雷沛鸿。此为国民党统治区乡村教育运动的代表人物。(5)孟宪承、廖士承、吴俊升、舒新城、邱椿。此为发表过许多教育论著，语调比较平稳的教育家。在第四类中将六位均列为乡村教育运动的代表人物，不过这样似乎把雷先生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地位局限了。雷先生的主要贡献虽在广西，但其所创建的民族教育体系的理论与实践及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其创造性和学术价值、社会价值，恐怕正在于它有着全局性的宏观意义。

1993年4月

知耻近乎勇

——记启功先生

启功先生不仅以诗书画著称于世，而且精于古书画鉴定和碑帖之学，更令人景仰者是其博大的胸襟和高尚的品格。

我了解启功先生，一是拜读其人著作，二是接触其人处事，三是闻其弟子介绍。而前二者，又多数与后者有关。

在我的楼下。就住着启功先生 50 年代初的弟子马遵骝先生。我从他处借到《启功丛稿》、《诗文声律论稿》、《论书绝句》、《启功韵语》、《启功书法作品选》等著作和书画来读，在书之扉页上都有启功先生的亲笔赠语和印章；在他之书房，悬挂着启功先生 1985 年春书赠的条幅：“潮来万里有情风，浩瀚通明是长公，无数新声传妙绪，不徒铁板大江东。”近几年，他著述不辍，有《饮水诗笺注》、《纳兰成德词和赋笺注》等书，启功先生不仅为其写序言，而且为其题诗曰：“勃海金源世可知，朱申奕叶见遗思。岂唯孤矢威天下，有井人歌饮水词。遵骝先生笺注。”可见其师生情谊非同一般。

启功先生是爱新觉罗家族的成员，自清世宗雍正皇帝开始，名字按胤、弘、永、绵、奕、载、溥、毓、恒、启排列。启功先人弘昼同乾隆皇帝弘历均为雍正皇帝胤禛的儿子，弘历是四子，做了皇帝；弘昼排行第五，被封为和亲王。在《三希堂法帖》后边的诸层衔名中，头一位即是“和亲王弘昼”。清代爵位只能由长子继承，到启功先生曾祖父时，不但没有爵位和封号，连财产也没有了什么了。从此，其曾祖父只好走上了读书应科举求功名的仕途，曾祖父和祖父都由举人而中进士再入翰林，出任文职官员。这样一来，启功先生家虽然与皇室同宗，但是并未享受过皇亲国戚的待遇，而只是过着一般的中知识分子家庭的生活。

说到启功先生的个人经历是这样的：生于 1912 年，周岁时其父即故去，跟着祖父生活；十岁时祖父亦逝世，靠先祖任主考学政时的门生帮助度日。由于生活过得十分艰难，所以启功先生高中尚未毕业，就去教书养家糊口了。又由于没有文凭，他看够了人们的白眼和吃够了苦头，幸亏得识陈垣先生，知其有家学渊源，不仅文学、史学曾受教于老先生，而且古典文学有其深厚根基，于是陈垣先生将他由教中学而聘到辅仁大学执教。解放后，院系调整，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授。可是在 1957 年被错划为右派，作降级降职处理，“文革”后平反改正。虽然有些曲折经历，但是启功先生仍未改其旷达、潇洒、幽默之个性风采。

我读《启功韵语》不止一次，但是每次都乐此不疲。书中之《贺新郎·咏史》等佳篇使我爱不释手，此处我录下其《自撰墓志铭》：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这显然是他六十六岁时所咏。诗中颇多自我调侃，所体现的是诗人淡薄名利的胸襟。最感人的要算《痛心诗》二十首了，在其夫人章宝琛因病于 1975 年去世后，作者的诗并无一般悼亡诗的陈词滥调，而是以十分朴素的语言，表达出与亡妻生死相依的感情。仅录若干句以示一斑：“结婚四十年，从来无吵闹。白头老夫妻，相爱如年少。相依四十年，半贫半多病。虽然两个人，只有一

条命。今日你先死，此事坏亦好。免得我死时，把你急坏了。”虽然文字平白无奇，但却令人有摧肝断肠之痛。

启功先生少时喜爱绘画，但对书法则志不在此，“并没有学画的那样志愿”。弱冠时，“一位长亲命我给他画一幅画，说要裱成挂起，这对我当然是非常光荣的，但是他又说：“你画完不要落款，请你的老师代你写款。”这对我可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使我感到‘奇耻大辱’。从此才暗下决心，发愤练字。从这事证明，愤悻实是用功的起点。”（《启功书法作品选自序》）古语云：“知耻近乎勇。”由此而发愤、而勤学、而持之以恒、而成为当代著名的书法家，至于早年之画名反倒不彰了。启功先生每当谈到这件事，仍深有体会地说：“现在回想起来，还真得感谢这位表舅的一激。”

前面提到了陈垣先生。去年岁末，报章登载：北京师范大学设立励耘奖学助学基金会。这是启功先生为了纪念恩师陈垣，一手设置起来的。关于以其恩师命名设立基金的事，启功先生前多年就有此打算，用设立永久性奖学助学基金的办法，纪念恩师，奖掖后学，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方案定下后，启功先生就以自己的字画精品筹措资金，加上他平时为人作书所得报酬，共有163万余元，全部作为基金会基金。励耘书屋为陈垣先生生前书斋名，所以要以励耘作为基金会的名字。用启功先生的话说：“我之所以有今天，是因为有我的老师陈垣先生，没有我的老师，就没有我启功的今天。”道理虽然如此的浅显而简明，但是要实践这个道理，对于每个人来讲，却并非是容易办到的。这种尊师重道、慷慨无私之风范，在如今之社会风气下，岂不显得更加难能可贵吗？！

在《启功韵语》中收有一首《晋阳学刊题辞》，辞曰：“示人以宝藏，饮人以醇醪。比崇山之幽幽，如凌云之飘飘。洛阳以三都而纸贵，晋阳以一册而名标。信吾民之精神与物质，将益臻乎文明之域，而收显效於普及与提高也。”原题辞中还有：1982年夏日奉题。晋阳学刊。启功书於首都的内容，在编入书时略去了。这是启功先生在《晋阳学刊》创刊三周年时的题辞。其时，我以试探的心情向启功先生写了一封信，并附赠三年的《晋阳学刊》供他参阅。可是过了约半月余，一件挥洒自如的书法题辞就展放在我之案头，先生对《晋阳学刊》的提携奖掖之情充溢于辞中；虽然先生之过誉，使我愧不敢受，但是先生的企盼之望，我与我的同仁们却是领悟到了的。后来，由于我的书呆子气，在送往印刷厂制版时竟未及复制附件，致使启功先生题辞原件丢失（实际是懂行者偷窃去了），制版印刷时又使字形失体，丧损原墨迹风韵。尽管事后，我曾写信向启功先生检讨道歉，但不知他原谅我的失误否？时间到了1991年下半年，我主编的《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大辞典》近竣稿，想请启功先生再作题签。可是每当想到前事不检，总有汗颜不便启口之感。于是想到请遭骊先生帮忙，起初他也觉得为难，因为先生已年八十高寿，《索画》诗又说：“左臂行将枯，左目近复坏。”恐怕不能再给写了。他说试试看吧。于是亲笔去函，内中还附上我之再请“恕罪”之情；这次我之心情更为忐忑，但是不料启功先生却真的写了书名寄来，事实说明了他对我之失误是谅解了的。这样一来，《大辞典》的封面由启功先生书名，扉页则请古文字学家张颌先生篆书，序言约请社会学家雷洁琼先生撰写，终于如期发稿于出版社。

我虽然未见过启功先生，未直接聆听过他之教诲，但是他使人崇敬的形象，却难以忘怀。

1992年4月

笔走龙蛇七十年 ——记靳极苍先生

靳极苍先生在山西大学，然我认识他却很晚。在我书架上，有一部日本人桥川时雄编纂的《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出版于1940年，收入中国现代文人学者五千余人，其中有位靳德峻，后经核对就是靳极苍先生。靳先生名德峻，字极苍，解放后以字行。

由于他之学术上的建树，在30年代已经为社会所认可。想不到这本总鉴，竟成为我与靳先生交往的引荐者，之后我们竟成为忘年之交，在近几年差不多每月都有几次会面。在多数情况下，总是我去他府上，偶尔也有他敲我门的时候。因他年事已高，一般我都拒绝他来访。如果有一段我顾不上去他家，他也可能就突然闯上门来。

我们每次相聚，都有着可谈话内容。开始是谈论他的自传，诸如念书、师承、教学、研究和著述，后来谈学术上的问题，每着手一个研究题目和写成一篇东西，都愿谈论一番。靳老不仅经历丰富，而且感情丰富，甚至连语言文字也是丰富的。虽然已到耄耋，但是记忆力好得惊人，逻辑思维清晰而迅疾，写作速度很快，这一切都基于他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靳老有打网球的习惯，直到进入八十岁以后，每天上午都要在球场鏖战一二小时，雄风不减当年，球锋不逊青年，有时为一球竟能争得面红耳赤。靳先生因言获罪，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长期劳改，下放农村，这一坎坷就是二十多年。然在这期间，他心中之希望始终未泯灭，坚信真理，不断地追求，保持着一种坚韧的精神状态。当1981年返回山西大学时，虽已七十四岁高龄，但未经休整很快就进入了教学岗位，并进入他学术著作的又一个高峰期。

靳先生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30年又考入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陈垣是其导师。为何他的学术视野那么开阔呢？我在他一组《我和我的老师》的回忆文章里，知其在校期间，先后听过梁启超讲《中国文化史》、鲁迅讲《中国小说史》、胡适讲《中国哲学史》、黄侃讲《说文解字》、黎锦熙讲《国语文法》等，这些中国现代世界级的学者，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还是在校的1926年，靳先生即开始对王国维《人间词话》进行笺注。本想请教于王国维，未料书刚完成，王国维却逝世了。于是由钱玄同定名为《人间词话笺证》，由黎锦熙题签，由北京文化学社1928年出版。这是最早的《人间词话》注释本，曾在两年里印行两次。接着他在《益世报》连载《校勘学示例》，在上海出版了《史记释例》。在30年代，又出版《国语文法》、《国学概论》、《中国文学简史》等几种教学用书。在他37岁时，被南京中央大学聘为教授。因为《人间词话笺注》既是靳先生的处女著，又是奠定他终生在注释学领域耕耘的基础著，所以我在这方面向他请教的次数为多，得到的印像是这样的：

《人间词》是王国维早年词作的总称，分为甲、乙两稿。甲稿六十多阕，1905年作于苏州。乙稿是1906—1907年因父丧妻亡曾两度南返归家，于北京或于海宁所作。甲、乙两稿，先后刊于上海《教育世界》杂志，各有一篇署名“山阴樊老厚”的序言，皆为王氏自托之作。所以，解放后出版的《人间词话》，都出版了这两篇序。《人间词话》是王国维的词论专著，始连刊于邓秋枚(实)主编《国粹学报》(上海)，这是王氏生前手定的《人间词话》。

后来出版之《词话》有的变动了编排秩序，已非作者原意。这些词话发表时，正值辛亥革命前夕。在接踵而来的社会变动中，王国维随罗振玉举家流寓日本，已经由词而戏曲，又由戏曲而转攻考古、历史。直到1926年2月，才由北京朴社以单行本出版，标点者是俞平伯，并作有序。可以说，认识这本寥寥四千余言的词话的重要价值，并揭示其要点，此乃第一篇文章。自此以后，《人间词话》流传日广，数度再版。

进入80年代，靳先生先后有《唐宋词百首详解》、《李煜李清照词详解》、《长恨歌及同题材词汇编详解》、《诗经楚辞汉乐府详解》、《中华爱国诗选详解》、《阮籍咏怀诗详解》等书脱稿。与此同时，他在多种场合和报刊上提出了自己的注释学理论，并且自认为自己为注释学家。关于相关内容，《新华文摘》曾全文转载了他的两篇论文，一篇是《应把“注释学”建为一专门学科》，一篇为《对中国语言及古籍〈经〉和〈传〉的重新认识》。后者是他在被美国传记研究院邀请为顾问委员会荣誉顾问（他已是美国世界名人协会终身会员、顾问，并被推荐为副主席），该院和英国传记机构在剑桥大学联合召开世界学者有关文化艺术交流会议时，准备的大会发言的主要内容，只因其年高不能赴会，故先行在国内刊物上刊载。

靳先生提出注释学，是以他六十多年之科研和五十多年来之教学实践为基础的。他认为现在通行的注释书和课堂教学中存在若干弊病亟待改革，仅在古典诗词注释方面即有十弊：一是解词不解句；二是解句不解章；三是难解者不解，易解者查查注释搬家而繁解；四是解与不解相等；五是用普通语言构成的形象，因无难词典事就不予以解释；六是注释忘了作者违背了作意；七是特殊语词解成一般，一般语词解成特殊；八是不同的解为相同，相同的解成不同；九是引书不查原著，有的竟意改原文；十是不寻语源妄加注讲。

由此，靳先生提出了“三体会三解释”的改革方法：所谓三体会，就是体会作者、体会作品、体会形象；所谓三解释，就是文学作品中每个词语典事，都可能三种解释：一是原意本事，二是用到各该处所的具体意义，三是构成形象后的特殊意义。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摆脱那种学究式的和片面的古书注释方法，也才能古为今用，古书为现代读者服务，使古诗词的研究尽可能地走向普及。

1994年12月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 ——记邓广铭先生

我与邓广铭先生的亦师亦友之交谊，若从 1980 年算起，至少也有十六个年头了。在这十余年中，见面有四次，通信有四封，可算是走近先生的观察，文章也就从此作起。

在我主编《晋阳学刊》的同时，策划了一项抢救中国现代学术史话资料的项目，即通过约组《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丛书来实现以上的构想。当时，所以产生这个构想，主要有感于 1949 年后政治运动频繁接踵地进行，一大批由旧社会过来的著名学者，尽管他们早在本世纪的前半期已经成就斐然，但却只能在新的政治风浪中被动浮沉，而在学术领域里则变得无所作为，当“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或到政治上得到平反解放时，他们的生命已到了黄昏之年，即使有鸿鹄之志，恐怕也难作千里飞行了。于是想到了抢救学术史话资料的事，举措则是通过撰写自传或回忆录来实现。

当把我们的构想和举措以约稿的方式，通知有关的学者时，其反映之热烈和响应之迅速，均出乎人们预料之外。这其中最早复信支持这件事情者，就有邓广铭先生。信的时间是 1980 年 5 月 8 日，信曰：

来函收悉。

贵刊要编辑出版《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但是，要把我的生平列入你们编辑的《传略》一书，实在不敢当。我虽已年过古稀，但并无甚么太大成就。容自个努力工作二十年，或许有可能值得写一些传略性的文字。

另外，关于翦伯赞同志的传略，可请我系张传玺同志撰写。他曾是翦伯赞同志的学生和助手，最近在《北京大学报》等刊物上正写有几篇关于翦伯赞同志革命一生的文章。此事请您们直接与张传玺同志联系。

信是用“北京大学论文用纸”横向竖写，毛笔字的功力使我想起他 1946 年代胡适向陈寅恪先生回信时的神韵（此信存我斋）。在我将刊载《季羨林自传》的《晋阳学刊》寄赠邓先生时，他还曾在多种场合，甚或给学生讲课时，既称赞这项工作的意义，又推崇季先生自传的特色。邓先生此举也曾受到人们的喝采，也令我辈增加了工作的自信和力量。

邓广铭先生 1907 年生人，早在半个世纪前，他的《宋史·职官志考证》就受到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高度评价，在是书序中称“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又指出：“先生则始终殚力竭智，以建立新宋学为务，不屑同于假手功名之士，而能自致于不朽之域。”后来，他又敢于面对梁启超兄弟所撰《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疏证》二书中之不足，推出了《总辩证》，同样受到陈寅恪的赏识，同时得到了中华教育基金会的资助。作为有志者的邓广铭，竟历时二载埋头于北平图书馆，完成了他的奠基之作《辛稼轩年谱》和《稼轩词编年笺注》。前者开了宋人年谱体之先河，后者被名家誉为“传世之作”，当时的著者年仅三十岁出头。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时，他又出版了力著《岳飞》一书。从以上所列举之著述，不难看出邓广铭先生本已是现代宋史研究的宗师，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中怎么能没有他的地位？在约组现代学人传略时自然也不应缺少他的名字。

然而，他却在信中表明二十年内不考虑作传。起初，我以为邓先生是谦

恭之态，可是经过我四次上门访谈游说，使我终于坚信他的表态并非故作清高，而是他所恪守的言必信、行必果的人生宗旨。第一次上门，大约是1981年春节过后，在访过同住朗润园的陈岱孙、王瑶、季羨林、宗白华诸先生后，即登门造访邓先生。其时，商鸿逵先生也在坐，尽管商先生不时为我打边鼓，劝说邓先生入传，但仍无济于事。由于我一再进逼，邓先生忽然施了一个缓兵之计，他当年正任中国历史学会执行主席，表示愿在执行主席卸任后考虑。当执行主席改任他人后，我二次访他，结果他又回到了二十年后的答复。第三次动员他入传，时间又过去了几年，可是仍无结果。到第四次，为了稳操胜券，我还特意邀请一位朋友作帮手上阵；邓先生每日上午都要去办公室亲自取书信报章，步行往返，作为休息调剂，恰在路上相遇，他一见面即先声夺人：“一定是又来催传，我看你已经成效显著，《传略》丛书已经出版好多辑了，确实值得道贺！但是每个人的情况不尽相同，可否有特殊例外呢？”我问如何特殊例外，他答：“如果一个人思想不通，可否容许人家继续考虑，待条件成熟了再入。”到此，我已无计可施，只能佩服先生的坚定精神，也只能尊重先生的自我选择。

时间到了1988年，我又筹组《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大辞典》的编纂，涉及类似邓先生的情况如何处置，又使我犯愁起来。一部学人辞典，总不能将该不该缺的人漏掉的，但是本人拒绝提供有关资料；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根据已掌握的材料撰写这些人的条目，不怕字数少，只求文字的准确和评价的客观。而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出力不讨好的事情，常常怀着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批评甚或发难。《辞典》出版后，我以试探的征求意见的态度向一些长辈学者发了样条和征订单，其中自然少不了邓先生。邓先生不仅有回信，而且还尊称我为“同志老友”，信说：

来函及所附我的传略，均已诵悉。十多年前，曾允诺老兄待我二十年后自写传略相奉求教，你幸而未上此话的当，因为，迄今尚未满二十年，我已经头脑昏聩，耳聩眼花，手臂颤抖，成了一个几乎丧失了劳动力的半残废，如果不由你“擅自”代写，我也将难以报命了。此传略中，只是所举述的我的“代表著”，有些选择不甚恰当之处，但全文皆是经你亲自斟酌费神写出的，所以基本上我是同意的，而且对你是非常感激的。承示此典乃借债出版的，为酬谢你对学术文化事业的这种热忱和无私，今寄上书款九十五元，即请惠赐一册为盼。

从回信看，完全是长者风范和学者雅量，尽管我“擅自”代写了他的辞条（他称为传略），还在举述他“代表著”方面“有些选择不甚恰当之处”，然也未表现出责备的口气，而仍奖掖我之对待学术文化的“热忱和无私”，同时对于“借债出版”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同情。从来信的笔迹上见，即使用硬笔书写，已难见当年毛笔的挥洒，确如他所说“手臂颤抖”了，甚至有的字迹尚需费神方可辨认。此时，我倒怪罪起自己的唐突打扰之举来了，悔不该以此等琐屑之事麻烦一位九旬老人！

邓广铭先生早年师承陈寅恪、傅斯年和胡适之诸师，其师之深思严谨的学风，他自始至终以其师法治学。从朋友处得悉，邓先生虽年高九旬，目前正在改写自己曾在读者中有声誉的著作：《陈龙川传》、《岳飞传》、《辛稼轩传》和《王安石传》。致于所以要改写，当然自有其原因和理由，陈传完成于大学毕业时，现今看来已感到过于粗浅；岳传则由于阶级斗争理论年代的烙印，大有修正的必要；王传更有儒法斗争、批林批孔的影响，未免滑稽可笑，不删除不行；……先生原定九十岁以前，修定四传，然鉴于身体状

况的变化，每日写作速度，过不了千字。今年适逢先生九十寿诞，然我们所见到的，仍是一位生命不息，耕耘不止的形象。每当想到这些，就会增加自己的惭愧之情和责怪之感！甚觉多年来，对邓先生理解的太少！

1997年3月13日

独居高楼再自修

——记谢兴尧先生

最近在《读书》上读了谢兴尧先生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回忆〈逸经〉与〈逸文〉》（1996年第3期），另一篇是《记大高殿和御史衙门》（1996年第5期）；又有幸购得他《堪隐斋随笔》，于是勾起了我与他十多年前的一段请教和交谊的经历，三者互为参照着读，使人更感到品不尽的兴味，受不尽的教益。

70年代末，我受权筹创《晋阳学刊》，同时也设计自身早已荒废了的专业，遂确定了研究中国现代学术史的领域。待研究领域有着落后，鉴于当时学界有一批世纪初出生的学者已届耄耋，应将抢救学术史料作为最迫切的事情。接着以《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为选题，开始了约组行动，于是有了我与全国许多著名学者的联系和交往。

我与谢兴尧先生的接触和聆教，就是这种情况下开始的，直接的动机是邀约他写自传，时间约在1980年下半年，他于次年元月二日复信，表示“惟嘱自写传略尚待研究，因细读大函要求是治学经验、治学方法、治学实践等等，必须能够有益后学，反躬自省，我系一学而未成之人，虽然在某些时候浪冒虚名，究无实学，有何可言、有何足写？惟与书打交道者已半个世纪，亦想作些研究工作未能有成心亦响往，俟想想看、试试，如能写出当于十五日至廿日左右奉上，请你们指正审查”。后来，自传实际是在1982年底才收到的，又为著作目录、照片和征询有关学者地址，曾先后通信七、八封，对我之请求，可谓有求必应，全力给予了支持，使我感念至深。

我记得有一信，是答复我关于马衡、孟森、吴虞、陈大齐传之提问的，“关于他人传记，马衡，不知他的儿子马彦祥（搞戏剧的）能作否？如不能，则以傅振伦最合适。傅系北大史学系毕业，专长考古及史学，为马所赏识，毕业后到故宫工作（马系院长），英皇爱德华加冕，傅曾押运古物到伦敦参加盛典。昨天我打听，他现在还在历史博物馆上半天班，住在前三门，楼房号头不详。……孟森先生传，有民族学院的吴丰培（玉年）、北大教授商鸿逵，他们和孟的关系极深，孟的遗著即由他们整理。吴虞离时代稍远，我在成高时，他曾给我们讲古文，日前荣孟源同志谈，他正研阅吴虞日记，其中部分有经济价值云云，未详谈，不知四川还有无先生了解他。陈大齐系留德学者，系资产阶级哲学家，后离北大任国民党国民政府考试院长，对学术界和社会的影响不大，教我中国哲学的有马叙伦，后来胡适，我已离校。关于诸人所知有限，聊供参考。”所以抄录信的内容，我是想让读者了解谢老的平易近人、助人以诚的精神。我也不想隐瞒我的想法，关于学术上事，也曾与一些颇具革命味道而又有一定官位的学者接触，但与谢老一类学者相较，总觉得他们所缺少的恰是这种谦恭随和的风度，发现有些人的架势倒比学问大些。

拜读谢老《读书》上两篇回忆文章，将我之思绪自然地拉回到了80年代上门请教先生的情景中。当年他住址在北京安定门外西河沿，造访原因是催促自传和请教有关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些问题、主编学术刊物的有关问题。经过这次拜访，谢先生加快了自传的速度，于1982年底写毕，编入我主编之《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七辑，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记得在自传末，先生赋诗一首，诗曰：

一别红楼五十秋，学而未成已白头。

典籍深渊难探索，文物遗址拟追求。

喜闻师友谈古今，未将黑白逐时流。

晚年幸福多珍贵，独居高楼再自修。

诗虽仅八句，然而却可视为他一生经历与治学的总结。近读《堪隐斋随笔》，其中一篇又提及此诗，只是诗中二、三、四、七、八句，都重新作了文字上的修饰和改动，但诗之主题并未变。此篇题目是《读书有味聊忘老》，写作时间为1994年2月24日。从中不难看出，以先生出生于1906年计，今年恰是高寿九旬之翁了，用其1982年的诗说是“独居高楼再自修”，以他1994年诗句是“隐居蜗庐再自修”，反正至今尚在不辍地笔耕着，确可称是一位“忘老”的学者。

那次谈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主要者有二：

其一，治学与师承。先生于1926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1931年毕业后又入北大国学门研究所。史学系系主任是朱希祖(逖先)，教授有陈垣(援庵)、陈寅恪、邓之诚(文如)、马衡(叔平)、原田淑人等；国学门研究所主任是沈兼士，虽未直接听过孟森(心史)的课，但却多次请教过学问，受益良多。在学期间，还有幸聆听过章太炎、胡适、钱玄同等先生的讲学和讲课，多所受益。在北京大学就读，本身就生活在很浓厚的文化学术氛围中，加之又有一批文化学术造诣很高的大师作导师，其所培养出来的弟子自有其深厚的素养是不成问题的，只要从谢先生等后学身上，是不难看到优秀的文化学术遗传因素的。

谢兴尧先生说：“我的老师，他们对我经常指导，我向他们不断学习，他们的著作，我都细读，我常听他们的言论，对我作学问，作研究，很多启发。于默默之中，我似悟出一些作学问的道理。”他在逐一讲述了从朱希祖、孟森、陈垣、陈寅恪、邓之诚等导师那里悟出的道理后，认为几位老师，虽然各有专精，而他们都是无所不通，“这给我一个总的印象，即是要作学问，要研究历史，就需贯通古今，文史不分，文史合一，兼及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否则是学不好的。这就是我在学术思想上所受的影响，也是简单的学习经过。”何谓治学？何谓师承？治学与师承有何关系？我以为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受师教、读师著、与师交的过程中，要悟出一些作学问的道理”来，形成自己的治学方向及其特色，才可称得上是学术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其二，办刊与作者群体。谈到办刊物，我在拜访前，即知道他先后作过《逸经》、《逸文》和《新生报·文史周刊》主编，有着丰富的办刊经验；加之我亦主持《晋阳学刊》笔政，极希望谢先生谈谈在这方面的见解，我们于是更有了共同的话题。

他说到主编《逸经》、《逸文》和《文史周刊》的情况时，着重强调了自己是学者办刊，往往是与专业结合在一起的，以刊物为园地，既是编辑，又是研究者，有时是以编为主，有时是在来稿启示下又着重研究些题目，又编又研，编研结合，可谓相得益彰也。

谈及刊物的作者群，谢老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刊物办得有无特色，能不能吸引读者，关键在于有无一个具有学养深厚的作者群体；而一个刊物有无有写作实力的作者群，又决定于刊物主持者的学术见地及其办刊风范，如果没有文化学术的兼容精神，当然也就吸引不了优秀的作者，又何谈得上作者群呢？“《逸经》是文史半月刊，简又文是社长，我是主编，当时计划分工，北方约稿由我负责，有周作人、俞平伯、萧一山、谢国桢、谭其骧、

王重民、傅惜华、徐一士等。南方由简又文负责组稿，由柳亚子、冯自由、刘成禺、冯玉祥、郁达夫、赵景深、许钦文等。”《逸文》为文史月刊，与《逸经》前后相距十年，然作者群多数系《逸经》旧人，所以刊物质量仍不逊于《逸经》。

谢老说他虽作过编辑，但在多数情况下是作者。作为作者，“我曾为多种报刊写稿。我的专业是太平天国史，在研究过程中，常写些笔记、杂文，于是投于北平晨报副刊。我从1931年开辟‘洪杨卮谈’专栏，而题目却是邓之诚先生给出的。当他写出‘洪杨卮谈’四字后，看到我有些不解，又特意解释了‘卮’字，卮是酒器，不能倾斜，常说的漏卮，是一点一滴地流出来的，你作文连载，只能是小文章，题目不可过长。就这样，在总题‘洪杨卮谈’之下，竟写了近百篇，直到次年四月止。有篇长文是《忠王李秀成之死及其供词质疑》，刊出后受到师友们的赞赏。作为作者投稿，不仅选择声誉好的报刊，而且特别重视编辑的学养及其识别能力。”

1996年6月19日

善藏其器善待其用 ——记王利器先生

在我 80 年代约组《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丛书的时间里，结识了众多的著名学者。

从年龄结构上看，有学富五车的耄耋高寿之长辈，有历经磨难的正在中天之同代人，也有思路开放的朝气蓬勃之中青年。从学术风格上讲，长辈学者的学术基础坚实，中西文化兼通，讲学论道自有其体系；同代则由于历史环境的原因，与前者相较既有逊色的一面，也有其某方面的长处，那就是理论修养上在行，在叙事论理方面透辟，有些人特别有着对极左思维的深恶痛绝，往往反思之力深邃；中青年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忧患，成长于改革开放之年代，学成于中西交汇之时期，他们是思维敏捷、独立思考的一代，有志向，有追求，每与他们相聚，总有清新扑面之感。我与他们中的每一代人相交，可谓是既师又友的关系，每与来往和书信，都能从中获得自己无尽的学识和见解，然后形成一种具有各具其长却是相得益彰的学问。其中，既有知识，又有思想；既有智慧，又有力量；既有学业，又有品格；既有学术，又有方法；……常因启示和收获甚多，而处于“不亦乐乎”的情态之中。

在此篇中，专谈与王利器先生的相识相交的事。我与王利老当面交往先后有两次，通信时间当在十年以上。从 1981 年 2 月首次拜访到 1991 年 9 月聊城傅斯年学术讨论会上相聚，正好十年多一些。在与王先生的接触过程中，对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平易近人的风范。他虽然著作齐身，誉满中外，但却没有那种沾染了官气的学者的庸俗气味，故意端出一种架势，摆出一付派头，装出一个腔调，显出很有学问的样子。王先生不论与人交谈，还是在会上发言讲话，以及与朋友通函写信，甚至在著书立说中，都如其人，都那样的平易而近人。记得他亲口说过，他曾应阳谷县狮子楼拟撰楹联一幅，联曰：“俗语流为丹青；人心自有皂白。”同样联如其人也。

王利器先生，1912 年生，四川江津人氏，字藏用，号晓传。名与字相辅，乃“善藏其器，所以善待其用”之意。又取扬雄“书为晓者传”为号。其书斋，“颜寒斋曰晓传书斋，悬车之后，则又用毛泽东语易名为争朝夕斋。”我于十六年前初访他时，去的就是争朝夕斋。所谓争朝夕斋者，就是北京北新桥的一处大杂院内一间极普通、极狭窄的平房。进得屋来，给人最大感觉就是局促拥挤，屋里除了先生夫妇的一张床和先生伏案爬格子的一张旧书桌外，床下、桌下和墙角以及床上方搭起的架子上，堆放的全是图书和文稿。客人进去只能在指定的地方立坐，其余地方就无法伸展手足了。当我进得争朝夕斋时，王先生手中拿着一本书，迅速从床上跃下，给来人让坐、倒茶，口中连连说着：“斯文扫地了，斯文扫地了！”

从交谈中得悉，他在 1957 年“反右”时蒙难受冤，“十年动乱”中又罹不幸，但是他在逆境中却矢志不移，正如他所说：“我热爱祖国文学遗产，于是朝斯夕斯，专心一志，重振旧业，锲而不舍，就是文章著作，遭受禁锢，也从不气馁，不打算改弦更张。十年动乱中，不管说我是白专道路也好，是反动学术权威也好，我都诺诺连声，唯唯听命，以此幸免于难，也从而深深领略了道家所持的‘呼我为牛吾应之，呼我为马吾应之’的哲理。而我又所谓‘死老虎’，虽然有时也叫我去陪斗‘受教育’，提我去‘过堂’，甚至把我住处的地都撬开了，墙壁都凿穿了，片纸只字都搜光了，直至把我关

了四年的牛棚，我都泰然处之，随遇而安。每当他们要我交代问题的时候，我枯坐冥想，像煞有介事，其实我的思想早已开了小差，去悬想我在学术上没有解决的问题。因此，在粉碎‘四人帮’，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时，我的问题，也像我的鹤发童颜的面目一样大白于天下，我就接连交出去十多部稿子。”

这十多部著作书稿，多达六七百万字，除《文心雕龙校正》、《文镜秘府论校稿》、《颜氏家训集解》、《郑康成年谱》、《李士桢李煦父子年谱》、《宋会要辑补》、《风俗通义校注》等十三种外，手头尚存有《吕氏春秋比义》、《水浒全传注》、《道教大辞典》三部大稿子。然而这么多的学术成果，恰是在王先生蒙冤之后的学殖荒疏之岁月中劳绩；然而这么多的学术成果，又是在三万余册藏书被查抄，数以万计的资料卡片荡然无存，“闹市门前，辘辘萧萧；大杂院内，嘈嘈杂杂”的“刘郎陋室、维摩居士方丈的斗室，名之曰争朝夕斋”中完成的。在如此的蒙冤逆境的背景下，在如此的不堪其忧的境遇中，就常人而言是难以想像的事，然在王利器先生却能安之若素，乱中、闹中和杂中而取其静，取得极不寻常的成就；从另一个方面，不也能反观出他之学术素养及其功力吗？！

今年，王利老已八十五岁高龄了，然他仍是研究和著述不辍，而且思维之敏捷，析理之清晰和运笔之高速，都是令我辈难及而钦羨的。后来他乔迁至西便门小区宿舍，居住条件不难想像是大为改善了，与北新桥大杂院不可同日而语。虽然后来未及登门求教，但在聊城傅斯年的家乡会议上，却弥补了我之缺憾。会后还通信几通，自今还保持着联系。会议期间，我有感于他十多年来在学术上的建树，曾约请他在原自传基础上进行补充和扩展，想不到他又神速地完成了约稿，并于次年四月给我一函：“今此稿已完成，约十多万字，较前写的约增十倍，以朋友建议，须得重写，该写的也比较多也。今仍想寄与您处刊出，告知可以接受否？四月巩义县杜甫国际学术讨论会、六月枣庄国际金瓶梅研讨会，我都要参加，不知您参加否？如参加，而又可以接受拙稿，我当随身带来面交也。请速告知。”我当时并未马上复函，原因有二：一则他之自传早在1982年收编于《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丛书第二辑，目前丛书的第十一辑之后出版受困；二则我极力主张他之自传可出单行本，还与五、六家出版社作了联系，但是所得到的答复都是怕赔钱而难以应命。可是这样一来，也就延搁了时日，直到过了半年多，才以歉疚的心情专函奉告了王先生。对于目前的出版环境，他自然比我了解的多，当然也未怪罪我。

时间到了1995年年末，我的朋友崔元和计划推出“学海钩沉——文化名人回忆20世纪丛书”，请我和敏泽先生来策划筹出，名单中自然又列入王利器先生，这样才使得他扩充后的自传有了出版的可能。值得欣慰的是回忆丛书第一批，有张岱年、任继愈、钟敬文、罗尔纲、王利器、梁漱溟等六种，业已付梓，今年上半年即可面世，总算缓解了我对于王先生的负疚感。在这一点上，当然需要感谢山西人民出版社的有关朋友。

在新近的十余年中，由于政治环境的改观和生活条件的改善，王先生的精神状态更胜于往昔，除了接待来访之中外学术朋友，出席有兴趣之学术会议，应邀至学术机构讲学外，更专心于研究与著述。他对我说，这多年又出版新著有《新语校注》、《耐雪堂集》、《汉书古今人表疏证》、《晓传书斋文史论集》、《晓传书斋文史杂著》、《葛洪论》等多种，另还主编了《金

瓶梅词典》、《水浒词典》、《史记注译》，尚有若干部书稿已交出版社待付梓，他表示要在有生之年，著作力争达到二千万字。由上数字，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位老当益壮、耕耘不辍的形象，在此任何语言的评价，我以为都变得多余了。

不过，当今学坛上有几位长辈学者，诸如季羨林、张中行、王利器、金克木等先生，他们老来著述与成果之丰硕，确使晚辈同行们无法与之比肩，同时也使一些仰慕者思考其中的道理，甚或追寻其中的奥秘所在。当然这种思考与追寻，我本人也曾有过；在我反复阅读王利器先生自传后，似乎有所领悟。约略其要者有二：其一，他所就读的学校是四川大学，那时名师汇集，“……校长是任鸿隽先生，文学院院长是张颐先生，中文系有龚向农先生讲《三礼》，林山腴先生讲《史记》，周癸叔先生讲词，向仙樵先生讲《楚辞》，祝纪怀先生讲《资治通鉴》，李培甫先生讲《说文》，李炳英先生讲《庄子》，赵少咸先生讲《广韵》，彭云生先生讲《杜诗》，庞石帚先生讲《文心雕龙》，萧仲伦先生讲《诗经》，曾宇康先生讲《文选》，刘大杰先生讲《中国文学发展史》，后来又聘请向宗鲁先生讲《校讐学》、《管子》、《淮南子》，陈季皋先生讲《汉书》，师道立则善人多，一时蔚为蜀学中心。”

川大毕业后，王利器先生又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读研究生。当时北大文科研究所在四川南溪李庄设有办事处，由邓广铭先生负责。“其时，文科研究所的同学：任继愈、王明、马学良、刘念和、逯钦立、胡庄钧、王叔岷、李孝定诸人已在那里。史语所则有：向达、丁声树、岑仲勉、张政烺、王崇武以及董作宾、李方桂、陈槃、劳干、石璋如、董同和、凌纯声、芮逸夫、全汉生、杨时逢以及寄寓的王献唐、屈万里诸位先生在那里，朝文相处，左右采获，获益良多。……史语所藏书又颇丰富，因得纵观群碧楼藏书，并通读了《大藏》和《道藏》。”在这样有鸿儒的环境中学习和研究，也可见一个有志于学术的人，其所能达到的深厚学养和扎实基础，那是不言而喻的。

其二，那么在有了独立研究的能力后，有无可借鉴的成功方法呢？当然也是有的。请看王先生的经验之谈：

我虽天天要读未见书，但在每一阶段，我都有一个或者两个中心，换言之，有时我是单刀直入，有时又是双管齐下。比如，我治《吕氏春秋》、《盐铁论》、《风俗通义》时，我是采取单刀直入式；但在治《文心雕龙》时，又同时钻研《文镜秘府论》，治《水浒全传》时，又同时钻研《红楼梦》，我都是采取的双管齐下式。有了中心，于是围绕这个中心去遍读群书。遍读群书，不是无所归心，而是更好地为中心服务，在遍读群书的过程中，往往获得不少副产品；有时，副产品又逐渐形成新的中心。比如，我在读宋以后书籍时，就发现引用的《宋会要》，往往溢出徐松辑本之外，于是我就附带地从事搜辑，真的没有谄到俯拾即是，竟然裒成巨帙，于是这本《宋会要辑补》，就成为喜出望外的收获了。又如《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内容相当广泛，那也是治《水浒全传》和《红楼梦》的副产品。

读书要全靠记忆，哪里记得住许多。除了我在家塾里读的那些死书，至今尚能背诵而外，我全是利用卡片来辅助记忆力之所不及，来处理所搜辑的第一资料。……

我读书，从来不怕碰上疑难的问题。头难头难嘛，天下那有不难的事情。如果知难而退，任何事就不会有成功之一日了。我认为发现问题，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有时甚至意味着晓得问题之所在，便已经把问题解决了一半，下一步工序，只差把答案写出来而已。

我读书，不管已知的或未知的，我都锲而不舍，天天生活于此，实践于此，乐而忘返，痴若着迷，一旦把未知的又变

为已知，那种境界，拿我亲身的体会来打个比方：只有爬上八达岭，才能把长城内外，一览无余；只有登上排云殿，才能把颐和园的湖光山色，都收来眼底。这里我引用多了些，然而这种一生所积累的方法和经验，显然能给人以诸多启示和要领。可是，学问是复杂的，既有相同相似的部分，又有相异相殊的地方，恐怕按图索骥总不是成功之法，最佳者还是据己之实际情况领会吸收为聪明之要。

1994年3月3日

当今学界的南王北李

在文艺界，大师之类的高帽子满天飞，实际上很多是廉价的吹捧，甚至自吹自擂。学术界虽然也有泡沫现象，但更多的是听到一种忧患之声：世无大家，遂使小品流行！

我们以为：中国之大，没有大家出现的慨叹，是以历史为镜，比如相对于五四时代而言。大家、大师，的确是时间长河淘洗的结晶。社会公认多在事后，而不在当时。

但面对现实，大家风范，还是有迹可循。所谓大家，一是自己博大精深，有俯瞰古今中外的文化视野，能在多学科领域自由出入，整合自如，学问超过同辈。二是开一代风气，学术与思想打通，文品与人品一致，影响力辐射到各个年龄段。当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人文环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大家风范，不能用一个模子去套。

具体到 90 年代的中国学界，我们以为，“南王北李”值得注意。南王，上海王元化；北李，北京李慎之。两位教授，一个曾是“胡风分子”，一个曾是“右派分子”；一个精于国学，一个擅长西学；都是半生坎坷，一腔豪情犹在。尤其最近几年，关注的问题颇为相近。观其学术，纵横捭阖；读其文章，掷地有声。不管论学论人，都如快刀破竹，有一种灼人的思想力量。而且，他们率先提出研究命题，带动南北学界后生，影响所及之处，已是一片华章。

五四时代，有“南陈北李”之说。其实，陈独秀、李大钊当时才三四十岁。放在今天，乃是青年教授。他们之所以身孚众望，无非一是“铁肩担道义”，二是“妙手著文章”。试看如今之域中，与五四时代狂飚突进的气氛恰恰相反，犬儒之气太重，可谓“文章妙手多，道义铁肩少”。告别革命，躲避崇高，著书都为稻粱谋，则比较时髦。而王李二位，仍在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学不作媚时语，良心不泯天理声，并厉言谴责插标卖首、俯仰随人、阿谀取容、自诬卖友、见利忘义等诸种世象，这就使人如闻黄钟大吕，感到卓尔不群。他们关注学术文化的发展，更关注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再造，无论对陈寅恪人品文品的推重，还是致力于顾准精神的薪火相传，都着眼于此。其实，他们都已年逾古稀。其心境，无非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20 世纪已近尾声。人们称这个时段为世纪末。每个世纪都有开头和结尾。可怕的不是进入历法规定的世纪末，而是一个民族，特别是作为其灵魂的知识分子，沉缅于世纪末心态之中。南王北李，之所以在学界赢得敬重，就是他们不惜以老迈之躯，砥柱中流，与世纪末的颓风抗争。这种精神，正如王元化先生钟爱的一幅对联：呕血心事无成败，拔地苍松有远声。

本文是作者与丁东先生共同完成的。

1995 年 12 月

生活经历激发思考 ——记王元化先生

王元化先生是我心仪已久的学者，但同他有书信往还却是前年的事。本来，在 80 年代初，我筹组《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丛书的计划中，就列有他的名字。可是我向来惧官，他当时正在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任上，只得先约组那些年事已高的学者，而将王先生放在以后考虑的范围。当丛书出至第十辑时，王先生已从部长席退下，专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在该当邀他作传之时，情况却又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出版市场的制约和出版社领导的更替，原来出版二十辑的计划受阻而搁浅。但是，对于这样一项有益于 20 世纪中国学术史研究价值的工程中断和罢手，作为我实在是不情愿不甘心的；同时，也因这套丛书在海内外学界之影响，许多学者仍然大力支持，源源不断地赐传，以至促使后十辑传稿已趋齐备；不过也不是没有遗憾，那就是尚有些该收入传的重要学者还未约传，王元化先生即为其中之一。

当我与王先生有书信往还后，他几乎有信必复，有问题必答，文字中表现着平易近人与谦和通达，虽作过高官，却未见有官场中庸俗与专横，所多的倒是学人的书卷气风格。鉴于此，又令我有相见恨晚之遗憾；然与之交，每次都可获益颇多，又有弥补缺失之感。

王先生向来主张，为学不作媚时语，坚持独立见解，反对曲学阿世。我从他赠阅的《清园论学集》、《思辨随笔》等著作中，从他的治学经历中，均可体现他之人格风范。他在《清园论学集》扉页上有题签曰：“本书护封临风挥翰四字，乃复制家藏冰铁所刻闲章。其意取自板桥诗（题画竹石）：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崖中，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壮士换剑，浩然弥哀，萧萧落叶，雨漏苍苔。”此题词，既有共勉意义，也可理解为他本人之明志。

他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得到启示，忧患意识促成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升华；他又从自身的坎坷曲折中寻得结论，生活经历激发思考。他说他从 1938 年开始写作，然而由于生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青少年时期是在战争烽火中度过的，接踵而来的则是运动频仍的严酷岁月。从事研究工作，需要摆脱世事的困扰，无拘无束地进行潜心思考。但是后来，他从诸多事实中又省悟到另一种境界，“艰难岁月也使人有可能将环境施加在自己身上的痛楚，转化为平时所不容易获得的洞察力。没有经受这种痛苦，没有经受环境施加给人的无从逃避的刺激，就不可能产生这种深沉的思考。这是在远离尘寰的书斋中通过苦思冥想所不能得到的。……为什么有不少人一旦离开养育他的土地，在尚不熟悉的新生活中过着很少变化的宁静日子，思想反而逐渐枯窘起来呢？恐怕那些曾经使他感到不安的刺激因素的安全消失，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应该把环境施加给我们的影响，作为我们丧失宁静生活的某种补偿，虽然这并不是我们所追求、所愿意的。相反，我们却要命运所作的这种安排付出重大的代价”。

我阅读他的《思辨随笔》一书，一方面体验出其中的经历与思考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有不理解的部分，于是在 1996 年 6 月写信给他，求教了两个问题。其一，全书 231 篇（含附录），序另。排列顺序，时间是打乱了的，不知有何结构或逻辑或专题上的考虑。其二，在 231 篇中，按时间统计是这样的：

40年代6篇	{	1940年 3	
		1943年 1	(1942、44、47、48、49年无篇)
		1945年 1	
		1946年 1	
50年代19篇	{	1950年 8	
		1952年 5	
		1953年 3	(1951、55、56、57、58年无篇)
		1954年 1	
		1959年 2	
60年代36篇	{	1960年 5	
		1961年 7	
		1962年 15	(1965、66、67、68、69年无篇)
		1963年 1	
		1964年 8	
80年代76篇	{	1980年 5	
		1981年 9	
		1982年 18	
		1983年 6	
		1984年 3	(1985年无篇)
		1986年 12	
		1987年 8	
		1988年 11	
		1989年 4	
90年代37篇	{	1992年 6	
		1990年 3	
		1991年 11	
		1993年 17	

序 1994年

以上统计，似也有几个问题：(1)每个十年中的空缺，是有文无编入，还是这些年无文可编？(2)每个十年中的空缺，出于政治原因者，诸如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最为明显，但40年代的四年和80年代的1985年，不知如何理解？(3)《思辨随笔》由《思辨短简》发展而来，由于我手头没有后者，不知“删去了原初版本和港台本的数十篇”，是些什么篇目？(4)据我所知，他从1938年开始写作，其中有“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9年”、“1955年反胡风到1979年末平反”、“持续十年之久的‘文革’”的几个人生大的坎坷阶段，战争烽火的动荡，运动频繁的严酷，这种充满忧患的岁月中，对他思想之成熟所起到的作用是什么？(5)他有“生活经历激发了思考”之说，发现在《思辨随笔》中，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和深邃的思想，很可能不是源于书本，而是出于本身丰富的阅历；然如果脱离了深厚的文化学术蕴涵和理性的潜思考，我以为难以升华到一定的深度。到底该如何统一这二者的关系？(6)我与丁东已经撰文提出当今学界的“南王北李”之说，虽然计划研究他，

但由于资料的零碎和能力的限制，难以达到宏观的把握和微观的进入。所以，在此自不量力地提出以上不成熟的问题，希望在有便时给予解惑。

我给王先生的信发于6月12日，想不到他于18日复函达二千余字，一共从八个方面回答了我提的问题。此信对于理解和研究王元化及其思想，有着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故详为摘要如下，以应研究者之需好。即使读者责备本文过长，我也将全然不顾了。

来信所询各问题，谨回答如下：

一、《思辨随笔》各篇未按时间顺序，大体上根据类别划分，但并不严格。编时，我是从读者着想的，目的是使读者读来常常可变换口味，古的太多了，插点洋的，洋的太多了，再插点近代现代的，没有一定的比较整齐划一的严格安排，随意性很大，只是大致分分类而已。……

二、何以40年代缺42、44、47、48、49年的？42至45年中期，我在上海，处敌伪统治下，无法写作，更无法发表。43年的一篇是应柯灵之邀，为他编的《万象》杂志写的。（即那篇《谈卓别林》，从文字中可看出留下了那时的时代和环境色彩）抗战胜利后（45）至解放（49）我有三年光景在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即今北方交大）教书，其余时间或在编报纸副刊（联合晚报·夕拾）或在编杂志（展望·地下文萃等），都是短期的，加起来恐还不到一年，写了近百多篇的时事短评，已时过境迁，无收集的价值。所以只有两篇文字。

三、50年代自1955年至1958年没有写出什么文字，这是容易明白的，反胡风运动中，我被株连，自然无法写。1957年隔离结束回家后，精神打击严重，在医院就诊达两年多始愈。1959年写的《赵氏孤儿》那一篇是很偶然的，一位老友主持《新民晚报》笔政，要我化名投稿。写好后寄去，被编辑欧阳文彬删去中间一段，故此文至今仍有阙文。但已无法补了。

四、1960年我因周扬的支持（他对我写的文心各文极为赞扬），发表了两篇文章，一在《文艺报》（1961年，此文系据〈文心雕龙〉谈山水诗起源，未收入集中），一在《中华文史论丛》谈虚静说，1955年后仅正式发表过这两篇文章（用本名），后者一篇短文，不料在台湾（王更生文）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刘若愚已故所撰英文专著）竟有反响。

五、70年代文革时期自然开头根本不能写，后来写的也仅是笔记，发表时从笔记中选出。收入《沉思录》读韩非一文是在文革后期所撰，盖舒愤懑也。1979年后我才平反，继韩文后，文革刚结束，又撰读龚自珍一文。这两篇我颇重视，后者曾译成日文，载《中国诗人论》一书。入选者有三位中国人，大陆、香港（饶宗颐）、台湾（潘重规）各占其一。

六、80年代平反后是工作烦乱的时期，先在中国大百科负责编《中国文学卷》（后交中国社科院文研所负责）。继之当了上海宣传部长，在忙乱中是心粗气浮时代，撰文虽多，满意者少。至90年代，我可以说进入学术研究正常境地，故此时期学的较多，也较为好些。我的一些观点，主要写入读杜亚泉、近年反思及谈京戏与传统文化诸文中，此外有关社会评论、文化评论，则俱见集林编后。至于关于文学的评论，一位青年友人钱钢（博士，上海大学执教）曾协助收集整理，较全，但我认为尚不值得出版。……

七、在每十年中写作中缺，也有政治原因。40年代可参见第二页片。50年代反胡风，60年代70年代文革，80年代清除精神污染（我在部长位上未整过任何人，但却有被整记录）。90年代初，六四时我在国外（比利时、荷兰）故未卷入，……

八、关于“南王北李”之说，恕我直言，似不太好。慎之是搞国际问题的，这方面我一窍不通，难以比拟。至于在文化思想方面，我们有许多看法很不同，拉在一起，慎之也未必满意。另一方面，我对他的一些看法（案：王信中指出对李撰文评述李一氓与匡亚明事有不同意见。最近来信又谈到对李撰文谈胡乔木文颇反感——笔者）均未敢苟同。大概您和丁东先生将我二人并论，都由于我们遭遇和近来的立场吧。不容讳言，这是有相同处

的，但倘言思想，则不能仅以立场为标。(长期以来，我们太重立场、态度问题即韦伯所谓意图伦理了)不知您以为然否？我们虽未谋面，但神交已久，可谓知音，故不揣冒昧，直言种种。……

正如王元化先生信中所“直言种种”，不也体现了他之交友之道及其风格吗？虽然他把我与丁东二人列为他的“知音”，然我们毕竟素昧平生，可是当我向他请教学问时，他却能坦露胸怀，直言种种，犹如至交也。我与不少学者交往过，就一些人的待人方式，实在不敢恭维；尤其是占了点官位者，待人交往时总觉得有居高临下的不平等之感，谈论学问时总要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架势，对这种人只能雾里看花，不能近距离观察，更不想详细了解之。否则，总给人留下许多遗憾。对不起，这已是题外话了。

1996年8月

假如没有陈敏之

《顾准文集》已成“洛阳纸贵”，它以极强的思想魅力吸引和启示着人们的心扉。但是，读过《顾准文集》之后，激奋与感动之余，也不免产生了一丝遗憾。顾准那些精彩而深邃的笔记，本是对其弟陈敏之来信的回答。然在文集中，却未能把来信作为附录收入，这就给读者留下了太多的悬念。对此，余在近期曾分别给王元化、陈敏之二位先生去信提出，大意是处在那黑暗严酷的年代，陈敏之并未与其兄“划清界限”，反而却书信往还，提出许多令顾准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又以大无畏的精神保存下来顾准通信文稿，最后编选成《顾准文集》，并促成出版面世。于是我想，陈敏之是有功于社会、有益于学界的，假如没有陈敏之，岂可有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俱佳的《顾准文集》留传后世呢？

文集是陈敏之编辑整理出来的。也许，他是不愿意借其兄而标榜自己。但在我看来，从文献的角度讲，却实在不应该丢掉陈敏之书信这一部分。尽管文集已经出版了，不过再版时可否弥补上这个遗憾呢？如果将陈敏之去信附录于后，那是理所当然的事，也是读者所企盼的完璧。

思想的产生，学术的成果，固然不排除自言自语，但更多的是在对话中触发，在共振中升华，在撞击中深化，在启示中成体系。就后者而论，古今中外的思想史和学术史上都不难找到其事例。古代之《论语》、《孟子》、《荀子》、《淮南子》等传世之著，哪一部不是产生于弟子门客对其导师的提问？据说“谈话”体创始于柏拉图，于是外国有了《柏拉图对话集》、《狄德罗谈话》、伽利略《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等经典名著，即使未必是两人意义上的对话，但是以谈话和对话方式表达思想及其论题，也有相互触发，相互共振，相互撞击，相互启示之作用。

以书信方式提出问题而交流思想，在中外学术史上也许也是一种常见的触发方式。不过像陈敏之这样在特殊年代，面对着因言获罪的文字狱环境，敢于针对森严的禁区进行书信提问，不仅需要具备高深的思想理论素养和渊博的历史知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必须达到视死如归的无畏境界，务必在权衡了双方的生死成败之后，才会发出他的每一封书信。从《顾准文集》中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部分看到，这不是一本为发表所写的著作，而是作者应其兄弟的要求断续写下来的笔记，“他写本书各篇时，纯粹是为了满足我个人的要求，或者是答复我的提问，如关于西方史、骑士文明等篇；或者是和我讨论甚至争论某一问题，如关于民主问题的各篇以及关于哲学问题；或者对我的笔记所写的读后感(实际是对我笔记的批判)，如关于老子、孔子、韩非各篇。记得当时我还在五七干校，……找了当时能够找到的非常有限的一些书来读，随手写下了一些笔记就教于他，这就引发了他的议论。”以上这段话，引自《〈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出版追记》(见《顾准文集》附录一)，由此不难看出陈敏之书信或笔记在产生《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的“引发”或触发作用。也正如陈敏之所指出，“这些看似随手写来的笔记、读后感，决不是信手拈来之物，而是作者多少年来的积累，凝结着作者多年来思考、探索、研究的辛勤劳动。有谁能随手写出这样的笔记？”但是，如果有积累，有思考，有探索，有研究，而无“引发”或触发之表达方式与机会，怎么又会有今天所见到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振聋发聩之著作呢？

这就是本文题目《假如没有陈敏之》的由来，不知读者与同仁以为如何，也不知我之遗憾何时得以弥补。

1996年8月9日

永不毕业长葆青春 ——记蔡尚思先生

我与蔡尚思先生的交往，始起于书信，后有多次当面领教，印象最深者是两次：一次是1984年的傅山逝世三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另一次是1993年顾颉刚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学术会上。所以称印象最深者，是因为我们彼此走近了，互相更加了解对方之后，就一些问题进行思想交流之后。蔡老在学术追求上是很执着者，在待人处事上是很有性格者，尽管我很不习惯他之谈话方式，然而他之“永不毕业”的求师精神，却令人崇敬而倾倒。

蔡先生不仅信奉多师说，而且讲究名师论，他为实现“死也要到北京去求名师”的志愿，不顾穷困，不惧长途跋涉，不在乎人生地疏，敢于写出上清华研究院、北京大学研究所诸名师书，体现了强烈的求知若渴精神。现将上北京诸名师书抄录如下：

久耳斗山，时涂景仰，虽未受业门下，每读所著书，辄想见其为人。窃观当今之为士者，非随波逐流，则迷人绝世；否则，喜新好奇，竞尚欧化，至于国粹，毫无顾及，以致先哲之书，束阁不讲，而有志之士，欲得一良师，以成其学，迄不可得。幸天不欲绝我中国之教育，独生三数热心兴学之善士，为国家社会之导师，使学子得以宏造其学业，而免向隅之叹。噫！何其幸也！今生行将及冠矣，未尝知堂牖之分，涂轨之别，惟赋性异人，自少即嗜国学，及长感世风恶劣，人心败坏，于是益愤发，不能自己。居常自恨，生于遐陋，阮寡师友之观摩，又乏书籍之浸灌。故欲乘此时机，脱蕪危邦，远离陋俗，专心致志，求诸通都广邑之中，与夫名山大川之间，有道通古今，学博中外，以承先启后为怀，以经世诱民为任，真足为师资者而亲炙之。如颜曾之随孔子，颉颃之从周氏，朱晦庵之受业于三君子，李愿中之请教于罗从彦。且遍交当世有识之士，尽读历代有用之书，以辅其德，扩其识。他时道通学成之后，得效涓埃以报国家，或垂简策以资后学，尚不愧于先哲，有裨于世人，不致尸居世上，蠹食宇内，以羞炎黄之裔，而为夷獠所笑，则虽槁萎于蓬蒿之间，腐化于乌鸢之腹，亦足以了其愿，而瞑其目矣！以居常蕴蓄丰纾之愿，安敢不勤于诸先生哉？乃今诸先生学博中外，道通古今，昌明国学于将绝，灌输欧化以补短；且能热心教育，培养人才，此不特当世难侔，即古人亦罕其匹。故生常曰：天下之大人物，而国中之名导师也。比闻诸先生来教北京最高学府，生由是喜而不寐曰：“吾师在是矣！吾之所愿，其可以达乎！”遂不远数千里而来，敢以不肖之身，为诸先生之累，第未知樗栎之材，果不见弃于大匠之门哉？生之来也，经沪宁之名区，观齐鲁之胜地，耳目为之一新，胸襟为之一扩，惟以未见诸先生为歉！如蒙诸先生悯其好学之诚，求道之切，辱取而教诲之，固所愿也。水浮陆走，脑乱心纷，操笔辄书，辞不能达。盖恐诸先生未知其老之所存，故先叙其所以来之意。如有误谬，尚祈原谅，敬请铎安。

信写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八月，蔡尚思年方十九岁，从中可窥见他在学业上，甚或在未来学术上之志向与追求；更为重要的是，从中已透视出青年蔡尚思对于求学与求师、治学与师承、学无止境与师从不止的辩证关系及其必然内涵；蔡先生一生所坚持的正是这样一条“活到老，求知到老”的治学道路，这恐怕也正是他长葆学术青春的奥秘所在。

我从80年代初约蔡先生所撰自传中，即已大体了解他之学术路径，只是有关他在一生不同阶段的求师和师承情况不甚知悉。于是这个话题，也就成了我在苏州顾颉刚纪念会上私下里访谈蔡老的主题之一。不论在去的直游览的路途上，还是在下榻的宾馆里，都始终围绕着他治学与求师的问题。当我把访问蔡老的记录整理出来后，惊异地发现它就是当今的师说或师论，它所

继承的恰是中国优秀的师道传统，它会给予后来者以甚多的有益启示。

谈及“学无止境”时，蔡先生这样说：“我自知在学问的领域里，只有好学，没有捷才，至今还是知道的太少，不知道的太多，所以一向以‘终生研究生’自居，永不能毕业，永在接力赛的过程中，永不可能到达最后的目的地。”

蔡老在不同阶段，都有自己的师承；进入成熟阶段，直到老年，他之求师的动力仍然不衰，与之相交谊者可称为师友方妥，然蔡老仍本着“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原则，以从师的方式求教。下面所记，即是他求师与师承之记录：

在永春求学时期，主要老师(他称为最得力者)一是国文教员郭鹏飞，前清秀才，一是校长郑翹松，前清举人，著名诗人，二位在打好少年蔡尚思的国文基础和国学基础方面，为他日后治学有奠基之功。时间是1921—1925年。

1925—1929年，蔡尚思原计划以同等学力考取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因未赶考期，于是拜王国维、梁启超为师，常向王问经学、向梁问思想史。在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哲学组后，经常向导师陈大齐问西洋哲学，向梅光羲、李翊灼问佛学及孔学，向江瀚问孔学及文学，向陈恒、朱希祖问史学。陈寅恪因兼北大研究所导师，也时有请教。蔡元培在北大开一代新风，他虽在南方，但常与他有书信求教。

1929—1931年，蔡尚思经蔡元培推荐到上海大学任讲师，于是有条件常向李石岑、章太炎、太虚等大师请教，与同事孙德谦、陈柱、陈中凡、姜亮夫、陈守实、萧炳实、王蘧常、邱汉生、虞愚等论学，与复旦大学同事陈望道论学。当时，李石岑为暨南大学教授，乃著名哲学家，常去其书斋请教中印西洋哲学；章太炎并未在大学执教，朱希祖是其弟子，而蔡又是朱的学生，故常可请教国学；太虚是虞愚的老师，蔡则通过虞去拜访太虚，求教佛学。

1931—1934年，蔡尚思在武昌，常与何伟(原名霍恒德)、黄海滨、刘同环、刘同拱等进步学生在一起论学。

1934—1938年，蔡尚思在南京、上海，与柳诒徵、刘掞藜、郑鹤声、王焕镛、吕思勉、蒋维乔、顾颉刚、欧阳予倩、陈子展、张栗原等或请教或论学。期间的1936年，与陈家康有论学，1937年与嵇文甫、宗白华、胡道静等有论学。

1940年，与顾廷龙、韦恂、童书业等论学。

1946年后，多与马叙伦、翦伯赞、周建人、郑太朴、周予同、林汉达、沈体兰、张志让、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黄云眉、夏康农、杨晦、方行等论学。

1949年后，师友论学的机会多了起来，师友的范围也广了起来。与之常有论学者，尤以范文澜、齐思和、何干之、艾思奇、韩儒林、李新、胡华、王枬、郑天挺、王仲荦、张舜徽、赵俪生、张岱年、任继愈、张岂之、黄宣民、蒙文通、蒙思明、陈锡祺、谭其骧、罗尔纲、李一氓、匡亚明等为多。

蔡先生在历数了他不同时期的师友后，又特别郑重地强调了对他终生或在某些重要问题上受教益最多的一些师长和友好，致使他铭心永记。说到师长，论及友好，此处请允许我引用《蔡尚思自传》中的几段：

……从少至今，其中最使我念念不忘的是：师长方面，首推郭鹏飞的勤于为我改作文。王国维(1877—1927)的教我治经学与勉励我不可自馁自限。梁启超(1873—1929)的鼓

励我成一家言与研究思想史。陈垣(1880—1971)的教我言必有据,戒用浮词。梅光羲(1880—1947)每两星期必从天津到北京讲学,来枉顾一次,最鼓励我治佛学。蔡元培(1868—1940)在教育行政上的做出最好榜样与常介绍我教大学。柳诒徵(1880—1956)的给我多读书多搜集史料的机会与经常为讲近代掌故,这个长辈给我的教益,超过了我的所有老师,是我学术上的最大恩人。

友好方面,首推欧阳予倩(1889—1962)的教我在当时著书要寓自己思想于他人言论之中。顾颉刚(1893—1980)最全面地了解我的治学与思想。嵇文甫(1895—1963)的专诚远来同我论学,最为相得。范文澜(1893—1969)、齐思和(1909—1980)、黎澍(1912—1988)、宋振庭、李一氓(1903—1990)等的大力支持和鼓励我的批判封建传统思想,尤以李一氓最要好。杜国庠(1889—1961)等的同喜墨学。谭其骧、李侃的很了解我的研究王船山思想。罗尔纲的最鼓励我写自传专书。还有何伟从同我秘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到同我做些地下工作。邱汉生有一个暑假代我去南京国学图书馆主持请人摘抄史料工作。施景兰(乳名幼秋)(1921—1970)的最志同道合、热诚相助与秘密联系工作。朱悦(原名子开)自动为我出版著作效劳。施悟的帮助我整理一部分著作,也同我最多接谈。而朱维铮、李华兴等也帮助我编著《孔子思想体系》一书。李妙根是《蔡元培》一书的代笔者。胡道静最有使我感动之处。

读者方面,纷纷来信,支持和鼓励,不胜枚举。反之,直到近年也有一人写信用孔子骂他老友的话来骂我,认为孔子没有一字一句不正确。在百家争鸣中有夸奖过誉,有痛斥谩骂,这都是很正常而值得感谢的。

在这里,我还要声明一下:我的老师和一部分友好,多多少少都是尊孔的,尤其是陈焕章(1880—1933)的极端尊孔复古,已经成为反面教员,但对像“初生之牛犊不怕虎”的我,也大有好处,如果没有他的主张对孔子必须“先信后学”,就不会引起我主张对一切都要“先学后信”的反驳。若王国维、梁启超、陈垣等,我跟他们学习的只是学问而不是思想。我要学习的思想倒在非老师中,如李大钊主张“永葆青春”、鲁迅反对吃人的礼教之类,我一直作为座右铭。……

在这里,我可能引用转摘的太多了,不过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其中不仅蕴涵着师承的道理及其实践,而且体现了一位有成就的学者在治学上的博大兼容精神,更多地还能从中学习到蔡尚思先生从师的态度及其方法,这对于那些不重视师承者、不善于从师者以及学风和师风不正者,也许不无匡正和示范意义吧!

1997年2月8日

捻军史研究第一家 ——记江地先生

江地，原名李广澎，曾用名有李光朋、李唯琦、李浩之、李子豪等，以笔名行世。1921年9月19日生。山西省沁水县人。在高小毕业后，只读过二年半初中，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而辍学。在战争中作小学教师五年、中学教师十年，全国解放后的1956年进入山西大学任教，由讲师、副教授到教授，现为历史系教授。社会兼职有：晋东南教育学院名誉教授、山西省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山西省教材审查委员会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山西省卷》主编、山西省历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理事等职。他还任山西省第五、六、七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山西省第四届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

先生研究的主要领域是中国近代史，主要成就则在于捻军史研究方面，有关捻军的著作主要有《捻军初探》（三联书店1956年）、《初期捻军史论丛》（同上1959年）、《捻军史论丛》（人民出版社1981年）、《捻军史研究与调查》（齐鲁书社1985年）、《捻军人物传》（山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译成日文在《东海大学纪要文学部》上连载）及论文数十篇等。还有近代史的著作多种。他发表的研究捻军的处女作是1953年，论文题目为《皖北根据地失守和张洛（乐）行殉难——捻军小史的一节》。先生回顾他的捻军史研究过程时说：“在历史研究的领域中踏出第一步是困难的，但既经踏出之后，就可以顽强地坚毅不拔地走下去了。……继此之后，我更加努力了。此后接着又相继写出了《论后期捻军战争》、《论东捻军的抗清斗争》、《论西捻军的抗清斗争》，……在这些文章陆续发表的同时，我把它集中起来，大约九万字，……在1956年出版了拙著《捻军史初探》，到1959年又出版了拙著《初期捻军史论丛》。”（自传）当他说到自己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时，至今还十分感念荣孟源、刘大年、黎澍等近代史研究学者的栽培之恩。

江地先生在捻军史研究方面的建树及学术见解，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捻军史在中国近代史中的地位问题。过去的捻军史，只是作为太平天国史的附庸而存在的，仅仅在有关章节中稍稍提一下就过去了，没有人重视过它。名家之书凡是到了捻军这一部分，大都匆匆而过，讲得很少，只有华岗著之《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的太平天国部分（这一部分，曾以《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的名义，单独出版），讲得略多一些，但也不过三千字，而且有许多问题也没有说清楚。作为专门史研究则从江地先生始，先后编著成五本书，发表论文数十篇，还有二种著作在计划之中，未及完成。从捻军初期、形成期、后期，即从捻军起义的产生、发展到败灭的全过程，从捻军领袖人物到变节人物以及攻捻清将人物，都有系统的研究，成为国内外有影响的捻军史专家。

二、关于捻军起义的性质问题。对于起自1851年到止于1868年长达十八年的黄淮起义的捻军和波及十个省区的这场农民起义，其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这个起义是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农民革命，捻军战争的正义性和革命性，是不应有任何怀疑的，是应该加以肯定的。江地先生对参加捻军起义的领袖和广大群众的组成部分上，从这次起义的革命对象或革命目标上，从领导捻军起义的张乐行、龚德树、赖文光、任化邦、张宗禹五大领袖的功过评价上，充分论证了捻军起义及其革命在打击清王朝与封建地主的

统治和在反抗外国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都是有着历史的功绩的，使起义的正义、革命性质得到了澄清和证明。

三、关于捻军起义领袖的评价问题。江地先生指出，在过去的年代里，在历史科学领域里，历史人物评价成了禁区，许多农民领袖被否定，被打倒了。自从戚本禹关于李秀成评价的文章发表以后，不仅李秀成被打倒了，影响所及，许多农民领袖也横遭诬蔑，被加上种种恶名，戴上种种帽子，中国历史变成了一片漆黑，中国农民战争史黯然无光。捻军初期起义的最高领袖、太平天国沃王张乐行，就成为这种遭遇的典型。为了还张乐行以历史的本来面目，江地先生从张乐行的历史功绩和历史污点等若干方面，历史地辩证地进行考察分析，认为张乐行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他有功有过，瑕瑜互见，但是就其本质和主流来看，却是应该加以公正评价的。江先生强调说，“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我们要采取慎重的态度，不要轻率从事，不要动不动就一律打倒，一概否定。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学问，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应该这样，他有多大功劳，就说多大功劳，他有多大问题，就说多大问题，既不夸大，也不缩小，实事求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认为，这才是科学的态度，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捻军史厂家与调查》，第69页）

四、关于捻军史的分期问题。要解决捻军分期问题，首先碰到的难题，便是捻党究竟从何时产生，从哪年开始。先前江先生曾在《捻军史初探》中提出捻党产生于1814年，到1957年他改为1808年；至于捻党时期的下限年代，则主张应是1851年，其根据是：涡阳县志认为1851年；许多史书写捻军起义，多从1851年开始；“剿平捻匪方略”也从1851年编起；1851年是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时间，是中国大陆上抗清战争揭幕之年，捻党是组成部分之一，亦应由此开始转化为捻军；捻军起义从1851年起有着显著增加趋势，地区愈广大，人数也愈众多。但是，后来再经深入探讨之后，他把1851年改成1853年，改变根据是：捻党起义在1851年显著增加，并非本身发展实况，而是因许多史书多从此年写起，史料记载较多之故。金田起义的1851年，虽是中国大陆抗清开始之年，但并不能说，捻军也应该从这年开始。太平天国对捻党起义影响确实很大，但这只是太平军和捻军接触以后的事，即1853年以后的事。在此以前，捻军在皖北，太平军在广西，天各一方，虽有影响，亦极微弱。分期应以捻军史本身发展规律为依据。捻党原和义和拳一样，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并非偶然而起的农民军，而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作为反清结社之一，在长时期内，它形成一套独特的制度和作法，既不同于白莲教，也不同于天地会，更不同于上帝会。这种情况，继续到1853年，才发生了质的变化。1853年太平天国北伐军路过皖北，这是太平军和捻党接触的开始，也是捻党转变为捻军的开始。请注意，江地先生在这里把捻党和捻军两个概念是区别开使用的，他认为1853年不仅是捻党时期的下限，而且也是捻党时期和捻军时期的分界，即在此以前是捻党时期，在此以后是捻军时期。“捻党和捻军虽然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即捻党是捻军的前驱，捻军是捻党的发展；捻党运动是捻军战争的准备时期，捻军战争是捻党运动的最高斗争形式。但是，它们之间究竟是有区别的。即捻党是农民运动，捻军是农民战争；捻党是反清结社，捻军是抗清起义；捻党是白莲教的变种，捻军是太平天国的盟友。简言之，它们的区别是在不同时代条件下，群众运动与革命战争，群众组织与战斗单位的区别。”（《论捻党》）

从这个问题的观点的改变上，可以看出江地先生的科学精神。

五、关于捻军历史与捻军文艺。捻军史的研究，是史学领域里的一个成果。目前，关于这方面的成果，可以分为文物、资料、调查、论文、著作、档案等若干方面。捻军历史和捻军文艺两者性质不同，本来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由于其关系密切，互相联系，互为影响，江地先生非常重视捻军文艺的创作成果，对捻军歌谣的搜集工作、捻军故事和捻军小说的文艺创作、捻军戏剧和捻军电影以及捻军美术等，都在其研究视野之内，进一步丰富了他之捻军历史的研究内容。

六、注意捻军史的研究在国外的学术动态。江地先生对于日本、美国、苏联、法国、新加坡、英国、波兰、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学者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和捻军史研究成果，都给予充分注意，使他自己的捻军史研究经常处于主动地位和前沿水平。

1992年1月

考古学家的另一面 ——记张颌先生

也可能是我与张颌先生同生活于一个城市的原因，我们交往的次数显得比较频繁，向他请教的机会自然也就比较为多。当然，交往频繁的原因，仅以距离长短是不能说明问题的；其中最重要的，恐怕还是认识和情感上的投契，如果是话不投机呢，很可能也就半句多了，怎么能谈得上长期交往和情感交流？

张颌先生长我十二岁，按时下十年左右为一代的话，我们自然要算两代人了。然他与我交往，从未有两代人的隔阂感，其推心置腹的程度，可谓随和坦白如同代人。论学问，他是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并在书法绘画和诗词方面造诣颇深，对于天文天象有着极为浓厚的兴趣。尽管离休前，曾任文物局、考古所的领导职务，然在他身上绝嗅不到官员的庸俗气味，更多使人感到的却是儒家的学者风范。与来者谈学问，往往是侃侃而叙，绝无装腔作势之态，常常取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谦恭礼贤。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我就遇见过。有一次，正当我在坐，突然有位不速之客敲门进来，看装束倒也不俗，但进得门来即借题发挥，故作高谈阔论，且不时有左腔左调，完全是一副班门弄斧的架势；面临这种难堪的局面，张先生虽然自始至终一言未发，但却可使来者感到主人面有愠色，促使来者羞愧而退出。在来人走后，先生始开口，他说：“自经‘文化大革命’的大轰大嗡后，每遇到一些人再高腔左调，不仅血压要升高，而且气得人说不出话来！”

张颌先生虽然在考古学、古文字学方面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但他并非科班出身，也并不具备完整的学历，他是经过外行转变为专家的。从《侯马盟书》的考释与研究，到《古币文编》的专著，以及《张颌学术文集》的出版，不了解张颌底细的人，谁能相信他是自学而后卓然成家的呢？然而却是无可争论的事实。我曾撰文《师承——现代学术繁荣渊源》，意在强调治学上的师承重要，不少学者不仅有条件从师，而且注重名师，“转益多师是汝师”即是其师道所在。然而在现代学者中，也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在受教过程中失去了从师的机遇，不得不在学海中自我摸索，成为自学成才者。所谓自学成才者，并非“无师自通”，而是说在社会实践中的勤奋自励，多方钻研、多方求师而走上了专业治学的程度。可见自学成才者，实际上所走的仍是多师之路。拙文在自学成才者中，列出了一批著名学者，除了梁漱溟、钱穆、戈公振、王云五、陆费逵、唐兰、郑逸梅、黄云眉、华岗、童书业、张舜徽、周原冰、王芸生、贾兰坡、严北溟、唐弢、叶圣陶、姜椿芳等外，也有张颌先生在其中。我曾经采访过他们中的若干位，自然不例外地有张颌先生，所得到的结论是共同的，他们所以能在学术的某个领域能有所成就，除了自身的聪明好学与执着追求外，实际上都有着他们的各自的师承道路和师承方式。在这个问题上，张先生有着艰难倍尝的感慨：“自学成就者，如果早有良好的师承，加上自身的奋斗与悟性，肯定可以早有成就甚或有更显著的成就；然而由于摸索过程过长，且多曲折坎坷，所付出的精力与代价实在太大了！这实在是一种亡羊补牢的道路！对于那些失学失教而又不自暴自弃者，实在是一种不得不如此的补救办法！这也许就是有志者事竟成的道理吧！”

张颌先生在治学上，将治学放在立说的基点上，每有论著，力求有所发

现、有所创获、有所开拓，做到立言有据，论证确凿，令人信服。他有“著书容易立说难”之论，在治学实践中也向以此论要求自己，恪守谨慎立说的原则。这里仅以《万荣出土错金鸟书戈铭文考释》一文为例来说明之。60年代初，山西万荣发现错金鸟书戈一对，上有鸟书文字。经张先生考证识字，认出六个鸟书文字是“王子于之用戈”。并认为王子于是吴王僚，“州于”是其名。“于”是“州于”之单称。文章以诸多证据，证明春秋时已有人名单称的惯例，从而否定了将单称说成是两字反切的错误解释。同时指出，鸟书是春秋后期吴越等南方诸国一种风格，故此戈当系南方之器。前曾有过鸟书铭文的戈在晋出土，当是晋国之器受南方铭文风格影响所致。在对照此戈与“吴季子之子剑”的“子”字，字形相同，逐字比勘此戈与南方其它器物，字形相同，说明确为南方之器。南方之器如何流入晋国？从文献记载看，春秋吴晋两国已有频繁交往，如晋巫臣申公使吴，其子为吴行人；吴季札出使上国入晋以及著名的黄池之会，均为吴晋交往之显例，这可视为当时器物交流之条件。以出土实物看，早在清代山西代县即出土过吴王夫差铜鉴，解放后山西原平又出土有吴王光剑。这里，文章又合理地解释了吴器流入晋国的历史过程；这样，“王子于之用戈”的出土，再次为吴晋文化交流提供了实物佐证。由于张颌先生准确地判定了此戈的器主、年代，便使之成为东周武器断代的标准器之一；后又经国内外考古与古文字专家的肯定，于是张颌之说成立。为纪念此事和为容庚祝九十寿辰，他还写长诗《僚戈之歌》。

说到张颌先生诗作，尽管他曾译过普希金诗集，然他更钟情于古典体诗。他的诗，我未见有诗情画意的田园景色，所多者是以诗鸣志的冷静反思，无叙事论人都有激浊扬清的褒贬在其中；他的诗，虽然少有轻松的诙谐，却有着历史的睿智，从中可见他忧国忧民的关怀；他的诗，虽偶也抒发出长篇，但更多地是精练的短章，而且常见格言式的警句；他的诗，虽作者深谙诗词韵律，不过他从不死泥于章法，常“信谗拈来，但求适意”。他的诗，尚未结集，经朋友们一再催促，目前才着手汇编。现仅将《聋喻十章》抄录于后：

任尔南腔北调，不烦暮鼓晨钟，
天塌下来寂无声，我自巍然不动。

有人闻雷掩耳，有人掩耳盗铃，
吾生两耳失功能，只能架设眼镜。

不怕小组批判，凭你大会斗争，
刺刀见红势来凶，对我不起作用。

东家神号鬼哭，西家狗叫鸡鸣，
左邻右舍乱汹汹，我家风平浪静。

阿莘渔阳鼙鼓，三郎夜雨霖铃，
高山流水伯牙琴，容我掷诸虚牝。

大明寺里菩萨，不听和尚念经，
他用千眼观世音，要着耳朵何用。

不听背后笑骂，无须当面奉承，
人生贵有自知明，毁誉无足轻重。
苏张巧言游说，奢谈合纵连横，
寡人塞耳不收听，空见嘴皮磨损。

汉武发擢箫鼓，项王叱咤风云，
曹刘坐啸论英雄，输我耳根清净。

喇叭千般高调，锣鼓八面威风，
世事虚实懒追寻，躲进小楼一统。

当年先生七十三岁，到次年春节时书写在扇面上赠送于我，我则从词中看到了他的诗品与人品，也就是考古学家的另一面。在其书斋中，悬有一副对联，作者是著名书法家卫俊重。从对联或可证明我对书斋主人的看法，尚有几分道理。联曰：

观其为文不随时趣；
与之定事大有古风。

1997年3月9日

迈向“观堂之学”研究的新境界

人们推崇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但丁，称他是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又是现代第一位诗人。当中国跨进 20 世纪的门槛时，也经历了从古代向现代的急剧转变。在这个深刻的转变中，也产生过既是最后一位又是最初一位的文化代表。王国维，便是堪称古代中国最后一位学者，又是现代中国第一位学者的文化巨星之一。在学术研究上，他能弃旧谋新，具有一定的贡献和影响，深得海内外学者的推崇。他的治学道路，早期爱好研究哲学和文学，有过“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的时代”，“少作时时流露西学义谛，庶几水中之盐味，而非眼里之金屑”（钱钟书：《谈艺录》）。此时之思想言论颇受西方哲学和文学思想的影响。辛亥革命后，其致力于古代史料、古文字学、古音韵学和古器物学的研究，对经史研究的贡献，丰富了国学的宝库。晚年专攻西北边疆历史和地理。王国维生平著述当有六十余种，内容精博，他作为中国现代历史学、考古学、文学、戏曲史、美学、伦理学、心理学、逻辑学、文字学、教育学诸多领域的第一代大师，开启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新生面。鲁迅认为：“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热风·不懂的音译》）贺昌群称王国维是早期“我国介绍西洋哲学的第一流学者”（《王国维先生整理中国戏曲的成绩及其文艺批评》）。郭沫若从王国维在史学上的贡献，誉其为“新史学的开山”（《鲁迅与王国维》）。在文艺批评方面，其批评方法开一代风气，“他被了点西洋近代思想的微光，这是好兆头。”（李长之：《王国维文艺批评著作批判》）可见，王国维作为跨时代、过渡性的代表人物，他更富于独特的历史内涵，更具有窥斑见豹、提纲挈领的文化意义。鉴于此，愈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国维独特的价值愈来愈为思想文化界所重视。

如果说，从 20 年代王国维辞世到 70 年代，对其研究还只是零星地、概要地进行着的话，那么，进入 80 年代以后，王国维研究已经逐渐发展成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进展到了全面的、拓展的、纵深的、多学科综合的研究阶段。十余年来，海内外研究王国维的专著已经出版十多种，研究王国维的论文由每年几篇增加到几十篇、近百篇，涉及王国维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文化侧面。在这众多的研究成果中，陈鸿祥近几年连续出版的三部专著——《王国维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 年）、《王国维与近代东西方学人》（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 年）、《王国维年谱》（齐鲁书社，1991 年），尤为引人注目，受到学界的好评。

以王国维为研究对象，本有多种角度，多种方法。取其某一侧面，某一局部，某一问题，加以评论或作发挥，自然比较省力。如全面地系统地作整体性研究，则具有较大的难度。王国维这样横跨多种领域的大师，对于现时学科分工日细的当代学人来说，的确是太广阔了。无可否认，王国维开拓的某一方面、某一领域、某一问题，虽不能说令后世学人皓首穷经和奋斗平生，但是如敦煌学、甲骨文之学，若无深厚的造诣，要想近期之见效，要想轻易有成就，根本不可能。可是陈鸿祥却舍易取难，三种著作都采取综合性的视角，这本身即堪称“愚公”精神。他说：“对王氏早期思想学术的研究，近年来在国内外几乎都成了一个‘热点’。但是直率地讲，研究者大抵专攻文史，甚或专治诗词，故对王氏‘专攻’过的哲学，并不甚了然；对其曾攻过的‘理学’（自然科学），可说全无所知。”陈鸿祥看到这种偏向，力求以实际行动加以弥补，在哲学和自然科学方面，都下了苦功。三种著作，按出版

时间，《王国维年谱》在后，但是按研究过程，《王国维年谱》则在前。著者按照编年的顺序，对王国维全部生平经历逐月梳理，探索，分析，考证，然后才在其文学成就和东西方文化渊源及影响两大方面，着力耕耘。

陈著的第一个特点，是极其重视王国维史料的发掘搜集工作，以此作为研究的基础。由于王国维生前有的著作署名，有的著作不署名，所以至今不为人知的遗作、遗译甚多。在《王国维与文学》一书中，陈鸿祥发掘了《孔子之美育主义》、《叔本华像赞》、《咏诗二十首》等遗作；在《王国维与近代东西方学人》中，又发掘了遗作《哲学辨惑》和遗译《叔本华之思索论》、《势力不灭论》等；在《王国维年谱》中发掘更多，诸如《周秦诸子之名学》、《〈东洋史要〉序》、《〈经学概论〉总论》等，并对其一一详加考辨，作出有说服力的证明。就这件事本身，不但为近现代文学、美学、史学和翻译学增添了新的材料，而且对于王国维研究的深化，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例如，《孔子之美育主义》，刊于王国维编的《教育世界》杂志 1904 年第一期，未署名，经陈鸿祥考析，为王国维遗著。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包括其悲剧观、境界说、不隔论、雅俗观，六十多年来一向为学术界所重视，研究评论文章也最多，但是王国维的美学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却一直未能追根溯源，不免使人感觉过于突兀和遗憾。在发掘了《孔子之美育主义》这一篇后，大河便导到了它的源头。从这篇文章已使人们了解王氏“从中西比较的意义上，扼要而明确地阐述了不仅在《红楼梦评论》及《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而且在《人间词话》中加以进一步发挥的美学观点。”“此文引述康德、席勒、叔本华之美学理论，而以席勒《美育书简》所倡‘美丽之心’作为其美育主张之最高境界，又借宋代邵雍《皇极经世·观物内篇》，论述‘观物’‘观我’，而‘境界’之说，亦由本文首揭之。”这就以新的确凿的证据，否定了以往将王氏视为“叔本华化身”的成见，而证实了王氏美学文艺观与近代西方文艺思潮的关系是一种汇聚百川的关系，莎士比亚、拜伦、康德、席勒及其他美学论说，都为王国维所吸收所容纳。

不论是对王国维的研究，还是其他领域的学术研究，目前大致都有两种取向：一种是继承中国古代尤其是清代朴学的传统，重扎实的考据，以翔实资料取胜；一种则是重视视野的开拓、思绪的驰骋，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曾流行过、近年来又流行起来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方法，在人文学科诸领域均很普遍。概观之，前一种取向以老学者为多，后一种取向则更受青年学者青睐。陈鸿祥属中年学者，其可贵之处在于，他兼而有得两种取向之长处，不仅在资料的占有和考证上十分用力，而且在研究视野的开拓上亦颇有气魄。这就形成了其著作的第二个特点。

一项学术研究，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按照一般的要求，只有在尽可能充分掌握和了解原始资料 and 具体历史情况的条件下，才能揭示研究对象所体现的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展示其本质及其规律。这就要求研究者，要掌握足够的材料，以整个体系为对象，梳理其主要脉络，确定其明显倾向，考察所提的概念、范畴和命题，从而进行缜密的分析，然后得出科学的论断或结论。综观陈氏之王国维系列著作，在这方面确是当之无愧的，其学术价值恰是由其史料价值所奠定的。

然而，王国维之所以能成为本世纪初学术界得风气之先的大师，最根本的原因还不在于他继承了清代“朴学”的传统，而在于他超越了前辈学者的视野，广泛地吸收了西方现代文化思潮，吸取了西方哲学家和文艺家的价值

观和方法论。王国维的学术成就本身就是面向世界的产物，是西学东渐的一座里程碑。离开了王国维当时所站的高度，不把王国维放在本世纪初世界思潮与中国文化碰撞的宏观背景中考察，便无法深入理解王国维。可惜，由于这种考察工程艰巨，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准备，以往只有人破题式地加以触及，鲜有人系统地涉足其中。令人可喜的是，陈鸿祥的《王国维与近代东西方学人》一书，在这一领域可谓登堂入室。著者用了十几万字的篇幅，运用了中西比较的方法，全面地研究了王国维与西方学人的关系。其中与康德、叔本华、尼采、席勒、托尔斯泰的关系，均辟有专篇，分节详加评述；其余与莎士比亚、卢梭、拜伦、歌德等人的关系，也一一细致研究，勾勒出王国维吸收、消化西学思潮的全貌。王国维是在本世纪初十分重视西学思潮而又在吸收、消化西学思潮卓有成效的人物，对于这样一位在吸收、消化和传播西学思潮的开山人物，如果研究者不能站在历史的时代的背景上，不能站在学术的哲学的水平上，而仅是依据文献记载和故步自封地为经典作家的论点作注释，或仅机械地重复于知识传授和对人物思想进行简单的对号入座，绝难从总体上系统地认识王国维在中西比较上所作的努力、所处的地位和所产生的影响。构成一种学术体系的因素是比较复杂的，除去历史、社会条件的制约以外，还有思想继承关系，还有对外来文化及其思潮的吸收和影响问题。诸如与康德、叔本华、尼采、席勒、托尔斯泰等不同的学术思想影响，如果不研究这种影响，自然不可能了解王国维学术体系的实质。陈鸿祥关于王国维系列性著作的长处，还在于其不仅仅停留在当时这些西学思潮的影响上，而是从认清一个学派的总倾向上和属于某个学派哲学家、文艺家的个人思想特点上把握它，既注意共性，也不忽视个性；既着重于说理溯本求源，又力求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避免了简单粗暴的一概骂倒，对于确有科学价值的，可资借鉴的有益的内容，给予了恰当评价和肯定，吸收和继承过来；对其中错误的甚或反动的观点和内容，则分别予以指出和驳斥；对有些内容，现在看来不正确，但在历史上曾经起过进步作用，如实地予以评价；最要紧的是，既评又介，评介结合，采取公允的态度。著者虽然研究的是王国维，然在如何借鉴、如何选择和如何吸收的问题上，上述方法显然是值得佳许的，对于丰富和发展我们的思想文化是有益的。

陈鸿祥还注意到王国维与同时代其他大师对待西学思潮的态度的区别，“本世纪初，差不多与王国维‘决从事于哲学’的同时，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人，都曾经在各自所写的文章中引用过康德的某些论说，但一般说来，都出于当时的‘政治上之目的’，而对康德哲学并无深入的了解。王国维对此甚为不满，并举例说，‘如《新民丛报》中之《汗德哲学》，其纰缪十且八九也’。”“这里所说‘纰缪十且八九’的这篇文章，当指梁启超的《近世第一大哲人康德之学说》。梁氏介绍康德的专论尚且不免‘纰缪’之讥，其他更不待言了。所以，王国维并不是近代译介康德哲学的唯一的学人，但却是怀着对‘纯粹哲学’的‘兴味’，来译介康德的第一人；紧接着他译介康德学说的蔡元培，则是本着他的‘兼容并包’的宗旨，主要是试图将康德的美学、伦理学应用于其教育实践，并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著名论说”。（《王国维与近代东西方学人》）这就更深入地把握了王国维吸收西方文化思潮的独特态度。亦为理解他学术上的创新和政治上的恋旧同时并存的人生态度找到了一把钥匙。在《王国维与近代东西方学人》一书中，著者以近半的篇幅和第三、第四辑的份量，全幅度地展开比较研究与王国维同时代的中国

学者，罗振玉、梁启超、鲁迅、胡适等众多学人都在其视野和研究范围，或论其学术友谊，或较其学术成就，或探其学术异同，或述其学术继承，或解其中难解之谜，每涉及一位学术人物，都有其深入的着重点，都力求阐发出新的启示。

著者在比较了王国维与罗振玉之交后，发表了这样一段议论：“我们不能过分夸大个别杰出的‘天才者’的作用，但是，也毋庸讳言，任何时代的文化学术史，如果撇开杰出的‘天才者’，将会是无从下笔，或者即使下笔，也只能降到平庸低能的程度。就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学术史上的‘平凡主义’较之‘天才论’，也许要更为反科学和反进步，因而是要不得的。”于是著者进一步引申比较认为，“在近代文化学术上，有两个人物，其学问是可学的，其成就是难及的，这两个可学而难及的人物，一个是早年弃医从文的鲁迅，一个是壮年弃西转中的王国维，不管后人用何种尺度，持何种眼光，我想历史的事实决不会因而有任何改变，但是：在周氏兄弟中，没有周作人，近代中国文学史决不会有任何质的增减，但若无鲁迅，就会完全改变样子，失却光彩；在罗、王二人中，罗氏的贡献固然是不可湮没的，但若无‘兼通世界之学术’的王国维，近代中国学术研究的某些原先空白的领域，例如戏曲史、上古史等等，很可能反而让国外的‘汉学家’，利用从中国盗窃去的史料，抢先招摇”。(同上)尽管著者的观点，无需要也不可能使别人都苟同，但却是著者研究所得出的于人有启发的认识。

作为学术后辈的胡适，当然在学术文化思想上二者有着继承关系和发展关系。有关王国维与胡适的比较研究，已经有过不少篇章了，然而陈鸿祥还是重墨研究之。在《王国维与文学》、《王国维与近代东西方学人》二著中，均设专章对王国维与胡适进行研究，除了从家庭出身、气质、教养、生活环境等方面比较其异同外，更重要的把着重点放在了二者的历史背景、学术交往和学术文化的继承上，特别是用力探察二者在文学革命中的各自作用及其影响上。作为文学革命先驱的王国维，他所提出的文学方面的各创见，显然先于和早于胡适，可是在五四运动及其以后，胡适在同类问题上却声名雀起、影响盖过前者王国维。倒底该如何看待这个现象和问题呢？著者从“一代之文学”思潮的“始作俑”者、胡适“历史进化观”中的王氏之见和两个“中心理论”一个祖师等方面，进行阐述和分析后，发表了下面的两段议论：

其一，“当然，也应当指出，如果只从胡适之‘论’中找王国维的‘影响’，认为‘一切之论’皆先‘发之自’王氏而‘行之于’胡适，那还是表面的，而且会陷入‘以偏概全’。这是因为“王国维对近代文艺思潮的影响，既然是带有渗透性的；故其见解之在‘五四’以后的‘新文艺家’中的反映，就不会只限于胡适一人，也不会只限于胡适提出‘白话文学’的一时；惟其不限于一人一时，这就需要我们与‘五四’以后的‘新文艺家’中曾经流行，或于今仍然有影响的某些有代表性的观点联系起来考察。”

其二，“我们历史地回顾王国维与近代文学之关系，剖析他的文艺见解对胡适及‘五四’以后的‘新文艺家’的渗透性影响，这仅是一个方面；另一个重要方面，更应当从他的论说或见解之局限性、消极性、片面性中，进一步看到与他的起点相似的巨人鲁迅，是怎样随时代前进而不断地修正、发展与完善了自己的观点或见解，并产生了积极、能动、向上的足以消化外来的，摧毁腐朽的旧传统、旧观念的革命性影响，这才是真正的文学革命的先驱，新文艺家的先导，近现代中国新文学史的主流。”(以上皆见《王国维与

文学》)

这样一来，于是将王国维之历史影响及其局限性交待清楚了，同时对于认识相关问题、相关人物，亦不无益处。

陈鸿祥系列性著作的第三个特点，是著者勇于碰硬，拨谜析疑，在许多重要的然而又有争议的问题上，提出了有理有据的新见解。评论王国维，争议之大莫过于王氏为何自沉昆明湖而死的问题。以前，流行的结论主要有二：一为“逼债说”，一为“殉清说”。其他还有“殉中华传统文化说”、“恐惧革命说”、“精神苦闷说”等。但是陈著对前说均不赞成，而是在以大量材料加以证否的基础上，提出了“王国维之死是由政治的、思想的、现实的、历史的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的新观点。他指出，怕“党军”入京，可能是王氏自沉的外因，但并非是导致其必死的主要因素。“其主因还在他自身。第一，他是个哲学上的‘厌世’‘解脱’的悲观论者。……在他看来，宇宙之变化，人事之错综，日夜相迫于前，‘欲生之心’的‘生存意志’与‘不满足于今日之世界’的‘欲生之戚’的‘生活苦痛’，永远像‘魔影’一样纠缠着人而无从摆脱。第二，王国维又是一个以‘学术为性命’的‘书斋学者’，……‘甲子之变’，连溥仪都撤去了‘皇帝徽号’，当了‘民国国民’，他哪里还有庇护所？不得已入清华国学研究所当‘导师’，‘革命’一旦把这座‘国学重镇’也革掉，他还能由何处觅得安身治学的环境？第三，还有更内在的一个思想原因，王国维是个力主以学问为目的，而反对以学问为‘政治之手段’的‘学术神圣’论者。在他的头脑里，学问不受政治干涉，学者摆脱政治漩涡，为至上之境，至极追求。但，从‘戊戌变法’，直至‘辛亥革命’以后的历次‘世变’，他看到的只是政客跋扈，军阀混战，国事日非，他追寻千百度的这种能尊其‘学术神圣’的境界，不过是‘终古一理想’，是《列子》书中所谓的‘华胥之国’，是现实的社会中不能存在的，而‘革命’甚至会连他的这个‘华胥之国’的理想也要一并‘革’掉。连仅有的这点追求都不能有了，他还要这个‘五十之年’的躯壳做什么呢？”最后，著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王国维确是“以学术为性命”，最后又以其“五十之年”鼎盛的生命，殉了他视为“性命”的神圣的学术！他的死，毫无疑问是一大悲剧。千百年来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前途选择，基本有两条：一个是谋“要津”，做大官；再一个是求“直节”，做学问。王国维即属于后者。在这个意义上，他的死，又是一个有“直节”、有学问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陈鸿祥之说，并不是这一悬案的最后定论，却堪称令人耳目一新的新论。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谜”，王国维这样新旧错综、承先启后的知识分子，又是“谜中之谜”。综合运用历史、文化、心理分析诸法，力求深入王国维的内心世界，我们想其意义不在于解谜最终的结论是否堪称定论，而在于解谜的过程本身，已给读书和研究诸多启迪。

陈鸿祥关于王国维的系列性研究及其著作，可以看作是迈向“观堂之学”研究的新境界，但是随着史料的进一步发掘，随着对“观堂之学”众多领域的深一步研究，对于王国维的研究必将会有诸多更为专门领域研究的成果的产生，使得“观堂之学”更有一个繁盛时期。

(此文与丁东先生合撰)

1992年5月18日

廓然大公 物来顺应

——《梁漱溟传及访谈录》序

作为晚生的我，怎么能有资格为研究一代思想家、社会活动家、“乡建派”领袖梁漱溟先生的著作作序呢？若要说清楚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真还得容我慢慢从头讲起，也许还需要讲出一些事因来才是。

—

时间需上溯至 70 年代末，那时我筹办《晋阳学刊》杂志。在筹备过程中，同时也思考着自己的专业定向及研究领域，经过反复比较选定了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

所以如此，主要鉴于两个基本因素，一是有关中国学术史，除了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 1936 年）和钱穆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 1937 年）外，后面之学术史尚是空白；二是近现代中国著名学者，在经过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的磨难，尤其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后，有的在中国历史舞台上隐没了，有的在学术领域中沉寂了，即使是健在者，多数也到了古稀之年或耄耋之年，身体状况多数不佳。当时产生一种想法，觉得应该尽快通过适当的形式，抢救和发掘这批学者的学术史料；后来所以能有《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大型丛书的出版，正是这种“抢救和发掘”工作的重要成果。

当想法成熟后，即行按策划向全国学者发出了征约传记的信函。使人非常鼓舞的是，我们的想法受到了学界的首肯，很快就收到了一批著名学者的回信，诸如周谷城、冯友兰、周传儒、季羨林、张岱年、周予同、郑天挺、邓广铭、杨向奎、蔡尚思、李侃等先生相继指出：“这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此实为一开创之举。”很多人先后寄来了他们自己的传记。但是也有另一种情况，有一些先生碍于时政和师承等敏感问题，暂时不便作传，但愿被理解或延缓运作，诸如罗尔纲先生等；有一些学者保持了沉默和观望的态度，梁漱溟先生即取此举。从后来的迹象看，其实梁老一直在关注着《晋阳学刊》上《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选载栏目的动向，从创刊到 1985 年所刊之学者传记，他都阅读过了。

当他看毕《章士钊传略》后，他被作者白吉庵先生之朴素的文笔、客观的叙述和对传主之学术特色的介评风格折服了，动心了，他通过历史学家阎宗临之子阎守诚先生转告我，他希望能由这位白先生为他作传。就这一点看出，梁漱溟先生阅读传记是十分用心的，而且看问题有他自己的视角，从一篇传记中既观察传主与己相近的政治经历及其在现当代的地位，也审视传主在学术领域中的成就及在现当代所受到的臧否褒贬，更着重传记作者对于具有复杂背景和复杂经历的人物史料的驾驭能力，当然也注意到了作者的语言应用风格。所以白先生能被梁老所相中，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只有对梁漱溟先生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历史及其错综复杂的思想心态有一个客观的了解之后，恐怕才能认识和理解他在这件事情上的举动和选择。

因我约梁先生撰传已有多多年，说心里话，早就企盼着他有个明朗的态度，或尽早得到他的传记。于是在给李希泌先生去信时，顺请他转告白吉庵先生有关梁老的意图。李先生与白先生是云南同乡，他们时常来往。白先生据约，

很快就同梁老联系上了安排好采访日程，按约定计划进行。但是采访活动竟达几十次，时间长达三年之久，直到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先生仙逝时止，采访计划尚未最后结束，却是事前根本没有预料到的。采访活动的事实证明了，一则可见梁漱溟先生一生经历的丰富和社会接触方面的复杂，二则表现了白吉庵先生对梁老生平及其事件头绪的熟悉，从采访录中发现，两位总有说不尽的话题、解不完的人事矛盾，加之涉及时间跨度长、经历人事头绪纷繁，常为理清一些历史症结而使双方大伤脑筋和大费精神。由此也使人体验到，即使抢救和发掘近现代学术史料，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从后来白吉庵先生写的一篇《怀念梁漱溟先生》（《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7月16日）文章中知道，梁先生是十分重视这次采访活动的，“回忆我每次赴他家采访时，梁先生已经坐在客厅，正襟危坐，手里拿着书或报，聚精会神地在看。显然，这是等人的态势。对此我总感到抱愧。梁先生每次谈话，大部分谈自己的往事，但常常提到当时的一些风云人物，如梁启超、蔡元培、章士钊、陈独秀、李大钊、杨度、黄远生、胡适等人，其中讲得最多的要算是胡适了。因为胡适的文化观点、学术思想，与梁先生的主张是对立的，所以经常会被提到。我那时还在写《胡适传》，所以很愿意听听梁老的看法，……梁老总是诲人不倦地讲给我听。先生逝世后，我粗略翻阅了一下笔记本，竟有好几处谈到胡适，从这些谈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梁老的为人和道德风貌”。

在采访梁先生的三年多时间里，我与白吉庵常有书信往还，以便及时地掌握采访信息及动态，同时有意催促白先生抓紧时间，有时还通过采访者向梁老提出一些请求。我记起，曾有以自传形式写传的想法，“但他不主张取自述方式，他说我已九十二岁了，许多（事）已回忆不起，还是想到那里，随便谈，你去整理，可参考他的书，云云”。一次想请梁先生为《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丛书题签，当采访者转达了我的意向后，梁老愉快地允诺了，并于1986年2月10日挥毫书之，但却漏掉“现代”二字，翌日又补写了“现代”，把“现”还重写了一遍。直到梁老归道山后，我才意识到未在他健在时向先生当面领教的遗憾，这已是后话了。

在我的一再催促下，白先生曾有若干次想着手先为《晋阳学刊》撰写一篇二万字左右的传略，然后再考虑大传工程。但后来从白先生采访期间写给我的二十多封信中，才真正理解了他采访的根本用意。他最初是抱着“抢救”学术史料的姿态去采访梁老的，正是基于这种“抢救”的想法，越采访越觉得梁先生的阅历丰富，思想深邃，而需要“抢救”和“发掘”的东西越多，于是几经企图着手撰写梁老传记，都未能如愿，最后竟成为一项未完成的采访！然值得庆幸的是，经过传主和采访者三年多的合作，毕竟把极其珍贵的口碑资料“抢救”了下来，今天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梁漱溟传及访谈录》，正是梁、白二位先生合作完成的丰硕成果！梁老在他晚年接受过多次访谈，然白先生这次访谈，又可视作对梁老的最后访谈！

二

从80年代初约梁老写传始，到1985年梁老邀请白先生访谈，以至在访谈过程中，以及到梁漱溟先生1988年6月作古后，我同白吉庵先生有通信50余封，除其他事项外，主要内容始终未离为梁老作传的问题。原计划将梁

传纳入《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丛书的前十辑，尤其是1985年白先生开始访谈后，我感到梁老传之成功的希望愈来愈大，于是在访谈过程中，或在梁老故去后，我都以按捺不住的喜悦与白先生去信，进行催促，要他抓紧时间完成梁传。作为白先生，每次回信答复，都充满着信心，有着十分的把握。关于梁传，从访谈开始即有三个打算，先为《晋阳学刊》专栏写一篇二万字左右的，次为传略丛书写一篇五万字左右的，最后完成一部二十万字的大传。可是，实际的运作进度，并未如预料的那样。二万字的传，随着我本人的退役已没有必要；五万字的传，由于白先生尚有其他研究项目，直到1994年底才完成草稿，当定稿到我处时，时间已到了1995年8月。而传略丛书的继续出版，虽然因出版条件的变化而受挫，但是鄙人组织传略丛书后十辑的工作并未停止，坚信这套学术人物传略丛书的历史价值与学术价值，坚信出版界会有有识之士接受和推动这套学术人物传略丛书的出版，于是对于一些重要学者的传记，我仍孜孜以求、不遗余力地促成其成功，这就是我始终不懈的动力，收入“20世纪学者回忆丛书”中的梁漱溟传、罗尔纲传二种，都是这种努力的结果。

关于罗尔纲先生的情况，我已在罗老一书的跋中作了交待；有关梁传的促成，下面我想摘要几封白先生的书信来加以说明。

1985年9月7日：“……今天下午准备去访梁先生，上次是三伏天整整谈了一下午三小时，中间他保姆催停数次，均被梁先生喝退，后来恐怕他身体受影响，所以一直没去。而今已是秋天，所以才开始访谈，梁先生是很高兴的，但他不主张取自述方式，他说我已九十二岁了，许多已回忆不起，还是想到那里，随便谈，你去整理，可参考他的书云云，特此奉告，今天刚上班草此书束致意于吾兄，谈谈近来情况，请指正。”

1986年10月3日：“关于梁老的传，我一直在收集材料的，报刊上曾披露了一些，我都看了，自信还有好些没有涉及，请不要着急，有理不怕迟到。我准备明年写出，今年任务已安排完了。”

1987年11月14日：“最近开始阅读与梁老先生谈话笔记，心想明年写出一本二十万字的传记，故写信请问你是否能出一个单行本？若是写个五万字，不多不少解决不了问题。因为材料比较多，不用可惜！另外，有些材料如何用也是个问题。比如1953年与毛发生争论的事，等等。”

1987年11月27日：“前者奉上一函谅已收阅，那是一时想起来写的，不知阁下意见如何？不见回信，可能有难处的事，我现在考虑，还是以原计划为好。写一个两万字的给您，明年初即可刊用。现在已经着手，估计一两个月后就可奉上，请酌定。梁老最近腰疼不起，赶快争取时间写出才是，……”

1988年7月30日：“关于梁传，今年春间曾准备着手写了，当时看了资料。不料又遇着他事，一放就不好收拾。……如今梁老已经去世，好在过去几年的问学求教，知道了不少的事，这些活资料是他人不易得到的。我也有责任把它写出来，供大家研究。这是后话，可能老兄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吧？但笑得早不一定太好，有理不怕迟到，因此请兄还要等一等，近来的确太忙，夏天炎热，都休息不了，请谅解。”

1989年2月15日：“弟近来在阅读梁先生书籍、材料，预计四月份拿出两万字的传略，届时当奉上求教。同时也请兄作好安排。我意若能放在第三期（六月份的）为好，因为这是梁老逝世一周年纪念。不知尊意如何？”

1989年2月25日：“……近来常病，原计划写出的梁传稿，是难以实现了。虽然如此，我仍打算在今年内交卷；开始动笔时，再告。”

1991年8月21日：“……所嘱作梁传一事，弟时时在心，不敢忘怀。只因近年来为胡适传所干扰，故放下了。好在胡传，经过三年的努力终于完工了，现在正煞尾，不久即将交出。这样我可松一口气了。下一步计划，就是写梁传了。我估计明年春天可以奉上一个传略请指教。”

1991年12月20日：“关于梁传之写作，弟已列为今后的任务，当全力所向，先写一个两万字的，接着写大传，初步估计，两年时间完战，或再多一点时间。五万字的还要不要？两万字的明年三月份交稿可以吗？”

1992年1月4日：“新年前夕接到了您的来信及大作，……不过老兄以文章来‘讨债’，却是一大发明，使我不得不还债了。其实，我心里何尝愿意欠这笔债呢？都是形势逼着我走。北京距离较近，所以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了。现在他们的债已经还完。今后当还老兄的债了，请稍待时日，梁传今春定能交付。”

1992年7月14日：“……最后禀告者，梁传已经动笔了。两万字，恐怕打不住，如何办？要写三四万字，怎么办？是不就限两万字？我好掌握着写。”

1992年10月8日：“关于梁先生传略一事，我想还是按原计划进行如何：第一，先写两万字的在‘学刊’或是‘论丛’上发表。第二，再写五万字的纳入书合集中，你看好不好？请酌定。至于成书，当从长计议。”

1993年6月16日：“其次，关于梁传之事，正如老兄所推测的，现在提到日程，正在写作中。准备先写两三万字的传略，年内完成。你看在何处发表？（《晋阳学刊》学者传略已停）李希泌先生曾说过，若无处发表，他可推荐到广西去，不知兄意如何？”

1994年4月14日：“梁传正在写作中，今年内交稿没问题，……”

1995年4月22日：“梁传六万三千字，已经于去年底完成，请人抄写，我要再看看，同时也要请梁的儿子看看，提个意见，审查一下，看有不足之处，改一改。之后，再交卷，请兄最后审定。”“之后，想写一个大一点的，把访问记附在后面（这也是老兄之意见）但愿早日完成。目前弟正在主持编辑章士钊全集，精力恐顾不过来，上述大传，只有往后拖一拖了。”

1995年7月30日：“梁传稿及《略论章士钊与胡适》文稿，今已交本所传达室，由他们统一寄出，我在上面注上‘稿件挂号’四字，请交通员多加关照。估计八月上旬将会收到，望收到后即刻回音，免念。”“梁传因为是传略，有的地方只是点到一下，未能扩张来谈，这是有意留在大传中去说的。不过关键是交待了。兄以为可否？若需要补充者，请函告即可。”

1995年8月16日：“……兄对梁传提出修改意见，很好。有的我可补充补充家世，分段标题，我亦可作，但最后还是望老兄把关，修改润色才是。”

1995年8月23日：“这几天重读了梁传，拟了小标题十五个，另纸奉上，请酌定，编入为盼。至于其他不足处，俟来日再补。”

1995年10月5日：“信中所谈之事，一切遵照您的意见就是。”“书稿内容，我意是否可分为：传略、访谈录、年谱（简单）三个部分，实际是两个部分。书名《梁漱溟传及访谈录》，字数15—20万字，“传略”再加强一点，“访谈录”取漫谈形式，不可能再说当时的交谈情景。”“秩序可打散编排一下，按历史发展顺序，先远后近，使读者有个头绪。”

以上摘引有关书信十九封，时间跨度是十个年头，如果从 80 年代初向梁漱溟先生约传算起则是十五个年头，最终才算促成了梁传的完成，这其中的周折和艰辛可想而知！

三

梁漱溟传本来是为《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丛书撰写的，然现在却成为“文化名人 20 世纪回忆丛书”的一种，书名成为《梁漱溟传及访谈录》。事情之所由，白吉庵先生已在 1995 年 10 月 5 日信中略露端倪，感谢他接受别人之意见，并非常慷慨地将访谈录整理公诸于世，供学术界共同享用这份极其珍贵的访谈文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着共同的识见，认为任何文化学术文献史料，其本身都是公器，应该属社会所有，应该属学界共有，而不应占为个人己有。我们就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当山西人民出版社要推出“文化名人 20 世纪回忆丛书”时，将另有所用的梁漱溟传和访谈录归并一起付梓，让社会与世人所共享。

我在为“文化名人 20 世纪回忆丛书”草拟约稿函时，引用了夏衍老人在其《懒寻旧梦录》自序中的一段话，现于此处再作抄录：

有人说我是同龄人，其实，我出生于 19 世纪最后的一年，可以说已经是跨世纪了，从 1900 年到现在（案：1984 年），我这个人很平凡，但我经过的这个时代，实在是太伟大了。我亲眼见过亚洲第一顶王冠的落地，我卷进过五四运动的狂澜，我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我亲眼看到了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冉冉升起，我在这个大时代的洪流中蹒跚学步，迷失过方向，摔过跤子，也受到过不尊重辩证法而招致的惩罚。经过回忆和反思，特别是处身在今天这样一个伟大的改革时期，觉得我们这些人有把自己走过来的道路，经受过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记录下来，供后人参考的必要。亲身经历过的，耳闻目睹过的记述，应该要比辗转传闻和在历次运动中留传下来的“材料”真实一些，但我能够做出的，也只能是“力求”做到而已。上了年纪的人写回忆录，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主客观各方面的制约，一是记忆力远远不如往年，对几十年前的往事，大事情大概不会记错，具体的细节（时间、地点等等）就难免会有差错，二是“交游零落，只今余几”，过去一起工作过的战友，健在的已经不多，要核实或查对往事，只能从他们遗留下来的为数不多遗著中去寻觅了；三是记事离不开论人，这就还有一个该不该“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问题。……清人章学诚说：“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我以为这是一条应该自律的原则。

当读者阅读毕这段引文时，恐怕也就不难发现我所以引用夏文的意图了。夏衍出生于 1899 年，而梁漱溟则长于夏衍六个年庚，可否说他们是一代人呢？尽管二位的具体经历有异，然其历史背景却是基本相近的。更为重要的是夏公就如何认识和评说回忆文字的历史价值，以怎样的思想方法论来审视和判断这类回忆录或访谈录，不能不说是提供了参照系数的。

梁漱溟祖籍广西，但其父辈以上几代均为京官，故其自幼生长于北京。对于发生于上世纪末及贯穿于 20 世纪的重大事件，或政治的，或文化的，或教育的，或学术的，在他之访谈录中均有涉及和评说；对于活跃于上世纪末及 20 世纪的重要人物，或当政的，或在野的，或故去的，或健在的，对于他们的功过是非，在他之访谈录都臧否褒贬。梁先生在现当代的中国可谓是少有的敢于言论的著名人士之一，即使面临着曾指挥千军万马，刚刚打败了蒋介石八百万军队，并在天安门城楼亲自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毛泽东；还是面对着被捧为“红太阳”，愈来愈被神化了的，正在亲自发动和

亲自统帅“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他都敢于仗义直言，批评当今现状及其运动，或当面的，或书面的，或个别进行的，或在公众场合的，都不改其耿介正直、不同于流俗的人格形象。众所周知，梁漱溟在解放后的几十年里，几乎都是所谓的“反面教员”，但其本人却能泰然处之，净心养性，读书著述，研究思考，关心国家，评点江山，直至近百岁的高龄，思维状态仍然十分敏锐，还经常反思自己一生中的过失缺憾，确实称得上一代奇伟之士。尽管为梁老作传者或访谈者，已有若干，然像这次经历三年和访谈几十次中所涉及，都以为可称前所未有，弥足而珍贵也。

我有幸成为梁传及其访谈录的第一读者。能抢救到这份难得的学术资料，应该感谢白吉庵先生的辛勤劳作，同时值得欢迎他之以学术为公器的精神。关于推出这份访谈录的经过与考虑，白先生已在前言中作了交待和说明；的确，在访谈录中相重复者、相牴牾者的情况都是存在的，但这并不妨碍它之文献史料价值，相信研究者和读者能有辨别能力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中吸取到合理的成分。

奉命作序，自知难以胜任。序之标题则借梁老生前为白先生书赠。

1997年元月17日

罗尔纲《师承四记》跋语

一本著作或者有序，或者有跋，或者兼而有之，或者二者皆无。序文跋语，或作者自作，或他人作之；自序自跋者，多交待说明著述宗旨及经过，他人序跋时，则多介绍或评论本著之内容及其特色和创见。

本著是史学大师罗尔纲先生的自传。我作为晚辈，给他作序作跋，似乎都不妥当，都不相称。既然如此，又何必作呢？因这其中关涉到我和罗老十余年的交往，有许多话想要对读者有个交待说明，以释己之感慨。

一

罗尔纲先生诞生于 1901 年，与本世纪为同龄人。

罗尔纲先生研究太平天国，始于考证张嘉祥的事迹，若论时间已在七十一年以上了。其研究太平天国史确系著作等身，而论其治学严谨，更为一代师表。他考证之《李秀成自述原稿注》，是经历了四十九年笺注而成之作；1991 年推出之《太平天国史》四巨册八十八卷，凡一百五十万字，是历经半个世纪苦心耕耘的成果；与考证、著述并行，是他大量搜集和系统地编纂太平天国史料，所出版印行之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竟达一千四百余万字，为同行和后继者提供了丰厚的研究条件。在我国从事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先辈学者，公认者有罗尔纲、萧一山、郭廷以、简又文、范文澜、谢兴尧等几位，若论在同一学术领域中的成就及其创获，若论在太平天国史领域中的耕耘时间，恐怕是非罗尔纲先生不能为其冠也。更难能可贵的是，寿高已九十六岁，仍未辍笔，仍不断有著作问世，这在当今学界又能有几人？

二

我对罗尔纲先生心仪已久，在我主编《晋阳学刊》约组《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时，他是第一批征求传略的对象，时间约在 1980 年。可是直到 1994 年，传略稿已约组到五百余份，传略丛书已出版了十辑，然罗先生的传记尚未收到。十多年来，与罗尔纲先生一直有书信往还，除偶有几封是其女儿罗文起代复外，其他信函均为本人亲自书写。在我书斋中，有罗先生赠送的《困学记》、《太平天国史丛考甲集》、《太平天国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等近十种著作，都是本人亲笔题签，成为我藏书中的珍品之一部分。拜读其著，越发增加了我对罗先生的仰慕之情。

罗尔纲先生第一封信写给我的时间是 1982 年 1 月 31 日，那时《传略》丛书已面世一、二辑，在《晋阳学刊》开辟的专栏选载学者传记也有二十余篇，于是有此信。信中说：

至命撰自传一事，因有师承问题，难于下笔，未能遵命，伏维见谅为幸。

随信寄来《论湘军》论文，并说明是《湘军兵志》第一章《总论》，发表时先改此题。何谓“师承问题”？从罗先生 1944 年所著《师门五年记》得知，罗尔纲作为胡适的门生，自 1930 年起，两次被留在胡适家中研究学问，亲聆教言。胡适用他的“大胆的假设，细心的求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治学观点，向罗尔纲传授了治学方法，使之走上了有效的研究道路。由于“师承问题”，50 年代初和“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胡适思想时，作为胡之弟

子的罗尔纲，当然要受到株连。而我却在刚结束浩劫后约组罗先生撰写自传，作为过来人，如何能超越“师承问题”呢？如何能摆脱那场灾难性的阴影呢？

有碍于历史遗留，我对像罗尔纲先生一类学者的约传问题，一方面诚恳地理解，一方面耐心地等待，然后通过书信和访谈进行促成，甚或动员说服其子女和助手请本人口述成传。到1988年6月和9月先后收到罗先生两信。其一告知，他的传记将由广西某大学的老师撰写；其二告曰，传稿学术思想不足，“距尊处要求太远，难以应用。纲曾经打算在他写的稿上加以修改补充，但十分困难。经过再三考虑，只得据实陈明，伏维亮鉴，赐予宥恕，是所至禱！纲辱蒙列入尊编《传略》内，曷胜光荣，容待约得合适同志撰写，当再奉闻。”从“师承问题”到选择传记作者，时间已经过了七、八年，但先生的想法毕竟有了很大变化，我是非常高兴的，于是才会有1988年底的登门拜访。当然，我之意图是希望尽快促成传记的完稿。

三

当我登上罗先生所居之楼梯时，只见门上贴着：“本人有病，概不会客，有事请到新楼找罗文起联系。”见此状，我则退下楼来；可是事有凑巧，恰遇罗文起上楼，呼其名说来意，她让我上楼进屋坐叙。

进得门来，她与我谈：“父亲一来操广西方言，二来不善言谈，三来血压高。一兴奋可能影响睡眠，弄不好还可能发生意外，故而家人对来客挡驾较多。父亲一般不见客，不出席会议，不参加集体性活动，甚至也不下楼，平常与子女对话，或研讨问题，也须互相用纸条子的方式交流。不过思维很清晰，记忆力很好，对问题反映很敏捷，写作速度很利索，整天一个人伏案工作，他的著作都是这样完成的。对他的自传，自己不写，今年虽然请广西一位同志写，但写出后觉得难以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此事尚无着落。”我动员她帮助其父完成，或口述，或记录；但她觉得很难办到，怕不答应。在我们谈话间，她发现其母亲起床了，遂将我到访的事通告其父。大约十多分钟后，罗先生拿着一份前边说到的传记稿复印件和他为自传所拟提纲来到客厅，一阵谈笑风生，完全如老朋友一样熟识。看上去个子不算高，头发已灰白，然却精神矍铄，闻其说话节奏，我真不敢相信他是已到了耄耋之年的人。寒暄时说了几句普通话，当话转到正题时，就需要其女儿翻译了，竟然如同与异国人对话一般。

罗尔纲先生说：“《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之组织和出版，这部大型丛书，功德无量，意义很大，是现代学术史上的大事。我已购得一至四辑，希望在山西能购得五至十辑。我所以一直未诺写传，主要碍于师承，与胡适先生有关系，直到最近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种书，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荣孟源还在文中说什么‘胡适之流’，充满着左腔味道。在传中，吹捧不行，贬低也不行，自我张扬也不行。今年所以要写，是《人物》杂志上发了一篇，你来信要写治学和学术思想，于是我请原篇作者来写；可是写好一看，却发现作者对我学术思想的理解是隔靴搔痒，认识很不深化。我便在原稿上删改很多，但改到一半时，改不下去了，只好将原稿退还本人。了解我的人，是最早调到广东社会科学院的一位，其次就是广西的这位，我给了他资料，专门拨了经费，成立了教研室，还在我从事学术研究六十周年纪念会上报告我的事迹。现在看来，广东的没有联系了，广西的难以胜任，我只好请罗文

起整理了。我已拟了一个提纲，是仿照《浮生六记》的格式拟的：童年记、困学记、改造记、探索记、考证记、抗病记。大约可写二十五万字，还向近代史所报了项目，但是生前不计划出版；这个六记的提纲，是第一次让外人知道。至于给你们自传，我提供资料和构思，由文起整理，最后由我修改定稿。”

四

时间到了1989年元月16日，罗尔纲先生又亲自来信，说他收到了《传略》丛书五至十辑，函说：“先生主编这部大型丛书，功在不朽。承收小传，至感光荣。拙著《书呆子六记》已脱稿。其中学术思想、考证方法两部分甚难阐述，子女等了解更非易事。现已命女儿罗文起先读一遍，由第二小儿罗加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帮助。他们须读懂后才能执笔，而如何写法又是大问题。因此，今年三月必不能交卷。何时能奉上，须看他们工作而定。总之，辱承先生多年垂注，并亲临寒舍见教，纲一定将小女等草稿一改再改，使大体像个样子，才能奉上，断不敷衍塞责也。”信中还说邮来书款，连邮寄款三元钱都考虑到了。

可是到同年8月8日罗文起来信告悉，“前命为家父写传事，曾约定于九月间奉上。不料家父于五月间坐浴起来，仰身跌倒，眩晕过去，尚幸脑部未出血，左臂左臀都跌伤，至今未愈，因而他撰的《困学五记》写到第三记即未能续写。由于家父自传未写成，故我未能据以写简传，一俟他病痊愈写成《困学五记》后，即写简传奉上不误。”

五

至1991年12月27日，罗文起代其父来信，提到可否用郭毅生教授所写《罗尔纲先生的治学风范》一文作为传略，信云：“我父亲看了，以为写得不错，叫我复制一份寄给您，请您审阅是否可用。如可用，有何修改之处，请直函郭毅生教授。”随即，我复信罗先生，同意由郭教授撰传，并附传约二式，请罗文起代转郭先生。待到1993年1月10日，又接罗文起信，才知郭先生赴美探亲和访学，传记一时尚难完成。

六

1994年10月我去北京出差，任务之一自然包括访罗先生在内。但因先生血压过高，医生严禁客访谈话，未能如愿。不过通过罗文起传递信悉，已知《生涯六记》写就，并同意我从中节取第一、第二、第四、第五四记编入《传略》丛书之内出版。此次，我赠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大辞典》一部，他则送我《太平天国史》四册。当我返晋后不久，罗文起迅速按约将四记节录出寄来，在传稿中可见罗尔纲先生有四十七处亲笔改动，文起还附函询及“题目未知尊意是仍用《生涯六记》另加编者按语说明摘录四节呢？或者另改名作《童年求师和我的考证探索工作》？”继又接到罗尔老10月14日亲笔信，是他翻检拙编后的过誉评价，信曰：“拜读《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大辞典》，何止‘二十世纪全球华人社会科学学者之集中展示，学术之精华汇

集，学派之宏观检阅，学史之全貌缩影’而已，其将永垂不朽，功德无量矣，曷胜钦佩。”另外，罗先生对于我到京时，他因血压高未能接受我之访谈，在信上还特意表示了歉意，请求我“伏维亮鉴”。

后来，在我又一次阅读罗尔老四记时，又见其他刊物上载有《深宵感怀录》、《深宵读书集》两个内容的文章；再则，他曾谈起过，还有《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两种稿本。于是写信给罗先生，希望将以上四种与四记合并在一起出版，也许内容会更丰富些。对此，罗尔老又于1995年4月24日亲自复函给我，函示：

承嘉奖拙著《深宵感怀录》，至感盛谊！至尊示两种设想，均与拙著内容体例不合。

一、拙著《生涯六记》内容即到该书结尾为止，断不能再加，再加便非真实了。纲为人守朴拙，厌浮华，一字都不敢妄用。例如纲一生教育的基础，都出自嗣母林太夫人，但她严格的教育我目的只是“教子成人”，在她的思想意识内，并无扬名显亲的观念。如果我不出嗣给她，而由本生母王太夫人教育，在我小的时候，就常说我要“要名”。因为王太夫人是个书香大家出身，而嗣母林太夫人则出身于商人的家庭。纲用一字不敢苟且如此。伏望阁下俯念其朴拙，是所至感至禱！此其一。至于第二原因，则纲现已定有出版两部拙著计划：一为《深宵感怀录》，一为《深宵读书集》，一俟编成，即在北京有关出版机关订立合同。至于拙著《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已在北京三联印刷中，1994年第五期人民出版社的《人物》上已作报道，想来不久即可出版了。

未能拜赐盛约，至深歉仄，伏维鉴谅，是所至感至禱！

罗尔老特为我的意见与要求，复了这封长信，讲了其中的道理，道出了他另有的计划与安排，使我由衷地诚信诚服；同时也为我之唐突，并过多地占用了罗尔老之极其宝贵的精力而感到愧疚和不安。但是，罗尔老这封信，也进一步提供了深入理解其母教家学，对他人格形成的重要性，到老来他都严格恪守其中的一些重要的伦理规范原则，这对今天的家庭教育，也许还可能存在着它的积极启示意义吧。

七

后来，我之朋友、现任山西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崔元和先生提出要出版“文化名人二十世纪回忆丛书”，并邀请我为之策划。他觉得我多年来筹组《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丛书，与学界名家交往较多，对他们的情况较熟悉，似乎有条件策划这个选题。而我也认为，这个与学术文化贴近的选题，在本世纪即将结束之际，邀约一批与本世纪同行的学者中之著名人物，以其经历为主线，写出自传或者回忆录，显然有着极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化学术价值。通过这套丛书，即在于通过对文化、学术史的回顾与追怀，抢救一个世纪的文化学术资料，来一次文化学术的有目的、自觉的积累，是极有意义的事情。于是，我一方面为之撰写了约稿函，一方面开列了一个名单，同时也将我处已有的梁漱溟、罗尔纲的传稿提供第一批出版。就这样，罗尔老的自传四记被列入了这套丛书，目的在于促成这项文化学术事业；至于我主编的《传略》丛书中罗尔老传的空缺如何弥补的问题，尚未想到更为妥当的办法。这里，我的唯一愿望，就是期盼罗尔老能理解我的举措为禱。

八

今年春节前，我又去信向罗尔老请教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有关《新青年》学派与《学衡》学派争论的问题，并顺向他恭贺新春。到2月14日得复函，然写信者却是罗文起，信上说：

家父腰部老病复发，引发腹部水鼓新病，奉接赐教，我读了给他听，他说当时北京大学提倡新文化、新道德，创办《新青年》。南方南京创立《学衡》杂志反对白话文、白话诗，旗鼓相当，对立分明。

接信后，我立即回信罗文起，询问罗尔老病情，并致慰问。虽然至今未见只字回音，但总觉得再不好意思打扰了，可又常在挂念之中，常为他祝福，愿他战胜疾病，恢复健康！

在我与罗尔老的接触中，知道他不仅长寿有方，而且抗病有术，原《生涯六记》中第六记即是抗病记，从中可见罗先生对祖国医药的精通。然我欲集中体现罗尔老的治学经历、治学内容、治学方法和治学精神，征得他的同意，将第六记割爱了。最后我想在此补进罗尔老关于战胜疾病的两件体会，以增加读者对罗尔老抗病精神及方略的认识，从中获取益处。

罗尔老抗病的两件体会是，“一件是感到生与死为邻，对生命必须时刻警惕，一点轻忽不得。”他举出1950年、1989年两次危险，后一次在本文前边已提到，那是“7月2日凌晨一时，我坐浴起来，仰面跌倒，晕了过去。我妻已睡着，头颅撞地声惊醒了她。她慌忙起来把我拖上床去，过了半小时才醒，感到左臂和左边臀部作痛，量了血压为150/85毫米汞柱，检查左臂、左臀，都凝了紫色的血块，直到1990年1月才不痛。幸亏血压不高，否则便和那几位因跌倒去世的同志一样了。陆游诗道：‘此身虽幸健，敢作无事看，祸福在呼吸，恐惧兼寝饭。’我两次大险，就都因为轻忽，不知警惕，遂致频于死亡。回首前事，真正是祸福在呼吸了。”

“另一件是正确对待疾病。固然有些病要当机立断，争取早期治疗。但切不可一有病就发慌，乱投医药。有许多病应该仔细观察，有些病可以用理疗、食疗去治，还有些病可以不药而愈。”然后他分别举了许多病症与他对待的办法，还涉及到许多古今医疗经验加以参证，从中可见他对待生命和对待疾病的唯物主义态度。最后，罗尔老特意总结道：“上述对生命必须时刻警惕和必须正确对待疾病这两件体会，以与抗病有关，故并记于此。”

九

在我与罗尔老接触的十余年中，不论是从学界对他的奖誉中，还是从我亲身的经历中，都被他之为人治学精神深深地感动。他治学之穷经白首的坚毅形象，他为人之谦逊而不矫饰的学者本色，都给我以刻骨铭心的印象，使人终生受用不尽。当我撰写本篇时，尚不时地被他人品和学风推动着，激励着……

1996年11月1日

重读《甲申三百年祭》的思考

一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几乎历朝历代，都发生过使当朝统治者惊恐万状的农民造反行动。毛泽东对历代农民起义，研究有素。他指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5页）

今年是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结束明王朝统治三百五十周年，也是大顺政权功败垂成后的三百五十周年，即我们所称的农历“甲申”三百五十周年。李自成胜利攻进北京，到四十三天后京师得而复失，都在甲申年（1644年）。历史跨越至1944年，是又一个甲申年，从1644年距1944年，在满三百年之际，历史学家郭沫若写出《甲申三百年祭》，意在示人以前车之鉴，以防重蹈覆辙，其文所揭示的历史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毛泽东见到郭文后，所作出的反映及所采取的举措之异乎寻常，更见郭文之重大的现实价值及其深远的历史意义。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的讲话中向高级干部热情而中肯地推崇郭文，并结合党内历史上多次出现的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强调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901、902页）。于同年11月21日，毛泽东写信给郭沫若，高度评价郭文：“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41页）毛泽东所以十分重视郭文，除了它称颂与肯定农民起义及其革命的历史功绩外，而更在于其客观和科学地审视李自成农民革命的悲剧性历史教训，体现了毛泽东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的成败得失之深思熟虑。

二

明朝是农民暴动此起彼伏的朝代。究其原因，一是封建社会进入没落时期，矛盾尖锐；二是由于社会新的因素萌芽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三是当朝各代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和横征暴敛。尤其到了明朝中晚期，随着土地的两极分化，农村的崩溃及政治日益黑暗的过程加剧，与农民起义相伴随的，又不断地发生都市的民变。就在边患和倭寇侵略愈加严重的情况下，明朝统治者仍然集中全力去残酷地镇压和屠杀起义人民。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只不过是那个社会无数次农民暴动的代表事件而已，是明朝统治者制造出来的对立物罢了。明末农民大起义所以能由弱到强、由败致胜，其最重要的因素不就在于它之顺乎民意、得乎民心吗？

李自成的农民起义，是从地方贫瘠、灾难频繁、百姓负担过重和阉党剥削压榨残酷的陕北开始的。农民每年之所得，除了纳粮充饷以外，就所剩无余了，终岁靠野草、树皮、石粉等物果腹充饥。弃子、抛妻和饿死，已成为当时的普遍事实。加之，官吏追收派饷和搜刮，已经到了毫无容情的地步，于是官逼民反，也就势所必然了。再者，陕北农民，更有其极为丰富的斗争传统。李自成的农民起义，据史料记载，从起义到进京经历了十七个年头，虽然其义举是符合民心、符合历史，但是由于起义的领导者所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在不同阶段的清醒和成熟程度有区别，决定了其革命的曲折和顺利态势。在十七年的过程中，从崇祯元年(1628年)到十一年战败，前后为十一年，期间可以说起义军没有什么方针政策，没有一定的建制，纪律比较松弛，处于一种流寇状态；李自成失败后，又重聚力量，到崇祯十三年得李信(后改名岩)，李岩又荐牛金星、宋献策等，李岩等向李自成提出了“取天下”的方针：主要在不乱杀人，要散财开仓救济饥民，取得人民群众拥护。并在人民群众中提出：“迎闯王，……不纳粮”的号召，从舆论方面使得农民起义的威望大为提高。由此农民起义军可说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经过六年时间到十七年(1644年)即拥戴李自成为皇帝，国号大顺，建元永昌。以牛金星为天佑大学士；增置六政府尚书；设弘文馆、文谕院、谏议直指使、从政统会尚契司、验马寺、知政使、书写房等机关；重定军制，规定步兵四十万，马兵六十万；严申军纪，“有一马讒行列者斩之，马腾入田苗者斩之”；并“昔檄驰谕远近(即通告全国)”，“指斥”明朝恶政。由此可知，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已经具备了夺取全国政权的条件，已经作好了夺取全国政权的必要准备，真可谓革命形势一派大好了。

事实上也是如此，从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建大顺，二月东渡黄河，三月破居庸关，到三月十三日即进入昌平，十七日兵至北京城下，十八日遣投降太监杜勋入城劝帝退位，十九日就攻进皇城，崇祯煤山自尽。就此，李自成登上皇极殿，明朝之统治基本上就结束了。从建大顺到攻下京城，仅用了两个月零十九天时间，形势发展之迅速，胜利取得之容易，实在是出乎农民起义军领导者及其部下之所料。历史的辩证法也就是这样，恐怕正是这种易如反掌的胜利及其农民革命的性质，它本自就隐含着一种悲剧性因素。

三

李自成攻进北京，张献忠占领四川，明末农民大起义高涨到了顶点，此后便转向下坡路了。

在李自成初入北京时，诸多情况还是相当有利的：其一，明朝大批官吏，包括陈演、朱纯臣等纷纷迎降，从狱中出来的张若麟为起义军“策下江南”；梁兆阳称颂起义军“为救民水火，神武不杀”(《明季稗史汇编》《烈皇小识》卷八)。其二，自陕、甘、晋、冀以至豫、鲁的地方政权都建立了起来。其三，北京“士民各执香立门”，热烈欢迎起义军，人民群众心向大顺。其四，驻守山海关拒清之吴三桂，正在投顺和降清之间动摇。其五，冀东、热河、辽西一带的矿工和农民，纷纷“依山”“结寨”自卫，成为清军心腹之患。其六，李自成自身有着百万精锐步骑武装，斗志尚旺。其七，尤其是起义军所控制的地区人众、地大，生产水平远高于当时清占区的东北。等等。在这样如此有利的形势下，其领导集团如果适时地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即可阻止

清军入关，建立一个新的朝代(当然只能是封建性的朝代了)。然而由于其上层的骄傲与昏聩、腐化与争权、无能与失策，致使有利条件转向了自己的反面。

事实上，在当时全国局势正迅速地发生着复杂错综的变化，甚至有些态势是极其严峻的。就明朝讲，它的军队仍在继续与农民起义军对抗。即使在农民起义军控制的地区，地主阶级的力量还相当雄厚，并且时刻都在企图伺机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就东北方面讲，清军正在虎视眈眈地准备着大举向关内进攻，明将吴三桂还盘踞山海关，随时都有反攻北京的危险。面对着如此严峻的局势，也就是面临着如此强大的敌人，如何镇压地主的反扑，如何阻止清兵的入关，已经成为摆在农民起义军面前必须十分重视和必须集中主要力量解决的问题。然而，就农民起义军的领导层而言，却对以上生死攸关的问题并没有清醒和一致的认识，更没有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这些大事上面。

农民起义军进京后，把政府也从西安搬迁过来，但是并没有施行任何“收人心”和建国的新方针政策，就连原来在战争中由李岩等提出的若干有效的方针政策也丢在一边。请看农民起义军领导层在进京后的所想、所言、所做，就不难见其无大志和无远虑的情况了。大致情况如下：

以刘宗敏、李过、田见秀等为代表的农民流寇主义和享乐主义。他们一则不严格遵守纪律，不执行命令，即使在李自成要他们去打吴三桂时，甚至都不肯服从；二则纷纷为自己捞一把，贪图财货美色，不仅引起内部磨擦、倾轧和腐化，而且日益促使降官以至人民群众失望和反感；三则由于将校急速腐化，致使其部下以至士兵丧失原来的战斗力。既然上面那样胡来，下面自必更甚，加之分散于全城各排、甲，令每五家供给一人，无异放任其“淫掠”。尤其是刘宗敏强占吴三桂爱妾陈圆圆，迫使吴投靠到了清军一边，死心踏地地与农民起义军为敌到底。

以牛金星、宋企郊、宋献策等为代表的官僚地主思想和结党营私。这批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在起义过程中倒是起过一定的重要作用，但进京后原形毕露，招权纳贿，结党营私，生活日趋腐化。牛金星在李自成东征期间，终日“大桥、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甲申传信录》卷六《李闯始末》）一方面使得更多的明朝官僚地主混入政府，增加了腐朽消极力量；另一方面则因其与李岩政见不合，或者出于妒贤忌能，诬告李岩“欲反”，利用李自成之手除掉了谋虑与能力高于自己的政敌，致使大顺政权失去了最重要的智囊人物。然作为丞相的牛金星进京后，既看不见满洲贵族军事进攻的企图，也看不见明朝地主阶级势力卷土重来的危险，更不知怎样进一步来巩固政权，整日所忙的却是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即使在“颁发冠服”的过程中也有激化矛盾的作法，如把三品以上的降官八百余人加以拷夹，追问其所贪污的财货，并将大批投降的“勋卫武职……斩首”，对“富商……极刑追逼”，在方式和时间上都是失策的。

以李岩为代表的比较清醒和有政治远见的思想及其主张受到压制。制将军李岩在进京后，即主张贯彻所谓“收人心”的方针，不抢掠贪贿，礼葬明帝夫妇，不拷夹明朝降官追赃，巩固后方等。并针对农民起义军官兵中暴露出来的腐败和骄傲势头，曾向李自成上疏谏言四事：一、扫清大内后，请主上退居公厂。二、文官追赃，除死难归降外，宜分三等。三、各营兵马仍令

退居城外守寨，听候调遣出征。四、吴镇兴兵复仇，边报甚急。其中尤其“后两项似乎特别重要；一是严肃军纪的问题，一是用政略解决吴三桂的问题”。（《郭沫若全集·历史篇》卷四）但是李岩这个“过人”的主张，却被怀有成见的李自成置之脑后，结果“后来失败的大漏洞”恰好发生在李岩的远见上。

且说进京后的李自成，尽管他一如既往，保持了农民革命本色，甚至朝见百官，仍然十分朴素。作为领袖的表率示范作用是值得称颂的，但是在其进京后，是否也有胜利冲昏头脑，随同部下骄傲起来，渐至玩物丧志，甚至“集宫女，分赐随来诸(人)……各三十人”的情况呢？是否进京后，在镇压地主的反抗、阻止清兵的入关和用政略解决吴三桂的问题上，有着自己的政治远见呢？从对待李岩上疏谏言四事的态度上看，并非是英明君主。治国就是治吏，然在李自成用人方面，却亲近和重用牛金星等，疏远和猜忌李岩。敌国尚未灭，已将功臣诛杀，终铸成大错。在起义过程中得李岩而得天下，在进京后不用并信僭言杀掉李岩则成为失天下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以为，所谓“后来李自成的失败，自成自己实在不能负专责，而牛金星和刘宗敏们要负差不多全部的责任”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以圣上无过、臣下有罪的传统观点衡量李自成的成败得失，恐怕也是不妥当的。

就这样，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经过十七年的艰苦卓绝征战，建立了大顺政权，但是在进京四十三天后，却又因自身的失误，而饮恨而忍痛败离了京城，写下了一出让后人长久思考的大悲剧，其历史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四

《阿房宫赋》在写了秦二世而亡以后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只有有鉴于别人的教训，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一个人、一个群体，更不用说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只有善于从别人的正确的经验接受有益的启示，只有从别人的错误和挫折汲取有用的教训，同时更要有清醒的自我认识，既认定方向，开拓新路，又审视来路。倘若曾经覆车，还须有避开那种惯性的轨道，不以轻车熟路而重蹈覆辙。

最难忘的是历史，最容易忘记的也是历史。饱经忧患和沧桑，从远近的历史中找出经验教训，这才是极有益的好事。

1994年4月19日

惟有不忘“过去”

近读于光远先生《文革中的我》一书，给人的启示颇多，不过最具警示意义的是下面这段话：

历史上发生的许多事情会随着时间在人们记忆中淡化的。这是历史发展的一条规律。这种不可避免的、自然而然的淡化是一回事；通过历史研究的历史，使得那些不应该过分淡化的东西淡化得慢一些是另外一回事；而有意使某些历史事实在人们头脑中淡化起来，则又是另一回事；应该把三者区别开来。我国十年这段历史总的说来是不应该使它淡化的，它对中国人民的教育意义实在是太深刻了。我喜欢说这样一句话：“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我不能把握未来。”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今年是三十年了，就是它的结束，也已经二十个年头了。对于这场大劫难、大悲剧，它是怎样发生的？是怎样结束的？今后如何避免？这是需要总结的。只有敢于面对历史总结反省过去的经验教训，只有实事求是地纠正过去的错误，才能不再重蹈覆辙。十年“文革”灾难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的，决不可把用这样沉重代价换来的宝贵教训轻易地放弃掉。一个永远具有生命力而不断前进的民族是不怕这样做的，不仅敢于面对曾经发生过的沉痛的历史悲剧，而且善于总结反省曾经付出了沉重代价的历史教训，使之成为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警策后世，有益于未来。这恐怕就是以史为鉴的意义。

“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它给国家所造成的浩劫，它所留给民族的教训，是极其巨大而永远的。当这场破坏性的革命结束后，好多有识之士为了国家与民族的发展和前途，本着以史为鉴的精神，极力主张对这场历史大悲剧要进行全民族的教育和反省，让全民族永远牢记这场巨大劫难所遗留下来的历史教训，以免历史大悲剧的再度重演。诸如巴金提出的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邵燕祥提出的关于建立“文革学”，东方既白提出的拍摄“文革”电视连续剧，叶延滨提出的出版《“文革”说文解字》等，都是极其有益于国家与民族的建议，都是极其有远见有建设性的建议。故然，我们已经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对“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有过必要的总结，但是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历史科学及其历史反省，不应视为少数人的专利，而应深入普及到全民族全社会的每一员中去；要深入普及到全民族全社会的每一员中去，并不是决议了的东西就可彻底毁弃其土壤，而是必须进行全民族全社会的“文化大革命”历史教训的教育、总结和反省，才可使之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才可使之产生以史为鉴的久远效果。

巴金先生的建立“文革”博物馆之建议，其想法、其目的绝不是情感性的冲动，而是经过了长久的深思熟虑之后的理智性的思考，他的有着深远历史良知的忠告，我愿引出其中一段，以便国民大众重温之。

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过去”，才能作“未来”的主人。

读过此段巴老先生语重心长的意见后，我甚至想建议：应将“文革史”作为教科书，写进大中学生的课本中去，让我们的后代了解这段历史及其教训。

1996年4月

地域与藏书家

——《山西藏书家传略》评介

当我写下这个题目后，忽然又感到是否有些夸大其词呢？难道一本二百余页的小书，竟然有如此大的文化学术价值吗？

为了审视这个题目的准确性，确切把握本书的文化学术意义及其价值，我又静下心来阅读了一批有关的书籍，诸如清代洪亮吉《北江诗话》、叶昌炽《藏书纪事诗》；近代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徐信符《广东藏书纪事诗》；现代吴晗《两浙藏书家史略》、《江苏藏书家史略》；当代杨立诚著《中国藏书家考略》、郑伟章著《中国著名藏书家传略》、李玉安著《中国藏书家辞典》和谢兴尧《慎隐斋随笔》中有关篇章……才立定了按本题为文的信心。

我对几种藏书家的图书作了一个统计，从中可见《山西藏书家传略》一书的著者薛愈先生所付出的劳动及其价值。《中国藏书家考略》共收藏书家七百四十一人，其中三晋藏书家仅见三十二人；《中国著名藏书家传略》共收入五十六位著名者，而涉及山西的仅元好问一人而已；《中国藏书家辞典》收编全国藏书家一千一百四十九人，其中包括三晋藏书家充其量才十三人。“自古江浙多才子”，固然是不错的，但作为黄河文化发源地之一的三晋，恐怕也不至于藏书家少到如此地步。尤其对于从事图书馆工作已半个世纪和管理古籍四十多年的薛愈先生，他心里十分清楚，以上书籍怎么能反映山西藏书之概貌呢？薛先生有感于此种状况，“便从一九七七年开始，注意山西的地方志、史乘、通志、府志、州志、县志以及文献、文苑、传记、乡贤录、碑传铭刻等著述，凡遇到名人有关藏书事迹者，随时笔录，积年累月，终有所成。到一九八七年退休之前，已辑得一百九十余入，遂为《山西藏书家传略》一帙。”余所以称薛先生之一帙为：“弥补三晋文化学术研究空白之著”，据我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尚未见三晋有此耕耘者和同类性的著作。

如果把薛老之著和吴晗等著放在一起比较，还能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藏书作为一种文化看，它绝不是孤立的事物，而是同整个社会历史发展之盛衰相联系的，甚至与全国经济、政治及文化中心的地域转移有着紧密的关系。我们从中发现，当经济、政治及文化中心在关中、中原时，隋唐以前藏书家则多出秦、豫、晋、冀、鲁等黄河中下游沿省；当经济、政治及文化中心南移至杭州后，宋以后直至近现代，藏书家在东南江浙闽之众和藏书之富，其它省区难与之相埒。按吴晗记载：两浙是三百九十九人，江苏是四百九十二人；元明清定都于北京，藏书家在燕赵地区也有了它的繁盛发达时期。三晋介于中原与燕赵之间，它之藏书事业虽难及江浙，但薛老在《山西藏书家传略》中能达到近二百的规模，也无愧于黄河文化发源地之声誉了。不过也勿需讳言，山西到后来确实是封闭和落伍了。

从《山西藏书家传略》到其他几种藏书家专书可见，所收之藏书家均为私藏。虽然私藏晚于官藏，但此种“学术下移”现象，却弥补了官藏之不足，起到了文化普及的作用。过去的藏书家，确有着高低层次的分野，清代学者洪亮吉曾在《北江诗话》中将藏书家区分为五类：“藏书家有数等，得一书必推求本原，是正缺失，是谓‘考订家’，如钱大昕、戴震诸人是也。次则辨其版片，注其错伪，是为校讎家，如卢文弨、翁方纲诸人是也。次则搜采异本，上则补石室金匱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浏览，是谓收藏家，如范

氏之天一阁、吴氏之瓶花斋、徐氏之传是楼诸家是也。次则第求精本，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纵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最所深悉，是谓赏鉴家，如黄丕烈、鲍廷博诸人是也。”洪氏之藏书家分类，确有透彻的见解，但也不无偏颇之处。就藏书家而论，除了考订、校雠、收藏、赏鉴以外，许多人又同时是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和版本目录校勘学家。他们之藏书功能及其价值，往往是多方面的。为此，又可见薛老工作的意义之深远了。

从历代藏书家经历中，人们还能在字里行间看到，每逢改朝换代、兵荒马乱之时，藏书必遭兵燹劫难之灾，损失严重。吴晗在《两浙藏书家史略》序言中指出：“隋牛弘谓自古典籍兴废，仲尼之后，凡有五厄：大约谓秦火为一厄；王莽之乱为一厄；汉末为一厄；永嘉南渡为一厄；周师入郢为一厄（见《陆子渊别集·统论》）。隋开皇之盛极矣，未几皆烬于广陵。唐开元之盛极矣，俄顷悉灰于安史；肃代二宗，洊加鸠集，黄巢之乱，复致荡然。宋代图史，一盛于庆历，再盛于宣和，而女真之祸成矣；三盛于淳熙，四盛于嘉定，而蒙古之师至矣。胡氏统计之十厄，盖谓大业一也，天宝二也，广明三也，靖康四也，绍定五也。”（见《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一）以上所指，虽然主要是说官藏，但私藏在一些时代也不能幸免。薛愈先生所著《山西藏书家传略》，收入现当代人物六十余位，在记录本世纪战乱之厄，尤其“文革”之厄，对于藏书家之摧残和对于藏书之浩劫方面，更显出比同类著作有其特色。

最后，还有几句话要说，那就是薛愈先生在编著此书时所付出的艰辛，与他所得到的实惠极不成比例。如果按他从1977年着手此书，至1991年将书稿送往出版社算，恰是十四个年头；然又等待周旋了五个年头，自款出资四千元，才在今年出版。而本人所得到的是什么呢？全部报酬只仅仅是出版社赠给他的一百五十本样书。这件事情，到底该如何评价，至今我都不知怎样下笔为妥。

1996年10月

弘扬晋商文化之力作 ——评《晋商兴衰史》

中国几千年，奉行重农抑商政策。

然而，山西人所坚持的却是重商立业为荣的人生观。“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晋商称雄五百年，雄风劲吹明清两季，足迹几半天下，声誉满天下，从货贩到金融皆掌握市场主动权，成为全国十大商帮之冠。“尤其清代创立票号之后，商业经营资本与金融资本相结合，一度执全国金融界之牛耳。”明清晋商资本之雄厚，经营项目之繁多，活动区域之广阔，活跃时间之长久，在世界商业史上可谓罕见。明清晋商与世界商业史上著名的威尼斯商人、犹太商相较，堪称媲美。

然而，长期以来，对于晋商研究，却未引起中国学界的应有重视，甚至落后于日本学者。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开始有规模的研究，出版了多种有关晋商以及票商的著作，山西社科院张正明研究员，在著述《明清山西商人研究》(合著)、《山西工商业史拾掇》、译寺田隆侓著《山西商人研究——明代的商人和商业资本》(合译)后，近日又推出了《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一书，可视为他在晋商史及其文化研究方面的扛鼎之作。

总览《晋商兴衰史》，纵贯明清五百年，是有关这时期晋商兴衰史系统之作：

(一)承先启后。有关晋商著作，在建国前有卫聚贤《山西票号史》、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70年代后有日本学者《山西商人研究》，国内有史若民《票商兴衰史》、黄鉴晖《山西票号史》，然以上著作均囿于票商方面。本书则在于其对晋商五百年史全面系统的探索，其方方面面涉及全国和山西经济史；地主制经济和财政、金融、商业等部门经济；民族经济和对外经济，商业经营和商业道德等。

(二)史料丰富。该书是作者集十余年穷搜广积和精心竭虑所成，史料发掘也有许多首次披露的内容。据作者告知，此中有来自日本、美国收藏的晋商在日本开办银行的资料，晋商数学著作《新集通征古今算学宝鉴》，晋商著作《贸易须知》，孔祥熙谈话，祁县乔映霞的婚姻资料，“军机处录副”和晋商信函及家谱，等等。它有助于深化认识晋商史。

(三)视野深阔。该书加结束语共十章，分别论述了晋商、票商之产生原因及其年代，晋商之性质、历史作用及其地位，晋商之成功原因及其精神，晋商之著名商号、商人、商人家族等。作者将晋商之兴衰史放在了历史的大背景下省视，以比较方法将晋商与徽商等十大商帮，以及与犹太、威尼斯等世界商人，进行了比较研究。书中在探索晋商及其“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重商观念时，已将研究领域拓展至晋商文化，将商业文化与地区文化(晋文化)进行了交叉研究，弘扬了晋商文化价值观。但也正在这方面，表现出了不足。据悉，作者正在撰写《晋商经营文化》一书，我们期待着他的新著问世，以弥补其缺憾。

1996年4月

自知才上层楼尚须展布群才 ——谈现今学界人物辞典

中国乃文明古国，亦可谓辞书古国。

近代，西方输入和国外辞书及其编纂方法的输入，使中国辞书开始摆脱传统的字书、训诂书、韵书和类书、政书的束缚，逐渐在编纂思想及其方法上，与欧美辞书接轨，辞书走向了世界。

但我国本世纪的辞书研究有飞跃，却要到70年代末以后，这是中国辞书事业最兴旺的时期。

人物辞书作为工具书中专科辞典的一个类型尤见突出。数量大，品种多，从综合性人物辞典已拓展到许多领域和专科人物，由中小型人物辞典已发展为大型化、系列化，在众人一典的格局下已出现了专人辞典(如《孔子辞典》、《毛泽东辞典》、《鲁迅辞典》等)；更有甚者，人物辞典逾越了活人不入典的传统和禁区，在世人物收录入辞书已与先进国家一样成为通例，这应该视为正常思考获得自由后的表现。

在这个时期，学界人物辞书真可谓繁花似锦。据我所见，以类型说，人名录型(亦即人物志型、履历体型)、传记型、姓名型、特种型等品种俱全；以学术类说，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及哲学、经济学等，综合性和专科性的应有尽有；以地域范围说，国际性的、地区性的、国别性的无不兼顾，就我国国学界人物辞书说，除了全国性的，尚有各省(区)市的；以收录对象在世与否，学界人物辞书分别出版有历史人物和现当代人物，近十多年尤以后者(主要收录在世人物)更加时兴；以编排方法说，还出现了以形序、音序和义序(以人物为序的分类法，以生卒年为序的时序法和以人物国籍为序的地序法)来编排所收的人名辞典，也有所见；这多年的人物辞书，还以大百科、年鉴、年表、年谱、方志等特殊方式，兼收学界人物，亦成为一时惯例。由上所说，不难看出，近年来在辞书编纂出版方面(包括人物辞典和学界人物辞典)所取得的成就，是世所公认的；仅本人之速朽斋，近十多年所购之辞书(主要是学界人物)即在百余部，可成为这方面辞书的一个缩影。

这个时期的学界人物辞书，不仅品种多，而且出版量大，高品位的人物辞书确实推出了一批。但也有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情况，东拼西凑、剽窃抄袭，并非个别少见。

学界人物辞书所以在这个时期受到青睐，其真正原因使我长时间迷惑不解。或许是“文革”后批判了“知识无用论”，知识分子及文化科技学术人物地位上升的历史动因；或许是学术长期以来只作为政治的附庸，在“左”的禁锢被解除后，学术界人物及科学史、学术史回归的缘故；或许是海外辞书界约稿所影响和推动；或许是人物辞书及学界人物辞典引入市场经济机制而受利益驱动所致；……万花纷飞，应运而生。约稿函及收费辞典通知轮番轰炸，使得学界人士应接不暇，也干扰了正常的学界人物辞书的编纂出版。这些只问收费而不问学术的辞典是很难成为可信可用可存可藏之工具书的。

按现今学界人物辞书的现状和走向讲，可以说是：既有丰收之喜悦，也有质量之不足，还须改进。(1)应有统筹规划。学界人物辞典出版的品种和数量都很可观，但选题重复，思路一律，多典一面，有特色者少。全国几百家出版社，除了几家辞书专业社外，许多综合性社并不具备出辞书的条件，然也争着出大部头辞书，不仅保证不了质量，而且互相撞车是预料中事。像社

会科学家辞典，在我书斋中即有近 20 种，但多数收录人物残缺不全、高低不一，缺乏必要的涵盖率和包容性，当然也就不具备权威性。(2) 仍需消除意识形态的影响。我总有个愿望，在“文革”结束 20 年后的今天，以改革开放的视野，编纂一部大型的、涵盖 20 世纪、包容大陆及港台澳以及全世界华人(第一代)社会科学家大辞典来，这部辞典应不分政治倾向、不论学术派别，完全从理性的、学术的和客观的方法，介绍与评价每一位学者的学术成就及其创见，以此体现中华民族及其汉文化的兼容大度。我虽与同仁费时十余年编纂《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大辞典》，尽管艰苦备尝，但就个人之行政能力和经济能力，都难以实现其愿望和目标。(3) 重视提高学界人物辞典的质量。学界人物辞典与综合性人物辞典，有共性，也有个性的问题。体例混乱、褒贬不当、史料缺漏、内容空洞、介绍片面，收条不准，尤其是评价有失客观公允等，是人物辞书存在的共性问题；而学界人物辞典的突出问题除收录人物严重缺漏外，就是名录化、履历化现象普遍存在，看不出学术人物的家学渊源、师承关系、学术贡献、学术思想和治学特色。这样一来，这种辞典也就失去了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不具备学术人物辞典应有的质量。

1996 年 11 月

传记岂可“离史叛实”？

——当今人物传记出版现状述评

一

在中外历史编纂史上，传记始终都是极为重要的形式。

中国之传记源远流长，遗产极其丰富，真可谓浩如烟海。由于司马迁和班固的“史传”的长期影响，更显现其中国之传统特色。

随着时代由古代到现代的交替，传记也有一个从古代到现代的过渡，而梁启超、胡适的传记写作及其理论就成为这一过渡的桥梁。他们发现了中国传统传记的缺陷与式微的情形，同时发现西方传记的发展及其在学术上的影响；他们二位除自己从事新式传记的撰写外，更大声疾呼提倡一门新的学问，即传记文学。

然而，中国传记发展的繁荣时期，却由于政治原因，直到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才迟延地到来。从近年来的传记出版现状看，传记的生命力及其所受到的宠幸，可以毫不夸张地称之为出现了传记热。据有关方面统计，传记的出版量正以几何级差增长，好些优秀的传记很受读者之青睐，甚至于超过了畅销小说。这其中之原因及其道理，不论作为社会现象，还是作为文化学术动向，鄙以为都是值得研究和关注的。

二

以往之传记及对人物的研究与评价，可以说是限制在一个简单而僵化的模式里，无论古今人物除了其阶级属性外别无其他个性；就人物类别而言，除了政治人物尤其是个别核心领袖外，也就剩下为少数农民领袖作传了；在一些传记，诸如对农民领袖评价方面，又定式为“时代——压迫——革命——局限——失败”等传记八股，致使一些本来是生动活泼的人物变成了无血无肉的、甚至不食人间烟火的僵死偶像。

在结束了那个年代后，人物类别由政治人物拓展至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学、学术、文学、艺术、企业以至三教九流的社会各个领域，几乎都在传记中有了一席之地；评价人物的视野也由传统的政治评判广延到经济、思想、文化、学术以至个人经历、性格、心态、气质、人性等各个方面，并取得了一些突出的成绩；传记的种类已由开始的传略向大传发展，已由评传、纪实体传记、采访体传记更多地转向重视自传体传记、回忆体传记、年谱体传记。近年来有个可喜的变化是值得赞许的，那就是不少出版社相继把关注点投向文化界、学术界，推出了多种大型的系列性文化学术人物传记，诸如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南京大学出版社)、国学大师丛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名人自传丛书(江苏文艺出版社)、名人情结丛书(中国青年出版社)、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天津人民出版社)、学苑英华(上海文艺出版社)、文化名人20世纪回忆丛书(山西人民出版社)、20世纪中国文化论著辑要丛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中国近现代思想家论道丛书(上海远东出版社)等，采取这种举措的原因，不难发现历史已到了世纪的转换之际，人们通过对文化、学术的回顾与追怀，总结一个世纪的文化、学术实践，抢救一个世纪的文化、学术资料，来一次文化学术的有目的、自觉的积累，实在是具有远见之策，有共识之举。对于社会和学界反思历史之得失显然大有补益。

还值得称道的是，这个时期的传记确实突破了一些禁区，诸如尽管领袖传记仍大行其道，但却是拂去了罩在领袖们身上的神圣的光环，把他们还原为有七情六欲的具体的人，过去那种仅在经天纬地、运筹帷幄中，总是不苟言笑、没有脾气而完美无缺的形象，成为了“人所固有的，我必固有”的具有普遍共性的人物，使之更加真实可信；再者不为反面人物立传的戒律亦破除。过来的人，也许还记忆犹新，在那个年月尤其是“文革”中，谁敢为反面人物立传或出版文集？即使有，恐怕也是专供大批判用的。近年来，既有大量正面人物传记问世，也有一批反面人物传记与读者见面，这样才能使今人后世从比较中认识忠奸善恶、辨别是非曲直和判断社会得失。还有，中国历来有盖棺论定之传统，即活人不立传。当今，这个禁区也破了。在这个问题上，我十分赞成庄昭先生的见解，他指出：生者不立传的传统，“至少有两点缺憾。其一，人死了才立传，即使其业绩再辉煌，品行再高尚，也大大削弱了它的号召力和教育作用。其二，传主已去，许多事情就永远也说不清楚。传记作者往往感到很难把事实全部写得清清楚楚，于是留下不少疑窦。而为生者作传，恰恰可以弥补这两方面的不足”。其实，既为逝者著书，也为生者立传，早已是国际通例，放弃传统的戒律，实是一种进步。

三

综观这个时期的传记，从总体上看，传记出版数量很多，但是佳作、精品甚少；传记作者队伍已经形成，但是学养素质参差不齐；传记大家尚未出现；在传记写作方面，还存在着不容小视的问题。这里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立传违背和脱离了历史真实的原则。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有的为亲者、为贤者、为尊者讳，有的则故意佛头著粪，或杜撰材料，或疏于考订；或受情绪左右，或囿于先入为主；或醉心于花边新闻、轶事揭秘；或迎合于窥视欲、追求官能刺激；或失于把握历史事件，或褒贬人物失去公允；……结果在传记中留下很多漏洞和史实错误，甚至出现溢美溢恶的弊病。如果再深一层思考的话，这其中又不能不受现实因素的影响，尤其涉及现当代显要人物，或历史档案公开性差；或易于受到各种现实问题的制约；或现当代显要人物都处于现当代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时代环境中，不论正反面人物都可能有点微疵或小善，可是传记作者总喜欢用简单的结论套在一些传主的头上，使得人们难以看到他们的思想发展变化的过程，由此也就不难发现所以产生溢美溢恶的根本原因了。有些传记作者，或许就分不清历史传记和文学传记的界限，甚至缺乏对传主从通体上的把握和精神特质上的把握的功力，在作传时，既提供不了传主的新材料，也提不出对传主的新见解，只凭情感臆造人物，虚构境地，发挥想象，尽力渲染，这种偏爱偏恨的作法，自然其立传也就失去了他的可信程度。在传记热的今天，建立传记学及其理论，重视传记学及其理论的建设，首先让一些传记作者懂得历史传记与文学传记的区别，遵循真实性是传记的灵魂的首要原则，恐怕应成为当务之急。这也许是使传记写作水平提高和传记质量跃上新高度的根本性的基础建设。

在传记写作中还有一个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如何结合的问题。所谓历史评价，就其要者而言，就是对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在整个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作出判断；所谓道德评价，就其主要点而论，就是对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作出善或恶的判断。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往往处于错综

复杂的关系中，从而形成了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之间的尖锐的对立和冲突，常常出现从道德评价看来是恶的东西，而从历史评价上看却常是进步的。为此，这就要求人们在评价任何现象和任何人物时，应始终把历史评价放在首位，并注意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有机结合，以避免将二者颠倒和一概而论的简单化错误。

在中国现代史上，由于新旧社会的更替，有不少人物在过渡过程中发生过失误和落伍的情况，这就存在着如何进行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的问题，如何贯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的问题。这几年像曾国藩、李鸿章、吴佩孚、张作霖、蒋介石、汪精卫、林彪、王明、康生等所谓的反面人物，都有大传出版。从对这些人物的评价看，除个别人物的传记比如曾国藩传写得客观合理外，多数存在着公式化、脸谱化的毛病，有些传甚至胡编乱造，严重失真，好像从娘胎出来就是个坏蛋。像这种现象，就带有以道德评价去衡量事物和人物的弊病，结果势必造成一概骂倒、一概否定的偏颇。这些反面人物处于复杂的时代背景下，都有着复杂的经历，一生都在复杂的人事矛盾中生存，形成了他们的复杂心态和复杂行为，每个人都是一个复杂的典型人物。企图以简单的模式构画他们，没有不失败的。传记中作者本来想以自己情绪爱憎塑造一个反面形象，以激起人们的憎恨而起警诫作用，然由于其失真失信，效果却适得其反。

王森然先生是著名的传记学者，早在 30 年代就写出了近二百万字的《中国近代百家评传》，所撰对象均为近现代重要显赫人物，但就政治倾向讲却正反面人物俱全，若论他对这些人物的评价，都严格恪守了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相结合的原则。在 80 年代，王先生说到对谭嗣同的评价时指出：“谭先生献身精神，惊天动地，但以他那样方式去救祖国，是无济于事的。我们敬佩他的大勇，为他作传，有利于唤起后辈的民族自豪感，将来要重新评价。至于引用《仁学》中的几句话，旨在于咒骂反动政府的统治者和政客。对始皇功过，可以讨论，荀子学术思想，也不能抹煞。”王先生还重新审视谭传，认为“谭嗣同的传记编写史识未高，史料未组织好，层次欠清楚，人物没有放到历史环境中去叙述，他日当重写”。谈到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时，他强调：“我在历史人物传记中有骂人的地方，是在旧社会，万不得已，但是我坚决反对搞影射史学。历史上有许多真实的东西，讨论清楚，便对后人有益，能起到镜子的作用。”他认为：“传记无须为贤者、尊者、亲者及自己讳。是什么说什么。凡是推助过历史前进而为人民做过好事，在学术方面哪怕一点一滴超过前贤者，都不能抹煞……。金要足赤，人要无瑕的狭隘眼光和过分苛求，做不成大学问。”这种不掩恶、不溢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诚，但求真于历史，有益于时代的学风，是何等之可贵。

1996 年 11 月

“文集热”中话文集

进入 80 年代后，编辑出版文集(文集、选集、全集)似已成为一种时尚，而且还呈方兴未艾之势。

中国历史上向来有编辑出版文集的文化传统。作为一种文化积累方式，编辑出版文集无疑有着它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然而从已经编辑出版的文集看，由于编辑目的与宗旨的迥异，却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及其价值，有的文集甚至为了解历史者很难卒读，甚至可以说一无价值可言。最近看到几段有关编辑出版文集的文字，现转引如次作为参考。

其一，《光明日报》1995 年 6 月 21 日刊出白京兆的一篇专访，说到《冰心全集》将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可又讲《全集》是由卓如“选编”的。既然是《全集》，起码要求要全，只可编，不可选。如果采用“选编”方式，岂可称为全集？

其二，《胡绳文集》(1935—1948)，全收入其解放前的文章，文集的主人声明，现在编这个文集，采取对原文一律不动的原则。除了错别字外，个别处做了修改的也只限于句子不通、事实材料错误的地方。著者在序言中告知读者，在 1960 年左右曾偶然重读十几年前自己写的一篇文章，觉得还有点意思，但又觉得不满意，于是我动手来加以修改。改了两页后，发现每一段落都改了不少。这样改出来后，到底算是什么时候写的文章呢？于是放弃了这种愚蠢的做法。我们以为，以上见解，对于当今编文集者也许是有匡正意义的。

其三，近闻《张闻天文集》四卷本出版。这之前读到《张闻天和他的“肇庆文稿”》(见《党史文汇》1995 年第 1 期)，文中说及张闻天流放肇庆期间，写下了《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些问题(学习笔记)》、《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的公私关系》等四篇文稿，共 8 万多字。这些文稿，后被理论界统称为“肇庆文稿”。然在《张闻天选集》中仅选不足三万字。如果说选集中只用不足三万字是“选集”的需要的话，可是十年后刚出版的《张闻天文集》第 4 卷，在编辑时仍与“选集”一样，却一字未增，仍难见到“肇庆文稿”的全貌，我不知如何理解了。

其四，邓伟志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文集《我就是我》，自序中说：“十多年来的杂文，全是我写的，……我乐于对这些文字负责，乐于为其优负责，乐于为其劣负责。在这次成书时，我甚至把在今天看来已经不合时宜的文字也保留了。保留的目的不是让谬种流传，而是不愿讳疾忌医，不愿隐恶扬善。我一直反对在出文集时把当初的文章‘现代化’，我一直主张在出文集时不要篡改原文。要改，我应该像马恩修改《共产党宣言》那样：加注！不然，岂不是太难为历史了？我一直认为我的文章有优有劣，今天依然这么看。如果只有优，没有劣，那就不像我了。我就是我。我对自己一分为二。”此种编辑文集的主张，应该说是合乎历史要求的，不失为严肃而负责的态度。

其五，如今有“洛阳纸贵”之《顾准文集》，颇受思想界、学术界推崇。不过这部文集所以受到高度评价，主要是文集的主人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及其独立的学术人格，以及这部文集中主要部分思想成果所产生的特殊年代及其主人所处的特殊境遇而决定的。至于说到文集的编辑，也并非无遗憾可讲。贵州版将香港版中删去的两篇《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民主与“终

极目的”》恢复，使得《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成为完璧，是为幸事。但是如果将陈敏之当年给其兄顾准的去信能够附在后面，岂不更佳？

由以上所引看出，文集的编辑，或是自编的，或是他人编的，或是本人授意下编的；有的生前所编，有的是身后所编。从所编之文集的目的与宗旨见，明显地存在着政治取向、思想取向、学术取向和文化取向的不同。归结起来不外是：

其一，为特定的社会群体提供学习文件，要人们在思想上和行为中遵奉恪守。

其二，出于为先人和师长树碑立传，以确立其在某个领域中的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

其三，立足于为今人提供文化消费和适令商品，时下青年人和部分艺术名人的文集显然属此类。

其四，在特定的条件下，将有代表性的人物以反面角色编其文集，意图是在提供所谓反面教材。

其五，为历史进行文化积累，为后世保留文化遗产，为再现历史的研究存藏原貌史料文献。

显而易见，不难看出，五种取向自然都各有其所需。不过我们仍毫不隐讳地认为，从编文集的本来意义上讲，我们倒更主张把文集的编辑出版作为一种文化事业，作为存藏历史文献史料，作为一种文化积累更为有价值 and 更为有意义。就文化积累的意义而论，文集与选集都不及全集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高；但是鉴于读者之文化素养和需求的不同，文集与选集自有其读者对象；但是不论哪种文集，文章均应保持原貌，切忌胡绳指出的那种“愚蠢的做法”，不要对当初的文章作“现代化”的改篡。即使文集与选集虽然节选是被允许的，不过需要加注说明。作为全集，保持其“全”是起码要求，不能碍于尊者贤者，而蔽功隐过、掩是饰非，不忠于史实，不进行实录，伪造历史，欺骗社会。

当然，文集的编辑不排除编者的初衷，但是很可能初衷与效果是不一致的，即使像过去立足于供批判的所谓反面教材，随着历史的推移，也会成为历史的思想资源及其史料。更何况即使是尊者贤者，就历史之长河审视，哪位不具有历史的局限性？是非自有后人评说，就像列宁遗嘱、《绞刑架下的报告》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虽被一时政治需要改篡删除，最终仍会恢复其历史原貌。故而，编辑文集还是以文化积累的眼光对待，来得科学，更符合历史观点。

1996年6月

全集岂能选？

偶翻旧报，得知《冰心全集》将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冰心老人是五四作家中最后一位健在者。《全集》若能在她生前出版，实为文化建设之幸事。

但读了《光明日报》6月21日白京兆的专访，说《全集》由卓如“选编”，我产生了一丝疑惑。我倒不是对卓女士有什么看法。她赠过我她写的《冰心传》，我读过之后，感觉甚好。我知道，她对冰心，无论学术上，还是其他方面，都很尽心。冰心对她也是极信任的。问题在于这个“选”字。在我看来，既然是《全集》，只可编，而不可选。全集要全，这是起码的要求。这不只是为着对名人的尊重，更是对历史负责。具体到《冰心全集》，我强调这一点，更不是无的放矢。

我记得，冰心前几年应《北京晚报》之邀作了一篇短文，因对中国教育事业的现状有尖锐批评，被删去一段，老人十分不快。这些内容在《全集》中能否恢复完璧？冰心在当今中国知识界之所以德高望重，其原因之一正如萧乾所言，“老年知识分子当中，还有冰心大姐这样敢于讲点不中听的话的作家，这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巴金也说，“我也知道她有些‘刺眼的句子’不讨人喜欢，要让它们和读者见面，需要作家多大的勇气。”但这些“不中听的话”或“刺眼的句子”是否会被筛选于《全集》之外，也是我所担心的。

本来，我的这点想法可以与卓女士通信说明。但有感于目前中国出版的全集、选集开始多了起来，其中出现了一些不尊重历史的偏向，诸如以现实需要剪裁历史，为尊者隐，为贤者讳等，所以我愿把这些想法公之于众。

但愿我的担心多余。

1996年10月

《胡先驌文存》与“补遗”

最近，通过朋友胡宗刚先生的帮助，使我如愿得到了《胡先驌文存》上卷，其兴奋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如此，一是感到中国现代植物学的奠基人和《学衡》学派主将之一的胡先驌，有了可供学界了解和研究他学术思想的依凭；二是感谢编者为国人和学界做了一件极有价值、极有意义的事情。

胡先驌(1894—1968)是现代国际著名的植物学家，又是我国把西方新人文主义思想运用到中国文学批评上的第一人，同时还是造诣颇深的古典诗人，在中国科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虽然他之诗名被植物学专长所掩，但是提到本世纪初文学史上的“二胡之战”(胡适与胡先驌)和20年代文化史上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之论战，恐怕都不致于忘却一位骁勇善论的主将，他即是文理兼通的胡先驌，有时人们又往往会忽略了他之专业却是一位成就卓著的植物学家。

《胡先驌文存》分上、下卷，上卷为人文学卷，下卷是自然科学卷，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1995年)。本书虽称文存，却不是全集，据知胡氏业已成书的自然科学专著即有14种，散见的中文论文有85篇，英文论文66篇；据文存自然科学卷简介说，“英文论文尚未著手收集”；著作“若全部再版，因需要大量资金，目前很难实现。”文存上卷六十万字，七百四十四页，收编了胡氏现存的古典诗词七百七十八首及有关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论文、短论及讲演记录49篇，据说“胡先驌与胡适文学论战全部论文”均已包括其中了。

翻阅是书的同时，一种遗憾的感觉忽然产生了。“出版说明”中第四款称：“由于本书为原始资料汇编性质的书籍，因此书中的某些观点和提法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历史局限性和认识局限性(如对农民运动的看法等)。为保持历史原貌，便于学术界研究作者的思想观点，除进行了最必要的删节外，基本上都未加评判地予以保留，希望读者阅读时注意鉴别。”接着又从中发现了加页，内容有：一是《胡先驌文存》自然科学卷简介，二是《胡先驌文存》上卷勘误表，三是《胡先驌文存》上卷补遗。

在这里，我十分理解编者的难处与苦心。既然有了“出版说明”的第四款，后又增加插页作上卷补遗，作为读书人来讲，能读到全篇，能了解全貌，那是最高兴不过的了。问题是这里有两个问题需向编者献疑：其一，既然“出版说明”已载明“本书为原始资料汇编性质的书籍”，又理解“书中的某些观点和提法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历史局限性和认识局限性”，为何还要作“最必要的删节”？连“原始资料汇编”都不能看到全书全篇全意，其原始史料价值何在呢？其二，关于“补遗”之含义如何理解，我特别查阅了有关辞书，这样标释着：“书籍正文有遗漏，加以增补，附在后面，叫做补遗；前人的著作有遗漏，后人搜集材料加以补充，也叫做补遗。”《胡先驌文存》上卷“补遗”，显然属于后者，然又不尽然符合事实，这里并非遗漏，而是人为地作了所谓“最必要的删节”后造成的。随之又带来另一个问题，既然为前人编文集或全集，就应全貌全数编入，人之一生及其思想，谁能没有历史局限性？谁能一以贯之地正确？谁能不受到后人评说？即使最伟大的人物，恐怕也不会例外。更何况作为一位学者，一生都在探索未知，岂可在所有问题上没有失偏失误？反之，倒不正常了。

1997年2月24日

主编《晋阳学刊》的十年探求

70年代末，随着“凡是”思想体系的否定和解放思想运动的深入，全国和省市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相继恢复和建立，创办了不少学术研究刊物，一反“文化大革命”中学田荒芜、术林萧索的严峻形势，而出现了学苑百花盛开，学刊丛立如林的可喜局面，社会科学研究呈现出春天似的繁荣景象。

1978年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恢复，我于次年调入所内筹组刊物出版。过去，我虽然接触过报刊，但是专门主持学术刊物尚属首次，故而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即进行学术调研考察，然后才结合山西的情况提出实施方案，于1980年创办《晋阳学刊》。

《晋阳学刊》为山西社会科学院院刊，国内外发行，在全国数十种综合性学术刊物中，就其学术档次和文化品位讲，就其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声誉和影响讲，似可列入中上游地位。所以如此，与我们强调刊物的个性特色密切相关。记得邹韬奋先生曾经说过，没有个性和特色的刊物，生存已成问题，发展就更没有希望了。邹先生将刊物的个性特色提高到存在和发展的高度，并以它作为衡量刊物力度的标志，是很有道理的。我们从《晋阳学刊》一创刊，就特别地重视和倡导刊物个性特色的形成；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将个性特色当着维系刊物的生命力和生存发展的基础来对待它。

道理显而易见，除了社会科学院系统的综合性刊物有数十家外，还有大专院校上百家文科学报，在学刊林立的情况下，如果主编者的思路千篇一律，缺乏形成刊物个性特色的标新求异举措，势必将刊物办成一份千人一面和毫无竞争力的大拼盘。我不敢自吹我主编《晋阳学刊》期间刊物的个性特色就独具了，但是我却敢说在办出个性特色方面，我与我的同事们是作了追求和探索的。到1989年底我辞去主编时，出刊五十七期；后又参编两年，共是六十七期。在这期间，所刊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六十多种国内外报刊转载和摘载，转载文摘率约占74.6%，由此可见《晋阳学刊》在文化学术界的认可程度和学术影响。

杂家与专家

一份刊物能否办好，关键在于编辑队伍。

《晋阳学刊》的编辑基本上是研究人员，他们自身都有专业，这恰是符合学术刊物需要的。按着习惯的说法，编辑应是杂家，应具备广博的知识，才可胜任。但是这个要求，对于专业刊物和综合性学术刊物的编辑是不完全适当的。《晋阳学刊》是综合性学术刊物，学科设置有哲学、经济、历史、文学、文化等，这就要求主持每个学科的编辑，首先应是学有专长的学者，也就是专家，否则就难以衡量和判断该学科论文的学术价值。如果说杂的话，也仅是在其学术领域中本科与分支学科的区别，例如哲学，就有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哲学原理与哲学史、古代哲学与现代哲学等的区分，这里要求哲学编辑在知识面上要能兼通，所谓“杂”仍然在学科相近范围内，基本素质还应该是学者专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贬斥杂家，而是说明学术刊物的编辑应与一般性杂志的编辑在专业构成上不同，或者说学术刊物的编辑，其知识绝不可停留在所谓“杂”的一般水平上，一定要是学有专长的专家，甚或是学者型的编辑。

在现代社会科学家中，有一大批学者是编辑出身或先成专家而后从事编辑工作的。他们既是编辑，又是学者，在他们身上不时闪耀着人类智慧的光芒，飘洒出一种特有的人格力量和醇烈的学者味，而绝少商人味、政客味和市侩味。他们是一群有学识、有修养、有的人生风格，且有风范、有魅力的伟岸夫子；他们有强烈的使命感，对真理有执着的追求精神，有通古今之变、融中西之学的文化心态，有开风气之先的胆识与魄力，是真正一代饱学之士。他们中如梁启超、张元济、鲁迅、茅盾、叶圣陶、郑振铎、舒新城、丁福保、宗白华、曹聚仁以及陈独秀、瞿秋白、王云五、胡愈之、张季鸾、金仲华、王森然诸公，都曾作过编辑，都是专家学者，他们以刊物为阵地弘扬学术文化，以学术造诣为内涵深化编辑业务，谁能分清他们何时为杂家何时为专家？

我们基于对学术刊物编辑学识构成的思考，对近现代学术历史的借鉴，从《晋阳学刊》创刊即要求编辑要学者化，具体体现是以编为主，编研结合。这个原则尽管屡遭干扰，也未曾动摇过。在实践过程中，又发现编研结合对增强编辑素质和提高刊物质量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于是更坚定了学术刊物编辑必须学者化的原则。

学术刊物的编辑非学者化，势必带来许多弊病；缺乏学术意识，缺乏学术反馈，缺乏学术兼容，背离学术精神。我以为，要做一个合格的学术刊物编辑，就应当在编刊的前提下进行学术研究，撰写学术论文，甚或著书立说，亲历一下研究与写作的艰辛甘苦。为着研究与著述，就得观察体验，就得阅读思考，就得调动语法、修辞、逻辑诸多知识因素和手段来进行综合性的实际运用，并在这一过程中，把知识转化为才能，把原始材料转化为学术成果。如此，编辑的知识素质、逻辑思维、信息敏感、学术造诣、审稿能力、文字水平等，都会发生重要变化。编辑学术水平提高了，在约稿、取稿、审稿和发稿质量上都能体现出来。以判断论文的学术价值为例。一篇论文的学术价值是高是低，必须经过如下顺序才能加以判定：一、论题价值。有大的学术价值；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略有学术价值；无学术价值。二、研究方法。有科学上的突破；正确运用了已有的研究方法；比较得当；不科学或有明显的失误。三、运用材料。全面且有新发现；比较翔实；基本可靠；常见常用或转用而不得当。四、逻辑论证。缜密；有说服力；有条理；混乱。五、基本结论。有创见或重大发现；成一家之言；较有新意；无新见。根据上述标准判定论文的学术价值高低，编辑必须具备较高的学术素养。一个学术刊物的学术质量高，是以它的编辑的学术素质为基础的。

学术与政治

学术研究是人类对未知领域的探索，是高层次的思维活动，是人类最高智慧的表征。学术的基本特征就是积累性、探索性与创新性。每个民族在其自身发展中，都必须批判和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绝不能一切从头摸索，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也是学术发展的规律。同时，它通过不断的设疑和批判，扬弃旧知，获取新知，不断地走向真理。因此，学术是人类向往真理、追求真理的有效方式，通过学术研究，人类发现了真理，同时也发现了自己。学术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精神不断提高、不断解放的历史。学术与思想解放有着本质的一致性。学术研究的方法，就是运用逻辑思维寻求实际材料和各个知识领域之间内在的正确的联系，这正如恩格斯指出的，

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能有所帮助”，除此而外，“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马恩选集》第3卷，第465页）。

学术刊物是积累精神文明财富、传播学术信息、交流学术成果的出版物，是繁荣学术研究、发展学术文化的有力手段。因此，学术的特性就是学术刊物的特性，学术对于人类的必然性就是学术刊物存在的必然性。学术刊物的对象是以学术理论工作者为主体的知识群体，这就决定了学术刊物与通俗性、普及性、宣传性刊物的区别。在学术层圈内，学术刊物应发挥凝聚和导向的作用，以兼容性团结各家各派学者，以争鸣性深化学术热点难点。使凝聚与导向功能相辅相成地有机结合，推动和繁荣学术事业。

在主编学术刊物的过程中，多年来困扰最多的问题，主要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过去，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被弄得混乱不堪，学术几乎丧失了自己独立的品格，成为政治的附属品；学术刊物也成了舆论一律和千人一面的工具。勿庸讳言，把握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不仅关涉到刊物为谁服务的政治方向，而且也关涉到学术保持自己的品位，按照自身的规律繁荣发展的问题。必须看到，学术与政治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范畴，它们在客观上各有其独立存在的领域和独特活动的方式。正因为学术与政治不同，在时代的大背景中才有彼此的联系。政治与学术永远地处在一种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过程之中，学术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直接或间接的形式与政治发生着联系。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既不容许有脱离政治的倾向，又不可能有所谓的“纯学术”的存在。学术刊物应当既承担起政治责任，又体现出学术研究的严肃性，以体现学术的独立品格以及在社会实践中它与政治的天然联系。鉴于以上的基本认识，我们在办刊实践中，恪守以下原则：其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运用它的科学方法论推动学术研究；其二，以它本身为对象，为它的运用和发展进行科学研究。学术刊物的政治方向问题解决了，学术如何为现实服务、如何处理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探索与争鸣

学术研究是探索性的理性思维，它的探索常在未知领域，其探索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在旧知的基础上寻求新知。由于研究者长期在特定的对话系统中执着地工作，自然地形成了自己的思维定势，形成了自己的行为习惯，形成了求异和偏执的性格。求异和偏执在人的日常生活中，当然是个缺点，但在搞学术研究时，恰是重要的和必不可少的心理条件。因为只有求异和偏执，才能引起其他研究者的争执（争鸣）和作更进一步研究探讨的兴趣，才能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才能造成百舸争流的态势，以促进学术的繁荣和发展。

百家争鸣是一种客观的必然性，而不是主观的必要性。不论是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还是科学上不同的学派的争执和存在，都是学术及其学术刊物活力的体现。要使学术刊物充满活力，必须探索，必须求异，绝不能千人一面，众口一词，舆论一律。一个学术刊物，一定要在学术气度上营造一种相互启发的学术环境。一个学术刊物能够形成一个学术流派，能够成为一个学术运动或学术争论持续不断地发表学术成果的阵地，成为某个学派的一面旗帜。学术刊物还应该是不同学派，不同观点争鸣与发展的学术场所，而不是什么法律裁判之地，更不是什么具有排他权力的一家天下。学术刊物的

任务就是要在学术探索和讨论中，把百家争鸣推向自由境地，对学术成果的评判坚持学术标准，只要确有研究，言之成理，不管其观点属哪家哪派，刊物应尽量提供篇幅，给予发表的机会。对待不同的学术观点，刊物不可偏亲一方，而要让双方展开平等讨论，除了防止对学术观点的政治批判外，还要避免双方的意气之争。当然并非刊物没有主体作用和毫无主见，其职责就在于寻找契机，因势利导，深化讨论。

在探索与争鸣中，还有一个如何对待失误和谬误的问题。学术探索有个特点，那就是要进行超前性、预测性的研究，需要涉足新的学科领域和新的认识领域，提出新见解、新观点，有新发明、新创造；这样，自然就不能要求其观点与结论完全正确，没有失误。相反，这类研究成果可能出现正确与谬误混杂的现象，甚至完全错误。这种情况是正常的，是应该允许的。我们的刊物要有民主气度，鼓励和支持失误的学者继续探索，给他们以弥补和纠正的机会。更何况，检验学术观点正确与否，需要一个过程，要通过实践检验，不是马上就能下结论的。再则，探索性研究的失误，多半表现为个人学术观点的偏颇与不安，是一种学术行为，不能说明政治立场和学术上的反动。我曾在《晋阳学刊》1986年第3期写过《试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成败与功过》一文，目的在于说明应该确立学术探索中的科学功过观。

地方与全国

在办学术刊物过程中，常常遇到如何处理地方性与全国性关系的问题。作为一家隶属于地方性社会科学机构的学术刊物，要求其地方经济政治、学术文化服务，应该说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过如何理解这个服务，文章可就多了。所谓为地方服务，并不能说只刊登本地作者的成果，只堆积本地的问题和事情，就是最佳服务形式了。岂不知，学术是公器，学术文化除了有地域性外，还有共同的发展规律。我们发现，在学术研究中，有好多重要选题和项目，往往既是地方的，又是全国的。例如《晋阳学刊》开辟过的“傅山研究”、“元好问研究”、“司马光研究”、“三晋文化”、“晋国史研究”、“晋商研究”、“理学与明清文化研究”、“《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选登”、“历史唯物主义社会改革研究”、“现代文化思潮”和“优秀企业家、企业改革史”等栏目，即使是地方性人物，也是在全国有影响的；一些全国性的题目，却又是推动本地同类问题所共同需要的；虽然是古代的选题，但对现代有借鉴意义；或者是现代项目，却与历史有着继承关系；说的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人物传略，同时也覆盖了本地的学术人物及其史料，等等。通过以上处理，较好地解决了地方性与全国性的学术研究的关系问题。以《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选登一栏而论，一辟设就是十年，其在刊物编辑史和在现代学术史上的意义，其对于地方学术事业的推动，都是显而易见的，不言而喻的。

学术文化的服务，并不能狭隘地理解为立竿见影、急功近利的服务，而只能理解为积累、继承、借鉴、启示的作用，否则就会犯过去年代那种简单化、庸俗化的毛病。

1994年3月/PNG>

